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 中国道路丛书 · 学术

The Political Etho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香港人的政治心态

刘兆佳 著



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

孔　丹　金耀基　李明堃
陈弘毅　李彭广　强世功
联袂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香港人的政治心态

作者:刘兆佳

ISBN:978750866958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

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孔丹

2015年11月25日

序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三册书汇集了近40年来我对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所做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原以英语撰写并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发表，现在经翻译首次以中文出版。这些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的研究重点和目标，也反映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香港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迁。这些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着重指出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之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非完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凸起有更大的关系。

尽管我年轻时念书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开办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但我在中学时期已经深深地被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的主张所吸引，因此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认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即便如此，回香港工作后，我还需要物色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头两年，我一直在摸索将来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假如这项研究能够启发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则日后我的研究重点便会是内地而非香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来说关系重大。然而最后，我决定舍“中国研究”而取“香港研究”，这当中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不等于我特别“爱”香港。虽然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和受教育，但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爱香港并非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当然，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对香港的感情不断加深，进而促使我更加锐意研究香港，并愿意对其未来尽一份力。

第二，虽然从功利角度考虑，“中国研究”应该是首选，但是内地研究中人民公社研究的经验却让我对“中国研究”感到犹豫。一方面，我没有把握能够从内地取得大量信而有征的材料和数据，以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我感到人生苦短，希望自己在有限生命中创造的研究成果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具有实用和传世价值。因此，“中国研究”对我来说风险太大，非我所能承担。相反，就算“香港研究”不能带来丰硕的学术回报，甚至对个人的学术事业造成阻滞，但从学者“求真”的精神出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如何，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他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这样才会产生“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做抽象和理论的探讨，因此不需要对某一特定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课题。

第三，“香港研究”越来越成为迫切的实际需要。回顾过去，1975～1981年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黄金”6年，是我可以在比较不受外面世界干扰的环境中专注于学术工作的6年。1980～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期间出版了《香港社会与政治》（*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1]一书。自哈佛回港后，适逢香港前途问题出现，中英两国政府及香港各界人士都被卷入这个历史性事件之中，我个人也不例外。作为香港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日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中英两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不时向我咨询，提出现实或政策性问题。政治环境的突变，使我在“象牙塔”内做学问的同时，还要回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1992年，英国政府派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在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的最后几年，我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香港回归后，政治、经济与民生的挑战纷至沓来，令各方面疲于奔命。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2002～2012年，我离开大学，进入特区政府出任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在这10年中，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较诸其学术性更为重要。总的来说，自1982年以来，我的学术事业直接与香港的前途和发展问题紧密联系，“纯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研究的目标

不但要对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有意义，还要对发现和解决香港的诸多问题有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定取决于香港面对的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变迁与争辩，关系更加小。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定的工作目标，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无论就背景、目标、经验，还是历练而言，在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界中，我都是颇为“与众不同”的。

毋庸讳言，不少甚至大部分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西方的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原因有3个：一是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就算不能直接应用于香港，稍作调整便可适用。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哪怕只是小环节，香港研究的成果既印证了普遍理论，又丰富了普遍理论。二是他们服膺于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三是假如学者认同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而其研究成果又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理论在香港适用，那么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发表著作便较为容易，而能否在西方“学术市场”发表著作，对个人的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于以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为评审标准来衡量学者的学术成就。因为这些原因，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两者之间的差异则较少受到重视。

另外一种情况是，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入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有参考或应用价值。对于不少香港学者的这些倾向和行为，我的看法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承认，西方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那么来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也自然在其他的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应用价值。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我们因为长期在香港生活而看不到或者遗漏的东西，对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从而深化我们对香港社会的理解，西方理论也会强化本地学者从理论角度剖析香港社会现象的能力。然而，另一方面，将注意力放在某些现象上等于疏忽了另外一些现象，而那些现象对香港社会而言可能更为重要，或是更好地理解香港社会的“钥匙”。换句话说，西方理论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但同时遮掩了另外一些东西。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予以整合来建构理论这一方面。因此，鉴于西方社会学比其他地方的社会学更为“发达”，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参考西方的理论研究和研究成果，起码要用它增强我们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但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以盲目奉之为金科玉律。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的同时，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脱离西方的

思考框架，认真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多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确切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更好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之用于研究香港。

从一开始我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这在香港学者中是较为罕见的，目标是不仅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的不足，也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知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必须从客观角度出发，不要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现实。基本上，我是从“不服气”的起点出发来思考香港社会的，首先假设西方学者“不可能”对香港有深度的认识，因此他们的理论总会在某些方面难以直接套用于香港。一些在西方社会比较瞩目的现象，在香港不一定重要，而香港一些显著的现象也可能在西方看不到。诚然，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他们的理论绝非完全建基于西方现象，而是来源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但即便如此，倘若他们对香港缺乏认识，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那些格格不入之处正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可以对所谓“普遍理论”建设所能做出的“贡献”。

既然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理论，那么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角度（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角度，是要基于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去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事件、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历史角度不单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视野，其中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为重要。不了解历史，为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容易流于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每个社会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跃然纸上”，马上成为学者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角度，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比较，找出其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的人类社会比较，而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多，因此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思考，找寻若干有意义或有价值而又可供比较或对比的现象。在我看来，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能够更好地发掘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这些“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有其重要性，我们更可以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与之密切关联的其他社会现象。

在过去近40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多现象，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了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担当着研究的“钥匙”的功能，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未来提供

线索和可行之道。这些概念在学术界广受关注，当然也受到不少批评，部分批评在香港的高度政治化环境中更流于道德或恶意的中伤。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有失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而基于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我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核心”概念和与之相关的理论并存绝对是好事，良性的学术争论会越辩越明。然而我相信，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的。

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建构了一批“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工具研究香港社会的状况和变迁。这些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高度稳定的殖民社会，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社会容纳政治（social accommodation of politics），低度整合的社会与政体（compartment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polity），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袖，缺乏领袖的制度（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功利主义法律观，行政主导，局部民主政体（partial democracy），发育不良的政党体系（stunted political party system），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 without the ruling party），低民主、高自由的社会，民主发展后于法治、自由、人权、稳定、繁荣的出现，关注的旁观者（attentive spectators），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矛盾民主观（democratic ambivalence）等。这些“核心”概念通通源于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也源于认真利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的特点。

总体而言，这些“核心”概念加起来其实很好地描述和反映了香港作为一个社会乃至一种社会现象的主要特色。

第一，香港在“开埠”伊始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英国人攫取香港这片荒岛为“殖民地”，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而且不受清政府控制的桥头堡。为了达到目的，一开始英国人便要在香港推行开明和怀柔的管治方法，以吸引各地尤其是中国内地的人才、资金和劳工来香港开拓和发展。为此，一套有利于各方面经商、就业和生活的法律和制度便不可或缺。与绝大部分殖民地不同，香港是先有殖民政府的出现，然后才有“殖民地”人民的到来。从内地来香港定居或发展的华人，无论基于什么理由，都是自愿接受殖民管治的，起码不反对殖民管治，因此他们绝无推翻殖民政府（在香港，即为港英政府）之心，反而将香港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这种情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正因

如此，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过反殖民或独立运动，也无法借助反殖民或独立运动来培育有威望的政治领袖。

第二，中国政府不会容许香港脱离中国走向独立。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英国人不会在香港推动有“还政于民”意味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刻意培育有群众基础的本地政治领袖。为了巩固殖民管治，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同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这些“同路人”虽然在华人社会享有一些声望，但绝对不是具备政治权威的政治人物。社会上反对殖民政府的政治人物绝无仅有，因此对殖民管治不构成威胁。

第三，香港的华人社会由无数的家庭单位组成，这些家庭单位的核心是那些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但也可以从“功利”角度考虑，选择性地将一些与自己有利益联系的亲戚朋友“纳入”家庭单位，因而表现出“功利家庭主义”的形态。这些家庭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的需要，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第四，家庭单位与众多的华人社团共同处理了不少华人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不少可能引发政治事端或冲突的问题，因此发挥了“社会容纳政治”的功能，大大减少了最后需由殖民政府应对的政治摩擦与挑战，使得行政需要吸纳的政治不至于过多，从而保持了香港的政治稳定。与其他殖民地相比，香港的政局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度稳定的。“二战”后，全世界反殖浪潮风起云涌，但香港的政局却风平浪静。我研究香港的起点恰恰就是探讨香港“超稳定”殖民社会的原因何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就是政治稳定和港人对政治的不热衷甚至“冷漠”。我当然不会否定社会冲突的存在，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政治稳定对我和不少人来说，应该是较为瞩目和值得探讨的现象。我的基本看法是，“行政吸纳政治”和“社会容纳政治”相辅相成，大幅减少了香港政治矛盾的数量和严重性。与此同时，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各司其职，来往不多，形成“低度整合的社会与政体”的局面。就当时来说，在殖民管治被广大香港人接受的前提下，所谓香港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政治”，即发生在政府内部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这些“政治”与社会没有密切关系，也没有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因此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人们关心的问题一般不会进入政治领域，也没有有实力的本地政治领袖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议题，从而将之带进政治领域。

第五，港人政治文化的内涵与“功利家庭主义”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对此，我和关信基教授合著的《香港华人的心态》（*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2]一书有详细阐述。简而言之，港人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公民文化与顺民文化的混合体。港人一方面吸收了一些来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对权威的尊重以及对稳定与秩序的追求。他们

愿意接受殖民管治，并基于殖民政府的良好施政表现而赋予它颇高的政治认受性。港人的法律观或法律文化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不太了解西方法律背后的原则和思想，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中国的法律观点。不过，港人相信香港的法律对自己有用，因此坚持遵守法律的重要性。无论是港人的政治文化还是法律文化，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色彩都很突出，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价值观则不太和谐地并存。实际上，港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流于表面，大体上认为西方文化对自己和香港有用，但仍然受到来自中国传统的“威权性”政治文化（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的熏陶，而后者是和西方文化相悖的。

第六，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矛盾增加，民众的期望与诉求攀升，华人社会自我解决问题和满足需要的能力下降，殖民政府面对的来自社会的要求和压力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应对。殖民政府介入社会和民生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港人对政府的依赖不断提升，因此社会上逐渐涌现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他们不仅向殖民政府提出各种具体诉求，也在确认殖民管治的前提下要求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殖民政府一方面尽其所能地回应民众的民生需要，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控制。在“九七问题”出现的前夕，香港的政治人才十分匮乏。大部分港人认同香港的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制度，但对政治领袖缺乏信任与尊重，出现了“缺乏领袖的制度”和“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袖”现象。人们觉得只要制度运作良好，政治领袖可有可无。再者，在殖民政府管治下，人们也不相信本地政治领袖会拥有实质的政治权力或能力。这种轻领袖、重制度的心态本来应该是进步的象征，但在政治领袖匮乏的情况下却成为绊脚石，阻碍了领袖的形成与成长。香港脱离殖民管治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然而缺乏拥有群众基础的政治领袖便为回归后香港的有效管治和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

“九七问题”的“突然”出现，对香港的政治格局与生态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无法延续殖民管治的情况下，英国人谋求“光荣撤退”和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保护英国的权威与利益，一方面大力推动香港的民主改革和“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则锐意扶植反共和民主派势力。中国政府则一方面致力于挫败英国人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努力培养“爱国爱港”力量。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化路向，但同时分化和弱化了刚冒起却“先天不足”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势力。在中英斗争的大气候下，香港所走的“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道路呈现几个重要特征：第一，既然香港不是独立国家，港人便不能完全决定由谁来控制特区政权。在主流民意仍然反共和拒共的氛围下，中国政府觉得必须确保特区的行政长官是中央可以信任和依托的人。因此香港的民主化是“局部民主化”，具体反映在港人有较大权利选举负责监督政府的立法会议员，但在选举行政长官上则权利有限。第二，“局部民主化”让一位拥有强大宪制权力的行政长官与享有实质“反

对”权力的立法会并存，各自有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支持者，彼此之间摩擦难免。第三，从宪法的角度看，香港是一个“行政主导”甚至可以说是“行政长官主导”的政体。行政长官垄断了政策制定权、财政主导权和人事任免权。但在群众支持不高、政府权威不足和行政长官没有政党联系的格局中，行政长官纵有宪制权力，却在政治威望低落的情况下无法充分和有效地运用手上的权力。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管治不畅和政局混乱与此不无关系。第四，为了避免突然进入全面民主化而带来政治动荡，民主改革遵循循序渐进的步伐。行政长官的普选只会在条件成熟时才进行，同时要防止选举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特首。在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中，“功能团体”议席的引进和逐步减少，以及选民基础的不断扩大发挥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巧妙作用，从而使得以普选办法产生所有立法会议员的时刻不会过早。第五，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衍生了香港几乎独一无二的“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现象。在执政党缺位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在立法会内缺乏稳定和可靠的支持；无论是建制派政党还是泛民主派政党，都以监督和制衡政府为己任；建制派和泛民主派政党都处于松散和积弱状态，社会支持基础不强。泛民主派政党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日趋激烈的趋势。“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似乎不能成为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它对特区的长治久安不利。

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诚然不能满足大部分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对于政治体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满情绪。但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没有出现拥有强大群众基础、得到中产阶层鼎力拥护、有能力持久“作战”、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这可以从香港独特的民主发展轨迹和与此相关的港人“矛盾民主观”中找到解释。香港这种“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历史背景，使得它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已经陆续享有法治、善治、自由、人权等不少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流血牺牲、在争取到民主之后才能获得的东西。既然港人已经得到那些他们认为比民主更加珍贵的东西，那么他们便不愿意付出沉重代价来争取民主。“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只容许香港在脱离殖民管治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港人明白与中央对抗有害无益，因此也不太希望因为民主改革问题而与中央交恶。不少港人甚至担忧，不适当的民主化反而会带来不符合自己和香港利益的恶果，因此宁愿慎重地、一步一脚印地推进民主进程，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中产阶层不占少数。由于顾虑多且犹豫不决，港人的“矛盾民主观”与循序渐进发展民主若合符节。假如港人愿意不顾一切地追求民主，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就不会被港人接受，而港人与中央的冲突便会极度激烈，不仅政治稳定和有效管治不可能，甚至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也难以落实。

如果政策建议是基于对香港独特性研究的成果，那么与来自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建议相比自然有所不同，反映在如何处理香港的民主发展和达到有

效管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必将建构在“两制”关系融洽和中央与特区合作的基础上。“互利共赢”和“荣辱与共”必然是彼此互动的指导原则。从香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港人与内地同胞、中央与特区之间必然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诚然，这个趋势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片坦途，反而会跌宕起伏、阴晴不定和坎坷不平。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肯定，也基于我对香港独特性的理论思考，过去几十年来我曾经提出了一些政策和行动建议。粗略来说，“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建设、功能团体议席和选举办法的引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设置、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比例代表制的施行、“管治联盟”的建构等，都有我一些建议的影子。毋庸讳言，这些建议都曾经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攻击。然而回想过去，这些建议在香港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环境中恐怕是迫不得已、有一定正面价值的建议。当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的发展、香港的变迁、香港人心的变动、中央与港人矛盾的逐步缓解、“两制”之间的差异缩小，以及两地同胞逐步在“两制”下合成“命运共同体”，香港的政治、管治与政党发展自然会沿着新的方向演进。经济、社会和民生立场上的分歧会逐渐取代中央与港人之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成为左右香港内部政治形态的主要因素。困扰香港多时并妨碍妥协的“非常态政治”会大幅度地被对协商解决问题有利的“常态政治”所取代。到了那个时候，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才会有更扎实的根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非常态政治”过渡到“常态政治”绝非一个顺畅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反复的过程，2014年爆发的“占领中环”行动和香港最近涌现的“本土主义”主张可为明证。

在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对香港的未来保持较为乐观的期盼，这样的态度对一些人来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但基于我过去近40年香港研究的经验，我对我的论断和预测是有相当把握的。未来的变迁也许可以为我印证。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并着重指出，香港在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稳定与香港华人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有莫大关系。华人家庭和各种民间组织拥有不少资源和能力去处理华人社会内部的问题和需要，从而减少了社会问题“外溢”为政治问题的概率，对维护殖民管治有利。不过，香港急剧的社会变迁逐步削弱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作用，使得政治矛盾和冲突不断上升。第二部分描述了香港引进群众性选举后的早期情况，指出选举在动员群众方面作用有限，而媒体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大。第三部分论述了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殖民政府的管治困难、英国谋求“光荣撤退”的部署、中英政府围绕政制改革的斗争和“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

和独特性。第四部分回顾了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对港政策，并着重指出其理性务实的一面，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就是中国对香港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在香港回归后的延续。既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国对港政策的首要目标，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所要建构的香港政治秩序便以此为指导原则，不过这个新政治秩序却蕴藏着一些管治困难。第五部分则讲述了政治精英和政党发展的情况，其中突出了“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香港政治精英的矛盾与分化、各类反对势力涌现、行政主导政治体制因而缺乏足够实施条件的情况下，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管治面临相当困难的局面。与此同时，香港的政治体制又对政党的发展不利。特区政府固然不能依靠“执政党”来进行有效管治，但在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香港的政党呈现弱化和分化的趋势。

《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香港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具体特征包括“局部民主化”、民主化问题成为“永恒”的政治议题、中央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民主化的出现后于法治、人权和自由等。尽管香港没有重复西方的民主发展道路，但仍然具有积极和正面的内容，起码切合香港实际的情况和需要。第二部分探讨了香港回归后的管治形态，特别关注了新生的香港特区政权在管治上经验不足、政治能力不强、内外环境不利和反对势力阻挠的情况。自香港特区成立以来，非常态政治实际上是香港政治的“常态”，而政治斗争则围绕着政治原则、信念和道德等议题，其中退让和妥协的空间有限，因此冲突难以化解。虽然以实际利益冲突为本的常态政治长远来说应该成为“常态”，但演化过程却十分曲折。这一部分也论述了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殖民政府的管治困难、英国谋求“光荣撤退”的部署、中英政府围绕政制改革的斗争。第三部分讲述了香港人独特的民主观，指出香港人有明显的民主诉求，但其民主观充斥着自相矛盾和实用主义的元素，因此难以构成庞大、持久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香港人的政治心态》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香港人对政治领袖的态度，指出香港人心目中缺乏可以信任的政治领袖，而且人们对制度的信任远高于对领袖的信任，因此香港得以拥有良好的政治秩序。香港的政治领袖虽然占据领导的位置，但其社会或群众基础颇为薄弱。第二部分探讨了香港人的社会与经济态度，指出香港人在整体上虽然支持香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却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希望政府能够发挥管理经济活动和提供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殖民地”结束前夕，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涌现，导致香港社会的公平性受到不少香港人的质疑。此外，随着回归的到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浮现，却没有出现“香港人”与“中国人”对立的局面。第三部分专注于政治信任和参与。最为明显的现象是，

尽管香港人对殖民政府有一定的支持，但对各类政治权威和制度的信任有不断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虽然香港人有不错的“政治认知”，但多数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仍然不够积极，因而成为“关注的旁观者”。

这3本书的出版与一些朋友的努力和帮助分不开。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首先提出出版我的学术论文的建议，而且为翻译工作筹措经费。这3本书的翻译出版获得敏华研究基金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尹宝珊女士既是我以前的学生，也是长期以来我在研究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与伙伴。尹女士在统筹和协调学术论文的翻译、核对和出版等工作上花了很大气力。孙文彬博士是我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任职期间的首席研究主任，她不仅承担了部分翻译工作，同时负责协调牛悦博士和雷竞旋教授的翻译工作，确保不同论文的用词和行文一致。几位译者高水平的翻译让我的英文论著得以准确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对上述学者的支持和协助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季红女士和编辑们为这3本书的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努力。

最后要说的是，有关香港研究的学术著作迄今其实不多，主要原因是香港研究并非学者们学术事业腾飞的捷径。中央和香港的官员在制定政策时往往缺乏充足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持，这是甚为可惜和令人痛心的事。我特别希望这3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内地读者提供参考，更真诚地盼望它能够为促进两地同胞的互信和彼此了解发挥一些作用。

章末注

1.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在书名中“社会”置于“政治”之前是刻意的，目的在于凸显香港政治的社会基础。

2.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

第一部分　对领袖的态度

第1章　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注)

在香港，随着“九七问题”的出现，政治参与及政治冲突不断增加。中国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量的政治积极分子及团体涌现，他们对香港的政治需要有不同的理解。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及文化团体也越来越政治化。伴随着此等新政治势力的出现，港英政府的威信持续下降，其管治香港的时限也只剩下5年多。港英政府的弱化，既引发更多针对它的政治挑战，也逐渐令其丧失处理政治冲突的能力。由于选举制度的引入，香港的政治体制得到局部开放，这更提高了政治参与及政治冲突的程度。

然而，到目前为止，政治变迁对香港社会只造成有限的冲击。大体而言，是政治冲突脱离了社会及经济冲突，后一种冲突主要在非政治领域（其中市场最为重要）进行。在社会内部，政治动员及民众参政的程度依然偏低，政治冲突所引发的社会分化效应仍旧相当温和。再者，政治力量与社会经济力量之间还缺乏强而有力的联系。[1]

在“九七问题”出现前夕，香港一直受到政治领袖匮乏的困扰，所以有此不良情况的原因甚多，我曾在其他地方就港人的态度如何导致此情况的出现做历史和结构因素的分析，[2]本文将集中探讨以下问题：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如何阻碍被港人信任的领袖涌现，以及如何阻碍拥有强大社会基础的政治团体形成。本研究的焦点在于，港人对香港政治领导架构的态度，政治领导架构包括主要的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及政治团体等组成部分。通过这个研究我发现，对于这些政治领导组成部分之间的矛盾，港人虽然朦胧地觉察到，却不能够把这些矛盾与当前香港显著的社会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因此，他们不会觉得政治矛盾与社会经济矛盾之间有何关系。结果，民众在使用政治准则来区分不同的领导组成部分时，虽然稍有困难，但仍能对之做有限度的分辨。然而，要以社会经济准则来划分这些政治领导组成部分时，他们几乎无能为力。这种情况，对于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的认可度，以及这些领袖和团体取得民众的信任来说，显然都不利。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一项全港性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3]调查在1990年进行，成功访问了390人，回应率为69.8%。

对政治领导的取向

近年来，香港虽然涌现了大批自称代表民意的政治领袖，但港人依旧感到难以从中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在调查中，我询问受访者心目中有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69%回答“没有”，只有9%认为“有”。将这些数据与我在1988年所做的同类型调查的结果相比较（相关的数字为69.9%及16.2%）

[4]可以看出，港人对政治领袖比以往更缺乏信任。

在37位回答“有”的受访者中，当被问及谁是他们信任的领袖时，有5位不能给予答案，能够提供领袖姓名的则有32人。这些领袖分别是（括号内的数字为提及该领袖的受访者人数）：李柱铭（由功能团体选出的立法局议员及民主运动领袖）（12）、卫奕信勋爵（香港总督）（7）、邓莲如女男爵（行政局委任议员）（5）、司徒华（由功能团体选出的立法局议员及民主运动领袖）（3）、麦理浩勋爵（前香港总督）（1）、李鹏飞（行政局及立法局委任议员）（1）、尤德爵士（前香港总督）（1）、李永达（由直选产生的区议员及民主运动领袖）（1），以及徐四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1）。大体而言，在港人心目中缺乏值得信任的领袖。最重要的是，审视上述的领袖名单，看不到某类政治取向的领袖能够较其他类型更能够获得民众信任。[5]

至于地方领袖，情况与全港性领袖大致相同。当被问及在居住的区域内有没有值得信任的地方领袖时，6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7.9%回答“有”，其余32.1%则不能提供确定的答案。将此结果与1988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可以看出，民众对地方领袖的信任程度亦较前下降，情况和全港性领袖一样。[6]

受访者亦被问及心目中有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团体（1988年的调查没有问及这个问题），一如所料，结果与上述有关全港性领袖与地方领袖问题所得差不多：62.1%的受访者答称“没有”，只有7.2%的人认为心目中有信任的团体。然而，只有17人能够提供团体的具体名称。这些团体（及有关的受访者人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989年成立，目标为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联盟，简称“支联会”）（11）、香港民主同盟（香港民主积极分子目前最庞大的组合）（2）、太平山学会（支持民主改革的公民团体）（1）、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简称“香港新华”，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官方代表）（1）、新香港联盟（拥护中央及保守的政治团体）（1），以及香港基金（保守的智囊组织）（1）。一般而言，政治团体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民众信任，同时，有限的民众信任往往投向那些反对中国政府和推动香港民主化的团体。

在港人心目中，虽然缺少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和团体，但并不表示他们疏离于香港的政治制度之外。59%的受访者同意以下说法：“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港人对港英政府的信任虽然持续下降，但在调查中仍然有42.9%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港英政府，而只有15.1%的人表示不信任。一般而言，港英政府的工作表现也得到颇为肯定的评价，只有15.1%的受访者批评政府表现不好。不过，民众对政府工作表现的评价越来越差是总趋势。

除了政府及政治体制，在不同程度上行使政治领导职能的制度与团体同样获得港人一定程度的接受。这些制度与团体分为几类：第一类与政府有密切关联，属于政治体制内不可分割的部分，包括香港总督（简称“港督”）、公务员、立法局、立法局委任议员、立法局选举团选出的议员、立法局功能团体选出的议员、区议员及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第二类是政府以外的本地政治力量，包括压力团体、民主运动领袖、工商界领袖、工会领袖、学者及专业人士。第三类是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制度与组织，包括两个由中国政府参与组织、负责起草《基本法》的团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国政府的驻港代表（香港新华），以及拥护中央的左派机构。

表1-1显示了港人对这些制度及团体的信任情况。其中几项特别值得留意。第一，与港英政府有直接关联的制度与团体（特别是港督）得到港人最大程度的信任。第二，就取得的民众信任程度而言，具有选举性质的制度和团体与不具有此性质的相差不大，这表示选举方式作为政治认受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来源至今仍不占主导地位。第三，除了学者及专业人士之外，政府以外的制度与团体只得到有限的信任，大比例的受访者答称“不知道”或拒绝回答，这表明，对于这些制度与团体，他们不能确定自己有多大的信任。第四，香港新华及左派机构皆不为港人所信任，这反映了民众仍旧对中国政府反感。但在另一方面，由中国政府催生的两个与《基本法》起草有关的委员会都获得较高的民众信任，这反映了最后由中国政府颁布的《基本法》大体上是被港人接受的。第五，与那些可笼统地称为“反对派”组织（压力团体及民主运动领袖）相比，“建制”制度及团体得到的民众信任较高。因此可以这样说，香港现行的管治架构仍未受到严重威胁。

表1-1　对政治制度及团体的信任情况（单位：%）

	信任	不信任	不知道	拒答
港督	72.8	11.8	13.8	1.5
公务员	51.8	24.9	20.3	3.1
立法局	58.4	15.4	23.1	3.1
立法局委任议员	45.4	22.8	28.7	3.1
立法局选举团选出的议员	47.7	16.7	33.3	2.3
立法局功能团体选出的议员	48.5	14.9	34.4	2.3
区议员	53.0	21.5	22.6	2.8
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	42.4	20.0	34.9	2.8
压力团体	34.8	30.3	32.8	2.1
民主运动领袖	37.4	29.4	29.2	3.8
工商界领袖	33.8	32.3	31.3	2.6
工会领袖	37.2	27.4	32.8	2.6
学者	61.6	11.1	25.6	1.8
专业人士	62.3	12.9	22.8	2.1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33.1	32.3	32.3	2.3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33.5	30.2	33.7	2.6
香港新华	17.4	53.8	26.4	2.3
左派机构	12.6	53.3	32.1	2.1

至于民众对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态度，总的来说，港人倾向于认为政客及政治团体的参政动机是“利他”的，即为他人服务，只有16.9%的受访者觉得大多数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士是出于私人利益，68%的受访者则认为他们是为了服务社会，或是私人利益与服务社会并重。这个颇为正面的评价在另外一项调查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受访者心目中，虽然没有值得信任的领袖，但依然有22.8%的人认为，香港在回归之前会出现一些他们能够信任的领袖，30.8%的人表示不会，而答称“不知道”的则有43.1%。

受访者是否赞同政治领袖的意见，表1-2列出了调查结果。我挑选出来作为调查对象的领袖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代表当前香港主要的政治取向。其中邓莲如女男爵、李鹏飞、谭惠珠（行政局及立法局委任议员）、罗康瑞（一位政治上活跃的工商界人士）、钟士元爵士（前行政局及立法局委任议员）及钟逸杰爵士（退休高级公务员并一度任代理港督）乃“建制派”人物。李柱铭和司徒华是典型的“反建制”民主积极分子，两人都是不受港英政府及中国政府欢迎的人物。罗德丞以往曾经是坚定的“建制派”人物，由于他对英国政府处理香港前途的手法极为不满，摇身一变而成为显

赫的拥护中央的政治领袖；相反，廖瑶珠则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拥护中央的爱国者。叶锡恩与其他人不同，她以小人物权益的保卫者自居，为民请命的形象鲜明。刘千石则标榜自己为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运动领袖。最后，在调查期间，何世柱的形象属于温和的拥护中央的工商界人士。

表1-2　对政治领袖意见的赞同情况（单位：%）

	同意（A）	不同意（D）	不知道是谁	没听过其意见	拒答	A/D
邓莲如	63.1	4.6	5.4	15.4	11.5	13.7
李鹏飞	51.5	12.3	6.4	16.4	13.3	4.2
谭惠珠	45.9	23.3	5.6	14.4	10.8	2.0
罗康瑞	20.2	16.9	37.9	16.7	8.2	1.2
钟士元	45.6	13.6	13.6	18.2	9.2	3.4
钟逸杰	46.6	6.7	13.8	21.3	11.5	7.0
李柱铭	58.0	13.9	5.9	10.3	12.1	4.2
司徒华	46.2	25.2	7.2	11.3	10.3	1.8
罗德丞	12.8	15.4	45.4	18.2	8.2	0.8
廖瑶珠	18.0	31.1	29.0	14.9	7.2	0.6
叶锡恩	56.4	3.8	13.1	17.7	9.0	14.8
刘千石	34.3	15.4	16.4	20.3	13.6	2.2
何世柱	30.8	18.0	17.2	20.5	13.6	1.7

从表1-2可以看出，除了罗德丞及廖瑶珠之外，其他政治领袖的意见一般都获得认同。罗、廖二人可能因为与中央关系紧密的形象太鲜明，致使他们不被赞同。当我们观察同意与不同意两者之间的比值时，“建制派”领袖明显取得较高程度的认同，唯一例外是叶锡恩，这显然由于她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福祉，因而赢得很高的声誉。

在调查中，我也挑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政治团体，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表1-3列出了调查结果。这类政治团体多数在“九七问题”出现后才成立，被视为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衍生品。由于香港的局部民主化提供了政治空间，不少团体借机崛起，一方面通过鼓动令民众抗拒中国政府，另一方面借助港人对港英、英国政府处理香港前途手法的不满，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很自然，这些团体大多带有某种“反建制”色彩。不过就此而言，所谓“建制”其实代表了由中、英、港3个政府联合组成的奇特现象。在表1-3的政治团体中，“支联会”“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汇点”“太平山学会”“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香港民主同盟”及“四五行动”都可以归入“反建制”一类，其中“支联会”及“四五行动”反对中国政府最为激烈。“香港革新会”“公民协会”“香港民主促进会”“建港协会”及“香港基金”则可粗略

地界定为带有精英色彩却又倡议温和政制改革的公民团体。相对而言，“新香港联盟”“励进会”及“香港自由民主联会”的政治取向较为保守，它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也较为温和。

表1-3　对政治团体意见的赞同情况（单位：%）

	同意（A）	不同意（D）	不知道是谁	没听过其意见	拒答	A/D
支联会	43.1	19.4	11.3	12.6	13.6	2.2
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	26.7	7.2	30.8	22.6	12.8	3.7
汇点	14.8	5.9	48.7	19.2	11.3	2.5
太平山学会	16.1	6.1	43.3	23.6	10.8	2.6
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	27.7	5.1	31.3	23.1	12.8	5.4
香港民主同盟	23.6	5.4	35.1	24.1	11.8	4.4
四五行动	19.5	25.1	25.1	17.7	12.6	0.8
香港革新会	11.3	8.0	50.0	20.8	10.0	1.4
公民协会	15.1	3.1	51.0	20.3	10.5	4.9
香港民主促进会	30.6	5.4	32.6	19.0	12.6	5.7
建港协会	6.4	4.6	60.3	19.0	9.7	1.4
香港基金	12.3	4.6	50.0	21.8	11.3	2.7
新香港联盟	14.1	5.6	48.7	21.0	10.5	2.5
励进会	9.2	4.3	52.3	23.3	10.8	2.1
香港自由民主联会	18.2	4.1	46.9	19.0	11.8	4.4

从表1-3的数据中，有几点发现值得注意。第一，除了支联会，所有政治团体都不大为民众所认识。25.1%～60.3%的受访者答称不知道某团体是谁，而没有听闻过这些团体的意见的也占相当比例。所以，对港人而言，政治团体有别于政治制度及政客，至今仍然是新兴、陌生的事物。因此，政治团体在发动民众支持及确立其政治领导地位等方面，能力还非常不足。第二，那些主张对中国政府采取对抗姿态，以及鼓吹民主改革的团体的意见虽然得到较大比例的认同，但较为保守的及温和的团体的意见所得赞同的比例仍比不赞同的高。由此可见，虽然客观上可以根据其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及对民主改革的立场，来区分这些团体，但对于港人而言，它们之间的差异似乎不重要。整体而言，港人近乎不加区别地接受这些团体。第三，在所有团体中，只有“四五行动”的不赞同者比例大于赞同者。

这个团体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比其他团体激烈，它不为港人所接受，恰恰反映出港人的务实和温和的政治取向。

这些政治团体中有一部分自称为政党，或者表示有发展成为政党的意图，然而，为了谨慎行事，它们都没有正式采用政党的名号。对于组织政党一事，港人基本上是颇为支持的。在我的调查中，52%的受访者赞成港人组织政党。不过，鉴于政党一词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有不少负面意义，所以港人对成立政党也有一定的保留。例如，43.6%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出现政党的话，政党会争权夺利，使得社会不稳定（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占38%）。再者，港人虽然在口头上颇为支持成立政党，但是如果出现政党，只有20%的受访者答称会参加或者支持其活动，39%的人认为自己肯定不会，而答称“视情况而定”的人则有28.5%。

一般来说，港人基本上支持现行的政治体制及管治架构，他们对政客与政治团体的印象大体上也不错，例外的是那些被视为与中国政府关系过分密切，或者在政治上太激进或太危险的团体。与现行的政治体制及管治架构相比，民众对政客及政治团体的支持仍然偏低，特别是后者。事实上，虽然港人对政客及政治团体颇有好感，但政客和政治团体取得的民众信任却依然不足。

政治领导的社会支持基础

如前所述，港人对政治领导的各个组成部分倾向于不加区别地支持。与此相关联的现象是香港的政治制度、领袖与团体大体上缺乏社会支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都声称代表香港的整体利益，同时极力避免认同社会某部分的利益。此外，港人也不推举那些只代表个别或狭隘利益的政治领袖。例如，在调查中，74.9%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出现政党，它们应该代表全体香港市民的利益，而并非某些阶层的利益。

对于香港政治领导的组成部分缺乏社会支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7]第一，大体上，受访者对政治制度、领袖和团体的态度，与其性别并无显著关系。[8]第二，对几个政治领导组成部分的态度，年龄较长者虽然比年龄较轻者稍佳，但基本上，年龄与有关态度的关系十分微弱。[9]第三，受访者对各政治领导组成部分的态度，与他们的收入（个人月收入）也没有显著的关系。第四，总的来说，受访者对各政治领导组成部分的态度，与他们声称所属的社会阶层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0]

在所有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中，学历与有关态度存在较强的关系。例如，学历较高者比较倾向于不认同现行的政治制度，以及比较不信任港英政府、港督、由选举团选出的立法局议员、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及香港新华；与此同时，却比较信任压

力团体。就政治领袖而言，学历较高者比较赞同邓莲如的意见，但不愿意赞同罗德丞、廖瑶珠及刘千石的意见。最令人诧异的是，学历较高的人对政治团体有较少好感，特别是那些鼓吹社会及民主改革的团体。例如，他们比较愿意赞同下列团体的意见："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香港基金""香港民主同盟""香港民主促进会"及"香港自由民主联会"。然而，虽然学历较高的人对政治团体的认同程度相对较低，却不表示他们反对在香港成立政党，事实上，他们是比较支持港人组织政党的。他们也较倾向于参加或者支持政党活动，并且不认为政党会因为互相争权夺利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与以往的研究所得结论一样，[11]学历较高的港人对民主改革的态度十分矛盾。他们对民主政制有所憧憬，但同时觉得如果现行体制继续下去，会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有利。因此，他们不可能全心全意支持社会及政治改革，因为两者皆有可能触发民众登上政治舞台，从而威胁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学历较高的人，政治态度比较矛盾。此外，对于政治领导组成部分的取向，学历较高者与其他人的分别其实不大，基本上都是支持现状。正因如此，学历较高的人不可能成为某些政治领袖或团体的强大支持基础。

总而言之，就所得的社会支持基础而言，香港政治领导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差异不大。其实，这与港人不能够把这些组成部分清楚地区分对待，是同一个现象的正反两面。

民众对政治及社会争议事项的态度

香港的政治制度、领袖及团体虽然不拥有特定的社会支持基础，但这并不代表香港内部没有政治与社会分歧。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困扰其他社会的常见矛盾，例如，民族、阶级、语言、宗教、次文化及地域差异和对立等，在香港都没有。香港具有蓬勃发展且开放的经济体系，以及实行怀柔统治、尽可能避免介入华人社会事务的殖民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大部分时间，香港几乎没有出现过重大的社会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遇到接踵而来的问题，包括：经济放缓、贫富差距日增、"九七回归"、日益依赖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及提供福利与公共服务、政府的威信日渐下降等，这些问题致使冲突不断增加。这些矛盾很清晰地在我的调查研究中显露出来，对于社会及政治争议事项，港人的态度越来越有分歧，包括：

第一，对3个政府的信任程度。中英两国政府日益参与香港事务，使得港英政府的自主性受到掣肘。民众对港英政府的信任程度出现下降趋势。民众越来越觉得港英政府不能够进行有效管治。港人对英国政府的信任程度很低，只有18%的受访者对它表示信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尤其严重，表示信任者仅占10%。

第二，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矛盾。由于不信任中国政府，民众很容易突出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把共同利益抛诸脑后。在调查中，有49.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内地的利益与香港的利益有冲突，持相反意见的人只占29.7%。

第三，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对抗。香港当前最具分化的政治争议，无疑是如何处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纵使对中国政府没有好感，港人并不赞成采取对抗方式。因此，75.1%的受访者反对港人与中国政府进行对抗，赞成对抗的人只有11.3%。

第四，对政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于目前的政治状况，港人的满意程度分歧甚大，45.1%的受访者表示满意香港的政治状况，28.5%的受访者则表示不满意。

第五，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接受程度。虽然59%的受访者愿意接受现有体制，但仍有25.9%的人不予完全接受。

第六，政制改革。对此问题的态度，港人几乎可以分成人数相等的两派。43.1%的受访者希望保持现有政治体制，38.5%的人则认为需要进行改革。就民主改革而言，占绝大比例的受访者（74.4%）认为民主化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赞成民主化步伐应该很快或很慢的人只占极少数，各为6.2%和5.4%。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成功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前景，港人并不乐观，只有33.1%的受访者认为有成功机会。

第七，对港英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程度。在这方面，民众的评价越来越差。有稍多于一半的受访者（52.6%）认为政府的工作表现一般，15.1%的人则批评做得不好，认为做得好的只占22.8%。

第八，对《基本法》的满意程度。港人对《基本法》的态度，与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及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民众不能够确定回归后《基本法》是否会得到切实执行，但大体上对《基本法》做出的种种安排没有太多异议。一般来说，港人对《基本法》的态度很矛盾。调查发现，54.9%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自己是否满意《基本法》，或不愿意提供意见；不满意《基本法》的人有24.9%，而表示满意的有17.5%。

第九，对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一般来说，虽然港人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满意，但仍然有少数人认为他们未能受惠于社会的经济成就。42.1%的受访者表示满意香港的经济状况，18.5%的人表示不满意，认为经济状况只是一般的有26.9%。

第十，对社会福利的满意程度。在满足港人的社会需要上，有关社会团体

的能力日渐下降，而视社会福利为公民权利的观念又不断扩散，因此港人越来越依赖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整体而言，即使政府提供福利的力度在过去20多年不断加大，但仍未满足社会所需。所以，只有22.8%的受访者觉得社会福利状况令人满意，此现象可以说正常，不满意者则占较大比例（28.4%），而认为情况一般的达33.6%。

第十一，社会经济改革。港人虽然对社会经济状况大体满意，但对于社会经济状况应该保持不变或需要进行改革，受访者意见分歧较大，有47.7%的人支持改革，反对者在比例上也与之接近，有41.8%。

第十二，财富分配。香港近10年来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恶化，促使民众关注社会内部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在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56.4%）谴责财富分配不公平的情况，觉得公平的只有26.4%。

第十三，阶级矛盾。由于越来越感受到财富分配不公平，某种阶级意识很自然地衍生出来。69.7%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不同阶级人士的利益互相冲突，其比例之高，前所未见。持相反意见的则甚少，只有18.2%。

迄今为止，港人在上述有争议事项上的态度分歧不至于很严重，因此还没有酿成严重的社会及政治冲突。虽然如此，民众态度上的分歧仍为政客及政治团体带来动员民众、争取支持的机会。在这些有争议事项中，政客和政治团体选择能够取悦民众的立场，借此获得支持。不过，由于以下两个因素，因为民众态度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可以得到纾缓。第一个因素是，虽然民众有态度分歧，但分歧显得纷纭交叠，影响因而减弱。换言之，有关分歧并不足以令港人分化成截然不同的阵营，因为同一个人可以在某些事项上保守，而在其他事项上支持改革。这些分歧大多数是横向的，而非重叠的，它们没有造成社会的对立分化。港人在政治事项上的态度分歧，与其在社会经济事项上的分歧缺乏系统性关联。例如，满意政治状况与否，满意港英政府工作表现与否，以及对中、英、港3个政府信任与否，均与他们是否认为香港财富分配公平，或香港存在阶级利益冲突，没有显著的关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较不满意港英政府工作表现的人，以及较不信任中、英、港3个政府的人，则较倾向于支持社会、经济及政治改革。

港人在社会经济事项上的态度分歧，其相互关系也很弱。例如，他们是否满意香港的经济状况及社会福利，与他们对财富分配及阶级利益冲突的看法，没有显著的关系；对财富分配及阶级利益冲突的态度，也与是否支持社会、经济及政治改革无关。

第二个令冲突得以缓和的因素是，一般来说，民众的各种态度分歧，与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无关。因此，虽然可以用性别、年龄、学历、收入

及社会阶层认同等作为标准划分社会群体，但态度上的分歧并没有在不同群体之间衍生出冲突。

在不同的社会组别中，各种态度分歧并没有一致性的分布，不足以互相强化。因此，港人没有基于态度分歧而分裂为几个永久性的冲突群体，政客及政治团体也就不能借此争取个别群体的坚定支持。

态度分歧及对政治制度、领袖和团体的取向

香港的政治制度、领袖及团体虽没有取得个别社会群体的坚定支持，但他们仍可通过认同某些政策立场，来争取个别“争议事项”群体（issue groupings）的支持。所谓“争议事项”群体，是指就某争议事项，由具有共同看法或利益者组成的群体，其组合可以是松散的，也可以是较严密的。目前，港人之间的态度分歧主要围绕3个事项：其一是对中国政府采取对抗的还是妥协的态度，其二是支持快速的还是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进程，其三是香港的社会改革问题。第三个事项没有前两个那么显眼，但重要性会不断上升，当中尤其重要的是，港英政府应加强还是减少提供福利的职能。然而，即使在这3个重要事项的态度分歧上，政治制度、领袖及团体之间的差别也是有限的。大体来说，大部分港人倾向于维持现状，持极端保守或极端激进信念的人可谓绝无仅有，即使有，也不能够在香港引起政治回应。

虽然如此，香港的政治领袖及团体都十分细致地凸显了他们在取向上的差异，努力利用这些有限的差异，建立自己的独特形象，并以之号召民众。可是，由于港人对这些政治制度、领袖及团体并不熟悉，因此未必能够体察他们之间的区别，或者认为这些差异是对他们进行区分的重要标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则政治领导组成部分如果要依靠“争议事项”群体来作为自己的支持基础，将会事倍功半。不过，要断定这一论据是否可以成立，我们必须探讨港人的态度分歧与他们对政治领导组成部分的取向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我的分析如下。

第一，对3个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港英政府较信任的受访者，同时较信任所有的政治制度，并较倾向于赞同政治领袖（罗德丞除外）和政治团体的意见（“四五行动”除外）。

同样地，较信任英国政府的受访者，同时较信任大部分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取向。他们也较倾向于赞同大多数政治领袖与团体的意见，而这些领袖和团体的政治取向其实并不相同。

港人是否信任中国政府，以及与他们对政治领导组成部分的态度的关系，与上述的情况稍有不同。首先，较信任中国政府的受访者，只会同时信任

那些“建制”的制度（港督、公务员、立法局委任议员及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以及属于拥护中央阵营的制度（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左派机构及香港新华）。简言之，越信任中国政府，也会越信任“建制”的及拥护中央阵营的制度。然而，较不信任中国政府的，却不一定会较信任其他（即非“建制”的和非拥护中央阵营的）制度，特别是那些对中国政府采取对抗姿态的制度。其次，较信任中国政府的人，也较倾向于赞同大部分“建制派”及拥护中央阵营的政治领袖的意见。我还发现，这些人不太认同司徒华的看法。最后，一般而言，是否信任中国政府与是否赞同政治团体的意见并无明显关系，即使存在若干关系，也缺乏实质意义。

第二，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港人是否认为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与他们是否信任政治制度、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意见，没有显著的关系。

第三，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对抗。整体而言，港人是否主张与中国政府对抗，与他们是否信任政治制度，没有显著及有意义的关系。反对与中国政府对抗的人，则较信任邓莲如及李鹏飞等“建制派”领袖，也较不信任司徒华及刘千石等“反建制”人士。令人费解的是，赞成与中国政府对抗的人，却同时较赞同下列政治团体的意见：“支联会”“民主民生协进会”“香港民主同盟”“四五行动”“香港民主促进会”及“香港自由民主联会”，而最后一个团体事实上对中国政府采取友善态度。

第四，对政治状况的满意程度。较满意香港政治状况的人，会较信任与“建制”及中国政府有关系的政治制度。但这个因素与民众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意见无关。

第五，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接受程度。港人是否接受现有政治体制，与他们是否信任政治制度、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意见，均没有显著的关系。

第六，政制改革。认为香港需要推行政制改革的人，较不信任委任立法局议员、区议员、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及工商界领袖，这些都是与“建制”或拥护中央阵营有关的制度。支持政制改革的人，也较不信任邓莲如、罗德丞及廖瑶珠，同时较不信任“激进”工运领袖刘千石。最后，是否支持政制改革，与是否赞同政治团体的观点，没有显著的关系。

第七，对港英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程度。表示满意的人，会较信任港督、公务员、立法局、经选举团选出的立法局议员、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香港新华、工商界领袖、专业人士及（颇感意外的）工会领袖。同时，他

们较倾向于赞同一些“建制派”领袖（邓莲如、李鹏飞、罗德丞、钟士元及钟逸杰）的意见。不过，这个因素却不影响民众是否赞同政治团体的意见。

第八，对《基本法》的满意程度。是否满意《基本法》，与是否信任政治制度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即使民众满意《基本法》，也不表示他们会赞同某一类政治领袖的立场。此外，这个因素也与民众是否赞同政治团体的观点无关。

第九，对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这个因素与港人是否信任政治制度，以及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意见，没有显著的关系。

第十，对社会福利的满意程度。对社会福利表示较为满意的人，都较倾向于信任公务员、立法局、立法局委任议员、经功能团体选出的立法局议员、区议员、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建制”的或由中国政府催生的制度。但是，这个因素与民众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意见，没有显著的关系。

第十一，社会经济改革。是否赞同社会经济改革，与对政治制度、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的态度，几乎完全没有关系。

第十二，财富分配。认为香港的财富分配是公平的人，较倾向于信任公务员、立法局、立法局委任议员、经功能团体选出的立法局议员、区议员、左派机构及香港新华，这些或是“建制”制度，或是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制度。不过，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与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的意见无关。

第十三，阶级矛盾。认为不同阶级没有利益冲突的人，较信任区议员、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左派机构及香港新华，他们也较赞同罗德丞、罗康瑞、钟士元及（出人意料的）刘千石的言论。但这个因素与民众是否赞同政治团体的观点，没有显著的关系。

从上文对港人的态度分歧，以及与港人对政治领导组成部分取向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港人不能够根据政治制度、领袖和团体在社会经济事项上的立场，来对他们加以区别。换句话说，这些政治领导组成部分之间，即使真的在社会和经济上有不同取向，其差异对民众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民众对他们支持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认同他们的社会经济观点。同样地，这些制度、领袖与团体也不能够借社会经济争议事项来发动民众支持他们。

其次，民众在衡量是否应支持不同的制度、领袖及团体时，所依据的较为重要的准则是他们对中、英、港3个政府的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香港政治冲突的各个层面，大多为港人所认识，因此民众较能根据政治准则来区分不同的政治制度、领袖及团体。在这些准则中，较为重要的是民众对港英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港英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程度、对中国政府及其相关组织的态度。更明确地说，港人把政治制度、领袖与团体划分成两大类：较支持港英政府及中国政府的，较反对港英政府及中国政府的。

最后，调查发现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港人似乎并未感受到港英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冲突，但这冲突客观上是存在的。因此，那些支持香港管治建制的人，也倾向于支持中国政府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组织。

对于在香港建立政治领导体系而言，最紧要的现象是港人有如下的明显倾向：把所有政治领导组成部分不加区分地归并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或是整体地支持所有政治制度、领袖及团体，或是全部不予支持。民众当然有可能将各制度、领袖和团体对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作为准则，考虑是否予以支持，不过港人似乎没有清晰地和系统地采用这个准则进行区分。港人似乎把所有政治领导的组成部分都当成一个广泛和扩大了的“政治权威”的构成部分。这个“政治权威”在他们之上行使权力，而他们自己则属于没有权力的被管治者。港人这种把社会人士分为有力者与无力者、“建制”与“非建制”、政府与被管治者、“他们”与“我们”的二分法，其实是把社会内部的主要分化视为政治分化，而分化的标准是政治权力之有无。这种二分法，是香港华人的文化中永恒的特征（其实这也是中国人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12]香港的殖民政治体系及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都带有政治权力集中、垄断的性质，这便进一步强化了港人心目中政治二分法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香港的“反建制”政治领袖及团体花了很多工夫为自己营造一个代表港人对抗港英及中国政府的公众形象，但他们仍然需要说服港人，他们并不属于那个管治“建制”的部分。

政治派别、态度分歧及对领导组成部分的取向

香港未来的政治体制应该如何设计，各方面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议和角力，现在，“保守派”“温和派”及“民主派”等政治称号仍然广泛流传。虽然这些名词并无明确定义，而且带有很强的道德判断意味，但我们仍然可以据之粗略划分各类人士，并探究他们对政制改革的立场，以及对公共福利的看法。在我的调查中，略多于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认同某个政治取向：2.8%认为自己属于保守派、17.4%自认属于温和派，而认为自己属于民主派的则有23.3%；不过，最大比例的人（38.5%）却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当被问及他们会支持哪一派的参政人士时，1%的受访者答称会支持保守派，22.3%支持温和派，34.1%支持民主派，而17.2%的受访者则

回答全部不予支持。因此，无论是从自我认同政治派别的角度，还是从对各派别政客的支持而言，民主取向都得到较多的民众支持。

有趣的是，民众对政治派别的认同，与他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各种态度分歧没有太大关系。[13]不过，自称属于温和派的受访者，与自称属于民主派的受访者相比，更倾向于赞成社会经济改革，而较不支持政制改革与快速的民主化。

一般来说，即使知悉民众的政治派别取向，我们也无法知道他们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情况。虽然如此，相对于温和派，自称属于民主派的受访者仍然会更加信任民主运动领袖、压力团体及工会领袖。自称属于温和派的人士比自称属于民主派的人士更倾向于赞同廖瑶珠的意见；但自称属于民主派的人士，则比自称属于温和派的人士更为赞同司徒华的意见。

就政治团体而言，我发现自称属于民主派的受访者，比自称属于温和派的人士更接受“香港民主同盟”及“四五行动”。然而，整体而言，港人并不觉得不同派别在政治立场上有太大的差别。

同样地，民众究竟支持哪个派别的政客，与他们在政治、社会及经济事项上的各种态度分歧只有微弱的关系。不过，我仍然发现，表示支持温和派政客的受访者，比支持民主派政客的受访者更为接受现行政治体制，而支持民主派政客的人，则较赞成快速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如果要对不同支持者进行区分，则他们对政制改革的态度是个较有用的指标。

稍有不同的是，民众究竟支持哪个派别的政客，与他们是否信任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表示支持温和派政客的受访者，比支持民主派政客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信任港督、立法局、区议会及专业人士。反过来说，支持民主派政客的人，则比支持温和派政客的人更信任民主运动领袖、压力团体及学者。因此，这两类受访者所信任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支持温和派政客的人比较支持属于“建制”的制度，而支持民主派政客的人则相反。

民众究竟支持哪个派别的政客，与他们是否赞同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意见没有显著的关系。这一现象反映出一般人不太明白不同领袖及团体在政治取向方面的差异。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就政治领袖而言，我发现，表示支持民主派政客的人，比较倾向于赞同李柱铭及司徒华这两位民主运动领袖的意见，他们也比较支持“支联会”及“汇点”的意见。这再一次表明，不同派别政客的支持者之间差异有限，即使有差异，也主要源于政治态度上的分歧。

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

穆迪（Moody）在综观了后儒家社会（post-confucian societies）的政治情况，特别是政治与社会分离的现象之后，做出了以下分析：

在当代体系，无论是执政政权，还是反对派，都没有特定的社会基础，那群控制政权的人之所以走在一起，主要因为他们拥有权力……反对派人士当然对政策有自己的意见，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照顾，但执政者与反对者之间可能没有系统性的政策分歧。两个阵营内的分歧，与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其严重性其实不相伯仲。至少，在某些政策与纲领上，执政集团内某些人的立场，与反对阵营内某些人的立场，其实很接近。[14]

尽管穆迪并没有把香港包括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而香港是否可以被当作后儒家社会也不置可否，但他的观察大体上适用于香港。在我的调查中，通过分析港人的政治及社会态度已经清楚地显示，香港的政治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不能将民众在政治及社会态度上的不同作为准则，以区分社会经济背景相异的人，或促使这些人组成不同的政治群体。为此，香港所有的政治制度、领袖及团体都一致地寻求全港市民的支持，而不具有特殊的社会支持基础（即不被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支持）。因此，民众对个别领袖及团体的支持，既不稳定，又不可靠。民众很容易转换拥戴的对象，而且转换原因很多时候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或者投机。

对于后儒家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分离，穆迪归因于有着强大的国家组织，以及社会的同质性（homogeneity），后者指社会不存在严重的分化。但这个解释对香港来说显然不够全面。要解释为何香港的政治缺乏社会基础，我们必须对其特殊的历史和结构环境进行分析。与其他东亚社会相比，香港其实相当独特。

第一，有强大但不介入社会事务的殖民政府，而长期执行的政策方针也建基于经济放任及社会不干预主义。在香港，政治与社会的分离，令政治与社会经济两个领域得以分离，两个领域有各自的运作规则。香港华人社会的强韧性体现在社会及经济群体有能力处理不少问题。假如这些问题不能由社会及经济群体妥善处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冲突恐怕会大幅增加。正因为不少问题已由华人社会自行处理，所以社会经济冲突演化为政治冲突的可能性颇低。

第二，由于香港是由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官僚组织管治，所以管治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没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带有感情与利益成分的政治联系。在其他社会，政治精英赖以发动民众参政的一些机制很常见，例如，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及个人支持网络（personal support network），但在香港，这些机制鲜有出现。

第三，香港由于没有民主选举制度，因此政治冲突与社会冲突之间难以建

立联系。管治的精英分子不认为需要争取市民的支持。

第四，香港社会的同质性使它免受社会裂隙的困扰，但在其他一些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往往令其陷于分裂。[15]香港骄人的经济成就，令其因经济问题而引发冲突的可能性降低。殖民管治的怀柔性质，对华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潜在矛盾也起着纾缓作用。

第五，殖民地的官僚组织不但垄断了政治权力，也成功地笼络了香港华人精英，并取得其协助。于是，管治精英的内部便不会出现分化，这些精英也没有理由动员民众互相攻击。

第六，由于民众对香港的社会及政治现状一直比较认同和满意，“反建制”的精英分子也就缺乏机会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市民对自己的支持。

虽然在态度上港人有分歧，但正如前所述，这些分歧是很零散的。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民众对政治事项的态度分歧与其对社会经济事项的态度分歧并无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港人能够察觉到制度、领袖及团体之间的政治冲突，但没有能力把这些政治冲突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冲突联系在一起。港人很可能把制度、领袖及团体之间的政治冲突视为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对于这些制度、领袖及团体，民众不会将其视为特殊社会经济利益的代表，反而倾向于把他们当作广义的“建制”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港人眼中，制度、领袖及团体之间的政治冲突与社会脱离，因此也和社会不相干。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政治冲突在社会内部只产生有限的政治化效果。因此，政治冲突引发的社会分化未见严重。

在一定意义上，香港是幸运的。虽然缺少被民众信任的政治领袖及团体，但现行的政治制度仍然受到港人的广泛拥护。[16]不过，由于英国人行将撤离，而且他们是这些制度的缔造者、操作者和守护者，这些制度将来能否延续便难以确定。如果要维系民众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就需要有备受信任的政治领袖及团体，使民众相信这些制度会继续有效运作。但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结构为民众所拥戴，它反过来却阻碍了强大政治领袖及团体的涌现。这些制度的存在，令政治领袖及团体变得多余。由于既有制度被民众接受，领袖及团体即使涌现，其类型也会有限。过分“反建制”或过分“反现状”的领袖及团体很难讨得民众的欢心。所以，从客观角度而言，几乎所有冒起的政治领袖及团体都取向温和：他们的政见差异很有限，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立场也趋同。[17]

由于政治制度深受民众拥护，故被民众信任的政治领袖及团体就不容易出现。虽然我不能够对此提出充分证据，但据我的观察，民众对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之所以持正面评价，是因为早已接受香港的政治制度且对现状满意。也就是说，民众是否接受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取决于他们是否接受

政治制度。所以在香港，并非由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赋予政治制度认受性，而是由政治制度赋予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认受性，这种情况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新生的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仍然会依靠民众对政治制度的接受度来建立自己的地位，但这会带来隐患。在殖民管治的最后岁月，社会问题及社会不满一定会纷至沓来。现行的政治制度可能会被民众视为效果不彰而受到责难，其认受性会被削弱。如果民众对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在争取民众信任方面便会遇到困难。

有两个因素令政治领袖及团体之间的政治分歧不仅较具实质性，也较易被觉察到。第一，权力架构之外的精英分子采取积极行动，争取进入管治建制。很自然地，权力架构内的精英分子对之会坚决抗拒。不过，权力架构之外的精英其实也无意令香港社会出现根本的改变，他们多是中产阶级参政者，在现行社会经济体制中享有不少既得利益，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其实是希望通过民主改革进入当权的统治者联盟。第二，部分政治领袖及团体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烈的对抗姿态。不过，这些领袖及团体对香港的社会经济现状也并非严重不满。

虽然建制架构的威信正逐步下降，但其被民众接受的程度仍然颇高。而且，港人对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不是排斥抗拒。因此，民众并没有太大兴趣卷入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这使得政治冲突大体上只局限在精英之间，规模不会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精英争逐权力而造成的民众动员及分化也不会严重。不过，由于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不高，政治领袖及团体争取民众支持的机会也相应减少。

一般来说，港人对政治的态度是务实及功利的，如何衡量政治及政治参与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能够为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如果港人认为政治领袖及团体之间的政治冲突不会为自己带来社会经济利益，便不会给予这些领袖及团体高度的信任。不过，从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到，虽然港人对社会现状仍然颇为满意，但在若干问题上，态度已经出现分歧。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争议事项会被政治领袖及团体转化为政治用途。但是，在民众眼中，现今的政治领袖及团体在政治竞争的过程中，往往未能正视那些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正因如此，民众便没有足够理由去信任这些领袖及团体。

由于民众认为政治领袖及团体只专注于政治权力的争夺，忽视了处理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对香港政治领导的产生带来不良影响。因为精英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政治冲突，没有什么社会和经济意义。这些政治冲突也大多表现为精英之间的个人冲突及言论对抗，这便更加令人觉得政治是政治野心分子争权夺利的游戏，政治领袖及政治团体的形象也就进一步受损。因此，港人学会了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但

这对于提高民众对政治领袖及团体的信任来说显然没有太大的帮助。

结论

展望未来，我预期现今的情况会有所改变，香港的政治会变得比较具有社会基础。从1991年9月起，随着由普选产生的政治领袖进入立法局，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会加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政治取向的人会进入精英队伍，管治精英的同质性于是有所下降。由于普选已经成为政治晋升的途径之一，部分政治精英会致力于与民众建立联系。港人对社会经济事务在态度上的分歧也会深化，尤其是与阶级矛盾有关的分歧，这会产生政治上的后果。此外，香港的政治领袖及普罗大众对中国政府会采取越来越妥协的姿态，《基本法》在1990年颁布，这又使得政制改革问题暂时不会成为重要的公共议题，政治领袖及团体自会转向利用社会经济矛盾来寻求支持。因此，政治与社会的联系会得到加强。

政治冲突与社会经济冲突趋于重叠，是否会导致出现民众信任的领袖？这在目前仍是未知数。有了普选之后，政客肯定会努力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表。然而，由于将来的大部分权力仍旧掌握在不由普选产生的政府手中，而《基本法》又主要对已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利益有利，于是，普选产生的领袖很难通过政治行动来满足民众的需要。部分普选产生的“反建制”政治领袖有可能脱离“反对派”队伍，转投执政的建制阵营，并从中获得政治或经济利益。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民众都会觉得普选产生的政治领袖无能、无权，甚至是机会主义者，对政治领袖的敬意及信任也会减少，要产生被民众信任的领袖及团体困难重重。

章末注

1.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in Joseph Y.S.Cheng（ed.），*Hong Kong in Transition*（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6-51；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Lau Siu-kai，“Hong Kong’s‘Ungovernability’in the Twilight of Colonial Rule，”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Robinson（eds.），*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Washington, DC：The AEI Press，1994），pp.287-314.

2.Lau Siu-kai，“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The Hong Kong Chinese View of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3，No.2（1990），pp.191-209；Lau Siu-kai，*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 and the*

Poverty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0）.

3.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这个样本原有800个住址，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实际数目减少至559个。

4.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p.196.

5.一项由香港民意调查及市场研究公司进行的电话调查也得到类似结果。该调查在1991年1～5月进行，发现不同政治取向的政治领袖所得到的民众支持度相差不远。*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ly11，1991，p.8。

6.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pp.196-197.

7.本文利用卡方检定（chi-square test）来判断变项之间的关系，显著水平低于0.05者，被视为存在显著的差异。

8.女性受访者相对于男性受访者更能接受现行政治体制，而男性比女性更为信任左派机构。

9.与年龄较小的受访者相比，年龄较长者较为信任港英政府、公务员及香港新华，但较不信任工会领袖。他们也较为不赞同邓莲如、李柱铭及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的意见，但较赞同李鹏飞及廖瑶珠的看法。

10.自认为属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为不信任香港新华，这些人较赞同叶锡恩的意见，较不赞同廖瑶珠和“四五行动”的意见。

11.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162.

12.Lau Siu-kai，*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pp.96-99.

13.因为只有很少受访者自认为属于保守派或支持保守派，所以我在统计分析时没有将之包括在内。

14.Peter R.Moody, Jr.，*Political Opposition in Post-Confucian Society*（New York：Praeger，1988），p.3.也可以参考：Gerald L.Curtis，*The Japanese Way of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Gregory Henderson, *Korea*：*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5.香港华人社会的高度同质性在我的调查中得到清楚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只有24.6%的人把自己划分为下层人士，而自认为属于上层的人几乎没有。

16.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

17.香港报章对1991年立法局选举的委托调查也发现，各候选人对社会及经济政策的立场差别不大。《信报》，1991年8月15日，23页。*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ugust21，1991，p.5.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Hong Kong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 Vol.65，No.2（1992），pp.225-246.中文版曾以“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香港华人对政治领导的态度”为题，刊于《广角镜》，第228期（1991），50-62页；现在的译本再经修订。

第2章　谁可担当香港的政治领袖(注)

1974年以来，已经有30个南欧、拉丁美洲、东亚及东欧国家从威权（authoritarian）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这与以往“第一波”（1828～1926年）及“第二波”（1943～1962年）全球性民主改革不同，在这“第三波”民主改革中，民众动员及暴力现象并不显著。而大多数的新兴民主政体也是通过谈判、妥协及协议产生。按照亨廷顿（Huntington）的说法，妥协、选举及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这一浪潮中出现的政权改革、替换及转化的主要特征。[1]

在启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以及巩固其新兴民主政体上，政治精英扮演了关键角色。不同精英之间的利益、政治信仰及政治支持基础常有很大差别。民主化的成功，通常取决于政治精英间的谈判、妥协、和解及协议。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精英由分裂转化为达成共识不但至关重要，而且是新兴民主政体的主要标志。这个转化过程主要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和解（settlement）与趋同（convergence）。“精英和解”意指正在互相斗争的精英派系突然刻意进行谈判，并就彼此的基本分歧做出妥协，以重整相互关系。“精英趋同”则是指分裂精英之间的敌对派系，在保留分歧之余，仍然愿意合作及缔结联盟，以建立一个有民众号召力及基础广阔的管治同盟。[2]

无论达成和解还是趋同，都对精英有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具有妥协的诚意、能够容忍及尊重对手、认同解决分歧的民主程序、有决心使民主政治有发展的机会、具备远见以使自己和追随者的当前利益从属于民主政体的长远需要，以及避免通过激烈号召来进行对抗性的民众动员。唯其如此，不少新兴的民主政体均是由精英刻意通过巧妙及细致的政治工艺所缔造。[3]

从表面看，有很多因素可以促使香港借着某种形式的精英共识发展民主。例如，香港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不存在严重的民族、文化、宗教、地域、阶级或意识形态矛盾，港人没有受到政治动员，分化亦不严重，故而缺乏政治力量禁止政治精英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与很多新兴民主国家相比，香港的政治精英在政治、社会及经济事项上的立场差别较小；政治精英之间也没有激烈斗争的历史，令他们不能相互合作；再者，大部分精英都对中国从1997年起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心怀恐惧与抗拒，因此应有足够理由团结起来，与未来的主权国周旋。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诚然，香港在民主化进程中已取得一些成果，这要归功于殖民统治者在撤离时采取了一些主动部署，但直到现在，香港的政

治精英仍未能在本地的民主程序问题上取得共识。当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年末提出政改方案以加速民主改革时，本地政治精英的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由于他们不能化解彼此间的分歧，民主化过程也只能缓慢地进行，要巩固过去的民主化成果实为艰难。

除了互相不和，政治精英力量薄弱且组织分化。这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来，包括缺乏强大政党、政治团体林立、内部派系主义猖獗及分裂不断、过分依赖个人因素作为内部团结的基础，以及精英在重大问题上立场摇摆不定、对所属政治团体的忠诚度不足及多变、互相之间的联盟不稳定、个人恩怨此起彼伏等。毋庸赘言，力量薄弱及组织分化严重阻碍了政治精英在香港民主化问题上达成共识。要在政见分歧较大的精英间找寻共通点，肯定是件异常艰难的工作。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阐述导致政治精英弱化及分化的结构性及历史性因素。[4]这些因素包括：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的政治支配地位、中英矛盾对香港精英所造成的严重分化、殖民管治对本地政治领袖形成所产生的分裂作用、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政治精英没有坚实的社会支持基础、缺乏有威望的本地领袖、大量有志从政的精英在政坛上突然涌现（由于殖民统治者逐步撤退，留下了局部的“权力真空”，政制改革也为政治精英提供了发展机会），以及同时存在多条让精英争夺政治权力的途径。除了这些客观因素，我会在以下的讨论中着重论述港人对政治领导的态度，及其对精英弱化和分化的影响。换言之，精英弱化及分化部分反映了港人如何看待政治领导的职能、角色及要求。事实上，这些态度性因素构成了政治精英在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主观环境。

港人对政治领导的态度，在几个重要层面促成了政治领袖的弱化及分化。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低度信任与支持，使他们失去了组成精英联盟以加强对民众号召力的诱因。民众对香港现行制度的信任度较高，对政治领袖的信任度则较低，这妨碍了强有力政治领袖的出现。政治精英与民众的联系薄弱，使得来自民众的压力不能发挥作用，无法促成精英合作。民众对政党的冷漠态度阻碍了强大政党的发展，从而令香港不能借强大政党把精英组织起来，促进精英团结，并把精英纳入紧密及有力的组织。由于民众对政治精英未能有效辨别区分，精英便不能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得到稳定及可靠的政治支持。港人一般接受了现有的非民主政治体制，对民主的诉求也只属温和，因而对政治领袖普遍采取的态度缺乏一致性。结果是，民众同时认可经由民主程序及非民主程序产生的政治领袖。由于港人同时接受不同的领袖产生途径，这便鼓励领袖从事派系间的争斗。港人不但认可政治精英行使政治权力，也允许社会经济精英行使政治权力，这不仅降低了政治事业对职业政客的吸引力，也令政客不得不与为数甚多的“半政治精英”竞争，以寻求民众的支持。

在阐述以上论点时，我会借助与其他人在过去几年进行问卷调查所获得的发现，尤其是我在1991年进行的全港性随机抽样调查。[5]除特别注明外，以下讨论所列举的数字皆来自1991年的调查。

对政治领袖的不信任

1991年的调查显示，在政治不明朗的情况下，港人对政治领袖有着急切的渴求。大部分受访者（62.3%）认为，香港迫切需要有本地的政治领袖带领港人面对未来，持相反意见的人只有13%。

虽然港人如此重视政治领袖，却无法找到这些领袖。当被问及他们心目中有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时，在1988年、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各有69.9%、69%及71.6%的受访者答称“没有”；认为“有”的则分别只有16.2%、9.5%及12.7%。

就地方领袖而言，情况也是一样。当被问及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中有没有值得信任的地方领袖时，答称“没有”及“有”的受访者，在1988年为67.7%及10.6%，在1990年为60%及7.9%，而在1991年则为68.1%及11.7%。

在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我也询问了受访者心目中有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团体。一如所料，调查结果与全港性领袖及地方领袖基本相同：62.1%及62.6%的受访者答称“没有”，只有7.2%及12.5%的人认为“有”。

除了不信任政治领袖之外，港人对政治领袖能力的评价也偏低。在1991年的调查中，31.9%的受访者认为领袖的能力属于“低”，36.7%的人认为“一般”，觉得“高”的人极少，只有10.5%。然而，对于政治领袖的动机，港人的评价尚算不错。15.7%的受访者认为其动机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24.4%的人认为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较多的人（38.4%）则认为是综合了自利的及利他的因素。有趣的是，有约1/5的受访者（18.5%）回答“不清楚领袖的动机为何”。

鉴于港人对政治权威采取功利态度，[6]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众对政治领袖的不信任源于他们对领袖能力的评价偏低，特别是领袖在与中英两国政府周旋时的能力。也许还可以这样说，港人把自己的政治无能感及政治愤世心态都投射到了政治领袖身上。[7]

港人一般也认为政治领袖间有太多政治龃龉，并且过分重视政治问题，忽略了社会及经济事务。然而，大部分港人认为，政治以外的问题才更重要。由于政治争议与社会及经济问题没有太大关系，民众因此难以对政治领袖产生信任，而领袖之间在政治问题上的冲突，对一般人也没有太大意义。[8]因为民众与领袖疏离，领袖也就不能够强大起来。

总的来说，香港的新生政治领袖迄今还未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得不到民众高度尊重及信任的领袖，力量肯定薄弱。在强大的英国及中国政府面前，得不到民众鼎力支持的领袖，在由两大政府主导的政治游戏中自然大为吃亏。

对政党的低度支持

强大的政治领袖通常是组织起来的领袖。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在催化精英共识、推动民众接受，以及保证该共识能够成功执行等事项上，政党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政党在民主化过程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香港的政党现在仍处于发展初期，而且前景并不明朗。大量客观因素阻碍着强大的、有民众基础的政党出现。[9]尽管香港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政治团体及政治组合，但其中仍未有以“政党”自称者（直到最近，才有一个名为“自由党”的政治团体成立）。本质上，这些团体及组合都是小规模的“干部式团体”，它们或以个别人士为核心，或是一种主从关系的网络。这些团体长期受到“党”纪松弛问题的困扰，这些新生事物因而不能够有效运作。

港人对政党的态度，形成了政党发展的障碍。纵然港人对“政党”概念的支持日增，他们对政党的态度仍三心二意。民众对政党的实际支持依然十分有限，政党也未能吸引民众参与其活动及工作。民众虽然越来越意识到政党的存在及其纲领，但政党作为民众动员的机制，重要性仍不高。[10]

就政党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港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怀有相当“不切实际”的期望。在1985年的调查中，有34.8%的受访者同意以下说法：“政党的出现会使香港的政治体制更好。”[11]在1991年的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如果香港出现政党，发生以下一系列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结果有67.1%的人认为港英政府会更重视他们的意见；61.8%的人认为中国政府会更重视他们的意见；57.2%的人预期香港会管治得更好；56.3%的人预期香港的政局会更加稳定；60.3%的人预期香港会因此出现受市民拥戴的领袖；63.1%的人认为港人会更加团结；而59.1%的人则觉得“港人治港”更有可能实现。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大比例的受访者（30.2%～40.4%）对这些假设性问题表示“不知道”。这显示，不少人对于政党对香港的影响不甚明了。不过，港人至少对政党有着正面的看法。

另一方面，港人也充分了解政党之争对香港的负面后果。在1990年的调查中，多达43.6%的受访者同意，如果香港社会出现政党，这些政党会争权夺利，导致社会不稳定。较小比例（38.8%）反对这个说法。而那些不赞成港人组织政党的人，自然也较可能同意政党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观点。

与政党发展尤其有关的是，港人即使不反对政党的出现，也不大愿意支持政党。在1990年的调查中，52%的受访者赞成港人组织政党，只有25.3%的人表示反对。不过，仍有19%的受访者对此不置可否。1988年的调查则发现，有25%的受访者赞同港人组织政党，而反对者则达55.5%。把1990年的发现与1988年的比较，组织政党的概念显然已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然而，即使民众支持政党的出现，但对政党的矛盾态度挥之不去。39%的人在1990年的调查中声称不会参加或者支持政党活动，只有20%的人表示会那样做，28.5%的人则声称要视情况而定。[12]

总的来说，港人明白对政党的需要，却不愿意参与政党活动。因此，尽管政党对产生强大及团结的政治领袖非常重要，但民众对政党的矛盾态度令香港的政党力量薄弱且组织分化。

对多种领袖选拔途径的支持

在其他新兴民主社会中，普选被民众认可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最重要（即使并非唯一）方法。普选作为挑选政治精英的渠道，除了有其重要性外，还有一个作为政治领袖之间仲裁者的重要职能。政治权力是根据选举结果分配给各个政治领袖的。其他选拔政治领袖的途径，在权力分配上只有次要的或政治上认受性较低的角色。借由非选举方式取得政治影响力的精英，不可能成为政坛中的主要权力执掌者。

根据不同国家所采用的特定选举安排，及其社会政治力量的构成状态，普选作为主要的政治领袖选拔方式，可以产生团结的政治领袖，也可以产生分裂的政治领袖。总体而言，即使普选对政治领袖有分化作用，在一个以普选为主要或唯一领袖选拔方法的社会，这些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在一个缺乏一种最具权威性权力分配方式的地方（例如，香港），这些分化作用较为明显。如果多种领袖选拔方法并存，而其中又没有一种方法占主导地位，则领袖可以通过不同方法取得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力量薄弱且组织分化的政治领袖的机会便会大为增加。

香港的政治体制并非以短期内完成全面民主化的方式从专权殖民政体中脱离出来；相反，过去10年左右的政制改革，其实是各种力量的角力过程，它们试图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及对香港的需要的理解来塑造改革的内容。在这个曲折坎坷的民主化过程中，中英两国政府虽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香港新生的政治团体也能扮演一个小角色。截至目前所推行的政制改革，代表了各方力量一系列的妥协。就政治领袖的形成而言，这些改革所衍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同时建立了选举的及非选举的领袖选拔方式，但都不是主导的权力分配方式。而且，选举方式又再分为直接（普及）选举及间接选举两种，更降低了普选作为政治势力之间权力分配最后仲裁者的重要

性。

尽管多种选拔途径并存，如果民众一面倒地只认可普选，并视之为最具权威的权力分配方法，多途径的选拔方式对领袖形成所造成的分化效果仍会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或是大多数有政治野心的政客纷纷参与普选，或是循其他途径选拔的政治领袖主动对普选产生的领袖归顺。无论如何，一群强大而团结的领袖便会形成。

然而，这两种情况在香港都没有发生。反之，港人虽对普选作为领袖选拔的方式赋予较高认受性，但同时接受多种途径选拔领袖的安排。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众仍普遍接受殖民政治体制，这个体制过去在促进稳定与繁荣方面表现良好。一般人虽对民主有所诉求，但对根本性地改变现有管治方式缺乏迫切感。香港一直沿用由总督委任各界人士承担政治职务的做法，现在虽因殖民地权威日渐萎缩而不复昔日光彩，但仍颇受民众尊重。[13]所以，选举性及非选举性选拔领袖的方式能够并存，实与港人同时接受过去的政治体制及民主改革若合符节。

几个调查相继发现，香港民众支持现行政治体制。在1985年及1988年的调查中，各有74.3%及70.5%的受访者同意以下说法："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1990年及1991年的相关数字则为59%及72%。[14]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政制改革的关系，4次调查中所谓的"香港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殖民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港人心目中仍有相当的认受性。

尽管港人接受现行的政治体制，但他们仍表达了对民主改革的温和诉求。这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将在1997年出现的主权移交，使得民众忧虑香港的政治前途，并促使他们渴望获得政治权力，以确保香港未来的政治自主性。因此，民众受到争取民主人士的号召影响，并从功利角度对民主有所寄望。[15]在1991年的调查中，我发现有57.9%的受访者认为，如果香港有选举，港英政府会较听取港人的意见。约有一半的受访者（50.6%）认为，如果港英政府由他们选举产生，会做得比现在出色。但值得注意的是，有32.4%的人表示"不知道"，这表明，在港人的心目中，选举的成效并非那么清晰。

与此同时，港人因认为香港的民主化前景不乐观，削弱了对民主的支持。在1991年的调查中，43.1%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成功推行民主政制的机会不大，28.2%的人认为机会大，而26.2%的人则表示"不知道"。再者，港人对民主的理解，也因为他们接受了现行政治体制而受到"污染"。对港人来说，民主政体只不过是现行政治体制的改良模式。在1988年的调查中，较多受访者（44.2%）把民主政府定义为"一个肯咨询民意的政府"。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相关数字为39.5%及35.9%。

16把民主政府定义为“一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的受访者比例，在1988年、1990年及1991年各为14.9%、27.9%及21.9%。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民主观，港人不坚持把普选作为主要或唯一的政治领袖选拔方式便不足为怪，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991年的调查中，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香港现在已经有了几种形式的选举（例如，区议会选举、立法局选举），你认为我们的选举是“太多”“太少”还是“不多不少”呢？结果很能发人深省。较多的人（44.6%）认为“不多不少”，只有11%及14.7%的人分别认为“太少”和“太多”。因此可以这样说，港人对以普选为核心的民主政体的诉求颇为温和。

在港人政治保守心态的背后，是他们的社会保守心态，而两者又是互为表里的。港人对民主化虽然有温和的诉求，但他们对于改革现行的社会及政治权力结构显得漠不关心。在1991年的调查中，当被问及他们觉得各类机构或人士现在的力量是“太大”“太小”还是“刚好”时，受访者所提供的答案（见表2-1）很能说明港人的社会及政治保守心态。所以，一般人并不需要通过民主改革来激烈地改变社会，尤其是这些改革需要以民主政体彻底取代现有的专权殖民政体。

表2-1　对各类机构及人士的力量的看法（单位：%）

	太小	刚好	太大	不知道	拒答
区议会	31.2	34.9	4.2	26.7	3.0
工会	23.4	30.7	4.2	38.2	3.5
大学	20.4	43.1	2.0	32.2	2.2
压力团体	19.0	22.7	4.0	50.4	4.0
市政局/区域市政局	17.5	46.6	4.2	28.4	3.2
政治团体	17.2	27.4	5.7	44.6	5.0
专业团体	16.2	34.4	3.2	40.9	5.2
工商团体	15.0	31.9	7.5	40.9	4.7
港英政府	11.5	41.9	22.7	21.2	2.7
公务员	11.0	46.9	8.2	30.4	3.5
医生	11.0	53.6	8.7	24.2	2.5
立法局	10.2	48.9	7.5	31.4	2.0
律师	7.7	53.1	7.5	29.2	2.5
左派机构	7.5	21.2	16.0	51.1	4.2
法庭	5.5	58.4	9.0	24.4	2.7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4.7	21.7	30.7	39.2	3.7

除了没有把民主选举视为最主要的领袖选拔方式，港人也未把政治视为一种事业或专业。这也许是民众接受殖民政体的一种反映，因为在该政体内，社会经济精英通过总督委任执掌各类咨询性职位而得以行使某些政治影响力，当然这些影响力只局限于个别政策范畴。换言之，虽然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分作为社会贤达和政治领袖所需具备的条件，而且不愿意接受工商界人士作为政治领袖，[17]但他们并不反对社会经济精英出任政治领袖。事实上，正如表2-2所示，在选择政治领袖时，民众较属意那些没有政治背景及政治野心的人，而不是那些“专业”政治人物，例如，政党领袖、压力团体领袖及政客等。这种属意社会经济精英出任政治领袖的意向表明，民众对政治及政客有某种程度的厌恶，对在专业上有成就的人颇为欣赏。民众之所以属意社会经济精英作为政治领袖，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政治意识、中国历史中长时期的官僚统治，及华人在殖民政权下难以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等因素不无关系。但这也可能反映了港人向往非政治化的、实事求是的、朴实作风的管治方式。港人的这种“反政客”取向，肯定不利于政治领袖的形成，因为它使得政治事业对那些原来有意从政的人失去社会吸引力。同时，它导致民众对政客缺乏好感，而社会经济精英能够有力量与政客争夺民众的政治支持，从而使得有政治野心的人不参与民主选举可以通过社会及经济途径跻身政治领袖之列。港人同时接受政治性的及非政治性的领袖选拔途径，阻碍了有组织的专业政治领袖以及强大政党的产生，并造成了政治领袖的分裂。

表2-2　港人属意的治港领袖（单位：%）

	适合	普通	不适合	不知道	拒答
法律界人士	49.6	21.2	7.0	20.0	2.2
民主派人士	43.6	18.0	11.2	24.4	2.7
专业人士	42.9	23.7	8.7	22.2	2.5
大学教授	40.4	25.9	10.5	20.4	2.7
温和派人士	36.9	19.5	11.5	28.9	3.2

（续表）

	适合	普通	不适合	不知道	拒答
工商界人士	29.9	23.9	18.2	25.4	2.5
政党领袖	23.2	21.4	16.7	34.4	4.2
公务员	22.4	25.2	24.2	25.9	2.2
政客	20.7	18.2	19.7	37.4	4.0
压力团体领袖	18.0	21.7	19.5	37.7	3.2
保守派人士	12.5	20.9	31.9	31.2	3.5

另外，从表2-3港人对不同机构及人士的信任程度可以看出，港人并没有把普选视为产生政治领袖的最主要途径，他们同时接受政治及社会经济精英。

表2-3　港人对各类机构及人士的信任（单位：%）

	信任	不信任	不知道	拒答
港英政府及相关机构/人士				
廉政公署	82.8	2.2	13.7	0.7
港督	67.6	13.2	17.5	1.5
法官	61.4	8.5	26.9	3.0
立法局	58.1	14.4	25.9	0.7
区议员	56.6	16.7	24.7	1.5
公务员	55.1	19.2	22.2	2.7
立法局选举团选出的议员	51.8	13.7	32.2	1.5
立法局委任议员	48.8	20.9	27.9	1.5
立法局功能团体选出的议员	46.9	11.9	37.9	2.5
独立的管理局	45.1	18.2	32.9	3.5
政府委任的咨询委员会	38.7	19.4	38.9	2.2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16.4	46.6	34.2	2.2
政治及社会团体/人士				
医生	72.8	9.7	15.5	1.7
新闻工作者	63.4	9.9	23.7	2.0
大学教授	59.4	5.4	31.7	2.7
律师	52.8	18.0	25.4	3.2
民主运动领袖	34.4	27.2	35.2	2.7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36.6	22.2	38.7	2.2
工会领袖	32.9	20.2	43.4	3.2
宗教领袖	31.4	20.0	43.4	4.5
工商界领袖	29.1	27.9	37.7	4.5
压力团体	25.9	23.2	47.1	3.2
左派机构	9.0	45.3	41.9	3.2

注：本表剔除了小部分回答“普通”的受访者，因此，有些行的百分比总和不足100。

表2-3与以往调查所得到的发现大致相同。[18]在诠释表2-3时，有一点需要留意。因为由直选产生的议员是在调查结束后才进入立法局工作的，所以他们并未被包括在该调查之内。不过，零散及观感性的证据显示，循直选途径晋身立法局的议员，比从其他途径产生的议员受港人欢迎。[19]这并不表示那些由非直选产生的议员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认受性。实际上，直选议员及其他议员在民众拥护及信任程度上的分别不大，有限的分别并不表示非直选产生的议员不孚众望。更值得注意的是，表2-3清楚地显示了民众对社会经济精英的信任，远胜于对政治精英的信任。

香港回归后会成为中国主权下的特别行政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回归前英国及中国政府在香港皆能行使很大的权力。所以，来自主权国政府的政治恩荫，自然成为另一条招募政治领袖的途径，甚至有可能比其他途径更具效用。来自英国的政治恩荫，是以往香港华人赖以取得政治影响力的唯一途径。回归前，民众认同殖民管治，所以借着政治提拔而获得领袖地位的人，也享有不错的政治认受性。

理论上，港人不信任中国政府，因此不认同因中国政府政治恩荫而得到政治地位的人。这一推测从1991年立法局选举中可见一斑，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领袖连一个直选议席也没有获得。[20]不过，港人在政治上是相当聪明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任何政治领袖均难有作为。在1990年的调查中，当被问及假如未来的政治领袖要有所作为，谁的支持最重要时，17.7%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政府”，5.6%认为是“港英政府”，35.6%回答是“香港市民”，而觉得“三方面同样重要”的则为29.7%。至于那些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竟有约1/3的受访者（33.1%）表示不会支持他们成为香港未来的政治领袖，30.8%则表示会这样做。就这一点而言，港人内心的矛盾可以从28.2%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中反映出来。

在1991年的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显示，被中国政府提拔的政治领袖受港人接受的程度也稍有提高。2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成为有作为领袖的最重要因素；认为“港英政府”及“香港市民”是最重要因素的受访者分别只占4.2%及26.9%；不过，仍然有29.9%的人觉得“三方面”的支持最为重要；表示不知道答案的则下降至15%。我们同时发现，与1990年的调查相比，在1991年的调查中，表示会支持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成为香港未来政治领袖的受访者比例稍有下降（27.2%）；然而，表示不会支持的比例亦下降至29.4%；答称“不知道”的则大幅上升至36.9%。

民众对来自上层的政治恩荫作为选拔领袖途径的接受程度，可以从受访者在1991年调查的一项答案中窥见。约六成的受访者（59.6%）表示会接受中国政府与港英政府合作在香港培养的政治领袖来治理香港；只有9%表示拒绝接受；然而，仍有不少人（27.4%）对此不能拿定主意。

对于产生政治领袖的不同方式，港人的接受程度虽然不一样，但大体而言，他们允许政治性的及非政治性的、普选的及间接选举的、政治恩荫等方式并存。由于多种选拔途径并存，彼此之间的重叠性又有限（即不同途径吸引不同的领袖参与），要形成强大及团结的政治领导，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领袖素质的态度

民众对领袖素质的态度，在两方面与弱化及分化的领袖有关系。一方面，港人虽然对缺乏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深以为忧，但依然对领袖的素质提出相当高的要求。而在香港现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是难以满足这些要求的。由于民众觉得政治领袖不能满足要求，自然也不会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一般人较重视领袖的个人素质，不太重视领袖的“政治技巧”，包括妥协的能力，以及建立领袖联盟的才能。港人的这种取向，实际上产生了鼓励领袖趋向“个人主义化”的效应。

在政治前景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民众自然渴望值得信任的领袖，并希望这些领袖给予他们安全感及方向感。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尤其突出政治领袖的道德素养，并需兼具道德的示范者及政务的决策者双重角色。因此，要取得民众的信任，香港的政治领袖需能凸显刚正不阿的性格，及对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要成为民众信任的领袖，他们需要让民众相信自己有诚意分担同一政治命运。遗憾的是，“九七问题”引发的巨大心理震荡，不仅使民众惶恐不安，同时使政治精英深受困扰。不少精英选择移民，作为保证个人及家人前途的最佳办法。对政治领袖而言，移民并不困难（虽然有些人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因此，一个容易被民众用以考核政治领袖是否对香港有诚意及担当的准则，便是他们是否拥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正因为香港大部分精英都已取得外国国籍或居留权作为自己及家人的“政治保险”（虽然他们也许无意永久离开香港），如果港人愿意用谅解的眼光来对待精英移民，并且愿意接受拥有“政治保险”的人作为政治领袖，那么香港的领袖问题也许会得以纾缓，民众对政治领袖的支持度也会提高。

显然，情况并非如此。纵使香港缺乏政治领袖，港人也渴望出现有所作为的领袖，但他们依然要求领袖不要持有外国护照或拥有外国居留权，以证明他们对香港及港人有奉献精神。这种要求无疑是合理的，但在当前的环境下，似乎不切实际，因为这种要求会令不少有资格的领袖不敢挺身而

出，而且会使不少现有的领袖在民众的心目中变成有道德问题的人。根据一系列的调查发现，港人很执着于以领袖是否拥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为标准，审视个别领袖是否值得信任。在1988年的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对港人因“九七问题”而移民持不置可否的态度。21.2%的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也有24.2%的人认为对，然而比较多的受访者（45.2%）不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的问题。虽然如此，大部分受访者（68.2%）仍然表示，不会信任已拥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的人来当香港的政治领袖，只有17.7%的人表示可以信任。

从1990年的调查可以看到，民众越来越以道德观点看待移民问题。当被问及是否认同那些因“九七问题”而移民的人已放弃了对香港的责任时，受访者的答案颇有分歧。43.6%的人同意这个指控，但也有45.6%的人表示不赞同，只有10.8%的人不能给出答案，这表明绝大多数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一如所料，大部分受访者（60.5%）拒绝信任拥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的人当香港的政治领袖，只有17.7%的人表示信任。

1991年的调查结果也是一样。有56.4%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的人当政治领袖，只有19.2%的人持相反意见。港人质疑领袖的诚意，对领袖的产生尤为不利。在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有香港领袖人物表示一定会在回归后留在香港为大众服务，受访者是否会相信他时，只有20%的人表示相信，27.7%的人拒绝相信，而29.9%的人表示要看该领袖是哪一方再决定，有颇大比例的人（22.4%）甚至无法给出答案。

就公务员而言，结果也是一样。一般来说，民众对公务员的评价不错，尤其是华人公务员。稍低于一半的受访者（47.6%）认为香港的公务员尽忠职守、为港人服务，只有18.5%的人表示不同意，多达33.9%的人则表示不知道或不回答该问题。此外，当被要求比较华人公务员与外籍公务员谁更有能力管理好香港时，32.9%的受访者觉得华人公务员能力较强，35.7%的人则认为两者差别不大，只有极少的人（10%）认为外籍公务员比较能干。不过，民众又因怀疑华人公务员对香港的忠诚而令华人公务员所获正面评价受损。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大量华人高级公务员会在回归后留港服务，而37.7%的人相信只有很少华人高级公务员会这样做，24.7%的受访者觉得留下来的华人公务员人数一般，而多达21.4%的人则答称“不知道”。这些发现说明，大多数港人对华人公务员在主权移交后继续留港服务并不乐观。纵然民众担忧回归后华人公务员难求，但依然不愿意信任那些已取得外国国籍或居留权的华人公务员在回归后管治香港。在1991年的调查中，有稍多于一半的受访者（56.4%）表示不信任这类公务员，愿意信任的只有16.7%，21.4%的人则表示不知道。

假如把民众对政治领袖及公务员的看法一并考虑，有一点非常清楚：尽管

香港正在闹政治领袖荒，且香港精英在海外购买“政治保险”已相当普遍，但港人依然对政治领袖的道德素质提出严格要求。如果民众在领袖身上找不到那些素质，便直截了当地不给予支持，恶性循环亦由此形成：因为来自民众的支持不足，强大领袖难以出现；同时，由于民众对领袖的道德要求较高，不少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可能因缺乏满足民众期望的自信，不敢贸然到政坛发展。结果，强大领袖的形成受到限制。

如前所述，与职业政客相比，港人较属意社会经济精英担当政治领袖。与此有密切关联的是，民众倾向于视“政治”为公共服务，而非权力的争夺。政治领袖被视为应为民众无私且竭诚地服务、应为了崇高的目标而参与政治，而非以政治为谋生之计，需比一般人遵守更严格的道德准则，而经济报酬应该是象征性的，其回报应以民众对他们的尊重及崇高的社会地位为主。港人对政治的厌恶感，在其他文献中曾被详细描述，[21]民众对政治领袖素质的态度，则必须做进一步的探讨。简言之，当想到理想的领袖素质时，港人特别重视领袖的品格及个性，而职业政客必须具备的政治技巧，却只被民众视为次要。这种对政治领袖的态度，使港人倾向于把领袖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人来处理，并且以他们为个体加以衡量。

表2-4罗列了受访者在1991年的调查中对不同领袖素质所赋予的相对重要性。从表中可以看出，民众一般突出领袖的道德素质，对他们的政治技巧则重视不足。

表2-4　对政治领袖素质的态度（单位：%）

	重要	不重要	不知道	拒答
为民众服务的热诚	91.3	0.7	7.0	1.0
诚实可靠	90.8	0.5	7.5	1.2
有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90.3	0.7	8.0	1.0
得到民众的支持	89.2	1.5	8.2	1.0
大公无私	86.3	3.7	9.0	1.0
对香港有归属感	85.5	3.7	10.0	0.7
能够积极接触民众	85.5	4.0	9.0	1.5
与各方面人士关系良好	83.1	6.7	9.0	1.2
学历	82.0	9.5	7.7	0.7
愿意为香港牺牲自己的利益	81.1	6.2	11.0	1.7
敢于与港英政府对抗	67.3	15.4	14.7	2.5
能够坚持己见*	66.6	17.2	14.0	2.0
处事手段圆滑	62.9	22.6	12.0	2.5
敢于与中国政府对抗	61.8	15.0	20.0	3.2
讲话动听	43.8	44.9	9.2	2.0
高尚职业	41.4	46.6	10.7	1.2
仪表出众	24.9	63.1	10.2	1.7

*0.2%的受访者答称“普通”重要。

有八成及以上受访者认为“重要”的领袖素质基本上是个人素质，例如，为民众服务的热诚、诚实可靠、有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大公无私、对香港有归属感、学历，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等。同等重要的是，领袖得到民众的支持，并与各方面人士关系良好。然而，对这些具有社会性的领袖素质的重视，反而暴露了受访者对社会及政治和谐的执着。港人对于作为政治基本元素的冲突现象，以及政客作为处理冲突的能手，似乎并不特别欣赏。[22]

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领袖素质包括仪表出众、拥有高尚职业、讲话动听、敢于与中国政府对抗、处事手段圆滑，以及能够坚持己见。这些素质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能够直接反映个人道德品格的素质，另一类则涉及政治技巧。这些调查发现为我们的论断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港人在考虑理想的领袖素质时，尽管认为个人素质比政治技巧重要，但假如他们认为某类领袖拥有大部分理想素质，则那类领袖依然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而香港仍旧有机会产生强大的政治领导。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在1991年的调查中，我们也探讨了受访者认为的理想领袖素质，以及这些素质与他们认为适合治港的领袖的关系。大致上，有几类领袖被视为拥有一些民众认为的理想领袖素质。[23]例如，认为公务员是治港合适人选的人，同时较倾向于认为大公无私、能够坚持己见、拥有高尚职业，以及仪表出众是理想的领袖素质。认为大学教授为治港合适人选的人，同时较倾向于认为得到民众的支持、对香港有归属感、与各方面人士关系良好、敢于与港英政府对抗、讲话动听，以及拥有高尚职业是理想的领袖素质。认为法律界人士为治港合适人选的受访者，同时较倾向于认为诚实可靠、对香港有归属感、能够积极接触民众、与各方面人士关系良好、学历，以及拥有高尚职业是理想的领袖素质。认为民主派人士为治港合适人选的人，同时较倾向于认为诚实可靠、得到民众的支持、对香港有归属感、敢于与港英政府和中国政府对抗、能够坚持己见，以及学历是理想的领袖素质。认为政客为治港合适人选的人，同时较倾向于认为对香港有归属感、敢于与港英政府和中国政府对抗、讲话动听，以及拥有高尚职业是理想的领袖素质。

总的来说，民众心目中的理想领袖素质，并不是由某一类领袖所“垄断”。更重要的是，港人觉得那些素质颇为平均地分布于政客及社会经济精英之中。因此，民众对领袖素质的看法强化了政治领袖多种选拔途径并存对领袖形成的分化效果。

结论

与那些成功的“第三波”民主社会不同，在一个政治领袖力量薄弱且组织分化的局面下，香港通过达成某种形式的本地政治精英共识来缔造且巩固民主政体，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必定十分困难。那些力量薄弱且组织分化的领袖不能纾缓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化的疑虑，容易引发政治上极端的言论与行动，使民众对领袖产生疏离，且不能在他们之间协议出一套民主程序，令权力争逐制度化。由于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的民主化计划如果得不到中英两国政府的认可，是不可能成功推行的。然而，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不热衷于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团结的本地政治领导层不可避免。

港人对政治领导的态度，无疑在形成力量薄弱且组织分化的政治领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态度包括：对领袖的低度信任、对政党的矛盾观点、对政治领袖多种选拔途径的接受，以及对领袖道德素质的重视，均强化了历史性及结构性因素对领袖形成的负面效应。显然，港人把自己的政治无能感投射到领袖的身上，民众对政治领袖的态度，其实也部分是那些客观因素的结果。

即使存在着各种不利于领袖形成的客观因素及民众态度因素，如果香港的政治领袖气量宏大、以大局为重、具备包容情操、目光远大，并奉民主为崇高政治理想，则香港的精英就民主化的形式及进度达成共识的机会仍然存在。不幸的是，这些对于抗衡甚至改变港人对政治领袖的不利态度而言十分必要的素质，在香港却非常短缺。

章末注

1.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165.

2.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Introduction，”in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eds.），*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7.

3.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in Guillermo O’Donnell et al.（eds.），*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art IV, pp.37-47；Giuseppe Di Palma，*To Craft Democracies*：*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Comparisons，”in Robert A.Paster（ed.），*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Stopping the Pendulum*（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9），pp.41-61；Nancy Bermeo（ed.），*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Gilbert Rozman（ed.），*Dismantling Communism*：*Common Causes and Regional Variation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4.Lau Siu-kai，“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The Hong Kong Chinese View of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3，No.2（1990），pp.191-209；Lau Siu-kai，“Colonial Rul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0，No.2（1992），pp.223-242；Lau Siu-kai，“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Hong Kong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

Vol.65，No.2（1992），pp.225-246.

5.除了1985年的调查，其他都是全港性调查。所有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回应率根据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计算：（1）1985年调查在观塘区（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区与住宅区混合的小区）进行，完成767个访问，回应率为46.9%。（2）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3）1990年调查完成390个访问，回应率为69.8%。（4）1991年调查完成401个访问，回应率为55.8%。

6.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72.

7.政治无能感及政治愤世感在香港华人中甚为普遍。在1991年的调查中，各有72.3%、79.5%及79.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或有很少力量去改变港英政府、英国政府及中国政府的政策。再者，只有约1/10的受访者（12%）不赞同以下说法："政治和政府是很复杂的，我们一般市民是无法明白的。"Lau Siu-kai"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1，No.2（1992），pp.3-20。

8.Lau，"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pp.244-245.

9.Lau Siu-kai，*Public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pp.2-5.

10.Louie Kin-sheun，"The'Party-Identification'Factor in the1991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in Lau Siu-kai and Louie Kin-sheun（eds.），*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The1991Election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3）；Jermain T.M.Lam and Jane C.Y.Lee，*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II*：*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Hong Kong*（Hong Kong：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1992），p.56.

11.Lau，*Public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p.6.

12.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74.

13.Lee Ming-kwan，“Politicians，”in Richard Y.C.Wong and Joseph Y.S.Cheng（eds.），*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1990*（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13-130.

14.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74；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p.197；Lau Siu-kai，“Political Attitudes，”in Lau Siu-kai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1990*（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p.132.

15.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pp.203-206；Lau，“Political Attitudes，”p.133.

16.Lau Siu-kai et al.，“Political Attitudes，”in Lau Siu-kai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1988*（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1），p.184；Lau，“Political Attitudes，”p.135.

17.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107.

18.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p.198；Lau，“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p.231.

19.部分电话民意调查结果可参见：《香港经济日报》，1992年5月7日，11页；《当代》，1992年5月15日，48-62页。

20.Leung Sai-wing，“The‘China Factor’in the1991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in Lau and Louie（eds.），*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pp.187-235.

21.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p.70-72.

22.与这方面相关的有趣发现可以在一项由报章委托的电话调查中看到。在该调查中，受访者认为，他们不满意立法局的最重要原因是议员有太多争执而缺乏共识。《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2月11日，8页。

23.本文利用卡方检定（chi-square test）来判断变项之间的关系，显著水平低于0.05者，被视为存在显著的差异。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Asian Survey, Vol.34，No.3（1994），pp.243-257.中文版曾以“谁可领导香港？香港人对政治领导的态度及香港政治领袖的形成”为题，刊于《广角镜》，第248期（1993），50-61页；现在的译本再经修订。

第二部分　社会与经济态度

第3章　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态度[注]

基于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崇，港英政府的经济职能非常有限，基本采取不干预政策，行政机关的设置也因此缺乏经济干预能力。经过政府与商界的积极宣传，在港人心目中，自由放任与经济奇迹似乎密切相关。至少从表面上看，自由放任的政府经济信条广为港人接受。然而，本章将表明，对于政府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官方和民间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民众对政府具体职能的看法时，分歧就越发明显。例如，即使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民众也期望政府更多地介入社会福利领域。民众对于政府经济角色的期待，与中国人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理解密切相关。尽管在理解上存在差异，但由于各种因素消解了这些差异可能引起的矛盾，因而令民众对政府改变经济角色的要求变得不是那么强烈。不过，香港近期的变化，将置港英政府于进行更多经济干预的政治要求之下。自由放任信条在港英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受性及其对自身的辩解，将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香港自由放任主义的构想

相比其他社会，港英政府的经济干预性极低，市场和个人的主动性一直在香港经济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在其他地方非常流行的术语，例如，计划经济、工业政策、行政指导、凯恩斯主义及货币主义这些代表国家行动主义（state activism）的各式名词，在香港几乎从未被政府使用和干预提起。

政府就是用自由放任的信条将其有限功能合理化。然而，政府从未以一种前后一致、系统且详细的方式来阐述有关信条。我们从一些官员偶尔的言论中东拼西凑出自由放任思想的内容，不过作为准则，政府的处理方式向来模糊和隐晦。尽管如此，这一准则的概要却明确无误，即政府认为，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最终会使财富总量最大化。由于个人和分散的决策最有效，因此政府不应干预市场，仅需提供必要及并非为满足某些私人利益的服务，使市场正常运行即可，并确保消除妨碍市场竞争的障碍。从家长制的动机出发，政府还要逐步减轻市场竞争中受害者的痛苦，以确保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从理论上讲，港英政府至少提供了市场运作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同时，总的来说，港英政府也遵循自由放任原则来限制自身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信条，自由放任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以贯之。“二战”以前，港英政府似乎并不特别强调该原则。为了让香港实现自给自足，政府

不得不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战后，自由放任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迎来其全盛期。之后，政府用“积极不干预”政策来描述自由放任原则，从而为以后要承担的更积极的经济职能做辩解。

事实上，我们看到政府在很多方面都背离了自由放任原则。经济干预以商业法规的形式出现，比如一些公营的公共设施工程、大量的公屋项目、界定比较清楚的基础设施投入、一些政府资助的宣传机构、一个非常精细的私营商业咨询网络、一些与私营企业合作的项目，以及政府资助和管理的各种社会服务等。然而，即使实施干预措施，也是以一种顺应市场的方式实现。而且，大家普遍认为，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只是轻轻地触碰市场，并没有窒息市场竞争和私营企业的主动性，没有掌控经济的坚定想法。毫不奇怪，在民众眼里，自由放任主义是与战后香港的经济奇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能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任何违背自由放任原则的尝试，通常都会受到政府和舆论的明确抵制。当民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时，自由放任原则经常为政府的不作为提供一个信手拈来的借口。

自由放任表面上虽是香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且获得政府和商界不遗余力的宣讲，然而香港民众对此如何理解，我们却知之甚少。很明显，在传统和当代的中国观念体系中，自由放任是陌生的概念，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没有清晰的分界线，而且后者显然处于从属地位。作为自由放任信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权的概念完全没有得到发展。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国家拥有干预经济的特权，甚至可以废除私有权，以维护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为依据进行市场调整。在自由放任信条中隐含的公私分离观念，并不存在于中国思维内。[1]就像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的，香港华人创造了一种政府经济角色的观点，它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和官方的概念。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一项全港性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2]调查在1988年进行，成功访问了396人，回应率为61%。从统计的角度看，该样本的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等因素的分布情况与香港总体人口相似。

自由放任和政府经济职能

总的来说，港人相当支持自由放任原则。在受访者中，同意或很同意港英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的各占54%和3.5%，不同意或很不同意的只有22%和1.8%。略出人意料的是，人们的态度并未因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而呈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3]然而，当受访者被问到关于政府的具体经济职能时，他们的态度立刻出现180度的大转弯。这些经济职能包括各种经济干预措施，它们或未被政府采用，或曾偶尔、稍稍被采用（见表3-1）。

表3-1　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支持（单位：%）

	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不知道	拒答
制定工人最低工资	3.3	54.3	33.3	0.8	7.6	0.8
控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8.6	59.8	26.0	0.5	4.0	1.0
积极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	10.1	77.3	7.6	0.0	4.0	1.0
由政府经营公共事业	2.8	35.6	45.7	0.8	13.4	1.8
积极扶持部分工商业发展	4.5	80.6	3.8	0.0	9.8	1.3
加强管制投机性活动	6.1	60.1	22.2	1.5	8.6	1.5
制定长远经济发展策略	5.8	80.1	3.3	0.0	9.6	1.3
建立政府管理的中央公积金	8.8	71.5	7.6	0.0	10.9	1.3
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	3.3	65.4	15.9	0.5	13.1	1.8
限制大机构垄断市场	6.1	60.9	20.5	0.5	11.1	1.0
征富人重税以减少贫富差距	16.9	57.8	15.9	0.3	8.1	1.0
提供失业津贴	9.6	64.6	18.2	0.5	5.3	1.8
保护本地工业免受外来竞争	4.8	70.7	13.9	0.5	8.8	1.3

除政府经营公共事业以外，香港民众非常希望政府能履行表3-1列出的所有经济职能，而履行这些职能就意味着一个高度干预的政府和一个高度受管制的市场。虽然对政府从私人手中收回公共事业并自行经营的反对意见并非压倒性的（仅有略少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却反映出香港民众相当尊重私有财产。多数受访者同意政府积极扶持部分工商业的发展，也同意政府制定长远经济发展策略的构想，这使得自由放任的哲学受到明显破坏。同时，对一些政策的支持，比如限制市场垄断、规范投机行为、保护本地工业不受外来竞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受访者很明显希望有一个温和宽厚的政府：它致力于人民的福祉，制定法律保障最低工资，控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建立政府管理的中央公积金，提供失业津贴。当他们要求政府积极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并向富人征收重税时，显然还没有准备完全接受市场的分配结果。为取得更平等的结果，他们甚至强烈主张政府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去抗衡资本家的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自由放任虽是一个普遍受欢迎的原则，却也没有阻碍香港民众期望政府行使干预的职能。当然，大原则与具体态度之间存在差距的现象并非香港独有，[4]但香港表现出的差距无疑非常显著。这就让我们对民众抱持自由放任信念的诚意和强度产生怀疑，同时怀疑当市场运作失败或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时，人们是否还会坚持这一信念。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自由放任信条是否会降低民众对政府干预的支持？表3-2中的结果显示，答案应是否定的，支持自由放任原则确实会强化对政府经营公共事业的反对，但也会降低对以下措施的支持：积极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限制市场垄断、征富人重税以减少贫富差距、保护本地工业免受外来竞争。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不支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受访者支持政府的其他经济职能。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那些赞同自由放任原则的人比反对者更支持政府在以下领域进行干预：制定工人最低工资、控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建立政府管理的中央公积金、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以及提供失业津贴。在这些与政府福利功能相关的领域，自由放任信念并没有提供矫正干预主义倾向的方法。

表3-2　支持自由放任原则和支持政府经济职能（单位：%）

支持	支持自由放任原则	不支持自由放任原则
制定工人最低工资	62.6	58.2
控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71.1	65.6
积极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	90.5	94.7
由政府经营公共事业	40.4	48.2
积极扶持部分工商业发展	95.8	92.5
加强管制投机性活动	72.6	75.9
制定长远经济发展策略	97.2	96.7
建立政府管理的中央公积金	91.0	89.5
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	79.0	78.7
限制大机构垄断市场	76.4	79.3
征富人重税以减少贫富差距	78.4	88.6
提供失业津贴	78.8	75.3
保护本地工业免受外来竞争	81.3	86.2

注：支持自由放任原则即赞成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不支持自由放任原则即不赞成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支持政府经济职能即赞成政府肩负有关职能。

私有化和政府的经济职能

私有化的概念最近在全球政界和行政管理界越来越流行。殖民地时期，即使私有化程度非常低，殖民政府仍反复引用这个概念。就意识形态而言，私有化和自由放任联系紧密，因为前者预示政府下放经济职能。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反，香港民众基本上反对私有化。受访者对“港英政府尽量将政府所做的工作或提供的服务交由私人机构去做”这一陈述的反应令人困惑——52.8%的人不赞成这个说法，4.3%的人很不赞成，只有25.8%的人赞成，而很赞成的仅有可忽略不计的0.5%。而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预期的，私有化和自由放任态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对私有化的态度不因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而显著不同。

正如对自由放任原则的支持一样，对私有化表示认同的民众并不保证他们不赞同政府干预。表3-3中的数据就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支持私有化的人更倾向于反对政府经营公共事业和制定长远经济发展策略；另一方面，支持私有化的人却更倾向于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的项目与支持自由放任原则所列出的差不多。对一个总体经济原则的认可，出乎意料地强化了民众心中某些干预主义倾向。与自由放任的情况相比，在对私有化的态度上，民众更加前后一致。

表3-3　支持私有化和支持政府经济职能（单位：%）

支持	支持私有化	不支持私有化
制定工人最低工资	82.0	80.0
控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71.2	71.1
积极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	93.2	91.9
由政府经营公共事业	38.5	49.3
积极扶持部分工商业发展	95.7	90.8
加强管制投机性活动	77.3	73.0
制定长远经济发展策略	95.9	96.7
建立政府管理的中央公积金	93.1	90.1
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	82.0	80.0
限制大机构垄断市场	77.1	75.1
提供失业津贴	81.6	77.2

注：支持私有化即赞成政府的工作或服务转交给私人机构，不支持私有化即不赞成政府的工作或服务转交给私人机构，支持政府经济职能即赞成政

府肩负有关职能。

商人、政府和自由放任

在香港，政府是自由放任原则的主要倡导者，而商人则毫无疑问的是主要受益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对政府和商人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是否把自由放任作为思想信条。人们对商界领袖越有好感，就越会认同自由放任，而对于政府的认同则比较复杂。在西方社会，自由放任的主张是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此而言，对政府的喜好应减少对自由放任的认同；同时，对政府的喜好也应使民众容易接受政府提倡的思想原则，而自由放任正是政府提倡的思想原则。如此看来，对政府的信任和对自由放任的认同二者之间的关系应是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香港民众对商人的态度总体来说仅能算是正面。35.7%的受访者信任工商界领袖，29.1%的人不信任，有趣的是，35.3%的人无法给出明确回答。人们的态度不因性别、年龄和职业而明显不同。但不同学历者的态度则有显著的差异：学历越高，越不信任工商界领袖。高比例的“不知道”和拒答显示出民众对财富和商人的矛盾态度。在1985年对香港观塘区的调查中我们发现，41.1%的受访者相信许多有钱人通过不正当方式赚钱，而35.8%的人持相反看法。[5]

可以预见，对工商界领袖的信任和对自由放任原则的认同是呈正相关的。确实，在信任工商界领袖的受访者中，有75.6%的人支持自由放任原则；而在不信任者中，只有67%的人支持。除管制投机性活动外，对工商界领袖的信任和对政府具体经济职能的认可表现为轻度正相关（在不信任工商界领袖的受访者中，75.5%赞同管制投机性活动；在信任者中，69.2%赞同管制投机性活动），例如，信任工商界领袖的人更加希望积极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93.5%：89.5%）、由政府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81.9%：74.1%）、征富人重税以减少贫富差距（81.3%：79.6%），以及保护本地工业免受外来竞争（81.2%：79.3%）。

与对待工商界领袖的态度相比，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就正面得多，这在过去10年里被广泛地证实。我们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52.2%的受访者信任港英政府，只有15.7%不信任，还有27.8%表示中立。同样地，他们就政府表现给予了正面评价，即4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表现良好，仅有6.6%持不同看法，还有46.5%表示中立。对政府的正面评价也延伸到相关领域：70.5%的受访者同意香港政治制度虽不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已算是最好，只有21.7%不同意；66.2%的受访者信任公务员，只有16.7%不信任。

信任政府和认可自由放任原则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信任政府的受访者中

有73.9%支持自由放任原则；不信任政府的人中只有63%支持这个原则。信任政府和认可私有化两者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信任政府的受访者中有31.5%支持私有化；不信任政府的人中只有14%支持私有化。

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解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信任政府和认可自由放任原则是相关的，我们可能因此认为，信任政府的人会反对政府承担干预经济的职能，这与它拥护的自由放任原则相一致。另一方面，对政府的信任，加上对工商业负面的态度，可能会使民众赞同增加政府的经济职能。结果是，两个相反的作用力同时影响对政府的信任与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的调查情况就是这样。在赞同大多数列举出来的政府经济职能和信任政府之间，我们没有发现统计上的显著关系。[6]只有4项有显著相关，其中3项显示信任政府引发对政府增加经济职能的支持。在信任政府的受访者中，87.9%的人同意保护本地工业免受外来竞争，77.7%支持限制市场垄断，66.7%同意制定工人最低工资；不信任政府者中的相关比例则是71%、73.7%和50%。只有对政府经营公共事业这一项，不信任政府的人比信任的人支持稍多一点（51.9%：48%）。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白鲁恂（Pye）和所罗门（Solomon）主张，华人容易产生一种对强有力政治权威的依赖，而对政治权威的正面评价很可能会强化这种倾向。[7]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同意以下陈述：若要保持香港的政治稳定，需要有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政府来统治香港。只有29.3%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人们的态度并没有因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而显著不同。如此一来，对强势政府的需求和对自由放任的认同应该是逆向的关系。在民众心中，一个强势政府应意味着干预性，但是在理论上，这一关系并不明显。在赞同自由放任原则的受访者中，同意和不同意香港需要强势政府的比例差别不大（70%：71.2%）。然而，在引入政府的具体经济职能后，关系就变得更加清晰。除最低工资、长远经济策略、中央公积金、限制市场垄断和征富人重税外，我们的发现表明，在其他所有领域中，支持强势政府的人更倾向于赞成政府干预，包括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管制工商业活动以防止欺诈、政府经营公共事业、扶持部分工商业发展、管制投机性活动、鼓励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提供失业津贴和保护本地工业。总的来说，民众对工商界领袖和政府的正面态度确实在理论上产生了对自由放任的认可，但没能抑制香港民众在具体领域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事实上，对政府的正面态度，加上对强势政府的高度需要，增强了民众对一个更加干预主义政府的认同。[8]

福利和自由放任的含义

尽管香港民众接受自由放任原则，但同时相当强烈和广泛地要求社会福

利，这种要求包括政府需解决个人和家庭问题，甚至给每个人提供工作和住所等。政府应负责提供福利这一观点，建立在福利是应得权益这个广被认同的主张基础上。在我们的受访者中，47.7%的人认为福利意味着救济有困难的人，而另外47.7%的人则持相反观点，即认为福利是每一个香港公民都拥有的权利。而且，香港民众不相信福利会对职业伦理产生任何腐蚀性影响。例如，在我们1986年的观塘区调查中，[9]只有29.7%的受访者担心太多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会令不少有自立能力的人变懒，靠申请福利生活。

鉴于对政府角色的这种看法，香港民众觉得公共福利不足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1986年的调查中，52.3%的受访者认为现时的社会福利太少，令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或家庭难以改善其生活条件。[10]在1988年的调查中，71.5%的受访者认同政府应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即使因此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仅19.7%的人持相反观点。这个发现表明，民众把福利放在优先地位。重要的是，民众对此的态度不因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而不同。对自由放任的认同还是稍稍影响了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在那些不认同自由放任原则的受访者中，78.3%赞同提供更多福利，即使因此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在那些支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受访者中，持同样态度的人没这么多（74.3%）。同样地，与反对私有化的人相比，支持者比较不主张牺牲经济以提供更多福利（79.3%：76.3%）。

就民众心目中自由放任的含义，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虽然香港民众衷心认同自由放任作为指导原则，并由此定义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尽管这会适当地降低人们对公共福利的要求，但认同自由放任原则和支持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是共存的。事实上，它甚至加强了对这种干预的支持。同时，对自由放任原则的赞同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对私有化的认可。即使总体倾向和具体态度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甚至是自然的，但如此显而易见的差距清楚表明，香港民众所接受的自由放任主义缺少实质内容。我们尝试在下面解释港人在这个认知上的差距。

美国自由放任的信条，本质上是个人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化身。与此不同，香港华人的自由放任原则显示出对政府的信任和对个人主义的克制。该原则之所以被接受，主要是因为其功利价值。即使民众并不理解自由放任原则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它还是被视为香港经济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相应地，香港的自由放任主义只是建立在脆弱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上。

华人传统的国家观念和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在某些关键方面相互矛盾。第一，华人不太接受将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典范，思维中也不存在个人权利的概念。在传统和现代中国，个人权利一直被认为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从而促使其为国家的需要贡献力量。第二，国家干预经济并不受任何意识形态

的限制，而且国家为了社会和谐而介入经济是合理合法的。第三，统治者有义务为被统治者的福祉服务。当人民陷入苦难时，国家有义务给他们提供福利。但这些福利并不是人们可以向国家索取的权利，而是国家基于道德和谨慎而应肩负的责任。[11]自力更生的观念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因为这些差异，香港民众心中自由放任的概念为政府在经济和福利领域的运作保留了广阔空间。事实上，在民众心目中，政府在市场出现，可能是自由放任必然的组成部分，因为人们期望政府保障市场公平，防止市场权力滥用，改变市场竞争引起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这里的公共领域扩展得比美国相应的概念大得多。

政治影响

虽然港英政府在许多方面偏离自由放任原则，但它在经济中的作用显然远没有香港华人所想象的那么多。所以在香港，官方和民众对自由放任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民众要求一个高度干预的政府。不过到现在为止，对政府经济职能的不同界定，还未产生政府和民众之间严重的政治冲突。因此，明显的问题是，统治香港多年的现实方式，怎样才能和民众对该政府的看法分割开来？为理解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香港经济发展奇迹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太会被挑战。第二，港人共同的愿望就是自由自在，不问政治，为家人和自己埋头工作，而这正是自由放任主义所提供的。第三，在香港的殖民体系中，政府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界领袖力量薄弱、分化，得不到民众支持。即使民众想要改变政府的经济政策，也缺乏政治力量去强行推动更为干预主义的政策。第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务已明显扩展，大大提高了香港基层社会的生活水平。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仍可期待政府某种形式的帮助，对市场竞争的不满也从而减少。第五，香港的华人社会既是那些不幸成员的安全保障，也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例如，香港华人的宗亲关系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在非人格的市场和个人之间形成缓冲。[12]同时，家族企业也扮演着劳工调配中心的角色，政治上也减少了动员劳工的可能。[13]通过这些功能，华人社会减少了华人的政治化，也就是减少了反政府经济政策的集体政治行动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近期的发展有可能使政府和民众关于界定政府经济角色产生了政治化差异。随着政制改革讨论的开始、近期政府政务的逐渐开放，以及民众和他们的领袖拥有越来越多向政府施压的手段，而对施压手段的理解又不一致，注定会不断产生冲突。香港权力分散的经济结构和工会的弱势，意味着即使产业工人要求改善经济状况，也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有限地达成目标。因此，他们必须利用政制改革所提供的新途径向政府施压，通过立法

或行政手段改善处境。由于20世纪80年代收入不均不断扩大，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劳工激进主义。

香港经济环境的变化会最终影响政府的经济角色。不断兴起的国际保护主义，内地与香港之间持续紧密的经济联系，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资产、技术密集型及高附加值生产的转变在香港也势在必行，还有劳动力短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新形势都要求政府承担更积极的经济角色。最主要的是，香港的经济增速预期将放缓，政府将面对一个更加不利的经济环境。此外，香港的社会变革将弱化家庭和亲缘关系，加重社会问题，从而增加民众对社会福利的要求。在这方面，民众尤其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退休福利。

“九七回归”使政府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它已造成资本和人才外流，进而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政府的权威被削弱。为重新提高民众信心，政府计划实施数项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新机场的建设），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通过明确的财政手段刺激经济。此外，还有一些计划正在酝酿，这些计划旨在创造必要条件，吸引外国投资和人才来填补缺口，迎合发展的需要。

章末注

1.Benjamin I.Schwartz，“The Primacy of the Political Order in East Asian Societies：Some Preliminary Generalizations，”in Stuart Schram（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0；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18.

2.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这个样本原有723个住址，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实际数目减少至649个。

3.本文利用卡方检定（chi-square test）来判断变项之间的关系，显著水平低于0.05者，被视为存在显著的差异。为简化数据，文中表格省去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的数据。

4.Herbert McClosky and John Zaller，*The American Ethos*：*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Herbert McClosky and Alida Brill，*Dimensions of Tolerance*：*What Americans Believe About Civil Liberti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3）.

5.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65.

6.实际上，在本研究中，对港英政府的信任与对工商界领袖的信任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很低的（$r=0.15$）。

7.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MIT Press，1968）；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8.在本研究中，“信任港英政府”和“需要强势政府”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信任港英政府的受访者中，74.7%认为一个强势政府很重要，而那些采取中立态度和不信任港英政府的相关比例分别是58.4%和52.6%。

9.1986年的观塘区随机抽样入户调查，完成539个访问，回应率为67.4%。

10.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p.92-93.

11.Andrew J.Nathan，*Chinese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27.

12.Lau Siu-kai，*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pp.67-120.

13.Frederic C.Deyo，*Beneath the Miracle*：*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131-133.

---

1. 本文与关信基合著，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Asian Survey, Vol.30，No.8（1990），pp.766-781.

第4章　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

中国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同时，《基本法》将正式生效。[1]这个规定香港政治结构和重大公共政策的“小宪法”的主要目的是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原则，关键内容是保持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现状50年不变。《基本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中国和英国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2]明确了香港政治的未来，把经过深入讨论的香港社会经济制度都详细地写进了《基本法》。《基本法》被当作中央政府和港人之间的政治契约，最主要目的是缓解港人的焦虑和恐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港人担心现状会急剧改变，损害自己的利益。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认为，香港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包括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公平社会，其核心是：有限政府、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不干预的社会政策。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社会对这种制度的基本要素总的来说仍有共识，虽然社会发展已带出一些改变，进一步的变革也开始出现。[3]然而，自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民众对社会政策和经济制度的看法。下文将会论述，有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转变态度，开始怀疑香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际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的销蚀。香港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让本已困难重重的政制转型更加举步维艰。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瓦解的长期影响不仅深远，而且令人担忧，因为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基本法》作为法律架构，能否促进社会整合和香港未来发展，进而影响这部“小宪法”在香港的认受性。

本文旨在记录港人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看法的转变，所使用数据来自我和其他研究人员在过去10年（特别是1994年）所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4]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变迁

香港民众对社会政策和经济制度看法的转变非常重要，为显示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需先简单描述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席卷香港的社会变迁。[5]这些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香港的经济制度和港人际遇，也改变了香港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模式，最终削弱了香港民众对战后主流价值的认同。

经济增长减速是最重要的社会变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使香港在“二战”后缔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增长开始下滑。近年来中国内地经济腾飞虽提振了港人的信心，但

香港的经济表现却进一步摇摆不定。若干年前，香港实际本地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一直比较可观，例如，1961～1973年，GDP年均增长9.5%；1974～1983年，微降到8.9%；1984～1988年，再降至8.1%。自此，经济增长开始直线下滑，1989年GDP同比增长2.6%，1990～1994年的年增长率依次为3.4%、5.1%、6%、5.9%和5.5%。[6]

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有3个，即港元和美元汇率挂钩带来的输入性通胀、人才外流以及劳动力短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香港通胀率一直高企（与过去相比），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率在1982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和1994年依次是10.9%、5.7%、7.8%、10.3%、10.2%、11.6%、9.6%、8.8%和8.8%。[7]住房费用暴涨是其中最明显也是最具杀伤力的因素。房屋价格过高令大量香港市民难以置业，对年轻一代的伤害尤甚。通胀也助长了各式投机行为，而这些财富再分配的形式背离了民众一直以来推崇的道德价值，例如诚实、勤劳、谦逊、审慎、节俭等。每个人都尽力赚快钱，不惜代价“跑赢”通胀，给香港社会带来紧张气氛和诸多压力。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香港还经历了去工业化，本土工业转移到中国内地，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的趋势不可逆转。1984～1994年，工业北移致使香港的制造业劳动力下降了50%。[8]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工人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持续飙升，因为他们掌握的技能无法适用于正在扩张的服务业。令人诧异的是，服务业也出现劳动力短缺，部分行业甚至要通过输入外地劳工来解决问题。一个主要由年长者和低学历人士组成的社会底层开始出现，并趋于固化。大多数服务业的薪酬较低，仅有小部分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能够从金融、投资和商业领域正在扩展的机遇里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

香港的经济变迁令贫富分化严重加剧。战后初年，工业化发展带来了经济相对平等。然而，战后头30年收入不平等现象不断减少的情况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戛然而止，从那时起，贫富差距开始扩大。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49降至1971年的0.43，并维持在此水平至1976年，其后重回上升轨道，1981年基尼系数是0.45，1991年已达0.48，似乎还会升高。该数据仅计算人口普查收集来的收入数据，不包括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因此很可能低估了香港经济不平等的实际状况。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香港年轻人的教育水平虽不断提升，流动机会却在缩减。服务业的扩大虽令香港中产阶级增长，高薪职位也曾因回归引起人口外移而一度增加，但是高阶和高薪职位的增加赶不上高学历人口增长的速度。纵使香港已成为“文凭”社会，但教育的功利价值也在下降。

在高学历人士的社会上向流动机会不能与预期相匹配，中产阶级因此产生

困扰的同时，香港由超级富豪组成的社会上层阶级却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地位，越来越倾向于阻碍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人享有机遇。他们穷奢极侈的炫富，偶尔还有丑闻，被传媒广泛报道。上层阶级的极端物质主义与缺乏文化品位相生相随，令其丧失社会的尊重。他们的自命不凡、势利和冷漠无情也使自己与民众疏离，普罗大众看待富人时五味杂陈，既有几分欣赏、几分嫉妒，又有几分看不起。

一个固化了的社会底层、一个越来越抱团的社会上层、一个“危机处处”的中产阶级，这三者同时出现引发了社会不和谐、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摩擦，甚至还有明显的阶级敌视。[9]

回归问题应是瓦解香港社会经济结构的最有力因素。政治前景不确定引起的焦虑导致大量港人移民，当中以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专业和管理技能的人最多。[10]虽然回流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才空缺，但他们对香港的承担是脆弱的。港人有一种集体无力感，想用尽一切手段，包括不合法、不正当和不能见光的，以保护自己和家庭的未来。自求多福战胜了世俗的道德关怀，自私自利让人变得冷漠无情。不过，在香港这个移民城市，利他主义情操从来不盛行，因为移民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安定下来，而这种感觉也几乎消磨殆尽。一方面是人际和社会冲突增加，另一方面是人们不再对权威心存畏惧，因为民众看到，在这个世事难料的环境下，他们没有能力保护香港的利益，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轻易放弃香港，以规避社会责任。这些都共同营造了一种社会环境，里面充满了贪婪、抱怨、迷失、闷闷不乐、愤世嫉俗、意识狭隘、偏执和丑行，显示了港人当时的世纪末心态，抨击富人、当权者和名人成了大众娱乐，这些情感逐渐被唯利是图的传媒利用，反而加剧了社会分化。

简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已经削弱了香港的权威、体制和社群凝聚力，对民众如何看待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人际互信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最明显后果是，港人之间失去信在，但必须承认，港人的互信向来不多。在1985年的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大部分人不可信任”时，只有42%的受访者回答不同意，高达59.7%的人表示同意。

随后情况变得更糟。在1991年的调查中，一方面，有59.4%的受访者自认信任港人，同时有54.6%的人表示喜欢港人。但另一方面，有多达57.1%的受访者觉得越来越多的港人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仅有9.7%不同意。并且，有45.1%的受访者同意港人像一盘散沙，只有40.6%不同意；

在认同这种说法的受访者中，仅19.3%对港人能在几年内团结一致表示乐观，53%表示悲观。

在过去几年，人际互信明显降低。1994年的调查显示，30.1%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港人可以信任，33.5%不同意，余下的31%保持中立。值得注意的是，年长者较倾向于相信别人，这意味着年轻人的社会疏离感更严重。另外，港人对自己的社会成员也不抱厚望。根据1994年调查，只有14.9%的受访者认为港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35.2%认为港人的社会责任感较脆弱，而40.8%则认为一般。尽管如此，在人际关系层面，情况要好一些。当被问及是否同意港人乐于助人时，51.6%赞同，仅12.3%反对，而34%认为一般。

社会公平

“二战”后，经济增长、阶级结构变动、政府低度干预以及教育普及为港人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流动机公。在香港华人（他们很看重自由社会中的个人竞争力，并认为那是成败的关键）的心态中，这些客观因素可以找到相应的态度和取向。一个公平的社会通常指机会均等。在香港，民众对机会均等的要求极为强烈。根据1992a年调查，96.9%的受访者认为每个市民不论其收入或财富，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82%认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有平等的机会创业。

结果的平等并没有被当成公平的标准。例如，在1992a年调查中，73.8%的受访者不同意平等意味着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同样地，在1994年调查中，81.4%的受访者不同意公平社会意味着每个人收入相等。即使如此，港人也不一定反对结果平等的社会。在1985年调查中，55.3%的受访者同意一个良好的社会是一个大家收入都差不多的社会，只有39.9%的人不同意。

由于民众是这样理解公平的，因此只要港人看到有大量机会存在，就倾向于认为公平，否则就会感到社会不公。

一般来讲，香港仍被民众视为一个公平或平等的社会。在1985年调查中，49.8%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社会公平，仅有38.2%不认同。在1991年调查中，51.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是公平社会，而32.7%不认同。根据1992a年调查，61.6%的受访者同意香港是个平等社会。此外，认为香港是个机会之都的观点仍然流行。1985年，87.6%的受访者同意香港是一个充满发展机会的地方。1986年，84.2%的受访者同意在香港，一个人只要有本事，用心工作，便会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1994年，多达82.5%的受访者仍将香港视为充满机会的社会。尤其重要的是，民众倾向于相信穷其一生一定能向上流动。1986年，85.4%的受访者相信他们有机

会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样地，199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65.6%的受访者认为比父辈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

民众普遍相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个人努力会有回报，其结果是富人就此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接受。1986年，48.1%的受访者同意大多数富人靠个人条件（例如，自己的努力、成功的投资、家庭的帮忙）致富，仅27.5%认为富人致富是靠剥削劳苦大众或不正当途径。1985年的调查亦显示，55.4%的受访者并不同意富人的钱是靠剥削劳苦大众得来的。同样地，贫穷被解释为源于个人原因。1986年，59.7%的受访者认为一个人穷，是他自己的原因，而40.3%的人归咎于社会。1993年，52.5%的受访者将穷困归咎于个人，只有28.8%认为是源于社会的不公平。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贫富差距扩大只轻微地削弱了富人的认受性。如表4-1所示，1994年，港人仍将富人的成功归因于个人的积极努力。

表4-1　对致富因素的评价，1994年（单位：%）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有才干	75.2	16.6	4.4
努力工作	74.9	15.9	6.0
有冲劲、肯冒风险	74.7	11.6	6.4
家庭背景好	62.7	17.8	3.8
受过高等教育	52.8	23.9	18.4
有人帮助	49.9	21.0	18.0
好运气	45.3	25.4	20.0
剥削他人	28.1	28.2	29.8
运用不正当手段	23.3	29.9	28.6

尽管如此，一些不祥征兆开始浮现。民众的不安心态始终徘徊不散，甚至滋长，这种不安主要针对香港日渐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和富人正在恶化的公众形象。1986年，67%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严重，只有16%认为一般，17%认为不严重。1990年，56.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财富分配不公平，仅26.4%认为公平；69.7%的受访者肯定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矛盾，仅18.2%否认。在1992a年调查中，半数受访者（50.6%）同意香港的失败之处在于让富人越富、穷人越穷，42.4%不同意。1994年，57.3%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财富分配不公平，仅12.7%认为公平。

1992a年调查也探测到民众对哪些特定社会群体的收入表示不满。30.1%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商人所得的收入比他们应得的要多；专业人士的相关

数字是22.4%；最重要的是，多达33.5%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工人没有获得应得报酬。

而且，民众对富人的社会责任感不满。1994年，58.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富人所尽的社会责任并不足够，仅4.9%认为足够。因此，只有13.9%的受访者认为富人应该得到港人的尊重就不足为奇。同时，51.8%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有社会地位的人所尽社会责任并不足够，认为足够的亦仅有7.4%。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只有20.7%的受访者敬重有社会地位的人士，而商人最不可能被选为政治领袖。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接受

在港人心目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繁荣等同于社会稳定。港人对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抗拒，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的认受性。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相比，香港的特点在于无限制的市场化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香港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历史和政治因素的综合结果，[11]其骄人成就却使之成为香港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12]

在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得到港人巨大的支持。在1992a年调查中，65.2%的受访者同意私营企业制度总体上是公平和有效的。但也有证据显示，港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在缓慢下滑。1991年，58.4%的受访者同意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制度，持相反意见者仅占5.2%。到了1994年，对此观点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降到57%，但持负面看法者升至10.2%。

同样地，即使民众仍然支持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但热情度已明显降低。1988年，57.5%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有关政策，只有23.8%反对。到了1994年，支持者降到42.5%，反对者升至27.7%，而16.2%的人持中立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干预会引发厌恶和反感。实际上，传统的取向仍深植于港人的经济观，他们鼓励，甚至要求政府推动经济繁荣、矫治社会问题以及纠正过分的不平等。[13]尽管他们原则上接受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但同时要求公共福利相对丰厚和全面覆盖。港人认为政府有责任提供福利，源于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福利权利观。[14]事实上，港人要求政府介入经济领域的呼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日益高昂，反映了香港社会经济变迁带出的种种问题。如表4-2所示，港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尤其提供失业津贴，这在目前是不存在的。

表4-2　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支持，1988年和1994年（单位：%）

	1988 年	1994 年
制定最低工资	57.6	60.7
提供失业津贴	74.2	78.5
加强管制投机性活动	66.2	66.4
建立中央公积金	80.3	80.2
向富人征收重税	74.7	76.7

注：1988年的调查问卷采用四分尺度，1994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所以，如果1994年调查采用四分尺度，其相关数字应该较大。表中数字为回答“赞成”和“很赞成”者。

社会经济不满情绪和社会整合

在港人心目中，香港不再是公平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再神圣不可侵犯，这不但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变得更松散，也使得港人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例如，在1988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2b年和1994年调查中，满意香港经济现状的受访者比例依次是57%、42.1%、31.6%、32.2%、35.3%和39.3%。满意香港社会现状者在1988年、1991年、1992年和1994年的比例依次是40.9%、17.5%、22.1%和26.7%。香港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也破坏了社会信任，民众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威越来越不信任，犬儒心态日益弥漫。[15]

大多数人担忧香港会出现更多的社会冲突。1994年，65.6%的受访者认为目前香港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太多，仅11%持相反观点。由此可以看出，民众重视社会秩序，认为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1985年的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法律制度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最重要机制，在199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54.4%。1994年，当被问及维持香港未来繁荣和稳定的最关键要素是什么时，21.1%的受访者认为是政治制度，7.1%认为是政治领袖，而58.7%选择法律制度。[16]

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石，法律的重要性在表4-3的数据中获得进一步支持。表4-3列出了在1994年调查中，受访者就维持香港社会秩序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所做的评价。

表4-3　对维持社会秩序各因素的评价，1994年（单位：%）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公民教育	92.0	4.0	1.1
法律制度	91.4	3.8	0.4
提高市民生活水平	90.0	7.1	0.5
道德教化	88.1	8.0	0.6
经济增长	86.9	8.8	0.8
政府	85.8	7.3	2.3
严刑峻法	69.9	17.1	8.0
民主政治制度	62.1	22.9	5.1
政治领袖	53.9	21.5	10.7

港人明显将重心放在道德和法律上。事实上，在华人文化中，教育和法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在1994年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90.6%）认为香港应该继续遵守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如忠、孝、仁、义，但同时对香港的道德失范感到绝望，51%认为港人的道德越来越败坏，只有27.1%不同意。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低迷，民众对政府和政治领袖的不信任增加，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石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因此，维护香港法治最为重要，可以抵消社会经济结构瓦解的负面影响。虽然目前香港法律还可以得到有力维护，但过去几年，港人对法律的信任度逐渐下降。1985年，有75.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法律公平，相关比例在1988年、1990年、1991年和1994年依次是69.2%、53%、51.4%和48.3%。[17]另外，民众也认为法律制度更加维护上层阶级的特权。因此，在1985年的调查中，有73.4%的受访者同意香港法庭在审判时，富人比穷人有利，相关比例在1988年和1994年分别是69.2%和74.9%。民众对律师和法官的信任度也在下降。对于律师，在1988年、1990年、1991年和1994年，各有63.4%、60.8%、52.8%和33.9%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对于法官，在1988年、1991年和1994年，各有64%、61.4%和50%的受访者表示信任。

港人也越来越担忧对法律的敬意降低。1994年，虽然56.7%的受访者认为港人是奉公守法的（仅14.5%表示不同意），但仍有多达30%的受访者认为与3年前相比，香港奉公守法的人减少了（只有15.7%认为多了，42.3%认为没有差别）。

另外，民众对法律的不满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律对罪犯过于宽待。1994年，68.1%的受访者赞同这个说法，只有10.2%持相反观点。

更糟糕的是，民众对回归后的法律制度没有信心。1994年，仅8.2%的受访者表示对回归后的法律制度有信心，而43.8%直言没有信心。

因此，尽管港人越来越重视法律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并仍信任法

律，但法律所能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已经下降。

虽然香港社会经济结构在松动瓦解，但港人的社会认同感并未受到打击。与过去相比，今天的香港民众更倾向于把自己看成“香港人”而非“中国人”。在1985年的调查中，59.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36.2%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相关的数据在1990年分别为57.2%和26.4%，1991年分别为56.6%和25.4%，1993年分别为53.3%和32.7%，1994年为56.5%和24.3%。由于认同“香港人”身份者多是学历较高的群体，因此全民得到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似乎并没显著提升社会认同感。香港的经济成就仍令港人感到骄傲自豪。在1994年的调查中，近半数的受访者（46.5%）以身为香港人而感到自豪，仅18.8%不感自豪。

同样地，社会经济结构瓦解看似也没有影响民众的社会归属感，调查数据虽然有短暂起伏，但基本保持一致。在1988年、1990年、1991年、1992b年和1994年的调查中，表示对香港有归属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是67.1%、63.3%、55.1%、66%和77%。而自视为“香港人”的人，自然更倾向于承认对香港有归属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994年，67%的受访者认为有责任为香港服务，即使现实中很少参加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在同一调查中，62.2%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或很少参加社会服务、社会公益或慈善活动。

社会经济结构瓦解和稳定的社会认同感并存，也可以从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的指标之间缺乏显著统计相关得到佐证。可能的解释是，社会变迁总是不利于社会凝聚力，因而没有变迁时，社会认同感应有所提升。或者换个角度看，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变迁可能阻碍了香港集体认同感的增加。

虽然在调查数据中看不出集体认同感的来源，但认同感能保持稳定是有助于缓解社会经济结构瓦解给香港带来的不利影响的。

结论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已成立10年，《基本法》颁布至今也已有5年，在港人心目中，被写进“小宪法”的社会经济制度已丧失了些许荣光。过去10年收集的调查数据显示，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受到民众质疑，根据这样的民意趋势来展望未来两年，当特别行政区于1997年7月1日成立时，民众对这套制度的热情可能比今天更低，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认受性，以及后殖民时期的香港政府来说，这显然都不是好消息。

因为中央向港人做出承诺，“一国两制”政策会长期不变，所以修改《基本法》将极为复杂和困难。与其他国家的宪法不同，《基本法》详细规定了

特区政府社会经济制度的诸多细节，并限制了未来的特区政府不能改动这些制度，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香港经历的重大社会经济变迁已深深影响了有关制度。《基本法》难免会对特区政府因时制宜的灵活运作形成掣肘。如果港人不提升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特区政府所获支持很可能比殖民时代更低，《基本法》还限制了通过改变社会经济政策动员民众支持的做法，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将进一步受累。

章末注

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http：//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tc.pdf）。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http：//www.fmcoprc.gov.hk/chn/yglz/jbzc/t50598.htm）。

3.Lau Siu-kai，“Social Change, Bureaucratic Rule, and Emergent Political Issues in Hong Kong，”*World Politics*，Vol.35，No.4（1983），pp.544-562.

4.除了1985年和1986年的调查，其他都是全港性调查。所有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回应率是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计算：（1）1985年调查在观塘区（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区与住宅区混合的小区）进行，完成767个访问，回应率为46.9%。（2）1986年调查也在观塘区进行，完成539个访问，回应率为67.4%。（3）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4）1990年调查完成390个访问，回应率为69.8%。（5）1991年调查完成401个访问，回应率为55.8%。（6）1992年调查在5～11月进行，完成868个访问，回应率为55.4%。（7）1992a年调查在1992年10月～1993年2月进行，完成615个访问，回应率为54.7%。（8）1992b年调查在1992年12月～1993年2月进行，完成1993个访问，回应率为54.9%。（9）1993年调查完成892个访问，回应率为54.6%。（10）1994年调查完成997个访问，回应率为57%；受访者的社会经济背景与1991年香港人口普查所得相似。

5.Lau Siu-kai，“Hong Kong’s‘Ungovernability’in the Twilight of Colonial Rule，”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Robinson（eds.），*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Washington, DC：The AEI Press，1994），pp.287-314.

6.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1994Edition*（Hong Kong：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1994），p.111；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Hong Kong1995*（Hong Kong：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1995），p.63.

7.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Hong 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s1982-1992*（Hong Kong：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1993），p.65；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Hong Kong1995*，p.498.

8.Tsang Shu-ki，“The Economy，”in Donald H.McMillen and Man Si-wai（eds.），*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1994*（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4），p.132.

9.Tsang Wing-kwong，*Educational and Ear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ttainment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3）；Tsang Wing-kwong，“Consolidation of a Class Structure：Changes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Hong Kong，”in Lau Siu-kai et al.（eds.），*Inequalities and Development*：*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4），pp.73-121；Benjamin K.P.Leung，“‘Class’and‘Class Formation’in Hong Kong Studies，”in Lau et al.（eds.），*Inequalities and Development*，pp.47-71；Thomas W.P.Wong and Lui Tai-lok，*Reinstating Class*：*A 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al Study of Hong Kong Society*（Hong Kong：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Thomas W.P.Wong and Lui Tai-lok，*Morality, Class and the Hong Kong Way of Life*（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3）.

10.Ronald Skeldon，“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Current Trends, Dilemmas and Policies，”in McMillen and Man（eds.），*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1994*，pp.165-186.

11.Stephen Chiu，*The Politics of Laissez-faire*：*Hong Kong’s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4）.

12.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Asian Survey*，Vol.30，No.8（1990），pp.766-781.

13.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6-65；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Colonial Legitim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1（1995），pp.79-102.

14.Lau and Kuan，“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Wong Chack-kie，“Welfare Attitudes：One Way of Explaining the Laggard Welfare State Phenomenon，”in Lau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1993*，pp.205-222.

15.Lau Siu-kai，“Democratization and Decline of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Democratization*，Vol.3，No.2（1996），pp.158-180；Lau Siu-kai，“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1，No.2（1992），pp.3-20.

16.Berry Hsu，*The Common Law in Chinese Context*（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2）.

17.1988年的调查问卷采用四分尺度，其他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The Fraying of the Socio-economic Fabric of Hong Kong，”Pacific Review, Vol.10，No.3（1997），pp.426-441.

第5章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年）注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及“高度自治”等方针政策的实施均表示，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社会主义体系中，将存在一小片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资本主义飞地。由于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达一个半世纪，其制度与文化又与内地迥异，因此要把香港重新纳入中国母体，难度之高不言而喻。

其中一个困难是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当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英国在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所起的屏障作用便消失，身份认同问题将严重影响两地关系。作为概念，“身份认同”是模糊和多层面的。本文主旨在于，一方面探讨未来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另一方面分析香港内部政治，所以文中“身份认同”一词，主要指港人对自身及两地关系的理解与界定。很久以前，港人普遍使用“香港人”及“中国人”两个词自称，我们因此可以断定：“香港人”及“中国人”是港人感到最有意义的两种身份（为了叙述方便，我把认同自己为香港人的人简称为“香港人”，而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人简称为“中国人”）。在本研究中，我以这两种身份认同作为起点，解答以下一系列问题：一，在迈向“九七回归”的过程中，港人是否面临“身份认同危机”？二，这两种身份的认同是否分别与一些态度及行为特征相关联？三，身份认同问题如何在回归后影响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它对“一国两制”政策的落实有何影响？四，它将如何影响回归后香港的社会与政治？“香港人”与“中国人”身份的分野是否会造成政治态度分歧？五，这两种身份认同将来是否会越来越模糊，或者消融在一起，从而在政治上变得没有意义？

自1985年以来，我和其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随机抽样问卷调查，[1]其中部分涉及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下面的论述基于我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2]

“香港人”与“中国人”

由于绝大部分香港居民在血统上为华人，因此香港可称为华人社会。香港虽然在一个半世纪以来是英属殖民地，但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香港的华人并非在此定居，或以此为家。相反，随着中国国内外情况的转变，香港经历了多次华人涌入及涌出的潮流。[3]直至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内地的移民放弃返回内地，他们的后代又难以在香港以外找到归属之后，香港才开始建立一个稳定的华人社会。显然，港人的身份认同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逐步凝结起来。[4]在过去10年的问卷调查中，认为自己对香港有归属感

的受访者所占比例维持在颇高水平，在1985年、[5]1988年、1990年、1991年、1992a年、1994年及1995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依次为79.5%、67.1%、63.3%、55.1%、66%、77%及60.6%。

对于回归前港人身份认同的形成，有几个因素特别重要。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在香港与内地之间设置了障碍，使得两地人民不能自由进出。因此，港人被隔离在中国之外，不受内地翻天覆地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冲击。第二，在整个香港历史中，其发展道路与中国内地的差异极大：香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内地则大体上走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以后，两地在发展经验方面的巨大差异，对港人身份认同的形成有关键意义。第三，中国内地在1949年以后是内向且对外封闭的社会，香港却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活跃分子，并经历了相当程度的西化。第四，殖民政权所实行的有限职能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及对法治与人权的注重，在中国历史上均属罕见。相反，在传统中国，社会由国家支配，个人则受制于群体。第五，不少人移居香港的目的在于逃避政治动乱，或是寻找经济上的发展机会。因此，香港内部有着一股强烈反对中国内地社会主义政权的情绪，并成为港人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第六，香港与内地在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使港人产生了优越感；不少港人明显以鄙视的态度对待内地同胞。第七，港人普遍使用广东方言，并逐渐以此为基础，建立独特的普及文化，这在塑造港人的身份认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香港与内地分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因港人乃华人，并且在内地有家庭、亲戚、朋友及生意上的联系，因此不可能与中国内地的发展完全隔绝。尽管港人与内地人在1997年之前没有共同的政治命运，但仍然有着浓厚的手足之情。对不少港人来说，殖民管治虽是可接受的德政，但其内心始终感到羞耻，有时甚至怒火中烧。在香港，种族歧视虽然越来越以含蓄或隐蔽的方式出现，但毕竟仍是殖民管治的内在特征，不可避免地使港人不时感到自己也是华人。毫无疑问，港人对社会主义不理解，但中国共产党毕竟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并且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这些事实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而矛盾的印象。不过，由于香港始终是不少人的庇护所，所以在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民族主义还是反殖民主义，都没有成为强大的力量。虽然有小部分港人拥护内地的社会主义政权，但大部分人对政治敬而远之。两地政治的隔绝，才是形成港人身份认同的最重要因素。

在自1985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问卷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在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时，自认是“香港人”“中国人”“两者都是”，还是“两者都不是”。调查结果如表5-1所示。

表5-1　身份认同（单位：%）

	“香港人”	“中国人”	两者都是	两者都不是	不知道/拒答
1985 年	59.5	36.2	—	—	4.3
1988 年	63.6	28.8	—	2.0	5.6
1990 年	57.2	26.4	12.1	1.0	3.4
1991 年	56.6	25.4	14.2	1.2	2.4
1992 年	49.3	27.0	21.1	0.7	1.9
1993 年	53.3	32.7	10.1	1.6	2.4
1994 年	56.5	24.2	16.0	0.5	2.8
1995 年	50.2	30.9	15.4	1.2	2.2

注：1985年调查没有提供“两者都是”及“两者都不是”的答案；1988年调查没有提供“两者都是”的答案。

从表5-1可以看出，在港人心目中，主要且最具意义的身份显然是“香港人”和“中国人”。绝大部分受访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香港人”或“中国人”为主要身份。明显地，较多受访者选择“香港人”为主要身份。就这两种身份认同的相对重要性而言，过去10年的情况是：选择“香港人”及“中国人”为主要身份的相对比例并不稳定。这表明：港人的身份选择受到了在香港与中国内地发生事情的影响。此外，对于回归后哪种身份会更为港人所认同，过去10年的数字无法提供明显趋势。另一个值得玩味的发现是：数字似乎蕴藏着一个长期但缓慢的趋势，即同时认同两种身份的人所占的比例在上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香港回归后，这一趋势会进一步强化。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在社会经济特征上，认同自己为“香港人”的人与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人有明显差异。第一，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自认为“香港人”。在1985年、1988年、1992年、1993年及1995年的调查中，自认为“香港人”的女性与男性的受访者比例各为67.3%与58.8%、73.5%与61.4%、55.9%与43.8%、53.9%与46.1%，以及58.8%与44.4%。女性较倾向于认同“香港人”身份的主要原因，显然是较少受殖民统治困扰、对中国持较多负面态度以及较少欣赏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第二，学历较高的人较倾向于选择“香港人”身份。这一现象在1985年、1990年及1992年的调查中都有所体现。由于学历与收入有密切关系，因此在1985年、1990年及1995年的调查中，收入较高者也较倾向于认同“香港人”身份。第三，香港出生的人比内地出生的人较倾向于认同“香港人”身份，这一现象可以在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4年及1995年的调查中看到。第四，年龄较大的人大多在香港以外出生，并曾接受中国式的教育或社会

教化，自然会比年轻者倾向于认同“中国人”身份，这一点可以在1985年、1988年、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看到。

如果从“香港人”及“中国人”的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差异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香港继续由英国管治，那么在过去10年中认同“香港人”身份的港人比例应稳步上升，因为教育普及化及在香港出生的人所占比例增加。但如前所述，这个现象并没有出现。这显然与香港即将回归中国，以及香港与内地的接触往来急剧增加有关。

与“中国人”相比，“香港人”对香港应有较强的认同感，并有较浓烈的社会归属感。但调查数据不能明确支持这个看法。

与“中国人”相比，“香港人”不单不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而且其离开香港的意向更明显。在1985年的调查中，与“中国人”相比（40.9%），更多“香港人”（52%）表示有意移民。所以，“香港人”身份认同并不表示对香港有强烈归属感，而且也不是压制移民意愿的有利因素。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之后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在1988年、1990年及1995年的调查中，分别有23.3%、25.1%及10.9%的“香港人”表示已有移民计划，“中国人”的相关比例则为14.5%、13.3%及6.6%。同样地，在1992年的调查中，当被问及移民计划时，38.5%的“香港人”表示一定会留在香港，14%表示可以留下来便留，留不下来时才会离开，14.6%表示能够离开的话便离开，1.7%表示一定会离开，10.6%则表示尚未决定；“中国人”的相关数字则为48.1%、11.1%、8.6%、0%及3.7%。

此外，较多的“香港人”（1988年11.8%，1990年14.8%，1992年3.7%，1995年3%）表示会在1997年之前移民，“中国人”的相关数字则为9.4%、9.2%、1.8%及1%。在1992年的调查中，我也发现有较多的“香港人”（20.7%）表示有信心能够移民，有信心能够移民的“中国人”占16.6%。而在表示有能力移民的受访者中，有21.7%的“香港人”已取得外国护照或居留权，“中国人”则略低（19.2%）。再者，在自认没有能力移民的受访者中，有计划去获得外国护照或居留权的“香港人”（9.5%）仍然多于有此计划的“中国人”（2.6%）。

事实上，与“中国人”相比，“香港人”大多已取得外国护照或居留权。在1988年、1990年、1991年及1993年的调查中，分别有3.2%、4.1%、3.6%及19.7%的“香港人”承认已取得外国护照或居留权，“中国人”的相关数字则为2.7%、2%、1%及11.3%。1993年的数字突然上升，是过去几年大量香港移民回流所致，他们显然是在购买“政治保险”之后，锐意回港寻找发展机会。

为何“香港人”的社会认同意识没有“中国人”强烈？原因十分复杂。一个不

争的事实是："香港人"比"中国人"更信任香港居民。在1991年的调查中，69.4%的"香港人"表示信任香港居民，持此态度的"中国人"则为64.2%。与此同时，与"中国人"（62.2%）相比，更多的"香港人"（72.8%）相信，香港居民越来越多地使用不正当手段争取利益。因此，"香港人"对香港居民的信任会因为怀疑其道德操守而淡化。

根据过往研究，在港人身份认同中明显缺乏的，是对香港社会的浓烈感情依托。研究发现，港人对社会持实用主义态度，视社会为谋生手段或发达致富之地。[6]换言之，人们对香港的归属感并不代表社群的团结性，或是对某地域的集体忠诚。港人可能只是依恋一些流动且无形的东西：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超越地域疆界的价值观。[7]既然如此，我们便无须过分重视1994年调查中的一项发现：有多达72.7%的"香港人"及69.1%的"中国人"觉得有责任为香港做些事，因为大体而言，这种感觉并没有转化为实际行为。

更进一步地说，"香港人"其实比"中国人"更受香港问题困扰。在1993年的调查中，忧虑"九七问题"的"香港人"（17.7%）比"中国人"（11.7%）多。在1988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忧虑香港在回归前出现政治动荡的"香港人"（58.2%及47.2%）比"中国人"（35.8%及29.4%）多。1994年的调查发现，较多的"香港人"（50.5%）忧虑在未来几年出现政治动荡（"中国人"为40%）。在1991年的调查中，"香港人"（68.9%）则比"中国人"（48.1%）更担忧回归前香港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尽管"香港人"及"中国人"都预期香港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但前者比后者更难适应变化。因此，正如1991年的调查显示，虽然有58%的"香港人"表示能够容忍回归后个人自由稍微下降，但能够容忍这一变化的"中国人"却多达76.9%。另外，虽然只有17.9%的"香港人"表示能够容忍回归后个人自由大为减少，但仍有较多的"中国人"（34.5%）声称能够容忍这一变化。同样地，只有15.2%的"香港人"能够接受回归后个人收入大降，却有较多的"中国人"（29.5%）表示可以接受。

正因为"香港人"有着各种忧虑，对回归后可能变迁的容忍能力较弱，再加上拥有较多有助于移民的资源，所以他们有较明显倾向在外地重建家园。

身份认同与华人特性

尽管身份认同有异，但由于"香港人"及"中国人"都是华人，所以许多根本的华人特性（Chineseness）元素都可以在两者中找到。从民族与文化的意义上说，港人对中华民族有强烈认同感。[8]即使那些认同"香港人"身份的人也以中华民族及文化为荣。在1985年的调查中，60.5%的受访者同意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78.6%的人以能够做中国人为荣。[9]

事实上，“香港人”及“中国人”共同拥有很多典型的华人价值观。例如，1994年的调查发现，绝大部分“香港人”（92.9%）和“中国人”（94.1%）都同意，在今天的香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例如，忠、孝、仁、义）仍应受到尊重。同样地，绝大多数“香港人”（96.3%）及“中国人”（95%）表示，香港市民应尊重孝顺父母的人。此外，与传统中国人一样，38.2%的“香港人”及37.7%的“中国人”对有钱人不表示尊敬。然而，86.1%的“香港人”及89.5%的“中国人”诚挚尊重勤劳工作的人，那些一世好命的人却只得13.2%的“香港人”及18.9%的“中国人”的尊敬。与传统文化对卖艺人的歧视一样，只有11.8%的“香港人”及19%的“中国人”对歌星及影视明星表示尊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相对于个人，国家及群体被赋予更为崇高的地位与重要性。1993年的调查发现，香港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西化及有限的职能政治管理，但对于个人与国家在抽象层面上应建立的关系，港人显然没有发生深刻变化，这一现象可以在表5-2中窥见。

在表5-2所列的一半说法中，“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观点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他们都同意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下，并且都挞伐地方主义。不过，由于他们同时认为个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观念不一致。针对那些“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统计显著差异的说法，实际情况依然是：他们都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这些观念宣扬对国家效忠，并把个人及少数社群置于次要地位。事实上，在“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蕴含着初生的民族意识。[10]

表5-2　对国家的态度与身份认同，1993年（单位：%）

	“香港人”	“中国人”	卡方检定
先有个人才有国家，个人才是国家的根本	72.8	66.4	不显著
不要问国家为自己做了什么，要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	68.6	79.5	$p<0.05$
为了谋求个人的福利才需要组成国家，如果不讲个人，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33.8	37.7	不显著
如果地方政府每件事情都强调有权自主、自治，国家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办得好	51.7	56.3	不显著
收回中国历史上失去了的领土，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使命	68.0	82.2	$p<0.001$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即使是少数民族，亦不可以要求脱离	76.8	82.3	$p<0.05$

注：表内数字为同意有关说法的受访者占比。

资料来源：1993年调查

因此，无论就民族意义还是就历史文化意义而言，在“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华人特性”都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用以界定自己为华人或中国人的根本。[11]由于这些共通部分，“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差距便大为缩小。事实上，这两种身份认同非但不是完全分割或相互排斥的东西，反而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它们的相互渗透性在调查中也可以看出。在1992年的调查中我发现，人们选择何种身份认同与他们是否以“香港人”或“中国人”为荣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不过，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及“中国人”都以自己同时身为“香港人”及“中国人”为荣。在“香港人”当中，各有83.2%及63.8%的人以身为“香港人”及“中国人”为荣；持此态度的“中国人”则为66%及79.7%。

同样地，虽然“香港人”及“中国人”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对与香港及整个中国有关的同一事物感到骄傲：主要是关于经济发展及与之相关的东西。这一情况可以在表5-3中得到反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就，“香港人”及“中国人”的光荣感却大为逊色。这些现象表明，如果是涉及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央政府，港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甚至是负面的。

表5-3　对香港及整个中国引以为荣的事物与身份认同，1992年（单位：%）

	“香港人”	“中国人”	卡方检定
香港			
香港人够机灵，反应快，适应能力强	90.7	81.3	不显著
香港什么都吃得到，什么都玩得到，生活方便	87.1	84.5	不显著
香港是最自由的中国人社会	91.5	88.5	不显著
香港经济发展惊人，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93.6	89.3	不显著
整个中国			
中国人十分勤奋，又刻苦，又有能力	88.3	84.3	$p<0.001$
中国山河壮丽，名胜古迹极多	85.3	87.3	不显著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中国人可以吐气扬眉	55.3	59.8	不显著
中国现代化之后，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	72.8	82.7	不显著

注：表内数字为同意有关说法的受访者占比。

资料来源：1992a年调查

对社会主义中国及中国政府的态度

在民族及文化意义上，“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差别虽然有限，但在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内地同胞及中国政府的态度上，两者有显著的分歧。话虽如此，“香港人”与“中国人”在态度上仍基本相同。所以，他们之间只有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差异。

在1992a年的调查中，我们向受访者提出12个问题，目的在于了解他们对香港及整个中国的感情。调查结果如表5-4所示。

表5-4　对香港及整个中国的态度与身份认同，1992年（单位：%）

	“香港人”	“中国人”	卡方检定
香港			
身为香港人，当香港代表队对中国国家队的时候，应该支持香港队	75.7	62.0	$p<0.05$
香港的电影有时会讽刺内地，即使这样，中国都不可以用任何理由不让它们在香港上映	79.8	68.7	不显著
港英政府如果要向外借钱改善香港的基本设施，中国应该大力支持	79.2	73.9	不显著
为了香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应该把深圳划归香港	29.4	30.2	不显著
香港既然那么成功，整个中国都应该香港化	56.0	44.9	不显著
整个中国			
为了国家富强，个人利益有时不应过分计较	48.0	65.7	不显著
香港人应该以整个中国的利益为重，不应该只讲求香港利益	18.8	33.1	$p<0.001$
身为中国人，一定赞成香港的学生在上早自习之前要唱国歌	15.1	27.6	$p<0.001$
香港应该用普通话作为第一官方语言	33.5	52.4	$p<0.001$
香港如果有财政盈余，应该拨一部分给中国用于发展	38.4	56.5	$p<0.001$
如果有利于中国的行政管治，香港可以放弃它的特别行政区地位	16.3	23.8	$p<0.01$
只要中国有需要，香港什么都可以牺牲	6.2	20.8	$p<0.001$

注：表内数字为同意有关说法的受访者占比。

资料来源：1992a年调查

就对香港的感情而言，重要的发现是：“香港人”与“中国人”只有很小的分别。如果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有冲突，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在香港一边。他们都以香港所取得的成就为荣，并且都对中国内地流露出优越感。地方主义情绪也明显可见，在涉及香港与内地关系的事情上，他们倾向于以照顾香港利益为首要任务。

“香港人”与“中国人”的显著区别在于对整个中国国家实体的态度。不过，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基本上都对社会主义中国缺乏认同，这种负面印象可谓由来已久。在1985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纵使港人在民族与文化层面上认同中国，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内地同胞的认同感却甚为薄弱，只有42.5%的受访者对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数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此外，只有52.7%的人表示对内地同胞有亲切感。[12]

从表5-4的数字可以看出，“香港人”比“中国人”更偏重香港本身的利益，尤其是涉及香港的重大利益，虽然后者的地方主义取向也颇为明显。不过，如果香港有较多财政盈余，“中国人”有温和的意愿为中国提供协助。“中国人”比“香港人”更愿意以普通话作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另外，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缺乏好感，但“香港人”及“中国人”（特别是后者）仍然表示“为了国家富强，个人利益有时不应过分计较”。当然，这种态度究竟在行为上有何意义，现在无法衡量。

就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而言，“香港人”与“中国人”有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但基本上都不太信任。在1988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3]1994年及1995年的调查中，表示信任的“香港人”分别为17.8%、5.6%、7.4%、11.1%、20.8%、8.8%及10.2%，“中国人”的相关数字则分别为36.1%、18.7%、28.7%、40.9%、50.2%、21.9%及20.6%。由此可见，从政治角度来说，“香港人”与“中国人”在信任中国政府的问题上没有实质差异。

与“香港人”较倾向于不信任中国政府相一致的，是他们对香港的前景也较缺乏信心。在1988年的调查中，“香港人”有信心的比例（63.4%）比“中国人”（85.1%）低。在1994年的调查中，有信心的“香港人”（37.1%）有所下降，而“中国人”（56%）也有所下降，然而相对而言，“中国人”比“香港人”始终对香港前途更具信心。

“香港人”较倾向于认为，整个中国与香港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在1988年的调查中，有多达71.7%的“香港人”承认存在冲突，而只有较少的“中国人”（56.6%）这样认为。结果是：在1991年的调查中，“香港人”（13.4%）比“中国人”（35.4%）更少相信中国政府会照顾港人的利益。

一如所料，“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感情也投射到他们对香港及整个中国前景的评估上。在1994年的调查中，38.2%的“香港人”对整个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比“中国人”（52.7%）低。大多数“香港人”（58.9%）对回归后的法律制度缺乏信心，而有此看法的“中国人”少于一半（45.1%）。对《基本法》有信心的“香港人”（34.3%）比“中国人”（48.7%）少。[14]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搞好香港的“香港人”（39.1%）也比“中国人”（53.1%）少。1995年的调查也发现，相对于“中国人”（39.2%），较少的“香港人”（22.4%）相信中国政府在“九七”后会真正让港人自治。“香港人”（65.8%）比“中国人”（59.6%）更倾向于认为将来的特区政府会相对照顾整个中国的利益。同样地，与“中国人”（41%）相比，较少的“香港人”（16%）认为，将来特区政府会把香港管理得比现在好，信任将来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比例也较低（“香港人”9.4%，“中国人”18.3%）。然而，“香港人”和“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基本相似。

由于较不信任中国政府，“香港人”比“中国人”更倾向于以抗争手段保障自身利益及发泄不满（8.9%：7%）。当然，由于整个中国与香港之间强弱悬殊，港人其实十分害怕与中国政府对抗。同样地，在1995年的调查中，一半以上的“香港人”（58%）声称会支持不被中国政府所认可的政治领袖，“中国人”则少于1/3（30.9%）。更能显示“香港人”害怕中国政府的，是1988年调查的一项发现：53.5%的“香港人”支持香港独立，“中国人”则只有30%。“香港人”的这种立场与上述他们愿意把国家利益置于地方利益之上的态度大相径庭。

“香港人”之所以较不信任中国政府，与他们较信任英国有关。事实上，“香港人”比“中国人”对殖民管治更具好感。在1994年的调查中，较多的“香港人”（55.1%）支持在回归后保留香港为英国殖民地，“中国人”则只有28.8%。同时，43.4%的“香港人”认为，华人与英国人在香港享有同等地位，“中国人”却只有33.6%承认种族平等。虽然“香港人”（57.4%）及“中国人”（68.2%）都认为英国在处理香港事务时以英国利益为先，但“中国人”显然更为不满。

正因为“香港人”更信任英国及港英政府，[15]所以他们倾向于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便不足为奇。由于“香港人”较担忧中国在香港回归前干预香港事务，所以他们特别关心港英政府在英国最后管治时期的自主性。1991年的调查发现，虽然“香港人”承认在过渡期中英合作的重要性，但与“中国人”（64.8%）相比，他们（54.8%）仍然认为英国在做出重大决定前，应寻求中国政府的同意。同样地，在1992年的调查，“香港人”（75.2%）比“中国人”（59%）更倾向于认为港英政府应坚守有利于香港的政策，即使中国政府反对也在所不惜。

总的来说，“香港人”与“中国人”的最大差别在于对社会主义中国及中国政府的态度。不过，既然他们的态度大体相似，这些差别并不会严重到引发双方严重冲突。

对民主改革的态度与身份认同

如果说在对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中国及中央政府的态度方面，“香港人”与“中国人”基本上只有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差异，那么他们在香港民主改革问题上的态度分歧也一样。换言之，“香港人”与“中国人”在政治上的分歧并不严重，港人对身份认同的不同并没有造成“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矛盾。

“香港人”与“中国人”都有温和的民主诉求，但当中却渗透了矛盾的感情。这种民主观代表一种功利性与片面性：功利性是因为港人期望民主政制能为自己带来一些具体的政治成果；片面性是因为人们从负面角度去理解民主，即民主政制的功用在于保障自己的权利，使之免受中国政府及香港当权者的侵犯。至于民主的正面意义，即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则不那么受重视。[16]港人的民主观明显蕴含威权主义的元素，强调政治稳定及强势政府的重要性。在1992年的调查中，83.9%的“香港人”及81.4%的“中国人”同意香港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维持政治稳定。同样地，82.5%的“香港人”及77.7%的“中国人”认为香港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保持经济繁荣。1993年的调查也有类似发现：65.6%的“香港人”及62.6%的“中国人”同意限制政府的权力并非好事，因为这样做会影响政府的效率。虽然人们强调强势政府的重要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意识到政府应受到监督与约束，以避免权力滥用。这些考虑在1992a年的调查中多处可见。例如，37.9%的“香港人”及41.6%的“中国人”同意要解决香港当前面对的问题，港英政府必须强而有力，它是否民主反而是次要的。28.1%的“香港人”及36.7%的“中国人”同意要解决香港当前面对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港英政府行政效率要高，民意咨询反而是次要的。在1993年的调查中，只有26.5%的“香港人”及36.5%的“中国人”赞同只要有品行端正的政治领袖，就可以把所有的公共事务交给他们办理，我们无须提出太多意见。然而，1992年调查的一项数据显示，当涉及他们较属意一个有效率但不够民主，或一个够民主但效率不高的港英政府时，“香港人”与“中国人”在态度上的分歧明显加大。37.1%的“香港人”愿意接纳一个较不民主但工作效率较高的政府，但有57.1%的“中国人”属意这种政府。

虽然“香港人”与“中国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双方仍然存在微妙差异。总体而言，“香港人”比“中国人”有更强的民主诉求，“中国人”对民主却有较浪漫的或理想化的理解。“中国人”之所以对民主化的态度较淡薄，是因为他们对现行政治体制及港英政府的表现较满意，因而比“香港人”有稍高的

政治自满感。例如，在1988年的调查中，75%的“香港人”同意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同意这一论点的“中国人”则有78.1%。此外，与“香港人”（40%）相比，较多的“中国人”（52.3%）认为港英政府工作表现良好。

由于“香港人”较不信任中国政府，因此也较倾向于认为民主化是回归后强化香港自主权及防范中央干预香港事务的手段。例如，在1988年，与“中国人”（33.3%）相比，有稍多“香港人”（35.2%）相信香港有了直选之后，就可以防止中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

除了功利性考虑外，“香港人”对民主的较高诉求也与他们的政治面貌较现代化有关。这一观点可以从数项数据中得到证实。1992a年的调查发现，当被问及政治稳定与民主政府哪个更重要时，与“中国人”（8%）相比，较多的“香港人”（16%）认为民主政府更重要。同样地，当被问及经济繁荣与民主政府哪个更重要时，依然有较多的“香港人”（17.8%）（“中国人”9.6%）认为民主政府更重要。

1993年的调查发现，与“中国人”相比，“香港人”也更倾向于肯定政治平等的价值观。与“中国人”（48.3%）相比，较多的“香港人”（55.8%）反对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政治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较多的“香港人”（76.3%）（“中国人”68.8%）反对政府行政首长如同大家庭的家长，一切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都应该听从他的决定。“香港人”（16.7%）也比“中国人”（14.2%）更倾向于认为香港的政制改革速度太慢。较多的“香港人”（74%）（“中国人”59.3%）不同意进一步民主化会危及香港稳定。同样地，港督彭定康推行的政制改革在“香港人”当中获得较大支持，1995年的调查发现，45.1%的“香港人”（“中国人”27.5%）认为彭定康政府推行的政制改革对香港有利。

结论

经过详细论证，我们现在可以解答本章刚开始提出的问题。毫无疑问，“香港人”与“中国人”在政治与社会态度上存在差异。但跟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差异相比，这种差异可谓微不足道。所以，香港华人社会存在的不同身份认同应不会构成重大的、有严重社会和政治含义的裂隙。事实上，“香港人”与“中国人”在态度上的有限差别，正说明身份认同的形成只有很短的历史，人们对自己选择的身份也只投入较少的感情。

无论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建立在种族与文化基础之上，而且似乎都不具有地域认同，因为都不涉及对香港或整个中国的效忠。它们也不要求身份认同者对具体的政权忠诚。此外，两种身份认同都不包含强烈、狭隘或原始的感情（例如，地方主义和次民族主义）。因此，香港并不存

在发展中社会常见的、为国家建设造成障碍的狭隘主义与原始感情。[17]

对于把香港在文化及政治上融入中国母体的各种困难，中国政府充分了解。尽管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但以“一国两制”方式来处理香港脱离殖民管治后的前途，实际表示中国政府打算用充裕的时间去完成香港与内地的整合。《基本法》的序言说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第五条更特别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事实上，对于香港与内地的最终整合，中国政府的考虑极长远。“一国两制”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任何在香港可能出现的“身份危机”。这个模式并不要求港人在态度与行为上有所改变，当然，仍有部分港人担心中国会强制他们做出改变。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港人在心理上受到“身份危机”的困扰。基本上，香港也没出现因身份问题而引发的集体行动（1989年出现的活动或许属于这类）。此外，由于“一国两制”的安排，香港与内地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实际上使港人的独特身份更为强固及持久。

在社会主义中国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使有“一国两制”的安排，香港与内地也难免会产生摩擦，尤其是“一国两制”的目标并不在于分隔两制，而是在于加强接触，从而使香港更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港人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不信任与恐惧，肯定仍会对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中央政府难以完全抗拒介入香港事务的诱惑。不过，虽然港人对中国的国家组织有疏离感，但对中华民族依然有浓厚认同感。“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并不衍生分离主义。事实上，分别对香港及整个中国的认同代表双重及互相配合的身份认同。港人从来没有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此外，即使港人对回归心存忧虑，却从来不质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回归之后，可能有多个因素会强化港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甚至对中央政府的认同，这些因素包括：香港在政治上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军力的扩张、香港与内地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内地对香港发展的影响日深、民族意识的传播，以及两地之间日趋紧密的社会文化交流。

港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发展，我们现在仍难以准确预测。不过，鉴于以往的情况，“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将来有可能融合，并产生一种新的

身份认同，但仍会与内地人的身份认同有别。在带有地方色彩的身份认同上，港人会逐步接纳一个更大的华人身份认同，社会主义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认同的对象。另外一个可能的发展是：虽然存在矛盾，分别对香港及整个中国的认同会越来越相互配合，这是因为对香港的认同不仅不要求否定对整个中国的认同，反而使它更为强化。

章末注

1.除1985年的调查，其他都是全港性调查。所有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回应率是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计算：（1）1985年调查在观塘区（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区与住宅区混合的小区）进行，完成767个访问，回应率为46.9%。（2）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3）1990年调查完成390个访问，回应率为69.8%。（4）1991年调查完成401个访问，回应率为55.8%。（5）1992年调查在5～11月进行，完成868个访问，回应率为55.4%。（6）1992a年调查在1992年12月～1993年2月进行，完成615个访问，回应率为54.7%。（7）1993年调查完成892个访问，回应率为54.6%。（8）1994年调查完成997个访问，回应率为57%。（9）1995年调查完成408个访问，回应率为61.5%。

2.本文利用卡方检定（chi-square test）来判断变项之间的关系，显著水平低于0.05者，被视为存在显著的差异。

3.Elizabeth Sinn，“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before1941：General Trends，”in Ronald Skeldon（ed.），*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Tendencies and Impacts*（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34；Ronald Skeldon，“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1945-1994：The Demographic Lead-up to1997，”in Skeldon（ed.），*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pp.51-77.

4.要了解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文化内容，特别是涉及学历较高及西化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可参见：Helen F.Siu，“Remade in Hong Kong：Weaving into the Chinese Cultural Tapestry，”in Tao Tao Liu and David Faure（eds.），*Unity and Diversity*：*Local Cultures andIdentities in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

pp.176-196.

5.1985年调查问卷采用四分尺度（很少、少、多、很多），其他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很少、少、普通、多、很多）。所以，如果1985年调查是采用五分尺度，其相关数字应该较小。

6.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78-179.

7.Wong Siu-lun，“Political Attitudes and Identity，”in Skeldon（ed.），*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p.170.

8.文化与种族因素在界定何谓“中国人”或“华人”时十分重要，该因素被各方面所承认。例如，可参见：Myron L.Cohen，“Being Chinese：The Peripher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Identify，”in Tu Wei-ming（ed.），*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8-108；David Yen-ho Wu，“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dentities，”in Tu（ed.），*The Living Tree*，pp.148-166。

9.Lau and Kuan，*The Ethos ofthe Hong Kong Chinese*，p.179.

10.白鲁恂（Pye）曾指出，虽然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种族特征及文化习俗，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历史轨迹，使得在中国只能产生一种未完全成形、不清晰的民族主义。这种相对“缺乏内容”的民族主义形态的一项重要特征，便是中国人对中国的国家组织只有薄弱的认同感。在香港华人中出现的民族主义雏形，也是一种“缺乏国家组织”的民族主义版本，它比白鲁恂所描述的无内容的民族主义更极端。Lucian W.Pye，“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Supplement22（1991），pp.12-29.

11.不少学者都强调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都建基于种族及文化因素。张玉法.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角色（1900—1949）[M]//刘青峰.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99-125；姜义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M]//刘青峰.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143-157；汪荣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回顾与展望[M]//刘青峰.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187-200；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eds.），*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1.

12.Lau and Kuan，*The Ethos ofthe Hong Kong Chinese*，p.179.

13.1993年调查采用四分尺度（很不信任、不信任、信任、很信任），其他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很不信任、不信任、普通、信任、很信任）。所以，如果1993年调查是采用五分尺度，其相关数字应该较小。

14.1990年调查也发现，与“中国人”（55%）相比，较少的“香港人”（37.5%）表示满意《基本法》。

15.在本文引述的所有调查中，“香港人”都比“中国人”更信任英国及港英政府。

16.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The Partial Vis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A Survey of Popular Opinion，”*The China Journal*，Vol.34（1995），pp.239-264.

17.Clifford Geertz，“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in Clifford Geertz（ed.），*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New York：Free Press，1963），pp.105-157.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 Hongkongese or Chinese：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7）.中文版曾以“‘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年）”为题，刊于《二十一世纪》，第41期（1997），43-58页；现在的译本再经修订。

第6章　对资本主义的信心问题：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变化㊟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不久，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并给如梦初醒的港人带来很大打击。金融风暴前，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虽令人担忧，但香港的经济基础基本还算稳健。可是，金融风暴不但戳破楼市的泡沫，还终止了香港已延续超过20年的经济繁荣。

香港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增长在1998年11月出现负数，在通缩阴影下，经济一蹶不振，1998年香港的实际本地生产总值下跌5.1%。“二战”结束以来，香港从未经历过这么漫长的经济紧缩期，可想而知，人们在新经济环境下是何等痛苦。1997年10月～1998年8月，股市市值下跌超过一半，港人财富大量蒸发。经济衰退前，香港的失业率仅为2%～3%，1998年以后则升至5%～6%。由于企业急剧重组和裁员，中产阶级在“二战”后首次尝到失业的痛苦滋味。在可预见的将来，失业问题似乎难有明显改善。

面对经济困境，东亚地区国家因政治经济体系和国家在经济事务上扮演的角色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香港素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堡垒，不论是殖民政府还是特区政府，都一直紧守经济上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可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使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和一般市民都乱了阵脚。自经济危机出现后，港人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声音越来越大，行政当局也推出多得令人吃不消的措施，以期纾解民困，把香港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最值得注意的是，董建华的经济哲学以行动主义和家长式统治为特征，把香港转型为知识为本的经济体系和全面照顾社会的迫切需要排在政策议程的前列。[1]在某种程度上，民众的要求与政府积极介入经济事务相辅相成。[2]

港人及外国人都开始怀疑，空前严重的金融风暴已经蚕食香港主流社会经济价值观。[3]事实上，这次经济危机已经摧毁了港人对未来经济发展过于乐观的情绪，一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好年代（*belleépoque*）也很可能成为过去，不少人担心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最终会失去光芒。现在的问题是，港人是否对政府一直很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出现信心动摇？民众是否仍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以及市场在分配收入和财富时的公平性？他们是否会期望政府扮演更重要的经济角色？又是否会要求政府在促进社会公义方面担任更明显的职能？为解答这些问题，我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的第二年，即1999年进行了一次全港性随机抽样调查。[4]过去一些民意调查也为港人态度的转变提供了背景资料。如非注明，本章引用的民意数字都来自1999年调查。

香港的竞争力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金融一体化，发展步伐之快令人吃惊。随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自由市场主义的威权地位更是无从挑战，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政府干预经济领域的诉求则逐渐消失。香港虽奉行自由经济已有一个半世纪，但港人还是在最近感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金融风暴以前，人们虽已察觉中国内地这个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但一般人还是不太在意。金融风暴的打击使港人明白，在面对外部环境突变时，香港经济是何等脆弱。不少西方国家早已出现反对经济一体化的行动，即使在自由经济的堡垒，如美国，也不时听到一些保护主义的呼声。[5]

1999年的调查显示，港人虽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但基本上仍对竞争力及经济前景保持审慎乐观。民众虽对经济一体化新现象不太了解，但仍基本持正面态度。当被问及经济一体化是否对香港有利时，近半受访者（46.8%）表示不知道，其余多数（37.9%）认为有利，只有少数（14.6%）觉得会损害香港的利益。同样地，中国内地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也普遍受港人欢迎。大部分受访者（71.7%）对中国改革开放对香港的影响表示乐观，只有很少数人（10.3%）认为会不利于香港发展。

港人对经济一体化及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持正面态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香港的竞争力仍颇有信心。只有14.7%的受访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对手相比，香港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虽然较多受访者（40%）觉得香港的竞争力只是一般，但有不少人（29.7%）对香港仍然充满信心。

另一个原因是，港人总以为香港必行好运。民众之所以有此宿命论式看法，都是因香港在过去曾经历无数次逆境，并且在其后变得更加繁荣。在1999年的调查中我发现，有47.3%的受访者同意香港是一块福地，它往往能够逢凶化吉，只有23.7%不同意。

普罗大众对香港竞争力及其在世界经济转型中生存能力的信心反映在其对经济前景的乐观上。约1/4的受访者（26.7%）对香港能否重拾1997年之前的繁荣感到悲观，44.8%显示出很强信心，而20.3%则表示信心一般。

经济危机发生后，港人对前景的疑虑虽不断加深，但对经济前景仍能保持冷静和乐观。正如我下面所说，这种正面态度成为港人持续支持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不论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家庭收入，港人对香港竞争力的态度都无甚差别。

资本主义制度

港人的主要信念之一是，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最有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市场的自由运作是个人自由的最佳保障。市场效率为最多的人提供了最大的好处。在港人眼中，市场不应向非经济因素妥协。过去的调查一致表明，大量市民支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6]在1991年的调查中，58.4%受访者称赞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好的经济制度，只有5.2%反对。到了1994年，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略微降至56.6%，而同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则显著增加（10.2%）。从表6-1可以看出，1999年时，港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有些许下降，但大致上并未否定它。

表6-1　对资本主义的态度，1999年（单位：%）

	很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很不同意	不知道	拒答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	3.5	56.4	18.5	6.1	0.1	15.3	0.1
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只要努力工作便有出头的机会	7.5	63.7	12.6	11.5	0.5	3.9	0.2
在香港，只要努力读书，将来必能出人头地	7.7	48.0	14.8	25.4	1.3	2.4	0.4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每个人公平竞争	2.9	64.3	10.6	8.5	0.5	12.9	0.4
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指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收入	0.5	14.5	6.4	65.0	7.3	6.1	0.2
若允许商人能够尽量赚更多的钱，最终所有人都会受益	3.3	53.7	13.2	21.5	1.0	6.9	0.4
雇员应采取罢工的方式来提高薪金或改善工作条件	0.6	27.7	17.6	42.5	1.8	9.2	0.5

大多数受访者（59.9%）仍认为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大部分人（71.2%）也相信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只要努力工作便有出头的机会。更清楚地说，过半受访者（55.7%）赞同只要努力读书，将来必能出人头地。很多港人（67.2%）仍同意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由于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容易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港人都普遍接受经济不平等是市场竞争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港人深信，一个公平的社会并不是每个人收入都相同的社会。多数人（57%）都宁愿相信，若允许商人能够尽量赚更多的钱，最终所有人都会受益。

可是，港人不太赞成工人在市场经济下以集体行动改善权益的做法，44.3%的受访者反对雇员将罢工作为提高薪酬或改善工作条件的武器，只有28.3%同意罢工，17.6%则不置可否。

总的来说，虽面对经济危机，港人仍十分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民众

的态度仍带有明显的社群差异，而这些差异也未能良好预示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发展。首先，老一辈人较年轻人更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其次，高学历的人比低学历者更反对这种制度；最后，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士比职位较低的白领和体力劳动者更少眷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

政府的经济角色

在抽象层次和实际层次上，港人对政府在香港经济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有很大差距。在抽象层次上，绝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应扮演最小的角色。相反，为达成某些非经济目标或纾缓部分社会经济痛楚，港人又会期望政府在某些经济领域做出很大干预。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干预的同时依恋并不是港人独有的心态，西方人也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情况。[7]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经济主义会不时地被政治实用主义调整和冲淡。

在香港，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会因人们留恋中国传统价值观而妥协。事实上，传统价值观对港人仍有一定影响，并且继续塑造民众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态度。[8]在传统价值观里，政治与经济制度没有清晰分界线，但经济显然居从属地位。自由放任政策和有限职能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观念对传统价值观来说很陌生。在国家主导社会秩序的中国，国家可以以保持社会和谐和维护民众利益为由干预经济，甚至将私有财产充公，在中国人的思想里，甚至没有自由放任政策中公、私财产的分别。结果，港人虽普遍接受自由放任政策，但仍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必要时干预经济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过去的调查显示，自由放任政策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被港人广泛接受。在1988年的调查中，57.5%的受访者赞同港英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到了1994年，民众对自由经济主义的支持减少，只有42.4%的受访者赞成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9]可是，港人仍期望政府在某些领域做出干预，这样做便背弃了有限职能政府的原则。例如，在1988年，多数受访者（57.1%）反对尽可能把政府职能转交给私人机构；71.4%同意政府应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社会服务，即使这样做会减慢香港的经济增长。1991年的调查则表明，多数受访者（61.3%）认为政府在提供社会及公众服务方面做得不够。

与过去相比，港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有所下降。1999年的调查发现，44.8%的受访者赞同继续维持积极不干预政策，表示不置可否的有15.6%，反对的则有23%。在经济衰退及失业问题严重的环境下，港人对这个长久坚持的经济原则已明显动摇。

与此同时，表6-2中的数据表明，港人希望政府能在多个领域做出干预。在各项政府经济职能中，只有“买股票来打击投机者”及“赔偿因金融风暴而

不幸蒙受损失的市民”两项得不到受访者的支持。港人显然认为，股市投资失败者应为自己的霉运负责，而他们的困境也与公众利益无关。再者，虽然那些年轻、学历较高、从事较高尚职业和较富有的人，以及那些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忠实信徒，都比较不支持经济干预，但总体来说，民众仍强烈要求政府干预经济。

表6-2　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支持（单位：%）

	很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很不同意	不知道	拒答
制定长远的经济发展策略	9.7	76.3	5.5	1.0	0.1	7.0	0.5
积极扶助一部分工商业的发展	4.4	72.8	10.7	4.5	0.2	7.0	0.2
保证每个市民都有工作	13.1	62.5	10.8	9.7	0.4	3.0	0.6
采取措施以降低房价	8.2	60.2	14.4	11.2	0.4	5.4	0.2
设立由政府管理的中央公积金	2.9	61.0	14.5	11.1	0.2	10.1	0.1
提供失业津贴	3.1	57.1	15.4	19.5	0.7	3.8	0.4
立法处罚不肯赡养父母的人	7.0	52.6	14.7	19.5	0.7	5.4	0.1
向富人征收重税以减少贫富差距	7.5	50.8	17.9	18.8	0.4	4.3	0.4
立法给予工会集体谈判权	2.1	53.8	19.3	8.3	0.6	15.6	0.2
加强管制投机性活动	4.5	50.2	10.7	23.8	0.7	9.8	0.2
捍卫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	2.1	49.5	19.2	6.1	0.7	22.2	0.2
减少社会福利，鼓励市民自食其力	3.7	41.6	20.9	27.3	1.7	4.5	0.4
制定最低工资或薪金	3.0	42.3	7.0	40.0	1.7	5.5	0.5
买股票来打击投机者	1.9	28.1	18.5	31.5	3.0	16.4	0.6
赔偿因金融风暴而蒙受损失的市民	0.8	11.7	10.0	55.9	12.9	8.3	0.4

一般人认为，在经济困境时人们都会要求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因此，当香港遇上前所未见的经济衰退时，港人向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求助便很自然。董建华刻意建立的家长式统治政府形象更加深了民众对特区政府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港人是否真的越来越支持政府干预经济？根据不同时期的调查，我们可以找出港人对经济干预的支持度的转变。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如表6-3所示，经济危机发生后，港人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支持竟然在减退。

表6-3　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支持，1988～1999年（单位：%）

	1988 年	1994 年	1999 年
制定最低工资或薪金	57. 6	60. 7	45. 3
提供失业津贴	74. 2	78. 5	60. 2
加强管制投机性活动	66. 2	66. 4	54. 7
设立由政府管理的中央公积金	80. 3	80. 2	63. 9
向富人征收重税	74. 7	76. 7	58. 3

注：1988年调查采用四分尺度，1994年及1999年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如果1994年及1999年调查也采用四分尺度，其相关数字应较大。表中数字为表示同意的受访者占比。

1988～1994年，民众对政府扮演更重要经济角色的要求有所增强。自此以后，这一要求便开始减弱。虽然无法提出实质性证据来解释这个奇怪发现，但我仍可以提出一些可能的理由。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由市场理念的巩固以及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影响了人们的看法，使港人对以经济干预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失去信心。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1997年年底以来的多次行政失误，使港人对特区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经济危机加强了民众对市场的信心，从而使港人觉得，市场在解决问题方面比政府干预更有效。

贫富不均

虽然港人越来越接受以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机制，但并不表示他们满意这种机制的后果。港人深深体会到由市场造成的社会分裂结果，知道适度的社会差距将有助于促进工作热诚，正如传统中国人一样，港人倾向于认为财富是勤奋和诚实工作的回报，而贫穷则代表个人的无能和失败。因此，在1993年的调查中，当被问到贫穷的原因时，过半受访者（52.5%）相信那是个人因素所致，仅28.8%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数年后，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认为个人因素是导致贫穷的最重要原因。到了1999年，约1/3的受访者（32.2%）用个人因素来解释贫穷，20.7%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平，34.9%则认为两者都是贫穷的原因。在港人心目中，若一朝变得贫穷，他们很明显地会先责怪自己。[10]

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因劳动密集型工业北移内地而导致的去工业化，使香港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战后初期的工业化，贫富悬殊问题便开始出现。战后最初的30年，收入不均问题持续改善。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贫富不均问题趋于恶化。1960年时，香港的基尼系数为0.49，1971年降至0.43。1971～1976年，基尼系数保持在0.43，1981年，数字缓缓升至0.45，到了1991年，已升至0.48，1996年这一数值更达历史高峰，

0.52。由于基尼系数只根据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统计时所采集的收入数据计算，并没有考虑整体的财富分配不均情况，因此很可能低估了香港实际的贫富差距问题。[11]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没有为低下阶层设立社会安全网的地方，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的贫富不均，已造成了社会不满情绪和阶级仇恨。与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相比，港人在印象中较能容忍社会不公。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多次调查表明，港人认为贫富不均难以接受。在1988年的调查中，56.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财富分配并不公平。到了1995年，认为不公平的比例达到61.5%。到了1997年，赞成和反对的都有所增加，认为香港财富分配不公的上升至62.5%，认为公平的占25.1%。在1999年的调查中，44.9%的人认为不公平，认为公平的只有16.4%。

此外，港人对贫富悬殊问题已深感忧虑。在1995年，51.7%的人认为贫富差距问题严重，30.4%则认为一般，仅8.8%认为问题不大。到了1997年，觉得问题严重的增至67.2%，认为一般的则有22.1%，仅6.4%不以为然。1999年，认为严重的占60.9%，认为不严重的占7.2%。

这种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正好鲜明地在港人对富人、大财团的负面评价中反映出来。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微，港人对他们既羡慕又妒忌，但从不真心崇敬。近几年经济缓慢增长中日趋恶化的贫富不均，更激化了民众对富人的不满。在1991年的调查中，36.9%的受访者认为富人不值得尊重，认为值得尊重的仅占10.7%。1994年的调查结果类似，只有一小部分受访者（13.9%）觉得应该尊重富人，32.2%则不同意。

富人还被港人认为缺乏社会责任感。1994年，过半受访者（58.6%）认为富人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只有极少数（4.9%）持相反意见。1991年的调查也发现类似趋势，42.1%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弱，仅12.7%认为大企业具有责任感。

港人普遍认为富人是特权阶层，这是不满的原因之一。大多数港人相信富人获得了政府的特别优待。在1994年的调查中，57.1%的受访者感到政府会首先照顾富人利益，仅21.8%觉得政府会以公众利益先行。199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57.4%的受访者相信政府通常会先照顾富人利益，仅9.8%认为政府较重视公众利益。1997年时，虽然相信政府会先照顾富人利益的受访者（43.8%）比以往少，但仍有少数人（21.8%）觉得政府会把公众利益置于富人利益之上。1999年的情况大致相同，46%的人批评政府先照顾富人利益，仅15.5%相信政府更重视公众利益。在港人眼中，税收制度是政府优待富人的明显例子。由香港岭南大学进行的一项电话调查发现，47.3%的受访者相信现时的税收制度对资本家及商人有利。[12]

另外，港人认为富人在法庭上也享有特权，在1985年的调查中，73.4%的受访者相信由于富人有优待，因此在法庭上不会有公平审判。这个数字在1988年、1994年及1999年则分别为69.2%、74.9%和66.1%。

民众对富人的不满很容易转化为阶级矛盾。在1988年的调查中，69.7%的受访者认为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占18.2%。1995年，75.2%的人认为不同社会阶级间存在矛盾，仅12%反对这一观点。到了1999年，65.5%的人同意阶级利益存在冲突，持相反意见的则占18.2%。

除年长者比年轻人更不满这种社会不公外，其他具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访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差别很小。

社会流动的机会

港人坚信，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只要努力工作和读书，任何人都可以成功。这种看法已深深烙印在港人的资本主义精神特质中。作为一个只有短暂历史的移民社会，香港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阶级，以阻止具有野心和能力的人往上爬。[13]因此，当我们说港人相信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人都有发展机会时，并不会令人惊讶。[14]在1994年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受访者（82.5%）认为香港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到了1997年，有同样多的人（82.8%）支持此看法。即使在经济危机之后，也有71.2%的受访者在1999年的调查中表示同意以下说法：“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任何人如果努力工作都会有出头的机会。”

不过，调查也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迹象。最近两年的经济困境已严重打击了港人对经济的乐观情绪。在1995年的调查中，29.7%的受访者预期在未来3年他们的家庭生计会有所改善，23.8%预期会恶化，29.4%认为不变。到了1997年，民众对前景更为乐观，40.4%的人预期生活会有改善，仅10.8%认为会变得更差，36.9%则相信变化不大。1999年，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后，持乐观态度的人减少了（31.6%），感到悲观的增加了（15.7%），至于认为没有改变的则有40%。

更重要的是，港人对下一代的经济前景信心减弱了。当被问到“和你这一代人相比，你认为你的下一代在社会里出人头地的机会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时候，民众的看法出现了分歧，30.6%的受访者相信机会变少了，而36.5%则认为下一代的机会将更多。

香港的中产阶级已迅速成为社会不满阶层和社会不安的潜在来源。即使在经济衰退前，学历较高的年轻一辈的社会流动机会已比从前减少了。虽然随着服务业的增长，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在扩张，但这些行业中高职级、高

薪金职位的增加却始终追不上符合资格学历人士的快速增长。香港虽已成为一个处处讲求学历的“文凭社会”（credential society），但教育的实用价值却在下降。亚洲金融风暴对中产阶级的打击尤为巨大。阶级内的分化正在加快，使中产阶级人士互相对抗。很多中产者因房屋价格暴跌而导致财富大量蒸发，不少人负债累累。他们也因害怕失去工作，或跌落社会底层而在精神上备受折磨。更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是，他们的子女可能已没有机会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成就。

在这10多年来，原本心满意足、自鸣得意的香港中产阶级，已转变为一个焦虑、不安、愤世嫉俗的阶层。和工人阶级相比，中产阶级对长期备受推崇的资本主义价值更疏远。1999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不相信个人奋斗是成功的关键，或勤奋读书会成功。少于四成的受过大专教育的受访者相信，个人努力与成功有关联。

从中产阶级心目中家庭重要性的角度看，学历较高者认为下一代往上爬的机会较少，这是一种政治隐忧。48.8%受过大专教育的人相信，其子女的成就会不及他们，这个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中产阶级对富人的态度也较负面。与工人阶级相比，他们更不相信允许商人尽量多赚些钱会使所有人受惠。中产阶级明显地被香港日趋恶化的社会不公平所困扰。

结论

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但民众对香港资本主义的支持基本上仍较强固，自由市场仍是港人恪守的理念。民众虽怀疑其成效，但还是接受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要求。对于香港经济复苏及在全球经济上的竞争力，港人也颇有信心。

不过，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衰退以及残酷的国际竞争，已在香港造成不断恶化的社会不公恶果，不满情绪正在滋长。更坏的情况是，长期以来作为香港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赖以巩固的精神特质已日渐疏离，维系各阶层及政府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已经被打破。

港人仍受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价值观的影响，若经济困境持续，民众要求更多政府干预的可能性不会消失。董建华要把香港变成高科技、高增值经济体的决心也会导致政府更多地介入经济。中产阶级中愤愤不平的人也可能会要求政府更多干预，不单是为自己的利益，也是要纠正香港社会的不公平问题。结果，政府对经济日趋积极的介入、民众对政府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上升，以及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体制支持的逐渐减退，都使长期不受拘束的香港资本主义能否继续维持变成疑问。

章末注

1.Lau Siu-kai，“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in James C.Hsiung（ed.），*Hong Kong the Super Paradox*：*Life after Return to China*（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pp.35-57.

2.特区政府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可简述如下：（1）1998年1月，正达证券公司破产，多家证券公司也面临倒闭，政府为恢复投资者信心，宣布已准备超过10亿港元以赔偿那些因正达倒闭而受损的市民［*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简称*SCMP*），January26，1998，p.1］。（2）1998年1月16日，政府宣布成立共有14名成员的策略发展委员会。董建华指出，这个委员会将研究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世界发展趋势、它们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人力资源、教育、房屋、土地供应、环境，以及与内地关系（*SCMP*，January17，1998，p.6）。（3）政府在1998年3月20日宣布成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创新科技委员会，其目的是为发展香港成为高科技生产及服务中心向政府提供意见（*SCMP*，March21，1998，p.6）。（4）1998年5月，为刺激受负增长打击的经济，政府公布了一套紧急计划（*SCMP*，May30，1998，p.1）。（5）董建华在1998年6月提出了一个9点方案，以刺激经济、稳定地价、冻结高级公务员薪金及纾解民困（《明报》，1998年6月23日，A1页）。（6）1998年8月，政府历史性首次介入股票及期货市场，以捍卫香港股市价格（*SCMP*，August15，1998，p.1）。（7）1998年9月，香港金融管理局草拟一份分为7个部分的改革方案，以强化货币交易系统及终止投机者对本地利率的操纵（*SCMP*，September6，1998，Money p.1）。（8）1998年9月，政府在捍卫联系汇率时重整力量，提出新措施以对付“市场操控”，这个共有30点的方案加强了政府对证券及期货市场的监控，并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来对付非法交易，包括把更多活动纳入刑事犯罪（*SCMP*，September8，1998，p.1）。（9）1998年10月，政府透露在8月入市后累积拥有的大量股票数目。政府购买了3家公司超过一成的股份，动用1181.3亿元捍卫联系汇率，并拥有33只恒生指数成分股的股票（*SCMP*，October27，1998，p.1）。（10）1999年3月，政府宣布将直接拨地给由李泽楷（巨富李嘉诚之子）领导的盈科数码动力集团以兴建数码港。这个举动颇不寻常，因为香港素来都是以价高者得的方式拍卖土地（*SCMP*，March19，1999，p.1）。（11）1999年11月，政府公布迪斯尼乐园将在香港兴建（*SCMP*，November3，1999，p.1）。

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香港发表一篇演说，为港人自力更生精神的消失感到惋惜。他的言论引发颇多议论。李光耀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港人自己给教育及医疗服务付费：“政府没有感到要向市民负责，只是提供法治

及维持社会秩序。市民则在山边搭建小木屋居住。他们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并建设了现代的香港。”他又说：“香港现已变得不同，人们渴望香港特区首长为他们提供美好的生活。不论是禽流感、红潮导致鱼类死亡，还是楼市、股市下跌，人们都希望政府给予赔偿。”（李光耀，“Hong Kong in Transition”讲话，发表于香港政策研究所四周年晚宴，1999年10月25日，香港，3-4页。）

4.除1985年的调查，其他都是全港性调查。所有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回应率是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计算：（1）1985年调查在观塘区（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区与住宅区混合的小区）进行，完成767个访问，回应率为46.9%。（2）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3）1991年调查完成401个访问，回应率为55.8%。（4）1993年调查完成892个访问，回应率为54.6%。（5）1994年调查完成997个访问，回应率为57%。（6）1995年调查完成408个访问，回应率为61.5%。（7）1997年调查完成701个访问，回应率为49.7%。（8）1999年调查共使用4份不同的问卷，故有4个次样本，每位受访者回答一份问卷，本文数据取自问卷C及问卷D，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两个次样本的数目减少至1689及1701个；访问员成功完成839个和823个访问，回应率各为49.7%和48.4%。

5.Richard C.Longworth，*Global Squeeze*：*The Coming Crisis for the First-World Nations*（Lincolnwood：Contemporary Books，1998）.

6.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Asian Survey*，Vol.30，No.8（1990），pp.766-781.

7.西欧的一些调查显示，自由原则与经济干预的要求时常并存，而这些干预的要求又多来自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易于失败的个人或团体。当市场经济不能为人们带来好处时，干预政策或许会被接受为可行和必需的方法，不过，这并不表示自由理念会被放弃。很明显，恪守自由原则是一回事，废止干预措施又是另一回事。那些把实用干预主义与自由原则融合的选民，便是熟知例子。参见：Ole Borre and Jose M.Viegas，“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in Ole Borre and Elinor Scarbrough（eds.），*The Scope of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4-279.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原则

更为热衷。“到目前为止，当自由放任政策无法解决工业社会那些经常循环出现的问题时，人们对自由放任政策的信心便更为减弱，并会尝试以政府干预这种新形式来解决问题，同时，新的态度也逐渐形成。很多调查……证实了现时民众要求政府推行那些违反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不同措施。比如，民众舆论强烈赞成保护环境的条例、确保职业安全以及保证食品和药物的质量。可是调查亦表明，人们对自由放任政策恋恋不舍……与上面的说法似乎格格不入的是，在40年来的民意调查中，大部分美国人都鼓吹政府对经济更多干预便是他们理想目标的例子很少。”Herbert McClosky and John Zaller，*The Amercian Ethos*：*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ialism and Democrac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50-151.

8.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

9.20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用“积极不干预主义”这个新概念来代替“放任政策”这个名词，以反映政府将在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弱势者提供社会及公共服务方面担任更积极的角色。

10.Timothy K.Y.Wong and Chack-kie Wong，“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Social Welfare in Hong Kong，”*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Vol.21，No.1（1999），p.3.

11.Lau Siu-kai，“The Fraying of the Socio-economic Fabric of Hong Kong，”*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p.428-429.

12.*SCMP*，March7，2000，p.6.

13.当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肤色隔阂（colour bar）阻碍了香港华人的政治野心。

14.Tsang Wing-kwong，*The Class Structure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Turmoi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2，No.35（2003），pp.373-386.中文版曾以“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心问题”为题，刊于刘兆佳，尹宝珊，李明方，等.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貌：华人社

会的比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1：147-166；现在的译本再经修订。

第7章　社会经济不满情绪与政治态度㊟

遭受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香港经济便一蹶不振，政治气氛也变得沮丧和反复无常。缺乏政治警觉性和行政经验的特区政府，更加激化了港人的政治不满、经济悲观和社会愤怨。民众对政治的颓丧有目共睹，他们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咎于政客和政府官员，对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的信任一落千丈。在这种愈演愈烈（但不一定理性）的政治否定（negativism）的情势下，即使是一向备受推崇的公务员也难以幸免。民众对社会失去信心，也殃及社会经济精英，反精英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情绪不断滋长，使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特区政府正面临着经济逆转、收入下降、民众要求增加援助，以及商界精英要求政府紧缩财政的困局。于是，瞬间下滑的政治信任和持续上扬的政治犬儒心态，使特区政府的管治举步维艰。过去数年，特区政府与香港民众的冲突频发，不仅加深了民众对政治的颓丧态度，亦催生了香港的管治危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纵使民众对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失去信心，但仍指望他们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局。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香港难以培养出既富有经验又值得信赖的政治和社会领袖，所以无论港人如何不屑，特区政府仍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救星”。民众不信任政府，却又依赖其救助，对于缺乏管治经验和危机处理能力的特区政府来说，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难得机遇。

数年间，主权转移、经济滑落以及新领导层缺乏认受性和政治经验等剧变对港人的政治态度产生很大影响，这种态度既复杂，又变化不定，特征是充斥着否定主义和无力感。本章将根据我在2001年进行的全港性随机抽样调查讨论港人的政治态度，特别是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经济精英的信任和信心。[1]

对个人处境的满意度

港人虽陷入了经济低迷、通缩和高失业率的困境，但对自身处境仍保持一定的满意度。当经济逆转时，民众持续满意往往是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2]香港的情况也表明，港人多年来所累积的财富尚能帮助其度过短期的经济难关。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结构虽出现很大变化，[3]但民众仍能依靠家庭和亲戚网络寻求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不过，若与昔日相比，港人现在有较多忧虑。公共及私营部门为开源节流，无不积极精简架构、重组工作流程、重订目标和功能，进而导致不断的裁员和削减员工福利。中产阶级对此感受

尤深，因为他们大多没有为香港经济的突然逆转以及个人经济前景的剧变做好经济和心理准备。当港人还未能看到黑暗的尽头时，难免会感到不安、忧虑和紧张。表7-1阐明了这种状况。

表7-1　对个人处境的满意度（单位：%）

	满意	普通	不满意	不知道	拒答	不适用
整体生活	48.5	36.6	13.7	1.1	0.0	0.0
家庭生活	71.0	22.0	5.5	0.9	0.0	0.6
学历	31.9	31.5	32.2	4.3	0.1	0.0
健康	60.2	29.3	10.2	0.2	0.0	0.0
经济	34.1	44.2	20.8	0.9	0.1	0.0
工作	26.6	24.6	9.4	0.1	0.1	39.2
朋友关系	66.9	28.8	2.3	1.5	0.4	0.1
亲戚关系	61.8	31.1	3.8	1.6	0.4	1.3
居住环境	55.2	33.3	10.5	0.7	0.2	0.0
日常消遣	42.3	43.6	8.8	5.1	0.2	0.0

整体来说，港人大多满意个人处境。不少报告虽指出华人家庭已出现问题，但大部分受访者（71%）表示仍满意其家庭生活状况。对于其他形式的亲密关系，满意的亦居多：66.9%的受访者满意与朋友的关系，61.8%的受访者满意与亲戚的关系。由此可见，港人的首属社会环境仍能满足其感情需要，在经济困境中，稳固的家庭结构与紧密的亲友关系对社会稳定和个人福祉有莫大贡献。

港人素来重视健康，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紧张和压力足以损害健康。幸运的是，多数受访者（60.2%）均称健康没有问题。享有健康体魄的人大都具有较乐观态度和较强能力处理经济困难。

然而，个人处境也有不如意之处，部分问题开始浮现，例如，只有55.2%的受访者满意其居住环境，满意整体生活的更低于半数（48.5%），满意日常消遣的则更少（42.3%）。更令人担忧的是，只有34.1%的受访者满意其经济状况，在就业者中，对工作感到满意的也仅占43.8%，反映了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日益增长的工时已衍生出忧虑的社会氛围。

虽然只有31.9%的受访者满意其学历，但情况不足为惧。因为与各地华人一样，港人格外重视教育。过去的研究表明，对教育的重视是出于内在及工具性考虑，港人对学历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所以，不满学历由来已久。不过，从劳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角度看，港人对学历的不满确实比以往严重。

无论如何，港人对个人前景仍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展望3年后的家庭生活，受访者虽大多不奢望水平会比现在高，但仍有28.5%相信会有所改善，只有17.9%预期会比现在差。同样地，在展望个人前景时，50.2%的受访者表示乐观，32%表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只有13.4%回答悲观。

表7-2显示，在个人处境的满意度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人士有显著差别。

表7-2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个人处境的满意度（单位：%）

	整体生活	家庭生活	学历	健康	经济	工作	朋友关系	亲戚关系	居住环境	日常消遣
整体	48.5	71.0	31.9	60.2	34.1	26.6	66.9	61.8	55.2	42.3
性别										
男性	—	—	—	67.6	—	—	—	60.8	—	—
女性	—	—	—	52.2	—	—	—	67.5	—	—
年龄										
18~29岁	50.4	74.0	38.8	66.7	—	—	—	58.3	—	56.3
30~54岁	48.3	73.6	30.7	62.5	—	—	—	65.7	—	41.0
55岁及以上	50.3	66.9	36.9	50.3	—	—	—	63.2	—	46.6
学历										
小学	38.7	63.7	17.2	45.4	24.7	30.4	60.2	—	—	39.3
中学	49.8	75.0	28.4	65.9	35.9	45.7	69.0	—	—	44.8
专上	62.4	76.8	67.5	68.8	45.2	50.4	78.1	—	—	52.2
职业										
体力劳动	38.5	67.3	18.7	—	25.5	34.8	61.9	—	—	33.3
文职/销售/服务	58.0	74.3	25.0	—	37.2	46.4	75.0	—	—	46.4
管理/专业	57.8	83.1	47.5	—	44.4	50.0	77.0	—	—	44.3
家庭月收入（港元）										
15 000以下	34.4	58.2	22.9	53.6	19.7	29.3	60.1	58.0	53.6	38.0
15 000~39 999	54.1	80.0	30.8	65.6	38.1	50.9	68.6	65.1	53.3	42.4
40 000及以上	67.3	84.5	57.7	64.9	55.9	45.7	83.6	74.3	60.4	56.8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30.4	58.3	18.3	52.4	15.3	26.7	54.5	50.6	41.4	29.3
中下层	44.8	70.8	24.3	58.4	30.6	38.8	67.2	68.8	52.4	44.6
中层及以上	62.5	79.9	46.2	67.0	46.7	54.6	76.1	66.1	65.5	51.8

注：表中数字为表示满意的受访者占比。

女性除较不满意其健康状况以及较满意与亲戚的关系外，其他方面与男性的差别不大。年长者对个别生活范畴的满意度比年轻人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一般较多受健康问题困扰，而可资依赖的经济及教育资源则较少。不

过，他们大多与亲戚维持较好关系。

教育赋予个人更多资源以营造丰富人生，因此学历较高者一般具有较高的个人处境满意度。再者，由于学历与职业地位、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所以拥有较佳职业、较高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亦比较满意个人处境。

对香港现状的满意度

相对于个人处境，民众对香港现状的满意度明显较低。事实上，他们的忧虑相当明显（见表7-3）。过半数受访者感到满意的只有交通和医疗服务两项（分别为56.9%、51%）；约1/3的受访者则对文娱康乐（38.2%）、社会福利（33%）、房屋（32.4%）、治安（31.1%）及教育（30.4%）表示满意。

表7-3　对香港现状的满意度（单位：%）

	满意	普通	不满意	不知道	拒答
经济	7.8	27.5	58.6	6.1	0.0
治安	31.1	44.6	22.5	1.7	0.0
政治	14.6	36.7	26.4	22.0	0.2
交通	56.9	28.1	11.8	3.2	0.0
房屋	32.4	36.4	24.7	6.6	0.0
医疗服务	51.0	30.9	14.4	3.6	0.1
教育	30.4	32.7	27.1	9.6	0.1
社会福利	33.0	36.3	21.7	8.9	0.2
就业	6.2	27.4	58.5	7.9	0.0
文娱康乐	38.2	38.0	9.1	14.7	0.0
人际关系	23.6	47.8	22.3	6.2	0.1

调查也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恶化，例如，只有23.6%的受访者满意社会人际关系；认为港人是可信赖的更少于半数（46.8%），不同意者占9.1%，认为普通的则有39.8%。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港人不满社会现状的情况日趋严重。

除性别外，社会经济背景相异人士对香港现状的满意度也不同（见表7-4）。经历过经济困境及政治动荡的年长一辈对社会环境的期望较低，故对香港现状的不满也比年轻人少。教育会提高个人对社会的期望，因此学历较高者大多有较多不满。同样地，拥有较佳职业、较高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不满的比例也较高。

表7-4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香港现状的满意度（单位：%）

	经济	治安	政治	交通	房屋	医疗服务	教育	社会福利	就业	文娱康乐	人际关系
整体	7.8	31.1	14.6	56.9	32.4	51.0	30.4	33.0	6.2	38.2	23.6
性别											
男性	—	38.5	—	—	—	56.8	—	—	—	—	—
女性	—	23.8	—	—	—	48.5	—	—	—	—	—
年龄											
18～29岁	6.3	25.6	12.7	54.3	25.8	48.8	35.9	28.2	7.1	—	26.0
30～54岁	5.7	30.4	15.2	55.2	31.4	50.5	28.4	33.7	5.5	—	20.4
55岁及以上	18.2	39.5	39.1	73.4	51.6	63.4	50.4	50.6	10.6	—	39.6
学历											
小学	12.2	34.5	26.8	65.1	46.8	57.3	45.6	45.5	8.1	—	36.9
中学	6.6	30.2	17.8	58.1	34.6	56.1	34.2	37.7	4.9	—	22.3
专上	7.7	31.8	14.6	51.6	18.1	38.1	17.8	20.3	9.7	—	17.4
职业											
体力劳动	7.3	37.0	25.9	68.8	46.7	63.1	46.9	42.7	6.5	—	35.6
文职/销售/服务	4.5	23.9	14.0	58.9	24.5	53.2	25.7	39.4	5.5	—	19.6
管理/专业	4.4	26.8	11.3	44.9	20.0	40.7	18.8	23.7	7.9	—	11.3
家庭月收入（港元）											
15 000以下	10.2	36.0	—	—	42.2	—	43.2	41.1	6.3	—	34.0
15 000～39 999	5.9	29.2	—	—	30.1	—	31.6	32.8	6.3	—	18.6
40 000及以上	3.7	28.8	—	—	20.4	—	13.2	28.8	6.4	—	14.7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10.0	36.7	24.4	—	—	—	—	—	4.3	46.6	31.9
中下层	8.2	33.2	19.0	—	—	—	—	—	4.2	35.4	22.3
中层及以上	6.4	26.4	15.7	—	—	—	—	—	9.2	49.4	22.5

中产阶级以往一直志得意满，而“二战”结束以来，香港社会确实也发展迅速，充满机会。目前的经济衰退对中产阶级来说是前所未遇的危机，他们对前景已丧失信心，成为香港社会最多不满和最焦虑的阶级。

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估

表7-5列出了受访者如何评估各类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房屋和交通问题在回归前均被视为严重，现在已非主要。房价大幅下滑与公共交通改善都减轻了这两项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回归前民众曾担心法治会受到腐蚀，回归后又遇上经济不景，但受访者并未把治安看成是严重问题，52.1%的受访者仍相信香港司法系统的公平性，批评它不公平的只占少数（12.2%）。同样地，不少人在回归前曾担心回归后会令贪污情况恶化，但经济出现衰退后，贪污数字虽呈上升趋势，但仍只有18.9%的受访者认为贪污问题严重。

表7-5　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估（单位：%）

	不严重	普通	严重	不知道	拒答
治安	29.6	44.2	22.7	3.5	0.0
房屋	20.4	39.2	33.6	6.6	0.2
交通	38.7	42.8	14.2	4.1	0.1
教育	19.6	38.3	30.3	11.4	0.4
就业	6.3	18.5	68.9	6.2	0.1
青少年	4.1	11.4	76.2	8.3	0.0
医疗卫生	30.4	50.0	14.5	5.1	0.0
社会福利	21.3	47.7	20.6	10.0	0.5
环境污染	7.5	22.7	66.3	3.4	0.0
老人	12.0	29.1	50.0	8.9	0.0
道德风气	7.8	33.7	50.5	8.0	0.0
贫富悬殊	3.6	14.1	77.3	5.0	0.0
贪污	24.7	38.7	18.9	17.6	0.1

政府为市民提供慷慨而全面的医疗服务，虽然令私营医疗机构陷入困境，但足以取悦民众，因此只有14.5%的受访者觉得医疗卫生问题严重也不令人惊讶。同样地，香港虽不是福利社会，但民众颇抗拒把福利视为权利，反福利情绪甚至呈上升趋势。调查显示，46.4%的受访者同意社会福利会削弱港人自食其力的意愿，只有32.8%不同意。由于民众对社会福利的期望不高，所以大都满意目前相当有节制的福利制度。

港人非常重视教育。近年来，香港的教育制度不断被批评为僵化和缺乏效率。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社会人士对教育改革的诉求激增，教育顿时成为回归后的首要问题。行政长官董建华曾承诺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但时至今日仅取得有限成效。然而，从表7-5的数字看，民众似乎不认为教育改革是迫切任务。

将其余社会问题根据受访者对其严重程度的判断由低至高排列，依次为老人、道德风气、环境污染、就业、青少年及贫富悬殊。人口老龄化、孝道日衰及老人福利不足都提高了民众对老人问题的关注。而人们日益关注的青少年问题，包括学业、滥用药物、行为偏差、犯罪和失业等，也敲响了社会的警钟。香港的青少年普遍被标签为耽于逸乐、重视物质、个人主义、缺乏创业精神、缺乏想象力、不愿拼搏、怯于冒险、缺乏野心和毫无危机感等。港人本来视年轻一代为未来的希望，但在看到时下青少年的表现后，又感到非常失望，这可能是将青少年问题视为很严重的原因。

道德风气及环境污染皆被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印证了社会和物质生活环境的品质日趋恶化。道德风气日衰破坏了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交

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削弱了香港对外国投资者及人才的吸引力，进而损害了香港的经济活力。

就业和贫富悬殊的问题尤其严重。经济不景气对民众而言，最切身的后果莫过于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但当前问题基本源于香港向知识型经济转变，属于结构性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香港与全球经济融合，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了贫富鸿沟，在达尔文式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一方拥有能参与竞争的知识与技能，另一方则因缺乏此等条件，连生存都备受威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贫富悬殊问题日益恶化，近几年，赤贫阶级俨然形成，更加引起社会关注。我们的研究显示，在过去10多年间，贫富悬殊一直被评为严重社会问题，现在更居首位。

从前，港人倾向于认为贫穷是个人问题，由个人的不负责任或遭遇不幸造成，既不是社会问题，更与政治无关。但在过去10年间，民众的理解出现明显转变。在这次调查中，42%的受访者都同意贫穷是社会不公平的结果，把问题归咎于本身的不足1/3（31.5%）。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及其对失业和收入不均的影响，明显改变了民众对贫穷的看法。但很自然地，优势群体较倾向于以个人因素解释贫穷，劣势群体则倾向于将贫穷归咎于社会。以社会因素来解释贫穷的日趋普遍，也带动了民众要求政府照顾穷人的诉求。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人士对香港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评估（见表7-6）。在性别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认为香港正受到各种严重问题的困扰，这可能是因为其生活圈子较小，较易受传媒影响，而传媒又经常夸大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年龄方面的分歧较不明显，对不同的问题意见参差不齐。在学历方面，学历较高者较倾向于把房屋、交通、教育和医疗卫生视为严重问题，这与中产阶级人士所期望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而学历较低者则较看重社会福利、老人、贫富悬殊及贪污问题，这或许因为他们较易受此方面困扰。至于职业、家庭收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则与学历的情况相近。

表7-6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估（单位：%）

	治安	房屋	交通	教育	就业	青少年	医疗卫生	社会福利	环境污染	老人	道德风气	贫富悬殊	贪污

	治安	房屋	交通	教育	就业	青少年	医疗卫生	社会福利	环境污染	老人	道德风气	贫富悬殊	贪污
整体	22.7	33.6	14.2	30.3	68.9	76.2	14.5	20.6	66.3	50.0	50.5	77.3	18.9
性别													
男性	16.7	—	—	33.5	—	80.2	—	20.3	—	—	51.6	—	18.6
女性	31.8	—	—	35.4	—	86.4	—	26.2	—	—	58.9	—	28.8
年龄													
18～29岁	—	33.6	22.5	34.6	65.1	—	16.5	22.4	69.8	—	—	—	—
30～54岁	—	38.0	13.2	38.2	76.4	—	15.7	23.0	71.7	—	—	—	—
55岁及以上	—	31.9	13.5	20.0	71.5	—	13.2	23.1	58.9	—	—	—	—
学历													
小学	—	35.3	15.0	26.3	—	81.7	13.1	29.7	—	57.7	52.1	81.6	30.3
中学	—	34.2	13.7	32.6	—	84.2	13.8	20.2	—	53.9	57.9	84.2	22.7
专上	—	41.9	18.1	48.1	—	81.5	22.4	21.6	—	53.6	50.6	72.9	16.0
职业													
体力劳动	—	32.4	11.1	23.4	—	—	12.2	22.3	—	—	—	—	21.7
文职/销售/服务	—	35.8	12.4	30.8	—	—	11.8	27.1	—	—	—	—	23.2
管理/专业	—	40.2	15.3	45.7	—	—	22.5	23.4	—	—	—	—	19.5
家庭月收入（港元）													
15 000以下	—	—	14.4	27.8	—	—	14.4	24.3	—	55.1	52.1	—	—
15 000～39 999	—	—	16.3	34.8	—	—	14.8	23.8	—	56.0	58.9	—	—
40 000及以上	—	—	10.0	52.3	—	—	19.4	21.5	—	50.9	57.3	—	—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	—	—	29.5	83.7	—	—	29.6	62.1	59.1	48.8	85.0	—
中下层	—	—	—	30.0	74.6	—	—	22.5	70.7	58.5	60.5	84.0	—
中层及以上	—	—	—	39.5	68.1	—	—	20.7	71.9	51.4	53.9	78.4	—

注：表中数字为表示严重的受访者占比。

对回归后香港情况的评价

回归前，人们对于香港“九七回归”后的情况曾有很多末日式预言，事实上，很多港人也认同这些黯淡描绘。[4]于是，在调查中，我要求受访者比较回归前后香港社会的不同，结果如表7-7所示。

表7-7　对回归后香港情况的评价（单位：%）

	变好了	差不多	变差了	不知道	拒答
社会风气	3.4	43.7	47.7	5.2	0.0
工作态度	21.9	35.6	34.3	8.2	0.0
社会责任感	12.5	45.5	31.3	10.5	0.2
人际关系	6.3	59.2	26.0	8.2	0.2
道德水平	5.5	49.6	34.7	10.1	0.1
政府管治能力	7.5	34.8	48.5	9.0	0.1
守法精神	11.3	58.2	20.0	10.5	0.1
生活品质	5.1	25.1	64.5	5.2	0.1
公务员能力	10.7	47.2	28.3	13.5	0.2
经济竞争力	9.1	28.1	52.7	9.9	0.2
创业精神	26.4	33.3	29.1	11.1	0.1
社会和谐	6.6	44.6	40.6	8.2	0.0
青年拼搏精神	10.1	29.3	47.8	12.5	0.2

回归后，香港社会弥漫着萧索气氛。在民众眼中，社会已陷入全面衰落，包括生活品质严重下降，经济竞争力、政府管治能力、青年拼搏精神、社会风气及社会和谐大幅变差，港人的道德水平、工作态度和社会责任感每况愈下，创业精神、公务员能力和人际关系以及守法精神也出现倒退。无怪乎港人都感觉生活无望。

除性别外，社会经济背景相异人士对回归后香港情况的转变持不同评价（见表7-8）。年龄与这方面的看法虽有一定关联，但无固定模式。颇令人意外的是，对社会风气和社会责任感、人际关系、道德水平、生活品质、公务员能力、经济竞争力、创业精神及社会和谐等情况恶化最为敏感的，竟是中年受访者。年轻受访者较怀疑政府的管治能力，而年长者则对港人的守法精神较缺乏信心。

表7-8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回归后香港情况的评价（单位：%）

	社会风气	工作态度	社会责任感	人际关系	道德水平	政府管治能力	守法精神	生活品质	公务员能力	经济竞争力	创业精神	社会和谐	青年拼搏精神
整体	47.7	34.3	31.3	26.0	34.7	48.5	20.0	64.5	28.3	52.7	29.1	40.6	47.8
性别													
男性	—	—	—	—	—	—	20.0	—	—	—	—	—	60.5
女性	—	—	—	—	—	—	25.2	—	—	—	—	—	47.6
年龄													
18～29岁	42.9	—	24.6	21.8	33.6	60.3	19.2	64.3	25.0	51.2	23.2	33.3	—
30～54岁	54.9	—	37.5	30.1	41.2	56.4	21.7	74.1	35.1	63.6	36.1	51.8	—
55岁及以上	42.4	—	35.6	28.2	34.7	38.3	26.6	53.3	32.1	48.2	29.8	30.4	—
学历													
小学	53.8	—	—	25.9	—	42.0	—	—	—	51.9	—	36.0	—
中学	51.6	—	—	31.2	—	55.0	—	—	—	60.7	—	43.8	—
专上	42.4	—	—	24.5	—	63.6	—	—	—	60.5	—	56.0	—
职业													
体力劳动	—	—	—	—	—	45.5	19.9	66.4	—	—	—	41.5	—
文职/销售/服务	—	—	—	—	—	61.5	25.9	72.1	—	—	—	42.7	—
管理/专业	—	—	—	—	—	64.5	20.4	75.8	—	—	—	53.1	—
家庭月收入（港元）													
15 000以下	52.8	—	—	25.8	—	47.4	22.8	—	—	54.6	—	39.2	—
15 000～39 999	50.3	—	—	27.9	—	56.2	21.1	—	—	62.4	—	45.4	—
40 000及以上	44.4	—	—	34.6	—	65.1	22.2	—	—	68.5	—	63.6	—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61.3	—	39.1	—	—	—	28.4	75.3	—	—	—	40.0	—
中下层	50.6	—	40.8	—	—	—	24.1	72.3	—	—	—	45.6	—
中层及以上	45.1	—	29.1	—	—	—	17.9	63.1	—	—	—	45.6	—

注：表中数字为表示回归后情况变差的受访者占比。

学历不同者也对香港的情况持相异评估，其中学历较低者较倾向于认为社会风气日趋败坏；学历、职业地位和家庭收入较高者则更担忧香港社会正全面恶化。然而，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而言，自视地位较低者对香港情况转变持较悲观的评估。

总而言之，理由虽不一而足，但民众大都认同这样的结论，即回归后香港

风光不再。

对香港的信心

港人虽认为香港社会已出现各种衰败征兆，但仍对其前景颇为乐观，42%的受访者表示有信心，信心水平一般的占28.2%，坦言没信心的仅占25.7%。

同时，民众对港人治港的能力颇有信心，31.8%的受访者相信港人具有管治能力，另有32.6%的人认为港人治港的能力一般，但认为港人缺乏治港能力的比例也不容忽视，达25.5%。

经济竞争力下降已成为热议话题，也引发了各界精英筹谋对策。民众虽对香港竞争力的信心呈下降之势，但调查显示，只有16.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竞争力弱于主要对手，相信仍处于优势者占29.9%，而多数人认为香港与主要对手的竞争力相当。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稳步上升，可能是民众对香港前景仍然保持乐观的部分原因。即使此次调查只有35.9%的受访者表示信任中央政府，但已是历来最高纪录。事实上，只有23.5%的人仍然不信任中央政府。港人于回归前对中央政府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怀疑，现时大部分已消除，认为中央政府已履行承诺的达39.4%，持相反意见者仅占27.5%，23.4%则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随着香港和内地提高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港人也日益体会到两地有共同利益，香港经济受惠于内地的繁荣，考虑北上寻找机会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在调查中，61.9%的受访者对中国前景有信心，20.1%表示信心一般，仍缺乏信心的只占10.9%。影响民众信心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相信香港能得益于与内地日趋紧密的关系，就此而言，多数受访者（41.6%）认为是利多于弊，31.5%觉得利弊参半，只有16.8%认为弊多于利。

在不同问题上，民众的信心参差不齐（见表7-9）。与回归前的末日式预测相异，港人现时对个人自由、政府廉洁、法治、社会稳定及人权保障仍有信心，对经济前景虽谈不上乐观，但仍有一定信心。港人对民主的诉求，一方面受制于中央政府的反对，另一方面也缺乏本土的强烈诉求，所以对民主发展的前景持不同看法，不足为奇。至于行政长官董建华及负责制定政策的官员，他们则信心偏低。对特区高层政治领袖失去信心或许是民众对香港发展前景存疑的主要原因。

表7-9　对香港不同方面的信心（单位：%）

	有信心	一般	没信心	不知道	拒答
经济繁荣	32.8	29.2	32.0	6.0	0.0
社会稳定	39.9	34.9	20.1	5.1	0.0
个人自由	55.2	28.5	11.9	4.3	0.1
人权保障	37.5	33.3	19.2	9.9	0.1
政府廉洁	45.1	30.2	13.1	11.4	0.1
法治	40.6	34.2	14.6	10.5	0.1
民主发展	27.3	35.5	25.1	12.0	0.1
行政长官董建华	20.0	36.7	35.0	8.0	0.2
负责制订政策官员	22.7	34.5	30.3	12.2	0.2
公务员	29.9	43.8	15.7	10.2	0.4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人士对香港的信心也呈现差异（见表7-10）。总体而言，男性对各方面的信心大多比女性强。中年受访者的信心比其他年龄组别低，年长者对各方面的信心则较强。学历较高者虽对政府廉洁有较强信心，但对董建华及制定政策官员的信心较弱。职业和家庭收入上的分别则与学历的情况差不多。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拥有较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访者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权保障、政府廉洁及法治方面具有较强信心，但对个人自由、行政长官和公务员的信心则较弱。

表7-10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香港不同方面的信心（单位：%）

	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个人自由	人权保障	政府廉洁	法治	民主发展	行政长官	政策官员	公务员
整体	32.8	39.9	55.2	37.5	45.1	40.6	27.3	20.0	22.7	29.9
性别										
男性	35.4	—	—	45.5	55.7	50.5	—	—	—	36.9
女性	34.4	—	—	36.9	45.2	38.9	—	—	—	29.2
年龄										
18~29岁	43.0	53.1	53.9	41.7	—	45.6	30.3	11.9	22.1	35.4
30~54岁	30.5	38.0	54.2	37.0	—	42.7	25.5	17.4	22.4	30.4
55岁及以上	41.9	45.2	71.5	56.3	—	54.3	50.7	42.7	41.9	42.4
学历										
小学	34.5	40.7	—	—	45.9	—	—	32.3	32.4	—
中学	34.8	43.1	—	—	50.2	—	—	18.9	26.6	—
专上	36.1	41.3	—	—	59.1	—	—	15.4	16.9	—
职业										
体力劳动	32.7	—	—	—	50.0	—	—	25.2	36.8	—
文职/销售/服务	26.1	—	—	—	45.9	—	—	15.1	21.9	—
管理/专业	34.3	—	—	—	49.0	—	—	13.8	16.7	—
家庭月收入（港元）										
15 000以下	—	—	—	—	—	—	38.8	28.4	34.9	—
15 000~39 999	—	—	—	—	—	—	24.4	17.8	20.6	—
40 000及以上	—	—	—	—	—	—	25.7	14.0	16.0	—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28.1	36.3	61.1	41.4	42.6	41.9	33.6	25.6	—	34.9
中下层	33.9	40.5	56.7	38.8	51.3	45.7	29.5	21.8	—	33.2
中层及以上	36.7	44.6	56.3	42.8	52.7	46.7	30.4	19.4	—	31.7

注：表中数字为表示有信心的受访者占比。

对政治人物的信任

在经济逆转时，除非政治精英能拥有足够的智慧与技巧，充分展示与民众同舟共济、息息相关，否则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必然下降。香港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本质、特区政府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以及政治精英既缺乏经验又与民众有隔阂等情况，均削弱了政治精英与民众的联系。大部分受访者

（62.4%）表示香港根本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回答有的只占18.4%。同样地，受访者大都认为香港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团体，只有16.7%持相反意见。表7-11显示了港人政治信任低落的情况。

表7-11　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单位：%）

	信任	一般	不信任	不知道	拒答
行政长官董建华	22.3	33.9	36.3	7.3	0.2
特区政府	28.7	33.8	29.8	7.3	0.4
行政会议	18.6	36.9	27.5	16.5	0.5
公务员	29.0	42.6	16.4	11.7	0.4
立法会	27.1	38.6	22.7	11.2	0.4
工商界人士	12.9	36.1	34.2	16.5	0.2
区议会	22.1	38.7	23.5	15.5	0.2
政党	10.3	32.1	37.3	19.7	0.5
民主党	15.2	28.1	37.6	18.6	0.5
自由党	9.2	29.3	40.0	20.9	0.5
民建联	10.8	29.9	38.3	20.4	0.5

所有在特区政府行政架构内的政治人物，包括行政长官董建华、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和公务员，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度都相当低，其中以对董建华及其政治幕僚（即行政会议）尤甚。只有13.3%表示满意政府表现。更有趋势显示，港人视政府为一个官有、官享和官治的政府（government of, for and by the officials），40.9%的受访者相信政府关心官员的利益多于民众的，只有17.5%觉得政府关心民众的利益多于官员的，而认为两者利益不相伯仲者占23.6%。

民众对公务员信任的下滑最令人担忧。回归前，公务员最得人心，并被视为香港政治稳定和前途信心的基石。特区政府成立后，民众对公务员失去信心，原因不仅是对其处理危机的能力感到失望，也是因为对他们置自身利益于民众利益之上的做法感到不满。公务员不再受到尊重，无疑对政府的有效管治带来重大打击。

民众对统治权威的不信任助长了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的风气。例如，当被问到谁要为当下众多问题负上主要责任时，较多受访者（31%）把矛头指向政府，另有13.5%指责董建华要为困境负责。统治权威动辄得咎的情况亦可以从有6.1%的受访者归咎于港英政府的结果反映出来。只有11.3%的受访者认为港人自己责无旁贷。

对特区政府和董建华的不满也诱发了民众对殖民统治的怀念，如选择性地夸大昔日光辉，并忽略过去痛苦。近半数受访者（47.1%）认为如果香港现在仍然由英国人统治，情况会较好，只有27.1%不同意，回答不知道或没有意见的则占25.2%。

有趣的是，港人虽已对统治权威失去信心，但依然期望这些权威能带领香港解决问题和走出困境。首先，在照顾港人的问题上，认为政府应负较重责任的受访者比例（44.9%）竟高于认为港人应该自行负较重责任者（42.8%）。其次，当被问及谁最能带领港人走向美好将来时，虽然回答不知道或没有意见的达20%，而表示一个都没有的占15.6%，但仍有22.4%的受访者提出是特区政府，5.8%寄希望于董建华，很少有人会指望其他社会经济人物担当这方面的领导角色。民众对统治权威既不信任又寄以期望的心态，实为特区政府带来了挑战和机会。董建华及其政府若能改善施政，满足民众期望，必可重拾大众信心；反之，期望的落空则会加深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和不满。

对香港政治前景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这导致了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下降。立法会一直是香港民主改革的重心，[5]其部分议员由普选产生，所以比行政部门享有较高的认受性，立法会议员应更能代表港人（特别是草根阶层）的意见和利益。可是，随着民选议席的增多，民众对立法会的信任反而下降。[6]

区议会的成员大都由普选产生，但民众对其信任程度也不断下降。近年发生的多宗涉及区议员的丑闻严重打击了区议会的信誉。区议会是一个缺乏行政功能和权力的机构，民众也趋于直接采用集体行动向政府施压来解决地区问题，这些都令区议会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

令人惊讶的是，民众对政党的信任也大幅滑落，只有约一成受访者（10.3%）表示信任政党。对个别政党而言，亲工商界的自由党仅取得9.2%的受访者信任；亲建制、以草根阶层为基础的民建联也只有10.8%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民主党以鲜明的反中央立场和楬橥民主，在回归前是最受民众欢迎和信任的政党，但在1997年以后，也备受政治影响力和信任程度下滑的困扰，在调查中，回答信任民主党的只有15.2%。上述数据展现了一个现象：香港的局部民主化非但没有促进政党的发展，反而削弱了其政治影响力。[7]

港人一般对商人既羡慕又妒忌，却谈不上尊敬。回归后，港人越来越关注大财团的政治影响力，也越发相信政商勾结的滋蔓。在调查中，约半数受访者（50.6%）投诉特区政府关心富人的利益多于民众的利益，只有13.7%认为民众利益较受关注，而同意政府兼顾两者的占23.8%。

除性别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访者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有显著分别（见表7-12）。年长者对各种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都较高，唯民主党除外，这反映了他们对权威的顺从和对民主派活跃分子政治激进主义的厌弃。

表7-12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单位：%）

	行政长官	特区政府	行政会议	公务员	立法会	工商界人士	区议会	政党	民主党	自由党	民建联
整体	22.3	28.7	18.6	29.0	27.1	12.9	22.1	10.3	15.2	9.2	10.8
性别											
男性	—	—	22.2	37.0	—	—	—	—	—	—	—
女性	—	—	22.8	27.8	—	—	—	—	—	—	—
年龄											
18～29岁	9.5	18.9	20.0	22.8	27.2	16.4	26.6	14.9	23.1	10.5	10.3
30～54岁	20.3	26.5	19.6	32.2	28.0	12.2	23.3	11.1	17.4	9.6	10.6
55岁及以上	47.7	55.5	36.6	45.7	43.7	28.2	37.6	18.8	20.0	21.9	29.6
学历											
小学	34.7	42.7	33.5	—	39.8	23.9	35.8	19.7	—	19.6	20.8
中学	21.2	28.2	21.0	—	30.4	13.2	27.1	12.6	—	10.4	13.4
专上	17.2	23.2	14.4	—	20.7	12.8	13.6	7.0	—	6.8	6.7
职业											
体力劳动	28.2	35.6	30.8	—	37.9	—	33.1	17.9	—	—	18.6
文职/销售/服务	17.6	32.1	18.6	—	30.6	—	29.8	13.9	—	—	16.2
管理/专业	15.5	19.5	13.3	—	21.8	—	14.7	4.9	—	—	3.9
家庭月收入（港元）											
15 000以下	30.2	39.0	30.7	—	40.9	—	33.0	19.7	—	—	18.6
15 000～39 999	17.7	23.3	17.7	—	25.6	—	25.7	8.9	—	—	10.2
40 000及以上	20.8	30.8	13.3	—	18.9	—	12.6	6.1	—	—	7.0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29.9	—	24.2	—	—	14.2	—	—	—	14.8	—
中下层	22.7	—	22.4	—	—	16.1	—	—	—	6.3	—
中层及以上	21.5	—	22.3	—	—	15.9	—	—	—	13.8	—

注：表中数字为表示信任的受访者占比。

一如所料，主观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士对各类政治人物的信任程

度大都较低，这也佐证了在中产阶级中正蔓延的政治疏离感和犬儒心态。

回归后，对于特区局部民主化的政制，民众的接受程度虽稍微下降，但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并没有降低港人对此制度的认同，仍有34.4%的受访者同意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政治和社会人物的代表性

港人不信任政治人物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后者不理解民众的需要和担忧，所以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和利益。大部分受访者（69%）断言，社会阶层相异者的利益互为冲突，只有16.2%否定这一说法，而表示不知道或没有意见的则占14.5%。此外，香港的精英大都被看作自私自利而非乐于助人，调查数据显示，认为精英分子是介乎自私自利与愿意照顾民众之间的虽仍占较大比例（36.3%），但肯定精英是以自己利益为先的却高达32.1%，相信精英愿意照顾民众的只占11.9%。表7-13列出了受访者对一些政治和社会人物可否代表自己意见的看法。

表7-13　对政治和社会人物代表性的看法（单位：%）

	可代表	普通	不可代表	不知道	拒答
行政长官董建华	12.1	14.1	63.6	9.6	0.5
特区政府	15.2	22.3	51.7	10.1	0.7
行政会议	14.4	22.1	44.4	18.4	0.7
立法会	21.8	25.3	38.6	13.6	0.7
民主党	13.4	21.4	46.0	18.5	0.7
自由党	7.8	19.3	49.8	22.3	0.9
民建联	10.6	20.3	46.7	21.7	0.7
传媒	23.7	23.6	38.7	13.3	0.7
学者	25.3	25.5	30.9	17.5	0.7
工商界人士	11.3	19.8	51.0	17.3	0.6
关注公共事务团体	38.6	23.6	22.1	15.2	0.5

总体来说，受访者并不相信香港的精英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在政治人物及团体中，董建华、特区政府和行政会议的代表性都很低，政党的情况更糟，即使是最受欢迎的民主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受拥戴。

社会人物及团体的代表性则较获肯定，但工商界人士除外。事实上，在贫富悬殊不断恶化的环境中，商人是最不受信任的精英。被认为较能代表民众意见的，包括传媒、学者和关注公共事务的团体，他们都承担着权贵监

察者、政策倡导者和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这些社会人物虽无意争夺政治权力，却或多或少地发挥着反对派的功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他们不觊觎政治权力，反而使他们赢取了民众的信任。这些社会人物各有不同背景，又缺乏相同的议题和组织，因此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他们所得到的群众支持和所标榜的反对立场，却削弱了政党的地位和管治精英的权威。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受访者对政治和社会人物代表性的看法也存在分歧（见表7-14）。性别上的差别不大，但年龄上的分野则较为有趣，年轻受访者较倾向于认为董建华和特区政府缺乏代表性，中年人较蔑视行政会议、自由党和民建联的代表性，而年长者则较多认为民主党、工商界人士和关注公共事务的团体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

表7-14　不同社经背景受访者对政治和社会人物代表性的看法（单位：%）

	行政长官	特区政府	行政会议	立法会	民主党	自由党	民建联	传媒	学者	工商界人士	关注公共事务团体
整体	63.6	51.7	44.4	38.6	46.0	49.8	46.7	38.7	30.9	51.0	22.1
性别											
男性	—	—	59.3	—	—	—	—	—	—	—	—
女性	—	—	48.7	—	—	—	—	—	—	—	—
年龄											
18～29岁	75.4	61.1	46.4	—	42.2	53.4	53.0	—	—	48.8	18.4
30～54岁	74.3	59.9	59.1	—	57.2	67.5	63.2	—	—	64.5	26.2
55岁及以上	54.6	48.2	47.2	—	70.6	65.7	55.3	—	—	66.1	35.3

（续表）

	行政长官	特区政府	行政会议	立法会	民主党	自由党	民建联	传媒	学者	工商界人士	关注公共事务团体
学历											
小学	61.0	52.5	49.7	40.9	—	—	56.8	48.2	—	—	34.2
中学	73.9	58.6	55.9	45.9	—	—	58.8	42.9	—	—	22.5
专上	75.0	63.4	57.2	46.9	—	—	67.4	46.3	—	—	27.5
职业											
体力劳动	—	—	52.0	42.3	—	—	53.6	43.3	—	—	33.3
文职/销售/服务	—	—	55.3	46.2	—	—	60.6	48.6	—	—	19.8
管理/专业	—	—	60.3	45.1	—	—	67.8	47.2	—	—	24.9
家庭月收入（港元）											
15 000 以下	61.3	—	51.2	39.9	—	—	54.5	41.5	—	—	27.8
15 000 ~ 39 999	76.6	—	57.6	47.3	—	—	62.1	43.3	—	—	23.0
40 000 及以上	76.2	—	54.4	44.9	—	—	66.7	48.1	—	—	23.6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	—	—	—	—	—	—	37.8	36.2	—	26.5
中下层	—	—	—	—	—	—	—	45.0	46.5	—	27.7
中层及以上	—	—	—	—	—	—	—	48.3	31.7	—	24.7

注：表中数字为表示不可代表民众意见的受访者占比。

一般来说，学历较高者不但较不信任精英，而且较倾向于认为这些人物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对传媒代表性的评价也低于中等学历者。职业的差别与学历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学历较低者和体力劳动者均较不认同关注公共事务团体的代表性。至于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则没有出人意表的结果。

结论

回归后，经济逆转对港人的政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飙升，政治信任和政治权威也不断下降。中产阶级成为今日香港最失落和焦虑的社会阶层。政治犬儒心态和疏离感的上扬，明显不只是社会经济情况恶化的结果，同时反映了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不满。

然而，港人虽有诸多愤怨和不满，却没想过要依靠自己来解决问题，他们

依然指望管治精英的引领。极度的政治无力感已令港人难以鼓起勇气来改变现状，这方面的政治瘫痪无疑昭然若揭，但要将之克服又谈何容易。

章末注

1.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这个样本原有2000个住址，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实际数目减少至1609个；访问员成功完成822个访问，回应率为51.1%。

在介绍调查结果时，除罗列主要变项的频数分布外，也会分析这些变项与性别、年龄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项的关系。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4个指标来度量，分别是学历、职业、家庭月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本文利用卡方检定（chi-square test）来判断变项之间的关系，显著水平低于0.05者，被视为存在显著的差异。为简化数据，文中表格省去未达统计显著水平的数据。

2.Richard F.Hamilton and James D.Wright，*The State of the Masses*（New York：Aldine Publishing Co.，1986）；Vladimir Shlapentokh，*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the Soviet People*：*Changing Values in Post-Stalin Rus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Lau Siu-kai，“The Fraying of the Socio-economic Fabric of Hong Kong，”*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p.426-441.

4.Lau Siu-kai，“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Leaders and Political Disengagement，”in Lau Siu-kai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1995*（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7），pp.107-136.

5.Lau Siu-kai，“The Making of the Electoral System，”in Kuan Hsin-chi et al.（eds.），*Power Transfer and Electoral Politics*：*The First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35.

6.Lau Siu-kai，“Democratization and Decline of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Democratization*，Vol.3，No.2（1996），pp.158-180.

7.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artial Democratization，'Foundation Moment'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The China Quarterly*，Vol.163（2000），pp.705-720；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Hong Kong's Stunted Political Party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Vol.172（2002），pp.1010-1028.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Socio-economic Discontent and Political Attitudes，"in Lau Siu-kai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2001（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3），pp.29-75.中文版曾以"香港人的社经不满情绪与政治态度"为题，刊于刘兆佳，王家英，尹宝珊.香港社会政治的延续与变迁［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117-154.

第三部分　信任与参与

第8章　青少年对权威的看法注

与西方同侪相比，香港的青少年看起来死气沉沉、消极被动。与中国内地同龄人相比，香港青少年的不积极、不主动就更加突出了，香港青少年群体并没有被当作社会和政治力量，从而令社会将其严肃对待。他们不仅很少参与有明确社会和政治目的及有组织的活动，也与各式主观诉求（例如，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超验的、理想主义的）绝缘。在人们眼中，他们注重物质享受、关心家庭、只顾及个人的成就（学习或考试优秀）。

粗略地考察香港的社会政治背景，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很可能导致香港青少年反复无常、备受挫折、毫无方向感且易于产生激进精神诉求的一系列因素。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青少年在社会和政治上几近驯服和冷漠的姿态，更令人感到迷惑。第一，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以“咨询”面目出现，实际上否定了华人真正参与决策。第二，在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的卓越表现已在华人社会和文化制度上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关系，而这势必将松动华人青少年习惯于服从的权威结构。第三，经济增长孕育了新物质主义，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香港惊人的收入不平等，两者共同导致低下阶层挥之不去的感受，即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尽管低层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富人炫耀性及自我放纵式的消费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第四，香港金字塔式的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只提供到初中，港人享有更高等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在有志向学的青少年中，求学的竞争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导致青少年中普遍弥漫着失落感以及不安全感。第五，西化及其对华人传统价值观造成的弱化，令青少年群体出现一定程度的规范失序，他们对个性和自我表达的愿望越来越明确。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自我认同表现在经济和消费行为领域，也为青少年集体的、非物质性的、富于个性表达的行为做好铺垫。第六，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福利、住房、公共服务，希望借此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但由于与民众交流渠道的政治制度很不健全，人们对此也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针对政府和公营机构的小规模抗议和请愿运动逐渐增多，这些行动被大众传媒过度渲染，也为培育青少年的不满提供了肥沃土壤。

有如此多的便利条件，也没能塑造出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香港青少年群体，实在值得关注。针对香港青少年如何认识权威开展全面调查，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近期部分关于华人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也开始重视个人和权威主体（特别是父亲和政府）的关系。[1]我们的研究是要延续这个思路，尝试在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华人社会里，描绘出华人青少年认识到的“权威环境”。[2]

对权威的观感

为了解青少年对权威的看法，我们询问了一系列问题，涉及他们和不同类型权威主体的多方关系。第一类权威主体是殖民统治者，处于核心位置（即政治权力等级巅峰）的是港督和港英政府。港督是与众不同的，这表现在他除了是最高级别的管理者，还被视为（或至少看起来如此）仁慈的父亲、魅力型领袖、“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尽管这种“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明确），此外，他也是殖民政府官僚系统的人性化化身。第二类权威主体是辅助管治的准政治工具，包括最高层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港督委任，只具咨询职能）以及其下属的市政局和18个区议会（半数成员由近年引入、近乎普及但投票率偏低的选举产生；市政局具有行政职能，但限于区域范围的环境卫生、文化活动和市政服务；区议会只具有针对地区事务的咨询职能，因新近成立，至今还未赢得选民的广泛认可）。第三类权威主体由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名流组成，包括社区领袖、专家学者、商界领袖、宗教领袖和富人。第四类权威主体是亲朋密友，包括父母、老师、朋友。在严格意义上，青少年与朋友并不构成真正的权威关系，把朋友纳入是为了给“权威环境”提供一个更平衡的情境。第五类权威主体是多类混合的权威主体，包括大众传媒、工会和压力团体，它们是批评社会、政治和行政事务的主力，但多数仅设定温和的社会和政制改革目标。由于传媒和工会在整体上是四分五裂的，因而减损了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压力团体近期才有出位表现，大都是针对单一议题的短期及小规模组织，存在时间不长，靠抗议和请愿风格吸引公众注意。

青少年受访者很可能被虚假、扭曲、不完全的信息所误导，因为大多数权威主体与受访者之间相距遥远、没有直接的接触，都很抽象，所以这里所谓的看法，其实是受访者对权威主体的想象。香港基本上是非政治化城市，学生很少接触政治符号和政治教育。如表8-1所示，大部分受访者回答“不知道”，反映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无知。在大多数学校，公民教育、公共事务、公民训练等课程无一例外地不受重视。在我们了解青少年对权威的观感时，必须重视政治教育不足的背景。

表8-1　对权威主体理解青少年需求的观感（单位：%）

	理解	稍微理解	不理解	不知道	拒答
港督	6.1	30.2	41.1	18.2	4.4
政府	8.2	38.5	33.2	16.5	3.6
行政、立法两局议员	6.5	29.0	29.1	29.9	5.5
市政局议员	11.0	34.9	23.8	25.2	5.1
区议员	14.8	34.6	22.7	22.0	5.9
社区领袖	5.6	25.3	28.6	32.9	7.6
专家学者	8.0	28.9	25.2	28.6	9.3
商界领袖	1.2	12.1	37.6	37.5	11.6
宗教领袖	5.6	22.4	27.7	32.6	11.8
富人	0.7	6.2	56.7	26.7	9.7
父亲	46.7	36.6	11.0	3.1	2.6
母亲	53.1	34.3	9.1	2.0	1.5
老师	20.9	51.0	20.0	6.3	1.8
朋友	28.6	50.8	10.5	7.4	2.7
大众传媒	18.5	37.8	19.3	18.0	6.3
工会	2.6	15.9	33.9	35.2	12.5
压力团体	4.7	14.3	30.6	35.9	14.5

第一方面是权威主体对青少年需求的理解。受访者首先被问及，在他们看来，权威主体对青少年需求的理解程度有多深。因为在华人社会，权威和父权主义通常联结在一起，我设计这个问题，就是要挖掘权威关系的最基本维度，即权威主体宽厚的一面。表8-1的数据无可置疑地突出了亲朋密友（父母、老师、朋友）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出乎意料的是，非人化的大众传媒紧随其后，被青少年视为能够理解自己需求的权威主体。在政治、政府及其辅助机构中，与民众较接近的市政局议员和区议员比级别更高的机构和议员做得更好。也许最令人意外的发现是，尽管香港是殖民政权管治的社会，社会领袖、经济领袖和宗教领袖却被视为最不能理解青少年需求的权威主体，在谈及商界领袖、工会和富人时，尤其如此。总体上，表8-1展现了一种混杂的状态，里面包括家庭主义、政治疏离、社会冷漠、宗教疏离、反感商业和工会。我们会发现，当进一步深入挖掘数据时，这些特征会重复出现。

第二方面是关心青少年福祉和乐于为其服务。受访者继而被问及，在他们看来，权威主体是否关心青少年的福祉并乐于为他们提供服务。在此问题上，亲朋密友并未包括在内。表8-2展示出的最特别现象是大众传媒在受访者的心目中有更高地位。政府及其辅助机构也没有落后很多，表明它们

在受访者心目中有一定的认受性。社会领袖（例如，社区领袖、工会、宗教领袖和压力团体）极大地落在后面。最不被受访者认可的，再一次集中在社会最富裕的阶层，即富人、商界领袖和主要由富人领导的华人志愿团体。表8-1描绘的青少年心态在表8-2里重现。

表8-2　对权威主体关心和乐于服务青少年的观感（单位：%）

	是	有些	否	不知道	拒答
港督	17.3	32.6	18.6	25.0	6.5
政府	21.4	45.3	14.6	15.4	3.3
行政、立法两局议员	12.3	29.9	14.8	35.6	7.5
市政局议员	25.6	36.5	10.6	21.5	5.8
区议员	25.8	36.9	12.8	19.7	4.8
社区领袖	13.0	22.8	20.8	34.3	9.1
专家学者	13.7	24.2	22.8	30.4	8.9
商界领袖	4.8	17.2	38.4	30.3	9.3
宗教领袖	14.1	23.5	24.5	27.2	10.6
富人	2.4	9.5	63.6	17.0	7.6
华人志愿团体	9.6	21.6	22.0	37.4	9.5
大众传媒	30.3	30.4	15.5	17.8	6.1
工会	10.5	21.0	26.2	31.6	10.7
压力团体	10.9	13.6	27.4	33.4	14.6

第三方面是信任。香港青少年对权威主体的信任有多少？这是我们向受访者问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表8-3可以看出，前面的特征在这里重现。亲朋密友（父母、老师和朋友）再次受到高度信任，父母居首位；大众传媒紧随其后；接下来是落后不太远的政府及其辅助机构。应该注意的是，位居高层的行政、立法两局委任议员，排位反不如通过非全面普选产生的市政局议员和区议员，这反映了两局议员与青年人疏远，无法代表他们。但是政治和行政机构在整体上还是比社会和宗教机构更受青少年信任。社区领袖、专家学者以及较激进的压力团体，都没能赢得可观的信任度。富人、商界领袖和工会最不被青少年信任，再次证明他们在青少年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糟糕。

表8-3　对权威主体的信任（单位：%）

	信任	有些信任	不信任	不知道	拒答
港督	19.9	54.5	11.9	9.8	4.0
政府	19.0	54.2	14.1	9.1	3.5
行政、立法两局议员	9.8	44.5	11.9	27.4	6.5
市政局议员	15.4	48.2	10.0	20.7	5.7
区议员	15.3	45.8	14.1	19.2	5.7
社区领袖	6.3	35.3	18.6	31.9	7.8
专家学者	13.0	37.1	16.3	26.2	7.4
商界领袖	1.9	19.9	30.3	38.6	9.3
宗教领袖	10.2	29.6	21.2	28.5	10.5
富人	0.8	11.6	57.2	21.4	9.0
父亲	73.1	20.0	2.8	1.9	2.3
母亲	76.2	18.7	2.8	1.0	1.4
老师	44.1	44.6	6.6	3.1	1.5
朋友	35.0	52.7	5.3	5.0	2.1
大众传媒	22.0	44.8	13.6	14.7	4.9
工会	4.4	22.2	25.4	37.1	10.8
压力团体	5.8	19.3	28.4	32.5	14.0

第四方面是权力。关于青少年如何看待权威主体的决策权力，表8-4显示，总体回应相当符合现实，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准确地指出社会的掌权者，虽然他们认为富人获得的权力其实比实际享有的权利要少。自然地，青少年希望较弱势的群体，特别是普通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力。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受访者对商界领袖和富人各自享有权力的评价存在分歧，这两个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其实相当重叠，显示了“富人”此称谓的负面含义。

表8-4　对权威主体的权力评估（单位：%）

	过小	恰好	过大	不知道	拒答
港督	10.4	36.0	32.9	17.3	3.4
政府官员	11.9	34.9	25.7	23.8	3.7
行政、立法两局议员	16.1	36.9	13.8	28.9	4.3
市政局议员	28.3	35.2	6.8	25.9	3.8
区议员	45.9	23.9	5.7	20.0	4.4
社区领袖	18.7	16.1	12.7	45.0	7.5
专家学者	27.9	16.6	5.5	42.1	7.9
商界领袖	14.4	19.2	11.3	46.0	9.1
宗教领袖	20.3	19.2	10.2	40.1	10.1
富人	8.6	8.1	38.5	32.8	12.0
大众传媒	24.8	30.4	10.7	26.9	7.3
工会领袖	21.1	15.4	8.6	44.6	10.3
压力团体	22.9	10.6	9.8	44.3	12.4
香港市民	71.0	11.2	4.7	9.1	4.1

第五方面是整体形象。虽然流行的看法认为华人社会正在解体，但我们的数据显示，青少年仍重视家庭及与其他密友的关系。父母和老师比其他权威主体更受年轻人尊重。

在青少年眼中，除家庭与其他密友之外，香港明显缺乏宽厚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港督本应扮演有关角色，但根本做不到，令人失望。一些权威主体因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与青少年接近（例如，社区领袖、地方从政人士），本应受到青少年的尊重并赢得信任，但是也做不到这一点。[3] 实际上，所有非首属关系的权威主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只有非人化的大众传媒能够稍微减缓华人青少年与非首属关系权威主体的疏远。富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眼中钉，这种蔑视似乎反映出青少年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与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人士相比，政治和政府人士获得更多的青少年支持，说明青少年对公营部门还有适度的满意，对经济、社会和宗教精英则表现出很深的犬儒心态。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受访者对经济和社会权威结构的认识并不相互冲突。受访者倾向于不重视权威组织内部潜在的分裂，对他们而言，重大的社会分化在于首属关系和非首属关系之间，以及尚算模糊的贫富对立。这种倾向的一个生动证据是，他们对商界领袖的信任和对工会的信任有着高度的相关性（gamma＝0.80），表明青少年对权威的观感存在基本共识。总之，家庭是青少年身份认同和信任的载体，虽然并无特别，但他们对家庭与其他非首属关系权威主体在认同和信任上的悬殊却是相当独特的现象，即如果在华人青少年心目中有任何可信

任的和值得支持的权威主体，最主要的一定是父母，接下来是其他亲朋密友。

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目标

为了在更宽广的背景中考察青少年对权威的看法，我们需要探讨青少年如何看待一系列涵盖物质和理想生活目标的重要性。

从表8-5可以看出，青少年最重视的目标多与个人福祉紧密相关，这清晰显示出他们的个人化取向。这些目标包括：与他人和谐相处、密友、家庭、事业、爱情和婚姻、人生理想、个人自由、乐于助人。处于次要位置的目标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可归类为物质目标和理想目标，包括：财富、乐于服务社会、子女、收窄贫富差距、学习和考试、社会改革、民主政府、爱国主义，这里的一些非物质目标将香港青少年和成年人区分开来，成年人更追求物质目标。[4]这次研究的青少年在和平和经济腾飞的环境中成长，本应更能超越基本物质需求，追求更高形式的表达和满足感。但是，因为香港经济起飞的时间不长，过去的苦难回忆仍然历历在目，青少年价值体系中的理想主义元素还未占据重要地位。现在还不清楚的是，物质目标和理想目标是如何被整合进青少年的价值规范结构的，它们又是如何影响青少年对权威的看法的。这个问题下文会进一步阐释。

表8-5　对生活目标的重要性评价（单位：%）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很不重要	不知道	拒答
与他人和谐相处	41.7	47.8	8.9	0.8	0.3	0.4	0.2
密友	60.4	32.7	5.5	0.6	0.1	0.6	0.1
家庭	59.7	30.6	7.8	0.9	0.3	0.5	0.4
事业	47.6	37.6	11.6	1.4	0.3	0.6	0.9
爱情和婚姻	29.4	33.9	22.3	4.8	1.6	5.6	2.3
人生理想	53.8	30.5	10.9	1.4	0.2	2.3	0.9
个人自由	55.5	34.1	8.3	0.9	0.3	0.4	0.7
乐于助人	20.2	48.8	27.2	1.5	0.5	0.7	1.1
财富	17.9	34.6	41.3	4.1	1.1	0.4	0.5
乐于服务社会	11.3	40.3	40.9	2.8	0.8	2.9	1.1
子女	22.2	35.6	25.7	5.4	1.8	6.5	2.9
收窄贫富差距	30.1	30.7	21.0	6.5	1.1	7.1	3.6
学习和考试	22.0	36.1	32.1	4.4	2.9	1.4	1.1
社会改革	18.4	31.3	29.0	7.8	1.5	8.7	3.3
民主政府	26.0	32.0	19.5	6.8	1.8	9.6	4.3
爱国主义	22.7	32.2	30.6	4.8	1.2	5.1	3.2
政治权利	7.0	10.0	35.9	33.0	6.4	6.1	1.6
社会地位	8.5	17.9	36.9	27.9	4.1	2.9	1.8
组织参与	8.3	23.4	51.5	11.1	1.3	2.9	1.5
移民	6.3	9.3	33.9	32.0	7.9	7.8	2.7
政治理想	4.6	10.5	34.8	32.7	8.2	6.8	2.4
宗教信仰	8.8	11.8	33.9	26.9	7.6	7.5	3.6
华人治港	14.7	16.7	25.1	13.7	10.4	13.7	5.8
崇拜偶像	5.7	7.9	26.1	35.8	18.1	3.6	2.9

青少年心目中最不关注的目标均与社会和政治参与有关，例如，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组织参与、移民、政治理想、宗教信仰、华人治港、崇拜偶像。青少年不关注这些目标，与他们跟生活中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普遍疏远大体是一致的。

对华人青少年生活中重要目标的分析，给我们描绘了这一群体的形象：注重个人、不激进、实用主义、保守、远离政治、不参与、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又有模糊的适度理想主义。带有这种价值规范和行为导向的青少年自然会重视并支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权威主体。他们厌恶富人可能是源于温和的理想主义，他们谴责香港惊人的贫富悬殊，更难忍受相对剥夺感。然而，到目前为止，理想主义的潜流对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可谓无甚影响。

影响青少年权威观的因素

世界各地影响青少年对权威看法的众多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在香港似乎都不起作用，这可能清楚说明了华人青少年观点的同质性。青少年对权威的看法，与其社会经济背景，包括性别、宗教、父亲的职业、父亲和母亲的学历、家庭收入、对学校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在学校班级中的排名等，基本上没有显著相关性。以下因素具有较大的区分效力，但变项之间的联系普遍偏弱。

第一、年龄。相对来说，在解释青少年对权威看法的差异方面，年龄是个重要因素。其重要性在于显示青少年时期属于人生的过渡期，这个阶段青少年的社会化经验在不断改变。虽然年龄的影响远非强烈和包罗万象，但仍与大量变项有显著的关系。一般来说，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长，他们对权威主体的尊重程度会降低。然而，压力团体是个例外，随着青少年长大，他们会更支持压力团体。

第二、父母。大部分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良好，我们可据此推断，他们能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与香港华人家庭仍然残存的家长制一样，37%的青少年认为父亲的地位比自己高；33%视父亲为领导。同样地，35%的青少年认为母亲的地位比自己高，30%视母亲为领导。父母的这种形象肯定会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而改变，越年长的青少年，越倾向于视父母为朋友、远亲，甚至是同住的室友。然而，维护父母权威并不会损害亲密的亲子关系，反而似有帮助。依赖父母的权威，使华人青少年在资本主义和原子化的香港社会中得到最需要的心理和社会安全感。

香港的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各司其职，来往不多，形成了官僚政府与华人社会低度整合的局面。[5]在这种环境下，华人家庭在维系社会与政治稳定上起到关键作用。在这个充斥着商业竞争和社会流动的社会里，家庭是个人寄托情感的主要（在很多人看来是唯一）场所，是满足感情乃至物质需要的归宿。作为主要的社会化机构，华人家庭也会向年轻人灌输价值观，引导他们相信并支持家庭以外的组织和机构。因此，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越亲密，他们就越倾向于信任老师、商界领袖、工会和富人。这些相关性不会受父亲的职业影响，佐证了亲密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权威观的影响。

第三、生活目标。前文提及青少年对权威的看法与其生活目标之间的模糊关系，这里可进一步阐述。显然，这方面的调查结果时有矛盾，也很难看到高度一致的关系模式。但是，仍有几个发现值得关注。

一，重视服务社会的青少年似较满意现状，不准备寻求激进的社会变革。一般来讲，青少年有服务社会的热情都会满足于现状，如有需要，也会依赖建制来改善社会环境。

二，我们常会预计，在殖民社会成长的青少年倘若重视政治权利，那么在

意识形态上也会比较激进。但事实恰恰相反，根据调查所得，认为政治权利重要的青少年较倾向于认为富人理解他们的需要，也较信任富人和商界领袖。换言之，追求政治权利的青少年，更多志在体制内达成这个目标，不是既有体制的威胁者。

三，青少年是否重视社会改革并不会影响他们对权威的看法。这个发现似乎指出，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改变现存权威结构并不是改革社会的重要议题。

总而言之，最明显的现象也许是，华人青少年对本土社会（尤其是政治制度）普遍满意。即使贫富差距令人憎恨，但热切渴望社会改革和政制改革的人为数甚少。

结论

在很多方面，香港的华人青少年与其他社会（特别是发展水平相若社会）的青少年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包括对家庭的依附、不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对家庭外的权威主体漠然以及学校的社会化功能不明显等，虽然我们有理由说香港的情况相对明显，但这些现象或多或少可见于世界各地。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香港青少年的观感非常独特，反映了他们成长的特定结构背景，以及华人传统文化挥之不去的影响。

香港华人青少年最与众不同的表现也许是他们的持续沉寂和不善变。在其他社会，例如，美国、[6]尼日利亚、[7]波兰，[8]在过去几十年间，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华人青少年的心态和行为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这些变化充其量只是渐进和细微的。香港战后的政治稳定因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而得到巩固，令香港的制度结构几乎坚不可摧。另外，社会也普遍认识到，因绝无可能政治独立，如果拒绝殖民统治，另一条道路就是实行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政治激进主义和极端的意识形态普遍得不到年轻人的严肃对待。

虽然在青少年心目中，父母权威和家庭外权威之间的连接突然断裂，但作为社会化的机制，香港的华人家庭仍能对这些权威主体提供适度的支持。香港社会的本质，加上自由经济制度和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令殖民政权在青少年眼中的地位还不如社会经济特权阶层般显著。政治机构的作用不突出导致青少年较倾向于从社会和经济视角理解社会问题和个人的不幸。简言之，政治不稳定在其他社会是改变青少年心态的催化剂，但在香港则未必。

华人青少年对富人的厌恶并无特别之处。施塔特（Statt）研究了15个国家中58名成年人和1738名14～25岁的年轻人，[9]发现发展中国家年轻人提出

的主要问题是，一小撮富豪精英与贫苦大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香港青少年与其他地区同侪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理想主义不强和不积极坐言起行。虽然其他地方的青少年也会重视个人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重视的是，通过服务更广泛的社会理想获得自我实现，把自我发展与服务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终极目标结合在一起”。[10]当然，华人青少年并不缺乏严肃的个人、社会或政治理想，但我们从调查得知，这些理想虽是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一部分，但仅处于次要位置，并且他们甚少把理想转化为行动。

经济发展中的滴漏效应令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这应是减轻贫富悬殊不稳定效应的一个因素。富人和殖民政权从制度上分割开，以及后者实用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立场，也有助于阻止年轻人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立场。[11]

在香港，宗教和宗教领袖对青少年的影响微不足道，宗教领袖的权威地位在青少年心目中也明显偏低，这种情况相当特别。宗教在欧洲的影响根深蒂固，[12]在美国近期有所复兴，[13]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本土宗教在冒起，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香港。过去10多年，香港年轻人的宗教虔诚度不但没有提升，[14]反而可能下降了。我们的研究发现，香港年轻一代非常世俗化，受访青少年中，逾半（56%）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年龄越长，比例越高。华人青少年通常对宗教采取一种容忍但远离甚至工具主义的态度。有研究发现，香港青少年大多同意宗教会带来正面的价值，例如，促进人们相亲相爱、构建社会秩序、信仰上帝、有人生目标等，[15]但是受访者不愿意认同宗教是一种普世需要，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更多是因为他行得端、坐得正，而非有宗教信仰……大多数受访者更看重一个人遵从自己的良心，而非拥有宗教信仰……大量受访者亦认为，一个人能否找到生命中的真正幸福，是否信仰宗教并不是必要的，他们也不认同历史上存在着上帝这种说法。[16]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神职人员地位低下，是因为宗教的规范角色和制度角色有限。中国宗教具有分散和多神崇拜的特征，这与其不能作为一种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并受制于国家有关。杨庆堃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这位杰出的学者说：

宗教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以一种高度去中心化的模式出现。作为一个组织主体，现代制度性宗教的出家人数量有限，有的寺庙拥有2～3个出家人，多半彼此没有关系。因为人数少且几乎没有足够的资源维持生计，很容易失去有组织的信众的支持。在社会功能的发挥方面，宗教也有诸多的限制，不参与诸如慈善、教育和推行道德规训等社区活动，缺乏有号召力的核心僧人来主导宗教生活，或是直接掌管世俗社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佛教、道教寺庙宫观都是一个独立的宗教组织单元，各有各的神

明与神学主旨，尽管有的寺庙的名称相同并供奉同样的主神。结果，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宗教系统来主导出家人与民众的生活。也就是说，制度性宗教可以摆脱等级系统的控制。[17]

从另一个角度看，家庭和其他主要社会网络的民众相互依赖，令华人无需太努力就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感到满意，即使无法以个人的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18]因此，对华人而言，宗教能够提供情感需要的作用也就削弱了。

杨庆堃和许烺光指出，有诸多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华人的宗教热情有限，而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在当代香港也起作用。青少年给予佛教领袖可叹的低下地位就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情况稍佳，因为制度化的宗教倾向于介入社会事务，青少年因此对其领袖有较正面的评价。尽管如此，在一个自由信仰、各教共存的环境中，只是这两个宗教，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华人青少年对宗教的观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华人青少年对大众传媒的尊重相对较高。从结构的视角看，在殖民政权下，缺乏中介层的华人领袖，以及他们的软弱无力，都有助于传媒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渠道而存在，它可以传递信息、施加影响。香港传媒的作用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缺乏官方的言论审查。因此，香港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竞争激烈的传媒系统，香港传媒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多样性和（毫不夸张地说）庸俗商业主义。除了电子传媒（电视和广播），“香港新闻事业蓬勃，享有言论自由，目前有报纸72种，期刊413种，读者众多。报纸的印刷发行量约为每千人300份，世界的平均数字是每千人102份。每日在香港印刷发行的英文报纸有6家，中文报纸则有55家”。[19]

香港青少年多追捧大众传媒。一项10多年前针对1204名年轻人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65.3%每天都读报纸，63.9%每天读报超过16分钟，平均每周听广播7.5小时，看电视9小时。[20]现在，这些比例应该更高。但是，接触和使用传媒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传媒受到尊重。由于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尝试提出一种解释，即这与传媒的内容有关。作为信息和娱乐的来源，传媒的内容虽多元，但切合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因为殖民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高度不透明，传媒描绘的公共事件则以一种断裂、耸人听闻，甚至不可理喻的方式出现，自然会给青少年带来一种挫败感和无力感。过去10多年间，由于缺乏信息，传媒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趋于批判，但有时会忽略公共议题的来龙去脉，提出简单化和即兴式的“解决方案”，制造过度的急迫感。传媒的批判倾向及设立议程的倾向，虽对公共决策影响不大，但在年轻人脑海里形成了共鸣。对年轻人来说，传媒因此带有一种积极回应诉求、勇于改革、有良心的形象。

更重要的解释可能是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香港生活水平的提升，为传媒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传媒的商业嗅觉和行业内你死我活的竞争，令它们极度重视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喜好。过去几年，年轻人的购买力不断增加，是被传媒争相追逐的原因。根据一项粗略分析，电视和广播节目宣扬的主流价值观，包括宿命论、消费主义、个人主义、非道德论等，与客户的行为规范大致相同。[21]因此，可能的解释是，对青少年而言，传媒不仅理解他们，而且还为他们提供自我表达和情感释放的渠道。

最后，宗教领袖的权威地位低下和大众传媒受到高度推崇，启发我们理解为什么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看法和对其他社会政治权威主体的看法相差如此之远。宗教的软弱无力，令它不能给予其他世俗权威宗教的正当性，因而不能协调家庭权威和非家庭权威的关系，或是为二者的沟通架起一座桥梁。相反，哗众取宠的传媒不但蔑视了各方非家庭组织，还侵蚀了它们的地位和可信度。

从青少年对大众传媒十分信任这一点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传媒及其宣扬的价值观迟早会削弱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华人家庭伦理，以及这种伦理观所支撑的父母权威。

章末注

1.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MIT Press，1968）；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2.调查的总体是香港的华人青少年。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10～24岁的香港居民有1587691人，占总人口的31.8%。鉴于香港的小学和初中已经实施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也相当普遍，我们选择在学校抽选调查样本。首先是在香港所有中学（总数430）中随机抽选40所，其中38所愿意参与；其次是在每所学校随机抽选两个班。调查有两份自填问卷，调查员向共76个班的所有学生随机分发问卷一或问卷二。调查于1982年12月～1983年1月进行。问卷一和问卷二各成功完成1464个和1403个访问。本文采用的是问卷二的数据。

问卷二样本包括717名男性和680名女性（6名没有回答性别）；年龄介于10～22岁（79名没有回答年龄），其中11.1%是10～12岁，51.1%是13～15岁，33%是16～18岁，4.8%是19～22岁。逾半受访者来自低下阶层或中低下阶层家庭。多数受访者的父母仅有初中及以下学历。大多数受访者的父亲从事低阶非体力劳动。受访者的社会经济背景与香港社会的金字塔式阶级结构基本相仿。

3.Fred I.Greenstein，“The Benevolent Leader：Children‘s Imag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4（1960），pp.934-943；Robert D.Hess，“The Socializ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y：Som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15（1963），pp.542-559；William R.Schonfeld，*Obedience and Revolt*：*French Behavior toward Authority*（Beverly Hills：Sage，1976）；Joseph A.Massey，*Youth and Politics in Japan*（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76）.

4.Lau Siu-kai，“Chinese Familism in an Urban-industrial Setting：The Case of Hong Kong，”*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Vol.43（1981），pp.977-992；Lau Siu-kai，*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

5.Lau，*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6.Eva F.Travers，“Ideolog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Changes from1970to1979，”*Youth and Society*，Vol.13（1982），pp.327-349；Theodore C.Wagenaar，“High School Seniors’Views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Schools：A Trend Analysis，”*Phi Delta Kappan*，Vol.63（1981），pp.29-32；Ruth S.Jones，“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American Youth1969-1975，”*Youth and Society*，Vol.10（1979），pp.335-359.

7.Tunde Adeniran，“Youth Culture in Transition：Nigerian Youths in the1970s，”*Youth and Society*，Vol.6（1975），pp.481-494.

8.Aleksander Gella，“Student Youth in Poland：Four Generations1945-1970，”*Youth and Society*，Vol.6（1975），pp.309-343.

9.David Statt，“A Cross-national Survey on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Youth，”*Youth and Society*，Vol.5（1973），pp.131-183.

10.Statt，“A Cross-national Survey on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Youth，”p.149.

11.Adeniran，“Youth Culture in Transition，”p.492.

12.David Martin，“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Europe，”in Salvador

Giner and Margaret S.Archer（eds.），*Contemporary Europe：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Pattern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13.George E.Dickinson，“Changing Religious Behavior of Adolescents1964-1979，”*Youth and Society*，Vol.13（1982），pp.283-288；Charles Y.Glock and Robert N.Bellah（eds.），*The New Religious Consciousnes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hilip K.Hastings and Dean R.Hoge，“Religious Tren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1948-1979，”*Social Forces*，Vol.60（1981），pp.517-531.

14.Lee Wing-yee，*A Religious Attitude Study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Hong Kong：L.W.F.Broadcasting Service，1969）.

15.Lee，*A Religious Attitude Study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p.30.

16.Lee Wing-yee，*Youth and the Media*（Hong Kong：L.W.F.Broadcasting Service，1969），p.30.

17.C.K.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pp.339-340.翻译取自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06.

18.Francis L.K.Hsu，*Americans and Chinese*（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1），p.238.

19.政府新闻处.香港一九八三年[M].香港：政府新闻处，1983：154.

20.Lee，*Youth and the Media*.

21.香港大学学生会社会科学学会.八十年代的香港青少年[M].香港：香港大学学生会社会科学学会，1982.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Perception of Authority by Chinese Adolescents：The Case of Hong Kong，”Youth and Society, Vol.15，No.3（1984），pp.259-284.

第9章　关注的旁观者㊟

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香港华人极少参与政治活动。这一情况与香港在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就形成强烈对比。有关现象表明，经济现代化并不一定会提升政治参与度。

即使与中国台湾及内地相比（它们的现代化程度都不及香港），港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仍然偏低。与台湾相比，香港明显缺少有政治影响力、具有民众基础的反对派。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不存在由当权者动员的民众政治参与。相对于上述两地，香港的殖民地环境不利于大规模的民众性政治参与。

但是，在过去10年，香港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影响了港人的政治参与。这些转变主要包括：一，英国对香港的管治行将结束，中国则将于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二，港人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动力。三，香港的局部民主化，特别是在立法局、两个市政局和区议会中引入选举成分。四，港英政府越来越介入社会和经济事务，以及港人日益依赖政府提供福利及处理社会问题。五，对于非正规政治参与行动，港英政府采取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基于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本章的主旨在于了解港人的政治参与度及形态，并且探索影响其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随后我们会讨论香港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本章引用的数据来自我们在1993年进行的全港性随机抽样问卷调查。[1]

政治参与度

尽管港人对政治参与的需要和机会都有所增加，但参与度依然偏低。我们有理由认为，就实际政治参与而言，香港的参与度在过去10年并没显著增加。[2]事实上，用以衡量港人政治参与度的指标，大致上显示出以下情况：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相比，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政治活动，港人的参与度都较低。[3]即使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参与度最低的日本人，港人的参与也较少。[4]

我们先从投票行为开始探讨。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直选，并逐步用于产生部分区议会、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及立法局议员。虽然这些机构都不具备真正的决策权力，但在这些机构中引入普选机制仍具有巨大且深远的象征意义。然而，在1982～1991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却不踊跃。在1982年、1985年、1988年、1991年及1994年的区议会选举

中，以登记选民人数为基数的投票率依次为38.9%、37.5%、30.3%、32.5%及33.1%；若以符合资格选民人数为基数计算，投票率更大幅度下降为12.3%、16.4%、12.5%、11.5%及17.5%。

港人对两个市政局选举的参与也不积极。在1983年、1986年、1989年及1991年的两个市政局选举中，以登记选民人数为基数的投票率依次为22.4%、26.9%、17.6%及23.1%；若以符合资格选民为基础计算，投票率则下降为6.1%、12.1%、5.9%及10.7%。

香港立法局在1991年进行了历史上首次直选，以产生1/3的立法局议员。尽管如此，选举结果依然令人失望，虽然被广泛宣传和报道，却只有39.1%的登记选民投票，只占符合资格选民人数的20.3%。

以投票率而论，港人可以说是世界上较不踊跃的投票者。[5]我们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选举缺乏兴趣。从那些没有登记为选民的受访者口中我们得知，他们没有登记的主要原因是对选举没有兴趣，认为谁当选分别不大。另一个理由是没时间。对于那些已登记但没有投票的受访者，不投票的主要原因包括对候选人不了解、没有时间和没有兴趣。总而言之，香港各种选举的低投票率，充分反映了港人对选举缺乏兴趣。

民众对选举不感兴趣，也表现在甚少参与各类竞选活动上。根据我们的调查，在1991年的立法局选举中，94.5%的受访者表示从没参加过与选举有关的会议或介绍候选人的集会；95.2%从没动员其他人参加有关集会；91.7%从没游说其他人投票给某候选人或政党；94.4%则从没游说其他人不投票给某候选人或政党。此外，大多数人对立法局选举漠不关心，94.4%的受访者表示从没对选举过程表示不满，也没提出批评或改善建议。

除投票和竞选活动外，港人也甚少参与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就非正规的政治参与而言，虽然这类活动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并往往在传媒中成为头条新闻，[6]但在港人的政治生活中，这类活动只占很小一部分。表9-1罗列了港人在一系列正规与非正规政治活动中参与的情况。

表9-1　政治参与（单位：%）

	从未做过	偶尔为之	有时	经常	拒答
直接向有关官员或政府部门反映意见	92.0	5.0	2.7	0.2	0.0
找自己在政府部门认识的人出面交涉	96.9	1.7	1.3	0.1	0.0
请对官员有影响力的人出面帮忙	96.7	2.2	0.9	0.0	0.1
向有关官员的上司反映意见	95.9	2.9	0.9	0.2	0.1
通过政治团体反映意见	95.3	3.0	1.3	0.3	0.0
通过民选议员反映意见	92.8	4.1	2.6	0.4	0.0
通过委任议员反映意见	98.2	1.5	0.3	0.0	0.0
写信给政府部门	93.7	4.4	1.7	0.2	0.0
写信给报纸	95.6	3.3	1.1	0.0	0.0
向政府的投诉机关投诉	91.5	5.8	2.5	0.1	0.1
找有关官员的朋友，希望那位官员因为人情关系而帮忙	98.5	1.0	0.3	0.1	0.0
联合其他人表达意见或提出要求	92.5	5.0	2.0	0.4	0.0
去法庭告状	98.4	1.5	0.1	0.0	0.0
示威、游行、静坐	89.7	8.1	2.0	0.1	0.1
向负责人送礼或请客	99.4	0.6	0.0	0.0	0.0
找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出面	99.7	0.3	0.0	0.0	0.0
向港督请愿	99.2	0.7	0.1	0.0	0.0
其他	98.2	1.5	0.1	0.2	0.0

注：问题是“在过去3年内，你有没有试过用下面的方法就一些你关心的事情表达意见或提出要求呢？”

总体而言，表9-1基本反映了港人较低的政治参与度。不过，有几个现象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为解决私人问题而个别接触政治对象，是港人在政治参与上最显著的形式。在个别接触中，最主要的对象是港英政府；除了政府，民选政客也是民众寻求协助的重要对象。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政治参与度较高的人中，最主要的参与形式是为实际目标而进行的狭隘参与行为（parochial participation）。第二，几种比较温和的非正规政治参与方式（例如，示威、游行、静坐）已成为港人广泛接受的政治参与行为。[7]这间接反映了港人可能认为，制度化的政治影响渠道（例如，选举）并不有效或并不足够，因此觉得有必要且有理由使用一些非正规的手段以达目的。第三，作为华人社会，香港已进入较成熟的阶段。港人已基本摒弃了带有贪污成分（例如，向负责人送礼或请客）或裙带关系（例如，请对官员有影响力的人出面帮忙、找有关官员的朋友协助，或找自己在政府部门

认识的人出面交涉）的参与行为。因此，这些政治参与方式在香港并不重要，也不被港人认可。在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6.3%）不同意到政府部门办理事情时，为减少麻烦而找一些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替自己出头。第四，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港人越来越多地采取集体行动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可以从7.4%的受访者承认曾联合其他人表达意见或提出要求一事得到印证。虽然这个群体大多只属短暂性质，并且只关注具体问题，但在过去10年，它们却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因而可以预见，在未来，港人会组织更多的集体行动来参与政治。第五，香港政党在推动政治参与上角色有限，而其他社会的政党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上则发挥关键作用。尽管一般人缺乏所必需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他们在参政方面受到限制，但政党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机会。[8]香港的政党仍处于雏形阶段，而民众对政党的态度既矛盾又缺乏鼓励性。所以，香港在政治参与上所呈现的一个显著现象是，群体形式的参与很罕见，但个人形式的参与则较普遍。

政治兴趣和政治信息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港人较低的政治参与并不表示他们对政治缺乏兴趣。当被问及对政治的兴趣时，只有28.4%的受访者表示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48.9%表示没什么兴趣，不过仍有值得留意的小部分人（20%）承认对政治有兴趣，更有1.8%的人表示非常有兴趣。我们有理由认为，港人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尚算不错。

较好的政治兴趣水平反映了港人其实并非反感政治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港人在态度上逃避政治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在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61.8%）不同意“我们最好不要随便谈论政治，否则会惹来麻烦”的说法，同意者只占29.8%。同样地，55.6%的人不同意“我们最好与政治问题保持距离”的论断，同意者只占33.1%。很明显，港人至少在认知层面上对政治感兴趣。

尽管港人在政治参与方面不太踊跃，却很了解政府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调查中，认为区议会工作对他们的生活有些影响和影响很大的受访者分别占37.6%和5.6%；就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而言，相关数字分别为40.4%及14.9%。港人充分理解港英政府的影响，分别有32.6%及37%的受访者承认政府的各项政策对他们的生活有些影响且影响很大。

正因为私人利益与周围政治环境有紧密的联系，港人自然大量吸收来自各种传媒的新闻信息，例如，在受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只有39.7%的受访者表示没收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有11.7%收听了一至两次，至于收听了数次和几乎每天都收听的则各占8.4%和37.2%。

与电台相比，电视肯定是港人获取新闻的更重要途径。在受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只有8.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收看电视新闻，而收看了一至两次、数次和几乎每天都收看的受访者则各占9.6%、17.6%和63.5%。

香港的报纸为数甚多，而且流通面颇广。自然地，报纸成为港人获知新闻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受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只有22.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看报纸便不足为奇；相反，有47.5%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每天都看报纸，每周看报一至两次和数次的人则各占11.2%和16.5%。

即使与发达社会相比，港人也可以被称为踊跃的（如果不是更踊跃的）传媒新闻接收者。[9]然而，在谈论政治方面，他们却远不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积极。在受访者中，有41.6%声称从不和其他人谈论政治，39.2%则表示很少这样做，只有15.5%承认有时会和其他人谈论政治，而经常这样做的人只占3.6%。在曾经与他人谈论政治的受访者中，谈论的对象依次序通常是自己的朋友、同事和亲戚，其他人，如邻居、官员和政治人物，均极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朋友是最重要的论政对象，但有多达41.9%的受访者表示在居住的社区内，并没有知心朋友。当被问及与知心朋友在一起时是否经常谈论政治时，34.9%回答从不谈论，不过，仍有33.5%的人答称偶尔谈论，而表示有时谈论和经常谈论的各占8.2%和2.2%。

虽然港人不热衷于政治参与，但由于比较关注新闻，因此对政治方面的了解颇为充分。就此而言，港人与发达国家的公民相比并不逊色。在调查中，受访者的政治知识十分可观，这可以从他们对香港及其他地方政治领袖的认识中得见，74.9%的受访者能够正确说出美国总统的名字，而能够说出俄罗斯总统、中国总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香港总督和香港布政司等人名字的受访者各占62.6%、77.2%、59.3%、61.4%、85.7%和43%。只有很少人（16.7%）能够说出中国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名字。不过，由于他在香港不是瞩目人物，因此难免不为港人认识。毫无疑问，港人政治认识程度之高，足以令我们把他们形容为关注的政治人。

港人对政治的兴趣和具备的政治知识却和他们的政治参与没有显著相关性。这个现象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港人的政治参与并不是由公民意识衍生出来的，更可能是出于个人偏好。

组织性参与

除了政治参与度偏低外，在组织性活动参与方面，港人也不甚积极。大部分受访者（79.5%）表示没有参加任何社团，在表示有参加的受访者中，最多参加的是教会或宗教团体，其余依次是工会/雇员组织/工商团体/雇主组织、志愿服务团体、社区组织/居民团体以及兴趣会/体育会。和其他

现代社会相比，港人的社会参与度偏低。[10]

港人极少参加政党。在调查中，99.2%的受访者不是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成员。在寥寥无几的参加者中，大多数也不是这些组织的活跃分子。港人抗拒参加政治团体，恰好反映了对这类组织的矛盾和冷漠态度。[11]此外，受访者是不是政党或政治团体成员与是否参加了社团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07）。这一现象表示，这两类团体其实吸引不同类型的人士参与。换句话说，社会参与并不能促进政治参与。事实上，在我们的调查中，社团参与和政治参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港人在组织性活动的低度参与有两方面的政治含义：其一，组织性动员在香港的政治参与中并不是重要因素；其二，集体行动也不是香港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与这些现象有密切关系的是香港缺少一批得到信任，并且能够借个人号召力来发动港人参与政治的政治领袖。[12]

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和政治参与

从理论角度看，由于各类团体在动员港人参与政治上作用有限，因此港人在社会经济背景上的差异便应对他们的参与倾向发挥显著作用。[13]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预期男性、年龄较轻及学历较高的人会比较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就像其他地方一样。[14]

就投票而言，有较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的确比资源较少者更踊跃。在1991年的各类选举中，享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港人，尤其是男性及较高学历者，比其他人更多地登记为选民，并在投票当日投票。他们在立法局选举中的投票欲望也比其他人强烈。[15]

除投票外，性别差异在其他政治参与活动上也颇为明显。根据一系列的卡方检定，与女性相比，男性会更多地收听和收看电台及电视新闻，花较多时间阅读报纸新闻，也会较多地与人谈论政治，特别是亲戚、朋友和同事；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比女性大，而且具备较多的政治知识。

年轻人比年长者在政治上稍微积极一些。在计算年龄与不同政治参与指标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后，我们发现年龄与下列行为显著相关：和其他人谈论政治、了解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参加非正规政治活动的频率及有关活动。与性别因素一样，在参与组织性活动方面，不同年龄的人没有显著差别。

与性别和年龄相比，学历显然是最能解释港人在政治参与上存在差异的变项。显然，上述涉及性别和年龄的政治参与差异，有部分其实可以根据学历的差异来解释。根据相关分析，在政治参与（投票除外）、政治兴趣和

政治知识上，不同学历的人在统计上有显著的差别：学历较高者比较低者更积极参与政治；不过，学历与各政治参与指标的相关度普遍偏弱，例如，学历较高者较有可能与知心朋友谈论政治（$r=0.31$）及参加社团（$r=0.22$）。然而，就组织性参与而言，个人学历的高低并非重要因素。

因为各类团体对动员港人参与政治来说并不重要，所以个人因其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资源各异，相对而言更能解释港人在政治参与的多寡。然而，由于港人一般参与度甚低，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

政治参与形态的简单轮廓

为进一步探讨港人政治参与的形态，我们对受访者曾经从事的各种政治参与和活动进行因素分析，以发掘背后的基本模式。由于受访者的回答出现大量“不知道”和“拒答”，因此我们采用了按配对状态删除法（pairwise deletion）。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受访者的政治参与水平偏低，所以因素分析所得结果基本上只能为港人的政治参与形态提供一个简单的轮廓。

表9-2列出了对24项参与行为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这24项具体政治参与行为可以构成7个主要的政治参与方向，这7个独立因素可解释近半（49.3%）的总方差。

表9-2　政治参与模式的因素分析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因素6	因素7
	投票	抗议中国	联系政客	联系政府	参加集会	助选	运用关系

	因素1 投票	因素2 抗议中国	因素3 联系政客	因素4 联系政府	因素5 参加集会	因素6 助选	因素7 运用关系
区议会投票	0.83						
市政局/区域市政局投票	0.83						
立法局投票	0.73						
示威、游行、静坐		0.64					
通过政治团体反映意见			0.70				
通过民选议员反映意见			0.75				
通过委任议员反映意见			0.73				
找官员/政府部门反映意见				0.65			
写信给政府部门				0.76			
向政府的投诉机关投诉				0.68			
参加候选人集会					0.82		
动员他人参加候选人集会					0.85		
为支持候选人或政党拉票						0.79	
为反对候选人或政党拉票						0.88	
找政府部门认识的人出面							0.67
请对官员有影响力的人出面							0.67
找官员的朋友							0.65
找官员的上司反映意见							
写信给报纸							
联合其他人表达意见或提出要求							
去法庭告状							
送礼请客							
向港督请愿							
就选举发表意见							
特征值（eigenvalue）	4.4	2.0	1.8	1.6	1.4	1.3	1.3
解释的方差（%）	15.6	7.2	6.5	5.6	5.1	4.8	4.5

注：表内数字乃使用变值尽简法（varimax solution）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因素负荷量低于0.5者不予登录。

港人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显然是投票。鉴于普选在香港历史中出现甚晚，且具普选成分政治机构的政治重要性有限，这个发现尤其值得重视。其含义是：虽然实际上迄今只有小部分港人曾投票，但投票已快速地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活动。

在港人的参与行动中，中国因素的影响巨大。这个参与方式与表9-2中其他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一个在香港之外的政治目标。这充分表明中国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瞩目性，特别是考虑到几年后中国即将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针对中国的抗议行动与其他参与方式的最大分别是，这些行动颇为情绪化，其动机源于某些人对政治前途的极度忧虑，及他们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即使在投票过程中，投票者的行为也明显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

相反，第三种和第四种政治参与方式，即“联系政客”及“联系政府”，明显是由个体利益和功利考虑引发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寻求公职人员的协助，处理一些个别性，主要是影响个人或家人的问题。接触政治人物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典型狭隘性政治参与，它涉及极少的社会群体摩擦，以及极少的人际合作，却要求参与者有相当大的主动性。[16]

从表面看，第五种参与方式，即“参加集会”，似乎是某种集体形式的活动。不过，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下，这却非事实。实际上，在香港，绝大部分集会活动都是短暂和小规模的，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这些集会大多不是旨在改变公共政策或达成其他公共目标的有组织、大规模和持久性行动，也不是类似于近年在西方国家大量出现，旨在宣扬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的社会运动。[17]换句话说，这些活动参与者的动机显然是私人和功利性的，并非利他性的。

在选举期间协助候选人或政党助选，基本上是一种罕见且不那么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利用人际关系来达到个人目标也是如此，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这两类活动也是独立于其他的参与方式。我们预期，虽然“运用关系”会日益式微，但是随着普选在香港政治体制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助选活动将有所增加。

总的来说，港人的政治参与形态是杂乱松散的，它由一群为数众多，但显然互不关联的参与方式组成，并且不会互相促进。大部分参与方式如果不是由狭隘主义和物质利益所驱使的孤立活动，便是旨在发泄情感郁结的表达性行动。不过，明显功利性的参与是港人最普遍的参与模式。再者，个人方式的参与十分普遍，而群体性的行动则属凤毛麟角。大体来说，港人零散和多样的政治参与并没形成清晰和有结构的参与形态。就其参与形态而言，香港显然与其他发达社会不同，后者一般呈现一个较简单且有系统的参与模式。[18]

政治效能感

在政治参与机会快速增加的情况下，港人在政治参与上的冷漠确实令人费解。在追寻答案时，我们觉得首先应做的，是看看是否因为民众缺乏足够

的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导致他们不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

政治效能感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都会对人们的政治参与取向产生影响。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自认为拥有的认识政治、表达诉求和推动实际政治变迁的能力，代表了个人对自己作为公民及被管治者所具备能力的看法。根据这个定义，港人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无疑非常少。我们甚至可以说，港人被一股政治无力感所笼罩。在调查中，只有极少的受访者（7.8%）同意“我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参与政治”，不同意者则高达88.1%，当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我认为自己非常了解香港所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时，得到类似的结果：只有约两成（21.1%）表示同意，大部分（73%）则表示不同意。

外在政治效能感是指相信政治权威会以诚恳和积极的态度回应民众所提出的诉求和需要。和内在政治效能感一样，我们发现港人也不具备强烈的外在政治效能感。不过，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港人一般认为香港的行政机关有效率和廉洁。[19]因此，港人对政府产生某种顺民心态。基于顺民的观感，他们认为自己在与行政官员往来时，可以依赖或诉诸正规和可靠的规章制度，以保障自身利益。他们相信会得到行政机关的公平对待，意见会获得官员的考虑。他们有这种信念的原因，并不是认为自己具有政治影响力，而是相信行政官员受到法规约束，从而不能滥用权力。[20]所以，很自然地，在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觉得政府有责任考虑民众的请求。绝大多数受访者（83.9%）同意政府对民众有关自己利益的各种请求，都应该加以考虑；更重要的是，超过一半的人（52.4%）有信心当需要政府帮助时，会得到公平对待。

不过，在涉及港人是否认为自己拥有可以左右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时，情况便不一样了。就此而言，港人的外在政治效能感相当薄弱。53.7%的受访者的看法颇为极端，同意“好像我这类人对政府的决策无任何发言权”，而持相反意见者则占41.2%。一个看似较准确的衡量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指标是，民众是否同意“我认为政府官员不太在乎我这类人所想的东西”。大多数受访者（62%）同意政府官员并不太在乎他们的想法，只有29.1%表示不同意。港人内心普遍的政治无力感，也可以在另一个发现中看到：有60.1%的受访者认为当政府的某一项决定不好或对自己不利时，即使采取行动反对，也不会产生效果，只有25.7%有信心行动会有效。同样地，有65.4%的受访者相信如果向政府提出要求，政府不会做出回应，而持相反意见者则只占20.3%。

即使就民众对立法局的影响力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存在明显的政治无力感，立法局部分议员由选举产生，而立法局又声称是民众的代表，但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8.9%）认为如果通过议员影响立法局的决定，不会产

生效果，这显示港人并不相信立法局议员会积极回应他们的要求。

有趣的是，港人并不反对其他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对政府采取行动。事实上，有66.9%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人因政府部门或公务员没有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或措施而令其利益受损，并因此采取行动要求上级机关纠正，他们会赞成那种做法。不过，如果是由自己采取行动，他们对其有效性不存幻想，只有34.6%的受访者认为行动会有效果，但更多人（46.5%）则持不同意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出现冲突，港人便不会赞同他明显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政治行动。在调查中，我们向受访者讲述了一个假设性情况：当立法局在讨论某项法例时，有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托立法局议员加以赞成或反对。然后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有关做法。大部分受访者（74.2%）反对这种行为，只有15.9%表示同意。港人显然倾向于为政治参与所应达到的目标设定某些界限，而原则似乎是这样的：个人的政治参与不应对民众利益造成损害，由于港人的少量政治参与活动主要由非利他性的动机所驱动，民众否定自利性参与的态度有可能在大体上不利于政治参与。

与其他社会相比，港人的政治效能感很薄弱。[21]至于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则颇令人费解，基本上我们发现各种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指标与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十分低。这说明港人参与政治与否，并非取决于其对自身政治能力的估计。

政治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审视港人对不同政治对象所给予的支持度，以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充分证明，港人基本上支持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殖民政府，虽然长期的趋势是逐步下降。[22]但是，对理解政治参与最具意义的是，民众对政治领袖和政党的支持仍然相当薄弱，因而很难借助政治领袖和政党来提高港人的政治参与度。况且，由于政治领袖和政党所关注的问题一般不能引起民众的共鸣，因此他们作为推动政治参与者的效用也大打折扣。[23]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港人依然较支持现行的政治体制，例如，62.1%的受访者同意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有各种缺点，但它仍然是最适合香港的，只有23.8%表示不同意。虽然事实上，港人希望引进某种程度的民主改革使政府受到制衡，[24]但他们对民主改革的诉求是温和且举棋不定的。一般来说，过去10年来香港所推行的循序渐进式民主改革，被民众广泛接受。这可以从只有11.3%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近年的政制改革速度太慢一事中得到印证；相反地，27.5%的受访者觉得速度太快，而33.6%的人则认为速度

刚好。

调查还发现，港英政府仍然在大体上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超过一半的受访者（63.7%）表示信任港英政府；26.2%表示信任中国政府。从比较角度看，港英政府所得到的政治支持可以说是较高的。[25]

尽管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政府获得了民众支持，但它们对民众的政治参与仅产生有限作用。我们在接受政治体制和信任港英政府，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之间，并没发现显著的相关性。同样地，信任中国政府与否和政治参与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正由于港人支持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港英政府，所以不认为有参与政治的需要。虽然民众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却会间歇性地触发一些自发性和零散性、短暂性和表达性的参与行动。

社会和政治满意度

迄今我们的发现显示，港人的政治参与情况不能引用一些在其他地方享有强大预测能力的因素来解释。学历诚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民众不同的参与水平，但仍不是强有力的因素。

考虑到港人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一些偶发、自发、零散和缺乏组织的行动，且这些行动基本上由个别的利益所驱动，充斥着功利性，我们可以预料，个人资源、组织动员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重要。如果上述论断成立，则最能推动政治参与的因素应是个人所感受到的迫切实际需要。换句话说，参与者通常是意识到个人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为了间接验证这个假设，我们探讨了港人对香港社会与政治状况的满意度，以及满意度与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调查发现，港人对香港社会状况感到满意。只有13.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比5年前差，52.8%则认为比5年前好，33%则认为与5年前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受访者预期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日后仍会有所改善。受访者中，41.5%的人认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在5年后会比当前好，预期会变差的只有12.1%。民众对社会现状的普遍满意也可以在另一事实中反映出来。42.9%的受访者认为，相对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现在的收入合理，只有19.8%认为不合理，但有趣的是，多达33.5%的受访者没有确定答案。在职受访者基本满意自己的工作及从上司和社会中得到的回报。约75%的受访者觉得，上司曾对自己的能力与工作表现给予适当重视与承认；78.4%满意自己的工作；60%觉得香港社会曾对自己的能力与工作表现给予适当尊重与认可。与政治参与关系更密切的，也许是港人习惯以个人因素解释自己的人生际遇。例如，52.5%受

访者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本身有问题，而非社会没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

就政治满意度而言，最困扰港人的问题无疑是“九七回归”，而这个问题早已在部分人心中造成很大的政治忧虑。然而，从日常观察所得，与回归问题有关的政治忧虑似乎已得到舒缓。在调查中，只有15.3%的受访者表示对回归问题有忧虑，46.3%则表示毫无忧虑，26.2%感到有少许忧虑，而9.2%自认为忧虑程度属于一般。除了回归问题外，我们没有发现港人对其他政治状况存在严重不满。

我们接着计算了社会和政治满意度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在统计上的相关性。颇令人意外的是，这两类现象之间的关系较为薄弱，这说明港人的政治参与与一般的社会与政治满意度相关性不大。

结论

根据我们的发现，港人的政治参与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整体的政治参与水平低下。

第二，主要以追逐个体利益的狭隘性参与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除带有鲜明功利目的的参与外，较不常见的表达性参与行为并存。这些行为的主要目标在于宣泄因主权转移所引发的政治抑郁情绪和忧虑，而针对的对象则是中国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代表。

第四，中国政府成为港人政治参与的主要针对对象，特别是表达性的参与。

第五，由于普选作为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重要，而其他渠道的作用又有限，所以非正规的手段便成为对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施加压力的重要办法。

第六，政治参与形态零散，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个人式的参与行为、由政治领袖或团体引起的极有限的民众动员、参与行动缺乏连贯性，以及参与者在行动上缺乏长期坚持。

第七，民众在参与政治和社会群体活动方面偏消极。总而言之，香港的政治参与实际水平较低，而且非制度化。

尽管港人在行为上并不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但在认知上的参与颇为踊跃。他们相当留意政治环境的变化，甚为知晓香港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

情。作为认知上的参与者，港人比发达国家的公民毫不逊色。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与低度的实际参与并存，构成一个罕见现象。在承认这个奇异现象时，我们或许可以称港人为“关注的旁观者”。

日本人也经常被政治学者形容为“政治旁观者”。因此，日本人的政治文化也被界定为“旁观者”文化。[26]不过，作为“关注的旁观者”，港人在几个方面与日本“愤世的旁观者”有所区别。虽然港人和日本人都刻意和各种形式的政治保持距离，但日本人对政客、政党及政治的观感比港人负面。与港人相比，日本人对政治的不满程度较高。所以，港人和日本人虽然都有高度的政治无力感，但日本人逃避政治参与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对政治不满，而港人则是基于实际考虑和认定政治参与徒劳无功。此外，与港人不同，日本人在较大程度上被整合在社会团体和社会网络内，因此较容易在政治上受外来力量的动员。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人投票率较高。[27]结果是，虽然日本人的政治参与度偏低，但与港人相比，他们有较多的群体性政治行动。

在我们整个的分析过程中，未能找到一些可以有效解释港人政治参与的因素。当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港人有限度和目标狭隘的政治参与行为并不适合运用西方政治参与文献中流行的理论来解释。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依归的政治参与受到大量个别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则运用一般性（结构性或心理性）的因素来理解港人的政治参与便不会有成效，我们反而需要就每一项参与行动来解释，并分析影响该行动的具体因素。

不过，由于港人主要从事狭隘性的政治参与，这也许可以提供某些解释的线索。港英政府扩大其提供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的角色，以及民众对政府帮助的日益依赖，都可能营造一个政治环境，令在政治上不活跃的港人之间出现狭隘性参与相对重要的局面，这正如韦尔巴（Verba）所言：“如果公民曾经从政府得到一些服务，他们显然会从中学习到，在遇到困难时，政府也许可以有能力提供协助。如果政府的服务不尽如人意，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只会进一步提高。不过，只有在对政府服务满意的受惠者当中，才会产生出个人可以依赖政府这种狭隘的信念。”[28]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港人的政治参与是政府不断深入参与社会事务的结果，而因为政制改革增加了参与途径、政府对非正规政治参与行动越来越宽容、政府权威的下降，以及政府对民众要求的回应越来越积极，则起着推动狭隘性参与的作用。

章末注

1.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

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这个样本原有2065个住址，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实际数目减少至1633个；访问员成功完成892个访问，回应率为54.6%。

2.我们于1982年在香港4个社区进行问卷调查，这一论断可从此次调查有关政治参与的数据中证明。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in Joseph Y.S.Cheng（ed.），*Hong Kong in Transition*（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6-51。

3.Curtis H.Martin and Bruce Stronach，*Politics East and West*：*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Armonk：M.E.Sharpe，1992）；Geraint Parry et al.，*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Sidney Verba and Norman H.Nie，*Participation in America*：*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New York：Harper&Row，1972）；Sidney Verba et al.，*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A Seven-nation Compari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4.Bradley M.Richardson and Scott C.Flanagan，*Politics in Japan*（Boston：Little, Brown，1984）；Scott C.Flanagan et al.，*The Japanese Vot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5.这个结论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地方的投票率而得出。Charles L.Taylor and David A.Jodice，*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Vol.1*：*Cross National Attributes and Rates of Chan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3rd ed.，1983），pp.76-77。

6.Anthony B.L.Cheung and Kin-sheun Louie，*Soc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1975-1986*：*Trends and Implications*（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1）.

7.Lau Siu-kai，“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1，No.2（1992），pp.16-17.

8.Verba et al.，*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pp.17-19.

9.Martin and Stronach，*Politics East and West*，p.131；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ublic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94.

10.Martin and Stronach，*Politics East and West*，pp.142-149；Parry et al.，*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p.92；John N.Edwards and Alan Booth，*Social Participation in Urban Society*（Cambridge, MA：Schenkman，1973）.

11.Lau Siu-kai，*Public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

12.Lau Siu-kai，"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Hong Kong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5，No.2（1992），pp.225-246；Lau Siu-kai，"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The Hong Kong Chinese View of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3，No.2（1991），pp.191-209.

13.韦尔巴（Verba）等学者提出，社会地位高与社会地位低的公民，是通过不同的过程而变得在政治上活跃的。根据他们的研究，社会地位高的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较重要角色，多数不用通过明显的群体性动员，政治动员可以在个人层面发生，而这个过程不易被人觉察。相反地，社会地位较低的公民，多数需要以团体为基础的政治动员才能达到地位较高者的政治参与水平，他们既需要自觉的意识形态作为动机，也需要组织作为资源。Verba et al.，*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pp.14-15.Joan M.Nelson，*Access to Power*：*Politics and the Urban Poor in Developing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Samuel P.Huntington and Joan M.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85-112。

14.Lester W.Milbrath and M.L.Goel，*Political Participation*：*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nd ed.，1977），pp.86-122.

15.Louie Kin-sheun，"Who Voted in the1991Elections？A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Hong Kong Electorate，"in Lau Siu-kai and

Louie Kin-sheun（eds.），*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The1991Election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3），pp.1-39；Louie Kin-sheun and Wan Po-san，*Voting Behaviour in Hong Kong*：*A Study of the1991Legislative Council Direct Election*（Hong Kong：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1993），pp.49-60.

16.Verba et al.，*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p.54.

17.Russell J.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eds.），*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Samuel H.Barnes et al.，*Political Action*：*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Beverly Hills：Sage，1979）.

18.Russell J.Dalton，*Citizen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ies*（Chatham：Chatham House，1988），pp.35-73.

19.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Colonial Legitim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1（1995），pp.79-102.

20.Almond and Verba，*The Civic Culture*，p.217.

21.Almond and Verba，*The Civic Culture*，pp.214-229；Martin and Stronach，*Politics East and West*，pp.68-73.

22.Lau and Kuan，"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Lau，"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23.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Lau，"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Lau，*Public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Lau，"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Asian Survey*，Vol.34，No.3（1994），pp.243-257.从比较角度而言：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eds.），*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Boston：Little, Brown，1980）；Samuel H.Beer，*Britain Against Itself*（London：Faber and Faber，1982）；Allan Kornberg and Harold D.Clarke，*Citizens and Community*：*Political Support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E.J.Dionne, Jr.，*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New York：Touchstone，1991）；Seymour M.Lipset and William Schneider，*The Confidence Gap*：*Business, Labor, and Government in the Public Min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v.ed.，1987）；William Greider，*Who Will Tell the People？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Touchstone，1992）.

24.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The Partial Vis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A Survey of Popular Opinion，”*TheChina Journal*，Vol.34（1995），pp.239-264.

25.Lipset and Schneider，*The Confidence Gap*；Kevin Phillips，*Arrogant Capital*：*Washington, Wall Stree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Boston：Little, Brown，1994）；Almond and Verba（eds.），*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26.Richardson and Flanagan，*Politics in Japan*，pp.229-245；William Chapman，*Inventing Japan*：*The Making of a Postwar Civilization*（New York：Prentice-Hall，1991），pp.143-167.

27.Scott C.Flanagan，“Mechanisms of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 in Japanese Voting Behavior，”in Flanagan et al.，*The Japanese Voter*，pp.143-197；Bradley M.Richardson，“Social Networks, Influenc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Vote，”in Flanagan et al.，*The Japanese Voter*，pp.332-366.

28.Sidney Verba，“The Parochial and the Polity，”in Sidney Verba and Lucian W.Pye（eds.），*The Citizen and Politics*：*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tamford：Greylock Publishers，1978），pp.25-26.

---

1. 本文与关信基合著，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Attentive Spectator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4，No.1（1995），pp.3-24.中文版曾以“关注的旁观者：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为题，刊于《广角镜》，第270期（1995），66-77页；现在的译本再经修订。

第10章　公共制度渐失信任与民主化注

人们一般认为，威权政体的民主化一定能提升民众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信任。事实上，许多社会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1]民主化与民众增加对公共制度信任之间存在某些相关性，其原因显而易见：民主化增加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扩大了他们在政治决策中的角色，因而实现了公共制度更高程度的政治问责。

民主化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将社会和经济制度置于民众的政治监察之下，令其更易回应民众的需求。而且，在民主化进程中，公共制度被施压，不得不注重人权、极度关注程序公义、尽量将舆论纳入政策制定，并且不断提升自身表现，以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可以肯定地说，民众对公共制度信任的提升，也将巩固和进一步促进民主化进程。

在过去10年，香港的民主化已取得一定发展，但民众对公共制度的信任一度飙升之后，下降的趋势正在酝酿，颇令人担忧。这个趋势很可能持续至1997年，届时香港将在中国管治下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民众对香港未来信心不足的情形下，要在回归后成功实现高度自治，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主为民众提供参与和扮演角色的机会，以决定自己的未来。然而，民众对公共制度有信心又是成功实现民主的关键。香港过去10年的局部民主化，并未提升民众对公共制度的信心，这一现象令人对香港未来的民主前景感到不安。

本章将勾勒过去10年民众对香港公共制度信任的变化，并探索其对未来政治发展的启示，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我和其他研究人员在过去（特别是1994年）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2]

港式民主

香港受英国殖民管治将近一个半世纪，虽未能实现民主化，但殖民统治基本温和，给予香港很大程度的自由，近年来，人权亦渐受重视和保护。由于港英政府奉行经济自由放任及社会不干预政策，因此香港已发展为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更成为一个独特、多元化、教育水平高、高度城市化及开放的社会，受西方影响深远。如此一来，香港理应具备发展民主的土壤，并为此做好铺垫，民主却未如期而至。

与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大部分例子相比，香港的民主道路甚为独特。[3]一方面，香港的民主化是由英国政府于1984年发动，为1997年结束殖民管治而准备的。而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只扮演极有限的

角色，当然也并非微小到不显著。虽然英国只计划推行局部民主，但遭到了香港商界和即将执掌香港主权的中国的激烈反对。因此，民主化激发了一场中英政府高层之间长期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令香港社会政治化，并将港人分裂为支持快速民主化和支持循序渐进民主化、亲英和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团体。

另一方面，香港民主的特点是局部化，这主要是指立法局议员将逐步由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以此实行民主。虽然回归时立法局议员都将由选举产生，但是只有近1/3来自分区直选。此外，在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中，立法局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香港局部民主化的进程与常年纷争有很大关系，对于一个长久以来习惯并向往稳定与和谐的社会来说，这并不尽如人意。由于港人对改革前的政治体制较为满意，所以对民主的诉求较为温和，为实现民主而准备做出牺牲的意愿极小。在港人心目中，若要在民主和稳定之间权衡，后者毫无疑问更重要。因此，这种令人无奈的矛盾民主观始终困扰着民主化进程。[4]

香港政坛一直缺乏有威望的本地政治领袖，由立法局选举而突然产生的政治市场将大批政党和政客卷入政治争拗中。这些新冒起政客之间的斗争、他们与过往和殖民统治者合作无间的政治人物之间的斗争，以及支持民主人士与中英政府之间的斗争，都无情地将香港社会政治化，令民主化和反共的讨论成为公共议题之首。

香港民主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在香港民主步伐和恰当的制度安排上，各种政治势力间没完没了的争论，对香港的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争论到目前为止也未达成任何共识。这种不断争论、议而不决的状况，无疑使民众失去耐心。除政党、政客理想主义的说辞以外，他们之间相互争权夺利，致使民众对政治产生不信任感，犬儒心态弥漫，侵蚀了政治领袖的认受性。

不仅如此，关于香港民主的争论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政治化，并影响民众对社会制度和社会领袖的看法。事实上，港英政府、中国政府及各方政治团体争相拉拢社会群体为他们之间的相互较量背书。立法局中功能组别的议席更鼓舞了社会、经济和专业群体参与政治。鉴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公共议题必定会涉及民众如何看待社会制度及其政治领袖。

殖民管治的认受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经济领域的施政表现。[5]一直以来，香港的经济奇迹、廉洁的行政管理制度、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被归功于殖民政府。而民主化引起的政治纷争却对公共服务部门的士气、公正及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些正是殖民管治的主要支柱。[6]民主化之

前，公务员是唯一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去政治化的环境中管治香港。民主化将公务员带入前所未见、混乱不堪的政治环境，加深了他们因“九七回归”产生的焦虑不安。公务员队伍表现失准，不仅损害了政府的认受性，更影响了民众对公共制度和政府高官的看法。

殖民政府关注民主化，难免将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问题的精力分散，而这两方面都关系到维持统治的认受性，因此殖民政府的表现越来越差。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香港就受到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困扰，对民众的影响，比民主化或是“九七回归”来得更为直接，尤其是经济发展放缓、贫富差距拉大、去工业化、失业率上升、环境污染、通胀加剧、房价飙升、长者福利短缺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沦丧等，都是民众认为亟待解决的议题，政府却没有能力解决，这必然使民众对公共制度的态度产生变化，也自然地令民众对民主产生负面评价。

港人对民主的期待

作为被殖民者，港人并没有直接体验民主管治的经验。科尔曼（Coleman）曾一语中的地指出，殖民统治并不利于培养民主精神：

殖民管治本质上是一种官僚的威权主义，政府被看成是所有公共政策的主导者，并且是一切公共设施和好职位的供给者。政府通过请愿和行政管理，而非政治竞争和妥协来进行统治。民众不参与政治，一切都由官僚精英说了算，因为在制度的设定上，就假设了他们最懂得社会需要什么。[7]

但是，民众仍通过种种途径接触到了民主。教育的西化及扩张，对于培养和传播民主价值来说至关重要。“二战”后，殖民政府逐步开放，并自称咨询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殖民统治把殖民作为“民主学校”的保证。[8]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局部民主化的确在散播民主价值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传媒对其他社会落实民主的报道，也在灌输民主价值上起到了颇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港人对民主的体验仍非常有限。

正是民主经验不足和已被广泛接受的威权体制，塑造了港人对民主的理想化兼片面的设想，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各类公共制度的信任度。一方面，港人倾向于以一种理想化、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民主，并重视民主究竟可以带来多少实质利益。这种看待民主的眼光很片面，因为人们追寻民主只是为了它的政治功用，比如，可以保护并提高人们的利益和权力，防止滥权。但另一方面，人们其实并不热心参与政治。总之，人们追求民主的重点在于政治体制的产出而非投入。局部民主化以传统智慧为前提，认为公共政策终究是为了保护民众利益，而政府的架构和程序则无需听从百姓喜好，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也只需看他是否维护民众利益，至于这些机构和人是否由普选产生，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9]

一般来说，港人对民主只有温和的诉求，因此对政府推行政制改革的支持甚为有限。尽管有着诸多局限，但港人对民主化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1992年的调查结果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见表10-1）。

表10-1　对民主效果的期待（单位：%）

	会	不会	看情况	不知道	拒答
港人在政治上会更加平等	74.1	11.2	0.0	14.1	0.7
港人会更加团结	62.7	20.0	0.2	15.7	1.4
政府会更有效率	58.9	21.1	0.3	18.4	1.3
香港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62.9	16.2	0.6	18.1	2.2
港英政府会更重视港人意见	80.1	7.5	0.2	10.1	2.1
中国政府会更重视港人意见	48.4	28.6	0.2	21.5	1.3
香港的政治局面会更稳定	54.7	22.0	0.5	21.0	1.8
港人有更多社会福利	76.2	9.6	0.2	13.0	1.0
政府会更受港人爱戴	75.5	9.6	0.2	13.4	1.4
港人会生活得更好	67.3	11.4	0.5	19.5	1.4
社会冲突会减少	54.1	27.1	0.2	16.9	1.6
贫富差距会缩小	49.4	32.0	0.3	16.1	2.1
政府会越来越介入社会或经济事务	59.6	16.5	0.0	22.9	1.0
港人会有更多个人自由	82.7	5.9	0.0	10.3	1.2
中国政府越来越少插手香港事务	29.7	44.8	0.1	24.0	1.4
政府滥用权力的机会越来越少	75.1	9.0	0.1	14.7	1.0

整体上，港人对民主可以带来的好处期待甚高，其中包括政治上更平等、港人更团结、政府更关注民意、政局更稳定、社会福利更多、政府得到民众更多支持、政府更多地介入社会经济事务、更多个人自由、政府职权滥用减少等，这些可以说都是对民主的合理预期。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港人对局部和有限的民主竟有这么多期待。

民主究竟能否提升政府的管治效率、加速经济发展、提升生活水平、纾缓社会冲突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其实无实证资料可查，但香港民众希望能有如此效果。

至于民主对中国政府所能产生的影响，港人的评估则现实很多。虽然有

48.4%的受访者认为民主会使中国政府更重视港人意见，但仍有28.6%持相反观点。而对于中国介入香港事务这一长久困扰港人的问题，他们并不乐观，更多受访者（44.8%）认为民主并不会使中国政府减少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表示乐观者只占29.7%。

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是，民主经验少的受访者反而对民主有更高期待。比如，低学历者更倾向于期待民主会使港人更加团结、政府管治更有效率、政局更稳定、社会冲突减少，并更倾向于期待中国政府会减少对香港事务的干预。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认为民主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政治平等、港人更团结、政局更稳定、政府管治更有效率、更在乎民意，且会更多地介入社会经济事务。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港人普遍倾向于期待民主不仅对整个社会，也对每个个体都带来实质性好处。基于这种功利性的取向，港人对民主的支持和对公共制度的信任，与其期待民主能带来多少福祉息息相关。

对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估

在过去10年，港人总体上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评估在起伏中呈下滑趋势。表10-2显示，撇开民主不谈，港人对现状越来越不满。

表10-2　对香港政治、社会、经济现状的满意度（单位：%）

	政治现状	社会现状	经济现状
1988 年	29.0	40.9	57.0
1990 年	17.4	—	42.1
1991 年	20.0	17.5	31.6
1992 年	18.3	22.1	32.2
1992a 年	8.1	—	35.3
1994 年	14.2	26.7	39.3

注：满意度采用五分尺度，表中数字为回答“满意”和“很满意”者。

对于港人的不满，一种解释是他们对香港回归后的未来信心不足，但实证数据刚好驳斥了这种说法。从表10-3可以看出，总体而言，虽然民众对香港的前途信心不高，但除了因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引起的波动外，民众的信心还是呈现逐步增强的趋势的。

表10-3　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单位：%）

	1990 年	1991 年	1992a 年	1994 年
很有信心	3. 1	2. 2	3. 1	2. 2
有信心	29. 5	34. 7	39. 7	36. 9
普通	29. 2	28. 9	30. 0	34. 7
没信心	25. 9	22. 7	17. 9	18. 9
很没信心	2. 8	1. 2	1. 7	1. 3

对社会不满的另一种较流行解释是，香港社会变得涣散，因而疏离感普遍存在。但从表10-4的数据观察到，港人的归属感正逐步增强，尤其是较高学历和较年轻者。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正是社会涣散导致了港人更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表10-4　对香港的归属感（单位：%）

	1988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a 年	1994 年
很强	22. 2	13. 8	15. 2	17. 9	6. 6
强	44. 9	49. 5	39. 9	48. 1	70. 4
普通	24. 0	27. 2	33. 7	25. 0	14. 2
弱	4. 5	5. 4	4. 7	5. 8	6. 6
很弱	3. 0	0. 8	2. 7	1. 3	0. 8

民众对公共制度及社会的不满情绪，相信只是部分源于他们对个人生活领域的不满，如工作、家庭、健康、社会地位。如表10-5所示，多年以来，港人对个人生活领域的满意度相当稳定，只是对居住环境和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在不断下降，这或许影响了他们对香港整体状况的评价。

表10-5　对个人生活领域的满意度（单位：%）

	1986 年	1988 年	1990 年	1991 年
家庭生活	69. 2	76. 7	69. 8	64. 6
婚姻生活	72. 9	—	—	—
与父母的关系	80. 4	—	—	—
与子女的关系	77. 5	—	—	—
与亲戚的关系	45. 2	—	53. 1	53. 2
与朋友的关系	62. 4	—	63. 4	64. 0
工作	—	45. 0	49. 7	43. 6
个人生活	64. 0	—	55. 4	42. 6

（续表）

	1986 年	1988 年	1990 年	1991 年
社会地位	—	49. 8	—	—
教育程度	26. 9	21. 7	25. 9	21. 9
健康情况	52. 6	56. 1	62. 1	52. 6
居住环境	—	55. 5	49. 5	40. 2
经济状况	—	—	36. 9	30. 2

注：满意度采用五分尺度，表中数字为回答“满意”和“很满意”者。

最显著下降的是民众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1986年，有64%的受访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此比例在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4年分别下降为55.4%、42.6%、42.8%和41.3%。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港人在个人整体生活状况方面，感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学历的提高自然会令人们对自我成就抱有更高期待，但社会上竞争日趋激烈、贫富差距拉大，再加上最近10多年经济不景气，无疑都挫败了人们的期待，从而对自己的无所成就产生深深的怨怼。

根据调查，在过去10年，仍然认为香港充满机会的受访者略有减少。例如，在1985年，近九成受访者（87.6%）同意香港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到了1994年，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减至82.5%。与之相应的是负面情绪的滋长，1991年，不同意香港是个公平社会的受访者只占32.7%，但在1994年，认为香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者达57.3%，仅有12.7%认为公平。毋庸置疑的是，香港近年的种种变迁令社会产生颇多挫败感和疏离感，虽然这种消极情绪只有些许增长且步伐缓慢。

至于对更开放和民主政体的施政效果，港人的评价颇为复杂。1992年的调查显示，对于在立法局选举中引入直选议员，民众总体上持正面评价。半

数以上受访者（50.6%）认为立法局的表现比之前好，只有9.8%认为比之前差。与此类似，37.8%的受访者认为在直选议员加入立法局之后，政府的工作效率比之前好，只有12.3%认为比之前差。

但是，民众并不认为民主化提升了政治效能。事实正好与期待相反。1994年，有51.7%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政治引入各种选举制度后，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并没有提高，认为有所提高的只占少数（24.5%）。事实上，虽然民主支持者大肆宣扬，但港人的政治无力感在过往10多年没什么变化。比如，在1985年，75%的受访者同意香港的政治和政府极为复杂难明，84.7%认为自己对政府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到了1991年，仍有68.1%的受访者同意香港的政治和政府复杂难明，大多数人认为港人无力改变港英政府（75.3%）、英国政府（79.5%）和中国政府（79.6%）的政策。显然，民主化并未能提升港人的政治效能感。

基于港人认为民主应带来实惠的功利主义观点，民主化能否改善政府施政表现并提高绩效，对他们是否支持民主和信任公共制度来说至关重要。但民调数据似乎并不令人鼓舞。民众期待民主化可以提高政府表现和绩效，但事实令他们非常失望。表10-6的数据显示，过去10多年，港人对政府表现的评价急剧恶化。

表10-6　对港英政府表现的评价（单位：%）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1986年	0.0	40.0	49.9	9.5	0.6
1988年	0.8	41.2	46.5	6.3	0.3
1990年	1.0	21.8	52.6	13.8	1.3
1991年	0.2	30.9	50.6	10.2	0.5
1992年	0.5	27.9	58.6	9.1	0.5
1992a年	0.5	19.0	52.3	16.5	1.6

官方数据反映了差不多的结果。根据政务总署每季度民调的结果，过去3年的数据颇令人失望。就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临上任前（他上任时信誓旦旦地许诺，政府第一要务是提升政府部门的管治表现，以挽回民众对英国政府的支持），1992年7月的数据显示，52%的受访者对政府的总体表现满意，表示不满者占27%。但受访者对公务员的满意度则较分化，46%认为公务员高效，38%则认为效率低下。自此，民众对政府表现曾轻微回升，但之后便进一步恶化。在1992年9月，1993年1月、5月、9月，1994年1月、5月、9月和1995年1月、5月的调查中，认为政府表现令人满意的受访者比例依次是50%、53%、55%、50%、49%、49%、46%、40%和39%。

民众对政府效率的评价也不怎么乐观。在1992年9月，1993年1月、5月、9月，1994年1月、5月、9月和1995年1月、5月的调查中，认为公务员高效的受访者比例依次是44%、50%、49%、46%、47%、47%、45%、39%和38%。必须承认，民众对公务员效率评价较低的部分原因是彭定康的许诺令民众抱有极大期待，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公务员的表现相对于许诺着实有差距，而紧张的中英关系也打击了公务员士气。

反过来，公务员的政治焦虑和挫败感也势必影响其与民众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民众对公务员的日益不满看出。政务总署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992年9月，1993年1月、5月、9月，1994年1月、5月、9月和1995年1月的调查中，认为公务员工作态度良好的受访者比例依次是56%、59%、55%、52%、57%、56%、53%和50%。显然，彭定康在殖民政府最后的岁月里，试图通过公务员高效表现来赢取民众支持的盘算落空了。

以上零星的证据让我们看到，港人对民主的理想化期待基本上没有实现，而这势必影响民众对某些特定公共制度的信任和总体上对民主的态度。民调数据亦显示，港人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现状的满意度与他们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呈显著相关。

对公共制度的信任

总的来说，港人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信任度在过去10年有所滑落，尤其是政治制度，这预示着香港未来民主发展将会很艰辛。

首先，港人日趋对民主的效果产生不满情绪。1988年，略过半数的受访者（58.1%）同意过去数年政府推行的政制改革令当前的政制变好了，认为变差的只占7.6%。但到了1994年，只有39.6%的受访者同意政制改革改善了政局，而14.8%认为变差了。虽然1988年和1994年两次调查的提问在用词上略有不同，但民众对民主的效果明显表示失望。

其次，对政治的失望将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下跌上。如表10-7所示，民众对港英、英国及中国政府的信任急剧下跌，对政府表现及其相互间缺乏合作产生了不满。此外，民众还认为无论哪个政府，都只顾维护自身和金钱利益，表明社会产生了很强的政治犬儒主义。[10]

表10-7　对港英、英国和中国政府的信任（单位：%）

	港英政府	英国政府	中国政府
1985 年	72. 1	39. 5	31. 5
1986 年	76. 4	56. 6	31. 8
1988 年	52. 2	33. 1	22. 0
1990 年	42. 9	18. 0	10. 0
1991 年	42. 6	20. 2	11. 2
1992 年	45. 0	20. 0	18. 4
1992a 年	34. 3	13. 0	14. 7
1993 年	63. 7	27. 0	26. 2
1994 年	36. 5	19. 7	12. 5

注：1985年、1986年和1993年的调查采用四分尺度，其他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表中数字为回答“信任”和“很信任”者。

表10-8显示了港人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状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立法局逐步引入直选议员的同时，民众对其信任度却显著下滑。港督彭定康虽竭力讨好民心，却也清楚感受到自己逐渐低落的人气。长久以来作为殖民管治中流砥柱的公务员也遭遇了民众信心下跌的情况，想必与其表现屡屡令民众失望有关。

表10-8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单位：%）

	1988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4 年
港督	—	72. 8	67. 6	40. 6	21. 7
行政局	—	—	—	29. 9	—
立法局	61. 6	58. 4	58. 1	33. 9	27. 9
公务员	66. 2	51. 8	55. 1	—	29. 1
咨询委员会	—	42. 4	56. 6	—	—
区议会议员	56. 8	53. 0	56. 6	—	—

注：1988年、1990年和1991年的调查采用四分尺度，其他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表中数字为回答“信任”和“很信任”者。

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政治制度也经历了相同的民众信任危机，例如，在1988年，民众对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实际扮演中国驻港“大使馆”角色）的信任度颇高，有31.3%的受访者表示信任，而到了1990年，这一比例跌至17.4%，1991年是16.4%，1994年更骤跌至8.1%。[11]

政治领袖也未能避免民众的信心鸿沟。直接和间接选举的引入，以及中国政府与港英政府蓄意部署未来香港的政治领袖，都极大地扩大了政治角力

场。虽然政治人物在过去10多年艰辛努力，民心却未见回归。[12]因此，如表10-9所示，近10年不仅绝大多数港人心目中没有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而且持这一观点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表10-9　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单位：%）

	有	没有	不知道/拒答
1985年	24.5	47.8	27.6
1988年	16.2	69.9	13.9
1990年	9.5	69.0	21.6
1991年	12.7	71.6	15.7
1992年	19.8	68.5	11.7
1992a年	11.7	71.0	17.2
1994年	15.4	71.6	12.9

政治团体也同样受到民众质疑，而这种模棱两可的矛盾态度阻碍了政治团体的发展。[13]香港政治团体急速冒起，民众对其知之甚少，在认同上也存犹疑。表10-10的数据显示，香港政治团体要在民众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建立广泛而稳定的支持基础，仍有漫漫长路要走。就目前而言，政治团体并非港人信赖的政治角色。

表10-10　值得信任的政治团体（单位：%）

	有	没有	不知道/拒答
1990年	7.2	62.1	30.7
1991年	12.5	62.6	24.9
1992年	19.2	64.3	16.5
1992a年	13.3	68.1	18.6
1994年	16.8	67.7	15.5

与民众对政治制度信任的急跌相比，民众对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信任则令人稍感欣慰，但其下行趋势仍清晰可见。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一如既往地得到了港人的支持。1991年，大多数受访者（58.4%）同意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经济制度，仅有5.2%持相反观点。1994年，同意上述说法的受访者（57%）只有轻微减少，不同意者则增加至10.2%。表10-11的数据更细致地显示了民众对一些重要社会经济制度的信任度。总体来说，当前社会经济制度比政治制度更受民众支持，然而，过去情形却正好相反，即政治制度更受民众支持。[14]过去未改革之前的威权政治其实享有更

高的民众支持，这颇具讽刺意味。改革反令政治制度的支持率下跌，而未曾改革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支持率反而占了上风。

表10-11　对社会经济制度的信任（单位：%）

	1988年	1990年	1991年	1994年
工商界领袖	35.7	33.8	29.1	17.7
学者	61.1	61.6	59.4	50.3
专业人士	—	62.3	—	—
工会领袖	—	37.2	32.9	24.1
宗教领袖	—	39.7	31.4	22.6
律师	63.4	60.8	52.8	33.9
法官	66.7	70.8	61.4	50.0
压力团体	40.7	34.8	25.9	—
医生	—	—	72.8	58.6
新闻工作者	—	—	63.4	—
电视台	—	—	—	32.4
报章	—	—	—	37.8

注：1988年、1990年和1991年的调查采用四分尺度，1994年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表中数字为回答“信任”和“很信任”者。“学者”在1991年和1994年调查时使用“大学教授”一词。“工会领袖”在1994年调查时使用“工会”一词。“法官”在1990年调查时使用“法庭”一词。

在香港，民众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信任之间其实没有多少关联。究其原因，是由于香港一开始便奉行经济自由放任和社会不干预政策，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甚少介入。[15]再者，香港近10年政治领域的变迁对整个社会和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经济制度免受因政治制度信任下跌而引起的不良影响。民众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信任并不相互干扰，可以从这三者的因素分析结果中看出。

根据表10-12，民众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大致呈现如下结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可分为4个独立的因素，即中国政府、专业人士、英国和港英政府，以及政党和社会领袖，其中以关于中国政府的因素最为突出。政党与社会领袖归同一因素其实绝非偶然，比如香港民主同盟，他们声称代表普罗大众，倾向于与工会站在同一立场，而自由党本身亲商，拥有极强的商界联系。

表10-12　对公共权威信任结构的因素分析

	因素1 中国政府	因素2 专业人士	因素3 英国和港英政府	因素4 政党和社会领袖
中国政府	0.76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0.83			
香港特区预备工作委员会	0.86			
港事顾问	0.77			
律师		0.65		
医生		0.74		
大学教授		0.75		
法官		0.72		
英国政府			0.82	
港英政府			0.74	
港督			0.84	
立法局			0.62	
民主建港联盟				0.65
香港民主同盟				0.64
自由党				0.76
工商界领袖				0.52
宗教领袖				0.52
工会				0.57
公务员				
电视台				
报纸				
特征值（eigenvalue）	6.7	2.5	1.9	1.4
解释的方差（%）	30.6	11.4	8.4	6.4

注：表内数字乃使用变值尽简法（varimax solution），并按配对状态删除法（pairwise deletion）处理缺失值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因素负荷量低于0.5者不予登录。

对香港民主化的启示

香港的民主化基本上是由即将撤出香港政治舞台的英国政府发动的。因此，其进程未能广泛动员民众对民主的诉求，而且动员效果非常微弱。纵然港人的政治文化在民主化进程中作用非常有限，却对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和巩固深具意义（无论这个民主有多“局部”）。[16]

在这里，我不尝试解释香港的政治文化和民主化之间复杂的关系，本章以上讨论并非立意高远，我提出的问题是：对民主抱有功利价值取向的港人而言，民主化是否强化了公共权威，从而为香港进一步的民主发展奠定基础？在香港，民众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信任度似乎取决于这些制度的表现。换句话说，民主的认受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制度能否提高个人及社会福祉。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香港已实现局部民主化，但港人对各方制度表现的满意度，并不足以提升他们对公共制度的信任。

由于香港的民主并非自己产生，也非植根于广大民众对政治、社会或经济的不满，因此港人对未改革前的旧政体还带着留恋的感情。在局部民主政体下，港人对公共制度信任的下跌，并没能将其心意由旧的威权政体引向更开放的新制度。事实上，港人对旧制度的认同感仍然很强。同意“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这一看法的受访者，1985年占74.3%，1988年占70.5%，1990年下跌至59%，1992年为56.3%，1993年则为62.1%。[17]

纵观过去近10年，香港虽开始踏上民主之路，但仍可视为威权政体。关于民众对未民主化前政体的支持仍有证据：1992年仍有72%的受访者同意由公务员继续管治；1994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有56.8%。

港人对未民主化前的旧政体仍有怀旧之情，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二战”后香港的经济奇迹及社会稳定，均是在殖民统治下成就的，但这种情绪不仅会影响港人对民主的支持度，更会影响其对民主的接受度。调查结果表明，虽然港人期盼民主，却并不急切。1990年，43.1%的受访者表示香港的政治体制应保持不变，38.5%则认为需要改革。他们对民主的诉求在1992年有所增加，认为应进一步民主化的占59.8%，认为应保持不变的只占30.5%。而到了1993年，33.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近年的政制改革速度刚刚好，认为太慢的只有11.3%。

民众对公共制度的信任下跌，与对未来民主发展没有太大信心有关。1985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4.7%）认为香港有机会成功推行民主政制，1992年认为有机会成功的跌至32.8%。受访者于1990年、1991年和1994年被问到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成功的机会时，表示悲观的受访者比例依次为43.6%、43.1%和35.1%。总体而言，民众对香港民主化的未来呈悲观之势，这预示着未来民主发展将步履艰难。

在其他社会，民众对民主政府表现的不满，有可能削弱其对公共权威的信任，进而威胁民主体制的认受性。[18]在民主体制成熟发展的社会，类似威胁的程度不大，可以承受。但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即使推行了民主但政府

表现恶化，民众因此对公共制度信任下滑，成为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极大威胁。[19]

在香港，由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引发的不确定和不稳定，肯定会在短期内继续对公共制度的表现产生负面影响，香港的局部民主体制将面临严峻考验。同时，政治犬儒主义的冒起和民众的不愿参与政治，也必将阻碍香港民主发展的前景。再者，社会、经济体系虽充满活力，却也面临着民众信任的下滑，进而也就更无力搭救迈向民主但存在诸多问题的政治体制了。

章末注

1.Bradley M.Richardson and Scott C.Flanagan，*Politics in Japan*（Boston：Little, Brown，1984），pp.217-264；Kendall L.Baker et al.，*Germany Transformed*（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Bolivar Lamounier and Amaury de Souza，“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Brazil，”in Larry Diamond（ed.），*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Boulder：Lynne Rienner，1993），pp.295-326；JoséRamón Montero，“Revisiting Democratic Success：Legitimacy and the Meanings of Democracy in Spain，”in Richard Gunther（ed.），*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The Case of Spai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pp.140-168；Samuel J.Eldersveld and Bashiruddin Ahmed，*Citizens and Politics*：*Mass Political Behaviour in Ind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2.除了1985年和1986年的调查，其他都是全港性调查。所有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回应率是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计算：（1）1985年调查在观塘区（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区与住宅区混合的小区）进行，完成767个访问，回应率为46.9%。（2）1986年调查也在观塘区进行，完成539个访问，回应率为67.4%。（3）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4）1990年调查完成390个访问，回应率为69.8%。（5）1991年调查完成401个访问，回应率为55.8%。（6）1992年调查在5～11月进行，完成868个访问，回应率为55.4%。（7）1992a年调查在1992年12月～1993年2月进

行，完成1993个访问，回应率为54.9%。（8）1993年调查完成892个访问，回应率为54.6%。（9）1994年调查完成997个访问，回应率为57%；受访者的社会经济背景与1991年香港人口普查所得相似。

3.Lau Siu-kai，“The Unfinished Political Reform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in John W.Langford and K.Lorne Brownsey（eds.），*The Changing Shape of Govern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Victoria：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1988），pp.43-82；Lau Siu-kai，“Hong Kong‘s Path of Democratization，”*Swiss Asian Studies*，Vol.49，No.1（1995），pp.71-90.

4.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p.73-80；Lau Siu-kai，“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Hong Kong Chinese View of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3，No.2（1990），pp.191-209；Lau Siu-kai，“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Hong Kong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5，No.2（1992），pp.225-246.

5.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Colonial Legitim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1（1995），pp.79-102.

6.Terry Lui and Terry L.Cooper，“Hong Kong Facing China：Civil Servants’Confidence in the Future，”*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Vol.22，No.2（1990），p.159；Terry L.Cooper and Terry T.Lui，“Democrac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The Case of Hong Ko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50，No.3（1990），p.338；Joseph Y.S.Cheng and Jane C.Y.Lee，*A Study of the Bureaucrat-Politician Relationships in Hong Kong‘s Transition*（Hong Kong：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1994），pp.13-27.

7.James S.Coleman，*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Selected Essay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93.

8.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228.

9.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The Partial Vis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A Survey of Popular Opinion，”*The China Journal*，Vol.34（1995），pp.239-264；Lau Siu-ka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Asian Survey*，Vol.34，No.3（1994），pp.243-257；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in Joseph Y.S.Cheng（ed.），*Hong Kong in Transition*（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7-51；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Attentive Spectator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4，No.1（1995），pp.3-24.

10.Lau Siu-kai，“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1，No.2（1992），pp.3-20.

11.在1988年、1990年和1991年的调查问卷中，我们采用四分尺度（很信任、信任、不信任、很不信任），1994年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很信任、信任、普通、不信任、很不信任）。所以，如果1994年调查是采用四分尺度，其相关数字应该较大。

12.Lau Siu-kai，“Colonial Rul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0，No.2（1992），pp.223-242.

13.Lau Siu-kai，*Public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

14.Lau，“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p.208.

15.Lau Siu-kai，*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Asian Survey*，Vol.30，No.8（1990），pp.766-781.

16.Larry Diamond，“Introduc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in Diamond（ed.），*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p.1-33.

17.1985年、1988年和1990年的调查采用四分尺度，1992年和1993年调查则采用五分尺度。

18.Mark Franklin et al.，*Electoral Change*：*Responses to Evolving Social and Attitudinal Structures in Western Count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Jacques J.A.Thomassen，“Economic Crisis, Dissatisfaction, and Protest，”in M.Kent Jennings et al.，*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ction*：*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Three Western Democraci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0），pp.103-134；Felix J.Heunks，“From Personal to Political，”in Jennings et al.，*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ction*，pp.135-160；M.Kent Jennings，“Perception of Social Injustice，”in Jennings et al.，*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ction*，pp.161-199；Peter H.Merkl，“Comparing Legitimacy and Values Among Advanced Democratic Countries，”in Mattei Dogan（ed.），*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Strains on Legitimac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8），pp.19-63；Juan J.Linz，“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in Dogan（ed.），*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pp.65-97；James W.White，“Civic Attitud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ystem Stability in Japa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14，No.3（1981），pp.371-400；Scott C.Flanagan and Bradley M.Richardson，“Political Disaffec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Western Findings，”*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Vol.3（1980），pp.3-44；Suzanne Berger，“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Seventies，”*Daedalus*，Vol.108（1979），pp.27-50；Samuel Huntington，“The Democratic Distemper，”*The Public Interest*，Vol.41（1975），pp.9-38；Russell J.Dalton，*Citizen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ies*（Chatham：Chatham House，1988）；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eds.），*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Boston：Little, Brown，1980）；Michel J.Crozier et al.，*The Crisis of Democrac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5）；Seymour M.Lipset and William Schneider，*The Confidence Gap*：*Business, Labor, and Government in the Public Min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Samuel H.Beer，*Britain Against Itself*（London：Faber and Faber，1982）；Kevin Phillips，*The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New York：Random House，1990）.

19.William R.Reisinger et al.，“Political Valu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Lithuania：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4，Pt.2（1994），pp.183-223；James L.Gibson et al.，“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Journal of Politics*，Vol.54，No.2（1992），pp.329-371；Andrei Y.Melville，“An Emerging Civic Culture？Ideology, Public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1990s，”in Arthur H.Miller et al.（eds.），*Public Opinion and Regime Change*：*The New Politics of Post-Soviet Societi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pp.56-68；James L.Gibson and Raymond M.Duch，“Emerg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in Miller et al.（eds.），*Public Opinion and Regime Change*，pp.69-94；Arthur H.Miller，“In Search of Regime Legitimacy，”in Miller et al.（eds.），*Public Opinion and Regime Change*，pp.95-123.

---

1.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Democratization and Decline of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Democratization, Vol.3，No.2（1996），pp.158-180.

第11章　政治权威与殖民政权的认受性问题注

1997年，香港的殖民管治便会终结。由于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再加上伴随而来的政权转移，香港的殖民政府难免会沦为看守政府。殖民政府主动引入的民主政制改革，虽然程度及幅度有限，但终究终止了一直以来对权力的垄断。中国政府日益参与香港事务，也自然令殖民政府越来越感受到未来主权国日渐扩张的影响。民主改革为近年冒起的各种本地政治势力提供了活动空间，它们对行将撤离的政权不断提出挑战。因为“九七回归”而产生的政治忧虑感及恐惧感提升了港人的政治意识，并促使他们向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诉求，但与此同时，政府的管治能力却因为公务员的惴惴不安而弱化。简单来说，殖民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1]

身处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民众很自然地会预期殖民政府的权威削弱及认受性下滑。事实上，这些现象已经出现。[2]不过，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仍未跌至使英国人无法取得足够权威以维系像样管治的地步。在港人心目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本地的政治势力，都不能够取代港英政府成为有效管治者。如果我们把这些有趣又使人困惑的现象与香港殖民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民族运动、反殖民运动或独立运动的事实一并审视，那么香港与其他前英国殖民地的差异的确很惊人。

很明显，香港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有巩固的基础。鉴于管治的长期性及有效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港英政府也许已经为自己取得了某种程度上伊斯顿（Easton）所言的“普遍支持”（diffuse support）。[3]对港英政府而言，这是个不小的成就，因为这种认受性在其他殖民地十分罕见。当然，这种认受性可以由香港的独特性来加以解释。即使如此，要深入理解香港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本质，我们有必要探讨港人对政府权威的取向，了解政府权威对他们究竟有何意义。

针对民众对政府权威的态度及对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本质的研究，并非只具有学术意义。其研究成果，对于政权过渡的分析、香港的民主化与政治领袖的产生等问题来说，也具有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尽管香港的殖民管治会在1997年结束，但由于殖民政权在港人心目中的政治认受性仍然存在，民众不会马上把效忠对象转移到新政权，因此新政权会遇到一些管治上的困难。殖民政权认受性的持续也会削弱民众对民主改革的支持，妨碍本地政治领袖的涌现。

本章数据主要来自我们在1992年进行的全港性随机抽样调查。其他辅助数据则取自我们与其他学者以往的调查发现。[4]如非注明，本章引用的民意

数字都来自1992年的调查。

殖民政权的认受性

在殖民管治者行将撤离的前夕，港人基本上依然接受并且留恋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身份。民众一般仍旧认可殖民政权。这些现象表明了英国人在香港实施殖民管治的成功，并印证了英国的殖民管治具有政治认受性的事实。

1992年的调查清晰显示了殖民政权受到港人的拥护。有相当大比例的受访者（84%）同意以下说法："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好好地照顾人民，即使它是殖民政府，也应该得到人民的拥护"，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人极少，只有5.6%；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很少的人（4.1%）没有明确意见（指答称"不知道"或不予作答的人），这表明大多数港人毫不含糊地或确凿地支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管治。

港人对殖民管治的支持似乎并非单纯地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或是由于没有其他可取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对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好像并无怨怼之情。有人认为，由于殖民主义蕴涵了种族不平等、政治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经济剥削及文化冲突等特征，因此在殖民地人民心中出现某种羞耻感，对异族统治的抗拒感便不可避免，即使这些感受不一定导致公开的反叛。[5]但显而易见，这不是香港的情况。绝大部分受访者（83.9%）坦白承认他们没有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觉得心中不舒服，当然也不一定以此为荣，持相反意见的人则只占11.3%。一如所料，学历较高的人比其他人较多地感到不舒服，而没有明确看法的人则只占极小比例（4.8%）。我们仍有理由认定，对港人来说，保留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是可以接受的。

殖民政权所享有的政治认受性，也可以从殖民地政治体制所获得的民众支持中窥见。其中一个指标是民众对公务员治港的持续支持，而公务员作为统治者的情况，一直都是香港及其他前英国殖民地的主要特点。在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72%）对以下问题持肯定立场："香港一直以来都是由公务员管治。如果香港以后继续由公务员管治，你是否同意呢？"反对的人则只占微不足道的7.5%。

很明显，过去10年来，民主改革并没有动摇港人对宽厚式威权政治体制的支持，以往连续数次的调查都显示，民众支持现行政治体制。在1985年及1988年的调查中，各有74.3%及70.5%的受访者同意"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这一说法；[6]1990年及1991年调查的相关数字分别为59%及72%；[7]1992年调查的相关数字则为56.3%。需要当心的是，由于政制改革，在不同的调查中，所谓"现行"的香港政制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殖民政制的基本特征一般被港人接受，当然也需要承认一点，就是港人对现行政制的接受度正在缓

慢下降。

虽然民众对现行政制怀有自满感，但这并不表示港人不希望政制有所转变。事实上，香港存在着一股温和的民主改革诉求。在调查中，59.8%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政治体制应该进一步民主化，只有30.5%的人表示应该保持不变。不过，较多的港人倾向于把民主政府定义为“一个肯咨询民意的政府”，而民主政府是“一个由市民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意义，并不普遍为民众接受。在1988年的调查中，较多受访者（44.2%）认为民主政府是一个肯咨询民意的政府；同样地，在1990年、1991年及1992年的调查中，各有39.5%、35.9%及40%的受访者把民主政府定义为咨询型政府。那些把民主政府定义为“一个由市民选举出来的政府”的受访者比例，在1988年、1990年、1991年及1992年的调查中分别为14.9%、27.9%、21.9%及22.7%。[8]由此可见，在很多人心目中，所谓民主改革，其实基本上是以现行政制为基础加以改进，而非激烈的变革。无论如何，港人并无意图以其他政治力量取代现有管治。事实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3%）强调，除了港英政府外，并没有发现另外的政治力量有能力把香港管治好。

除了整体政治体制外，殖民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港督、行政局、立法局、立法局内的各类议员及政府高官，基本上得到了港人的支持（见表11-1）。

表11-1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单位：%）

	信任	普通	不信任	不知道	拒答
港督	40.6	38.6	13.5	7.0	0.3
行政局	29.3	39.6	15.8	14.6	0.6
立法局	33.9	41.4	12.1	11.9	0.8
立法局委任议员	23.6	39.9	21.9	13.8	0.8
立法局直选产生的议员	46.4	31.7	8.3	12.8	0.8
立法局功能团体选出的议员	31.4	38.6	11.0	18.3	0.8
政府高官	16.8	36.6	33.7	12.1	0.7

一个令人费解的发现是，在政制各组成部分中，政府高官最不为民众信任。在我们过去的调查中，公务员通常都是最受民众信任的，因此表11-1的发现令人诧异。[9]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臆测其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用了“政府高官”这个词，使受访者容易联想到一些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官僚，因而做出负面的回应。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民主改革导致高级官员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公开批评，从而使他们在民众眼中的

地位下降。但不管怎样，政府高官的公众形象受损是不争的事实。

一般而言，过去10年间，各种变迁理应对殖民政权的认受性造成冲击，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到目前为止，以民众接受度而言，殖民政府的状况看来还是蛮不错的。

对港英政府的评价

各种指标似乎都显示，民众对港英政府的评价日益下滑，不过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港人认受。以一个“夕阳”政府来论，尤其是把它与西方国家日益减少的民众支持相比较，[10]殖民政府确实干得不错。

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现正处于下降，[11]当然还未达到危险水平。在1985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分别有72.1%、76.4%、48.5%、42.9%及42.6%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港英政府；1992年调查的相关数字则为45%。

虽然港英政府近年来在行政上的表现比之前有所下滑，但民众对其评价仍处于安全线内。在1985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及1991年的调查中，认为港英政府的工作表现良好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61.2%、43.6%、41.2%、22.8%及31.1%；1992年调查的相关数字则为28.4%。这再次显示了下降的趋势。

此外，大概1/4的受访者（23.5%）表示港英政府办事公正，只有18.1%抱怨政府不公正，约一半受访者（51.4%）则认为一般。一个殖民政府竟被其人民视为办事公正，不能不说是个成就。

在1991年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63.6%）承认喜欢港英政府；有为数不少的受访者（38.9%）甚至表示会在回归后怀念港英政府。在此次调查中，当被问及他们对港英政府有没有好感时，34.8%的人表示有好感，声称没有好感的只占14%，49.2%则答称对政府的感情一般。

为了进一步了解港人对政府的评价，我们要求受访者就政府在各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价，其结果如表11-2所示。

表11-2　对港英政府各方面表现的评价（单位：%）

	好	普通	不好	不知道	拒答
关心市民的疾苦	17.9	48.3	31.5	2.2	0.1
解决香港所面对的问题	20.6	48.7	25.0	5.4	0.2
推动民主	21.6	43.5	25.5	9.1	0.3
处理与市民的关系	23.8	52.2	17.8	5.6	0.6
满足市民的需要	14.0	46.8	36.5	2.4	0.3
推动经济发展	54.2	30.3	9.3	6.1	0.1
维持社会治安	35.8	37.0	25.3	1.8	0.1
维护社会道德	31.2	45.5	17.4	5.4	0.5

（续表）

	好	普通	不好	不知道	拒答
爱民如子	13.3	43.7	37.7	4.3	0.9
提供社会福利	28.3	42.7	26.1	2.6	0.1
在英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16.5	34.3	38.3	10.3	0.6
在中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17.6	36.3	33.2	12.3	0.5
控制通货膨胀	10.6	25.9	58.8	4.1	0.5
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20.2	44.1	32.5	3.0	0.2

为了方便分析，我们用变值尽简法（varimax solution）进行因素分析，则表11-2内的多个变项综合成为几个主要因素，分析结果列于表11-3。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变项可归为4个独立因素，其中一个可以解释它们之间多达35.2%的方差，我们把这个主导因素命名为“照顾人民”。若我们把表11-2及表11-3的发现一并考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港英政府虽然大体上得到港人还不错的评价，但民众觉得政府在“照顾人民”方面未尽人意。对于港英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民众表示赞赏，却不满政府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此外，民众也不认为港英政府在英国及中国政府面前保障香港的利益方面有所作为。

表11-3　对港英政府表现评价的因素分析

	因素 1 照顾人民	因素 2 维护香港利益	因素 3 促进经济发展	因素 4 维持社会秩序
关心市民的疾苦	0. 70			
解决香港所面对的问题	0. 71			
推动民主	0. 57			
处理与市民的关系	0. 68			
满足市民的需要	0. 65			
爱民如子	0. 64			
在英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0. 79		
在中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0. 80		

（续表）

	因素 1 照顾人民	因素 2 维护香港利益	因素 3 促进经济发展	因素 4 维持社会秩序
推动经济发展			0. 70	
控制通货膨胀			0. 63	
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0. 71	
维持社会治安				0. 76
维护社会道德				0. 80
提供社会福利				
特征值（eigenvalue）	5. 28	1. 15	1. 09	1. 04
解释的方差（%）	35. 2	7. 7	7. 3	7. 0

注：因素负荷量低于0.5者不予登录。

尽管港人对政府的接受度逐渐下降，但大体上依然维护政府的管治权威。在政治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少人担心香港在回归前会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局面。在调查中，有37.8%的受访者承认担心未来几年会出现政治不稳定，而比较之下，没有这个担忧的人的比例则稍多一些（42.7%）。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然期望港英政府负起维护本土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重责。由于民众不认为有可以取代现行政府执政的其他政治势力，他们难免会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性。纵使政府的权威正在缓慢地减弱，但只有少数人认为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力。大部分受访者（66.2%）不认为港英政府拥有的权力过大，认为权力过大者只占21.4%。相反地，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扩大政府的权力。当被问及在目前情况下，港督的权力是应该加强、削减或维持不变时，受访者的答案颇具启发性。极少数人（12.1%）赞成削减港督

的权力，38.7%的人则无意改变现状，不过仍有不少人（33.4%）主张加强港督的权力。

作为一个有着多元化利益的现代社会，香港的私人利益与个体利益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众认受性。这种认受性在传统中国社会是不存在的。在传统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得到肯定，而私人利益被加以贬抑。在调查中，稍低于一半的受访者（45.4%）肯定香港各界人士尽力向政府争取自己利益的做法，大约1/4的受访者（23.7%）则表示无所谓，只有23.2%反对私人利益抬头。然而，尽管港人对私人利益采取宽容的态度，但仍有相当大比例（7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有责任约束那些主要为了争取自己利益的个人或团体。在主权移交前夕，由于政府权威下降及社会道德准则松弛为私人利益的扩张营造了一个合适的环境，民众因而更重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保障者的角色。正因为在这件事上，港英政府是难以取代的，所以它在民众心目中的认受性也有所提高。

对好政府的认识

为了探究殖民政权认受性的根源，我们有必要了解港人对好政府的认识。过去的研究显示，在香港华人的政治文化中，所谓的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传统价值观的影响。[12]香港的民间观点认为，港英政府刻意仿效过去中国帝王及士大夫的治国之道，以巩固在香港的殖民管治。所以，我们需要先探讨，究竟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在港人心目中是否仍有巨大影响力。如果情况属实，则随之而来的工作便是确定殖民政权的认受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观。[13]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国家被视为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制约家庭的道德及运作原则基本上也适用于国家。皇帝乃人民的大家长（paterfamilias），官员则是人民的父母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理应和谐，而统治者更有责任确保人民之间关系和睦。在中国人的社会与政治思维中，冲突是令人厌恶的东西，甚至被当成是不正常的，社会内如果出现严重冲突，为政者也会面目无光。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便是现实情况尽可能预防、处理或控制冲突。

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差距相当大。政府认为自己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认受性基础则建立在统治者的道德优越性上。人民的职责，则是竭诚地服从政府，并切实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在这种结构中，“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的观念并不存在，但人民被赋予一种在苛政下可以反叛的终极“权利”。不过，为了继续保有“天命”，也为了回报人民对管治的认可，政府自觉有责任照顾人民的福祉、保护他们不受外来威胁、教育人民、维持公共秩序、赢得民心，以

及置人民的利益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传统价值观要求政府实行简政，并且要轻徭薄赋。政府也有责任平均财富，以避免因人民间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社会及政治动乱。

传统的政府治理是由贤人领导的，而贤人必须要不懈地进行道德修养。国家有着崇高的责任去教化人民，并借官员的行为示范作用，在社会中宣扬道德规范。由于传统治理之道最推崇的成就是营造社会和谐局面，因此在人民心中灌输道德观念（特别是那些关乎不同类别的人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便成为政府在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时的关键任务。

本质上，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由国家支配。国家的权力在法律上或理论上不受限制。因此，在公众利益的名义下，国家可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国家并不承认社会经济团体在政治上的自主性。对统治者而言，“有限政府”（即只负责有限职能的政府）的概念乃异端邪说。政府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手段，才会受到制约而无法过分介入社会经济事务。从相反角度看，每当有公共事务必须要处理时，人民便会表现出一股强烈依赖政府的情绪。政治事项及公共问题属于政府独占的管辖范畴，而民众在政治上的参与不被鼓励，自发性的民众行动更被压抑。一个好的政府，被认为是能够使人民感到无须参与政治的政府。换言之，一个管治良好的社会，必然也是非政治化的社会。

为衡量传统政治价值观念对港人心目中好政府的影响程度，我们设计了一系列有关好政府的定义，并征求受访者的意见。有关调查结果可见表11-4。为了方便分析，我们也采用了变值尽简法，对表11-4中的变项做因素分析，结果则在表11-5中列出。

表11-4　对好政府特征的意见（单位：%）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不知道	拒答
好的政府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	81.6	7.7	8.7	1.5	0.5
好的政府能够将所有事情打理好，使得人民不需要参与政治活动	41.5	7.3	46.0	4.6	0.7
好政府的官员有高尚的人格与道德操守	83.2	7.1	6.1	3.1	0.6
好的政府会教育人民如何好好做人	81.7	7.3	7.5	3.3	0.2
好的政府拥有无上权威，不会被社会其他力量挑战	28.9	7.1	56.8	6.7	0.5
好的政府能够把公众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防止其他利益损害公众利益	88.8	3.7	3.3	4.0	0.2
好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一定是和谐的	85.9	6.7	6.0	1.4	0.1
在好政府管治之下，社会很少发生冲突	74.5	8.6	13.1	3.3	0.5
好政府的官员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	83.3	6.9	6.5	3.1	0.2
好的政府是不会容许富人太有钱，也不会容许穷人太穷	65.9	11.1	17.9	4.4	0.8
好的政府对所有的人民都不分彼此，同样对待	87.5	5.2	5.2	2.0	0.1
好的政府是尽量不管社会事务	14.8	5.5	73.8	5.4	0.5
好的政府是尽量不管经济事务	16.3	7.9	68.9	6.7	0.1
好的政府不会滥用权力	88.3	2.6	5.1	3.6	0.3

表11-5　对好政府特征意见的因素分析

	因素1 政治家长主义	因素2 政治威权主义	因素3 干预型政府
官员有高尚的人格与道德操守	0.50		
政府能够把公众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0.60		
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一定是和谐的	0.64		
官员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	0.68		
政府对所有的人民都不分彼此	0.69		
政府不会滥用权力	0.59		
政府能够将所有事情打理好		0.71	

（续表）

	因素 1 政治家长主义	因素 2 政治威权主义	因素 3 干预型政府
政府会教育人民如何好好做人		0.50	
政府拥有无上权威		0.69	
政府尽量不管社会事务			0.87
政府尽量不管经济事务			0.87
政府对待人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			
社会很少发生冲突			
政府不会容许富人太有钱			
特征值	3.23	1.93	1.33
解释的方差（%）	23.0	13.8	9.6

注：因素负荷量低于0.5者不予登录。

从表11-5可以看出，港人对好政府的认识仍然相当传统。“政治家长主义”（political paternalism）因素在表中很显著，这说明在民众眼中，一个带有家长取向的威权型政府才是理想的政府。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有多达81.6%的受访者选择一个家长型的政府（即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在1985年的调查中，有81.1%的受访者同意“政府应该像父亲一样对待人民”的说法。[14]事隔多年，港人仍然把好政府视为家长，不能不说是件令人诧异的事。从这个对好政府的理解出发，民众自然也会期望政府能够养育及教化人民、由具有道德品格的官员领导、维护公共利益及保持社会和谐、与人民和睦相处，并且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及慎重地行使权力。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发现是，虽然殖民政府长期以来都实施经济自由放任及社会不干预政策，且香港已充分发展了社会多元化的局面，但港人仍然期望政府更多地介入社会经济事务。[15]

不过，在传统主义的笼罩下，我们仍可以看到政治价值观念的一些转变。很明显，民众希望在公共事务方面有发言权，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得见。有46%的受访者不同意好政府是一个能够把所有事情处理好，从而使得人民不需要参与政治活动。连带有关的是，多数受访者（56.8%）不愿看见出现一个拥有无上权威而又不受其他力量约束的政府，这种看法在学历较高者中尤其普遍。诚然，民众期望看到一个拥有强大权威的政府出现，以确保香港的政治稳定并对狭隘利益加以约束，但他们同时担心无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50.1%的受访者认为港英政府需要受

到约束，而反对者则占36.1%。至于应该由谁负责约束政府，只有15.7%的人认为应由中国政府负起这个责任，更多受访者（59.5%）则赞成由民主派人士来约束政府。另外，尽管香港官员多次抱怨有部分选举成分的立法局阻碍了政府施政，但多数受访者（52.6%）表示不同意政府受到立法局过分的约束。总体而言，纵使港人对何谓好政府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仍受传统观念影响，但我们仍可发现一些民主思想的渗入。显然，民众希望能够扮演一个较为积极的角色，以驱使政府更切实地履行传统思想所定义的政府职能。

对好政府的理解与殖民政权的认受性

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是不是建基于其符合民众对好政府的要求呢？表面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有条件的肯定回答。殖民政府明显致力于营造家长的公众形象，希望民众视它为一个持平（甚至是“超越政治”）的政府。在殖民管治之下，香港创造了20世纪的经济奇迹。殖民政府也通过提供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来显示对市民生活的关怀，特别是帮助社会不幸人士。它也借实施经济自由放任及社会不干预政策，执行低税方针，力求避免对民众造成太大的负荷。香港的法治体系一般为民众所接受，因此港英政府也不会被人指控歧视华人或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由于香港并无明显的民族冲突，民众也比较相信政府处事公正，并且不会滥用权力。作为一个基本廉洁的政府，殖民政权也许还能以拥有若干程度的道德操守而自诩。

当然，在某些方面，殖民政府背离了民众所理解的理想治道。殖民地官僚架构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组织，而它“没有面目”的官员更与民众所期许的能够与人民建立温情关系的贤人政府相去甚远。港英政府刻意置身于社会道德问题之外，使它失去了赢取民心的重要机会。港英政府由于过分遵循“有限职能政府”的原则，有时不免令港人觉得麻木不仁且遥不可及。不过，即使在一些方面背离了好政府的准则，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港英政府大致上仍然合乎港人对好政府的定义。

事实上，我们发现，民众对好政府的理解与他们是否接受殖民政权并没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结果是我们没有预见的。很明显，殖民政权的认受性并非因为符合港人心目中的好政府形象。换言之，虽然港英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奉行传统的治道，但并不构成港人接受它的原因。

政治信任与殖民政权的认受性

如果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与民众对好政府的理解只有微弱关系，那么为寻求解释，我们下一步需要探讨的是殖民政权认受性与民众对政治制度（即殖民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及3个在香港拥有政治权力政府的信任的关系。

理由是，如果主要的政治制度受到民众信任，那么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便会相应提高。同样地，如果民众信任港英政府与英国政府，殖民政权在他们眼中的认受性也会因此强化。相反，如果民众不信任中国政府，民众会因逆反心态而支持殖民管治。表11-6显示了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与民众对政治制度及3个政府的信任的关系。

表11-6　接受殖民政权与信任政治制度及政府的关系

	接受好的殖民政府	对香港作为殖民地感到不安	保留香港作为殖民地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港督	0.11**	-0.16**	0.11**
行政局	0.10**	-0.15**	0.10*
立法局	0.13**	-0.11**	0.10*
立法局委任议员	0.12**	-0.17**	0.17**
立法局直选产生的议员	0.18**	-0.08*	0.04
立法局功能团体选出的议员	0.07**	-0.03	0.09
政府高官	0.09**	-0.12**	0.08*
对政府的信任			
港英政府	0.12**	-0.15**	0.11**
中国政府	0.04	-0.01	-0.20**
英国政府	0.12**	-0.20**	0.30**

*p＜0.05　**p＜0.01

注：表中数字为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s r）。

表11-6中的大部分发现都可以说在意料之内。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与民众是否信任维系殖民管治的核心制度有关。这些制度包括港督、行政局、立法局、立法局委任议员及政府高官。民众是否信任那些新生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殖民政治体制的附加成分，即立法局直选及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却与他们是否赋予殖民政权认受性只有微弱的关系，特别是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因此，较认可殖民政治体制主要组成部分的人，也会较倾向于赋予殖民政权认受性。

通过表11-6可以看出，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与民众是否信任港英及英国政府是相关的。表中数字显示，殖民政权认受性的指标与民众对港英及英国两个政府的信任度，在统计学上有显著的正向相关。至于与信任中国政府的关系，则颇令人费解。信任中国政府与否，只与是否支持保留香港作为英

国殖民地有负向相关的关系，但与是否愿意接受一个虽是殖民地却是好的政府，以及是否因为香港的殖民地身份而感到不舒服，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民众赞成保留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很有可能是基于实际的考虑，即港人甚为担忧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所产生的后果。由于信任中国政府与否，与另外两个更能反映殖民政权认受性的指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在解释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方面，中国因素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般重要。

政府工作表现与殖民政权认受性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港英政府的认受性建基于它的工作表现，而港人则以功利态度来对待统治者。[16]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应该可以找到民众对政府表现的评价与他们是否接受殖民管治的关系。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我们计算了衡量政府工作表现的指标与显示民众接受殖民政权的指标的相关度。

总体来说，计算得来的数字并不足以显示民众是否接受殖民管治，与政府在行政上的表现有太大关系。假如我们细心检视有关数字，可以发现一些令人惊奇的现象。在统计学上，与所有3个衡量殖民政权认受性指标有显著相关（虽然不是很强的相关）的，只有3个显示政府工作表现的指标，包括推动民主、在英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以及在中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很明显，推动民主及在英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与殖民管治认受性并不相关。另外，要求港英政府在中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也实在是一件不易做的事，因为这显然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因此，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殖民政权认受性与政府工作表现有任何关系，那么这关系是由政府在超越其能力范围以外事情上的表现所造成的。

这些意料之外的发现间接显示了港人对政府职能有一些新的期望。很明显，这些期望是由于回归问题改变了香港的政治形势而引发的。随着民主诉求的增加，港人越来越以政府是否积极回应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愿望，作为评价政府工作表现的准则。由于英国及中国政府在香港事务上的参与日益显著，促使港人提高了对中英两国与香港之间在利益上出现矛盾的警觉性。在港英、英国及中国政府中，后两个政府是港人较不信任的。在调查中，表示信任港英政府的受访者有45%，而信任英国及中国政府的则分别只有20%及18.4%。可能是因为港人不信任两个主权国政府，所以把维护本地利益的希望寄托在殖民政府身上，尽管他们也充分了解港英政府不可能不以英国的利益为依归。

主观福祉与殖民政权认受性

如果政府的工作表现不能为殖民政权认受性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另一个明显的原因似乎是港人在殖民管治下的切身经验。理由是，如果殖民管治能够为某个人提供合适的个人发展及社会生活环境，他便会较乐意容忍或接受殖民管治。事实上，1992年的调查也可能支持上述看法，因为结果显示，港人大体上对自己的生活及社会整体状况满意。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42.8%的受访者感到满意，42.7%的人表示满意度一般，而觉得不满意的只有13.2%。对于香港当前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状况，分别有32.2%、18.3%及22.1%的人表示满意，表示不满意的分别占28.8%、24.8%及30%，不过较多的人对这3种状况的满意度表示一般，其比例分别为34.1%、38.1%及41.9%。

为了了解港人支持殖民管治是否因为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满意，我们计算了殖民政权认受性的指标与个人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以及是否满意香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相关度。奇怪的是，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因此我们可以说，港人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及他们是否满意香港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状况，并不影响其对殖民政权的认受性。

对好政府的理解与对政府的信任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集中讨论了可能影响港人对殖民管治接受与否的因素。在多个因素中，民众是否信任主要政治制度、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比较能解释港人是否愿意接受殖民政权。换句话说，对殖民政权认受性最具关键影响的，是作为殖民管治具体体现的港英政府与英国政府（尤其是前者）能够得到港人多大的信任。因此，我们需要检视决定港人对港英政府及英国政府信任的因素。鉴于民众一般不太信任英国政府，以下分析将集中在港英政府。

作为分析的开端，我们先探讨民众是否因为港英政府及英国政府符合他们对好政府的理解才信任它们。因此，我们计算了民众对好政府的理解与对两个政府信任的相关度。

数字显示，民众对好政府的理解与其对两个政府的信任度之间只有微弱关系。相对而言，民众对好政府的理解与其对港英政府信任的相关度，比前者与对英国政府信任的相关度强一些。不过，在深入分析后，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一些有趣的发现。在民众心目中，有几个被认为是好政府的标准与是否信任港英政府及英国政府有较密切关系。这些标准包括：好的政府能够将所有事情打理好，使人民不需要参与政治活动；好的政府拥有无上权威，不会被社会其他力量挑战；在好政府管治之下，社会很少发生冲突。对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传统观念去理解好政府的人，会比其他人更为信任港英政府及英国政府。

政府工作表现评价与对政府的信任

民众对港英政府工作表现的评价对殖民政权认受性虽然只有很小的影响，但它与民众是否信任港英政府与英国政府却有较强的相关性。从表11-7可以看出，所有用以衡量民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变项，都与他们对两个政府的信任度显著相关。

事实上，表11-7揭示了港人对政府所持有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取向。很明显，港人之所以接受殖民政府，主要是因为它有能够令人满意的表现。

表11-7　政府信任与港英政府工作表现评价的关系

	信任港英政府	信任英国政府
关心市民的疾苦	0.34**	0.34**
解决香港所面对的问题	0.35**	0.31**
推动民主	0.25**	0.21**
处理与市民的关系	0.32**	0.33**
满足市民的需要	0.30**	0.32**
推动经济发展	0.21**	0.24**
维持社会治安	0.18**	0.20**
维护社会道德	0.27**	0.23**
爱民如子	0.36**	0.29**
提供社会福利	0.35**	0.34**
在英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0.33**	0.26**
在中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0.31**	0.22**
控制通货膨胀	0.26**	0.23**
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0.32**	0.30**

*$p<0.05$　**$p<0.01$

注：表中数字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主观福祉与政治态度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们对各种情况的满意度与他们是否接受殖民政权基本上没有关系。不过，正如表11-8显示，人们如果对自己的生活及香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满意，他们也会对各类政治权威有好感。

表11-8　主观福祉与对政治权威态度的关系

	个人目前生活满意度	香港经济状况满意度	香港政治状况满意度	香港社会状况满意度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港督	0.17**	0.19**	0.15**	0.12**
行政局	0.14**	0.18**	0.24**	0.16**
立法局	0.16**	0.18**	0.21**	0.19**
立法局委任议员	0.11**	0.10**	0.12**	0.15**
立法局直选产生的议员	0.10**	0.12**	0.08*	0.10**
立法局功能团体选出的议员	0.07	0.08*	0.13**	0.12**
政府高官	0.11**	0.10**	0.18**	0.18**
对政府的信任				
港英政府	0.15**	0.22**	0.26**	0.23**
英国政府	0.07*	0.09*	0.18**	0.17**
对政府行政表现评价	0.16**	0.24**	0.23**	0.27**
对港英政府有好感	0.16**	0.23**	0.22**	0.26**
政府办事公正	0.15**	0.19**	0.24**	0.25**
赞同公务员治港	0.04	0.08	0.15**	0.18**

*p＜0.05　**p＜0.01

注：表中数字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同样地，当港人对个人生活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满意时，也会对政府工作表现给予较高的评价。从表11-9可以看出，受访者对4个方面的满意度与几乎所有衡量政府工作表现的指标之间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表11-9　主观福祉与对港英政府工作表现评价的关系

	个人目前生活满意度	香港经济状况满意度	香港政治状况满意度	香港社会状况满意度
关心市民的疾苦	0.15**	0.17**	0.25**	0.27**
解决香港所面对的问题	0.17**	0.16**	0.22**	0.26**
推动民主	0.15**	0.05	0.24**	0.17**
处理与市民的关系	0.21**	0.21**	0.24**	0.25**
满足市民的需要	0.21**	0.26**	0.23**	0.26**
推动经济发展	0.18**	0.27**	0.20**	0.14**

（续表）

	个人目前生活满意度	香港经济状况满意度	香港政治状况满意度	香港社会状况满意度
维持社会治安	0.16**	0.13**	0.18**	0.26**
维护社会道德	0.17**	0.11**	0.22**	0.26**
爱民如子	0.14**	0.14**	0.21**	0.28**
提供社会福利	0.16**	0.19**	0.21**	0.23**
在英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0.15**	0.10**	0.16**	0.13**
在中国政府面前维护香港的利益	0.10**	0.05	0.21**	0.13**
控制通货膨胀	0.14**	0.17**	0.13**	0.20**
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0.15**	0.27**	0.15**	0.27**

$^{*}p < 0.05$　$^{**}p < 0.01$

注：表中数字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政治犬儒心态与对殖民管治的态度

尽管港人普遍接受殖民管治，并且对港英政府的观感不错，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他们对殖民政府潜伏着一股犬儒心态或愤世情绪。无论殖民管治如何仁厚，或在行政管理上如何有能力，蕴藏在殖民主义中的民族间基本不平等原则，以及香港华人心中的民族自傲感，都会不可避免地孕育出某种对殖民统治者的政治犬儒心态。到目前为止，这股情绪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只是一股不太重要的暗涌。但由于主权行将转移，民众认定中英两国政府背着港人进行秘密交易，由于怀疑行将撤退的殖民政府有着不可告人的目标，也由于单纯的政治不安全感作祟，民众的政治犬儒心态便油然而生。1991年的调查已经清楚显示了这一心态的存在。[17]

政治犬儒心态正在逐步上升，1992年的调查清楚地发现了这种心态的各种表现。从表11-10中可以看出，所有反映愤世情绪的语句都获得了受访者的普遍认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港英政府作为殖民政府，是以维护英资财团的利益为己任的。无论如何，港人的政治犬儒心态肯定会使他们质疑港英政府作为公平公共利益捍卫者的诚意。

表11-10　对港英政府的政治犬儒心态（单位：%）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不知道	拒答
港英政府是欺善怕恶的	39.8	18.9	32.0	8.6	0.6
港英政府只懂得照顾自己的利益	49.4	19.4	25.5	5.1	0.7
港英政府浪费纳税人的钱	50.6	22.4	18.8	7.1	0.9
港英政府主要照顾富人的利益	55.0	19.1	21.1	5.1	0.6
港英政府主要维护英资财团的利益	62.4	15.1	10.7	11.5	0.3

港人的这种心态会削弱对殖民政权的认受性。具有政治犬儒心态的人也大多不满意自己及社会的状况，而这反过来又会引发愤世之情。

政治犬儒心态虽未严重到衍生民众反对殖民管治的地步，但此心态也的确催生了某种程度的反殖情绪。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所有衡量政治犬儒心态的指标都与“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觉得心里不舒服”显著相关。

数字也显示，政治犬儒心态会助长民众对港英政府的不满之情。此心态较强的人也比较不信任港英政府，认为港英政府工作表现不好，不喜欢港英政府，以及觉得港英政府处事不公正。

结论

在绝大多数殖民地，殖民统治是以武力镇压作为支撑的。殖民地人民之所以服从殖民权威，主要是由于害怕在物质方面受到剥夺，以及在肉体上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殖民认受性既不稳定，又不确定。不但殖民政权的权威容易受到人民的揶揄及挑战，殖民统治者亦要在镇压工具（军事性、法律性及政治性的）上大量投资，才可以维持政治支配地位。

在世界殖民史上，香港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一系列的因素使香港异于其他殖民地。毋庸置疑，在世界所有殖民地中，香港的工业化程度最高。同时，它是一个很“平静”、服从及自满的殖民地。在整个香港的历史中，找不到严重的反殖民运动。除了在“二战”期间香港曾一度被日军占领外，殖民管治一直比较平稳、顺畅。虽然香港的宪制曾经做过一些变动，但香港现在的管治方式与以往的差异其实不是很大，统治阶层本质上依旧是那群

在政治上自我延续的官僚及经济精英。

与其他殖民地相比，香港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对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有极其重要的含义，即香港是英国以武力从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抢夺过来的，在抢夺发生时，该主权国（中国）在政治及军事上正处于衰弱不堪的状态。英国人谋取香港的主要动机并非扩张领土，而是获得一个安全基地，以保护及促进他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在整个香港的历史中，中国内地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受战乱及动荡的折磨。为了追求经济发展机会、逃避政治迫害，或是替自己及后代寻找庇护所，大量华人自中国内地涌入香港。由于香港在英国占领时，只是一个荒芜又缺乏人烟的岛屿，所以另一个使香港与其他殖民地有别的主要特征是，殖民地人民是在殖民政府建立之后才迁入殖民地的。这表示，到香港定居的华人大多无意挑战殖民地权威。相反，殖民政权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确保了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不受内部因素的威胁。

再者，要发展一块无任何自然资源的殖民地，人才的引进必不可少，因此殖民政府不得不实行开明之治，以吸引中国内地移民前来，特别是拥有资金及生产技能的人。结果，对于香港华人而言，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力，却在一个大体上公正的法律制度下，得到充分的赚钱自由。附带出现的，自然是种族矛盾的纾缓，种族矛盾仅以隐晦及非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开明的殖民管治，再加上大批意欲在殖民管治之下谋取私利的华人涌入，使香港最终获得一个庞大的人口，由于能够从战后的世界性经济复苏中获益，并且能够在过去40年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殖民政府在港人心目中的认受性自然得以提高。

很多时候，反殖民情绪来自殖民地人民心中的一份羞耻感。理论上，这份羞耻感在华人之间应该特别炽烈并令人感到痛苦，因为人们可以从其祖先的光辉文化中取得民族自豪感，而且对于在内地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及战后出现的全球反殖民运动，他们也不能无动于衷。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即使香港华人对殖民管治怀有羞耻之情，但这份情感被两个因素冲淡，即民众对共产党统治的恐惧及他们本身的功利主义考虑，这两个因素使得港人自愿接受殖民管治，纵使不一定积极认可。再者，民众也一致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及政治本领，可以随时收回香港主权，这便令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维持殖民管治，原因并非中国国力薄弱或中华民族破败不堪，而是一种中国内地及香港华人皆蒙其利的精明及务实政治安排。

从清朝到新中国成立，港人一直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实际上支撑了香港的殖民管治，港人要改变政治状况，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便是接受中国政府的管治，但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

一般来说，在提升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方面，香港作为殖民地的历史根源、管治方式、经济发展、殖民地人口的构成、中国因素的影响及香港缺乏政治独立的条件等因素都起了相应作用。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支撑殖民管治的殖民政权认受性的主要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最后几年的殖民管治及回归后特区政府如何建立权威，都有着很大的意义。

这项研究的发现，使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可以较有把握。证据显示，港人接受殖民管治，并非因为殖民政府体现了他们心中所谓的理想政府概念，换句话说，殖民政府并不依靠人们的“规范性服从”（normative compliance）（即人们服从政府，是因为它符合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来维系它的管治。正如上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武力镇压在香港管治过程中角色有限。因此可以说，殖民政权的权威主要不是建立在“规范性服从”及“镇压性服从”（coercive compliance）（即服从是基于对武力镇压的恐惧）之上，尽管规范性及镇压性的因素在维持殖民管治过程中仍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18]

与一般人的认识相反，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恐惧，并非他们接受殖民管治的主要因素，虽然中国因素仍然有一定的重要性。由此，殖民政府不能简单地认定人们由于害怕中国政府接管香港，因而会必然地对它服从。香港过去的历史也显示，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也会使政府的日子难过。由于国际舆论一般不同情殖民主义，再加上中国政府在殖民政府倒行逆施的时候，可能将被迫干预香港事务，因此香港如果出现任何带有反殖民性质的严重动乱，即使港人并非要求推翻殖民政权，殖民管治者也会陷入很困难的境地。所以，中国因素只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利于殖民政权认受性的重要因素，但不足以保证殖民管治不会受到港人的挑战。

我们的研究表明，民众对香港政治制度的信任度，特别是对港英政府的信任度，与殖民政权认受性有很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殖民管治在改变香港华人的政治文化上取得了一些成果，这可以反映在民众把法治看得比人治更重要一事上。港人倾向于认为，对于一个好政府而言，好的制度比能干的领袖更重要。这一论断更可以从实际证据中显示出来。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如果香港要管治得好，究竟好的政治领袖较重要，还是好的政治制度较重要呢？”54%的受访者认为好的政治制度较为重要，而25.3%则认为两者同等重要，只有11.6%认为好的政治领袖较为重要。这些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半世纪以来通过法律及官僚管治香港的殖民政府已经在港人心目中获得一定的理解与尊重。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香港殖民政权的权威中，存在着一种法理性认受性（rational-legal legitimacy）。[19]

然而，在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功利考虑无疑在民众接受殖民政府的过程中

占有关键位置，从而也间接深深地影响了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民众对殖民政权的接受，代表着他们对政府行政表现的欣赏，特别是这些表现对他们切身感受到的个人及社会状况的影响。套用埃茨奥尼（Etzioni）的概念，殖民政权的权威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功利性服从”（utilitarian compliance）（即服从合乎自己的利益）之上的。[20]换句话说，港人支持殖民政权，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政府的管治中得到好处。

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各种政权都依靠提供物质好处给人民的能力来营建它们的认受性。所以，韦伯（Weber）把权威划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及魅力型3种，对于解释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受性而言，这种分法变得越来越失去意义。维迪希（Vidich）提出以下意见：

根据韦伯所定的正式类别，认受性的基础是由主观上笃信魅力、传统或法理的有效性所提供的。在先进的工业文明世界中，所有这些信念对于维系权威来说似乎都不是必要的。它们已经被工业化真正带来的好处或承诺带来的好处所补充，甚至取代。对权威的认受而言，人们对更高消费标准的预期，比魅力、传统或法理似乎更具广泛重要性。无论是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还是在第三世界，个别领袖的任何言行都不及政治或经济工作表现重要。作为一股力量，人们对自我利益的理性盘算，可能比他们对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及法制价值观念的信任更为强大。[21]

香港的独特情况减轻了人们对殖民主义的耻辱感。所以，虽然香港是殖民地，但殖民政权认受性的主要基础，与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权基础相类似。最令人惊讶的是，在最后几年里，殖民政权的权威虽然正在下降，但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民众接受度。相比较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执政政权则黯然失色。

由于殖民管治行将结束，有两个问题变得迫切。第一，在迈向回归的过程中，殖民政权的认受性将会如何？第二，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殖民政权所享有的认受性，对新的继承政权将有何影响？我们打算在这儿对这两个问题做简单的初步探讨。

对于殖民管治最后几年的政治认受性问题，我们可以这样预期：时日无多的港英政府，其权威不可避免地会逐步下降，除非能够通过更佳的行政工作表现来将之提升。港人普遍认为，政府的权威正在下降，其自身也没有办法将之恢复。在调查中，有62.1%的受访者觉得政府越来越没有权威，只有28.9%对此表示异议。在觉得港英政府丧失权威的受访者中，92.6%担心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社会将出现更多冲突；61.2%认为政府应该对挑战其权威的人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反对这样做的则为25%；57.3%认为政府没有机会重振权威，对此持乐观态度的只占28.2%，这对于在未来数

年维持殖民政权认受性来说最不利。

另外，在调查中，有66.8%的受访者对港督的权威下滑表示惋惜。他们认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对港督没有以往那么尊重，是不健康的现象，只有19.9%持不同意见。

随着回归临近，政治犬儒心态自然会持续增加。民众对英国人的意图越来越怀疑，这会进一步削弱殖民政权的认受性。公务员的士气低沉，也会削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侵蚀殖民政权权威的根基。自然地，权威下降对政府的工作表现也一定会产生不良效果，因为政府会越来越缺乏能力去应对反对其行政决策的人，以及果断地推行公共政策。

虽然我们预期从现在到回归，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会持续下降，但最有可能的是，认受性会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水平。由于行将撤离的政权在港人心目中仍然享有认受性，所以承继的新政权将会面临如何为自己营建认受性的问题。由于殖民管治的完结并非源于民众的要求，因此新政权无法借助反殖民情绪来建立认受性。此外，新政权还可能被港人视为认同中国内地利益，甚至是受到中国政府引导，从而遇到认受性的问题。再者，殖民政权继续享有认受性，也妨碍了本地领袖的出现，这是因为港人还不能肯定本地有志从政人士是取代殖民政府以推行“港人治港”的合适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殖民政权在撤离前不会感到有交出权力的迫切性。结果是，在殖民地统治者离去后，新政权所遇到的认受性问题，不会因加入有民望的本地领袖而有所纾缓。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殖民政权的认受性是非常狭隘地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功利考虑之上，因此港人很有可能在回归后对新政权也有相似的期望。所以，如果未来香港的经济继续保持繁荣，而特区政府的行政工作表现又基本上令人满意，那么新政权的认受性问题应该不会太严重。但是，如果新政权希望其认受性能够达到殖民政权在全盛时期的程度，它便需要进行大量工作，以消除民众对中国政府对港政策的疑虑。但无论如何，即使能够取得成果，恐怕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

因此，在殖民管治刚完结的一段日子里，新政权在港人心目中的认受性很可能不及旧的殖民政权。就这点而言，香港与其他殖民地有所区别，因为其他殖民地在脱离原来宗主国宣告独立时，新政权的威望一般来说都会比旧殖民政权高。

章末注

1.Lau Siu-kai，“Hong Kong‘s‘Ungovernability’in the Twilight of Colonial Rule，”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Robinson（eds.），*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Washington, DC：The AEI Press，1994），pp.287-314.

2.Lau Siu-kai，"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1，No.2（1992），pp.3-20.

3."普遍支持"是指在人民中间存在着一份对政治权威的良好态度或善意，这会令他们接受或容忍一些实际上反对的公共政策。David Easton，*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p.267-288.

4.除1985年和1986年的调查，其他都是全港性调查。所有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回应率是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计算：（1）1985年调查在观塘区（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区与住宅区混合的小区）进行，完成767个访问，回应率为46.9%。（2）1986年调查也在观塘区进行，完成539个访问，回应率为67.4%。（3）1988年调查完成396个访问，回应率为61%。（4）1990年调查完成390个访问，回应率为69.8%。（5）1991年调查完成401个访问，回应率为55.8%。（6）1992年调查完成868个访问，回应率为55.4%。受访者的社会经济背景，与1991年香港人口普查所得相似。

5.Albert Memmi，*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Boston：Beacon Press，1965）.

6.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74；Lau Siu-kai，"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The Hong Kong Chinese View of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3，No.2（1990），p.197.

7.Lau Siu-kai，"Political Attitudes，"in Lau Siu-kai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1990*（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p.132；Lau Siu-ka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Asian*

Survey，Vol.34，No.3（1994），pp.243-257.

8.Lau Siu-kai et al.，“Political Attitudes，”in Lau Siu-kai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1988*（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1），p.184；Lau Siu-kai，“Political Attitudes，”in Lau Siu-kai et al.（eds.），*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Hong Kong1990*（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2），p.135；Lau，“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9.Lau Siu-kai，“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Hong Kong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Pacific Affairs*，Vol.65，No.2（1992），p.231.

10.Seymour M.Lipset and William Schneider，*The Confidence Gap*（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11.Lau，“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pp.5-6.

12.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p.69-117.

13.有关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详细讨论，可参考：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2-214；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Li Fu Chen，*The Confucian Way*（London：KPI Ltd.，1986），pp.413-448；田广清.治国古鉴[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14.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83.

15.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Asian Survey*，Vol.30，No.8（1990），pp.766-781.

16.Lau Siu-kai，*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2-115；Lau and Kuan，*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pp.80-88.

17.Lau，“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18.Amitai Etzion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61），p.14.

19.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299.

20.Etzion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p.14.

21.Arthur J.Vidich，“Legitimation of Regimes in World Perspective，”in Arthur J.Vidich and Ronald M.Glassman（eds.），*Conflict and Control*：*Challenge to Legitimacy of Modern Governments*（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9），p.301.

---

1. 本文与关信基合著，原以英文发表，刊于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Colonial Legitim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No.1（1995），pp.79-102。中文版曾以“香港人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及殖民地政权的认受性”为题，刊于《广角镜》，第252期（1993），80-93页；现在的译本再经修订。

第12章　旧政权与特区政府的政治认受性问题(注)

1997年7月1日，香港结束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殖民管治，它的600多万华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是，与其他殖民地人民在脱离殖民管治并宣告独立时的态度不同，港人对新政府的态度明显不是热情澎湃。民众在特区政府成立时不冷不热的态度，与香港回归祖国所代表的历史意义，及其在内地人民间所激发的民族自豪感对照，显得很不相称。香港特区政府虽在理论上是“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原则的最佳体现，但从第一天起，它便需面对如何在一个惶惑不安的社会中建立政治认受性的严峻考验。

尽管特区政府在1997年7月1日才正式就职，但其实当一个由400位香港社会经济精英组成的推选委员会于1996年6月推选航运业巨子董建华为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时，特区政府便已产生。推选委员会的组成受中央政府影响甚大。中央政府希望看到香港特区最高与权力最大的职位，由一位既能维持香港稳定繁荣，又能照顾中国根本利益的人士出任。董建华以其正直、老实、诚恳、温和及慈祥的个人形象，以及对儒家美德的推崇，的确获得了港人一定的认可。港人当然也十分明白，董建华不会把港人利益置于中央政府的利益之上。在中英政权交接前的6个月里，董建华及其团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当然，信心的逐渐恢复主要是由中英关系在1996年年底逐步正常化带来的。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前夕对香港所采取的务实与克制策略，与此也大有关系。

民众在回归时对殖民管治的怀念，及对与中央政府、工商界关系密切的特区政府的疑虑，难免会对新政权造成困扰。由于董建华作为政府行政首长缺乏政治经验，而且缺少强大及有组织的政治支持基础，因此令特区政府的政治认受性问题更为棘手。不过，通过维持原有公务员体制的完整性、委任一些亲英政治人物进入管治团队、承诺保留旧政权的基本政策，以及宣示特区政府要在社会经济领域有所建树等措施，董建华政府从过去的殖民政权也“借”得一些认受性。当然，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董建华作为行政长官的选举基础较狭隘，加上他的政治观点保守，其政府肯定得不到社会进步分子的钟爱。

由于香港殖民管治的结束并非来自港人的要求，而殖民政权的威信即使在最后岁月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不错水平，[1]因此港人难免经常把特区政府与港英政府比较。事实上，董建华政府也深刻了解并关注到，港人不断将特区政府的工作表现与被过分“美化”的港英政府表现对比。香港是一个高度多元复杂的社会，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得到全体市民的爱戴。殖民政权及董建华政府既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那么新政权必然要为自己培植新的

政治支持基础，当然，这个基础一定会与旧政权的有重叠之处。新政权需小心周密地设计它的管治哲学及政策方针，以争取在政治态度上有可能成为新政权忠实支持者的人。因此，要了解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基础、未来香港的管治方式以及回归后影响香港有效管治的种种因素，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与分析港人对新旧政权的取态。为实现研究目标，我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对华人居民进行了一项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其他辅助数据则取自我与其他学者以往的调查发现。[2]在以下的论述中，除非另外注明，所有数据都来自1997年调查。

对殖民管治的缅怀

作为殖民地，香港与其他殖民地有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即在其整个殖民历史中，管治从未受到殖民地人民的重大挑战。相反，香港的经济奇迹、社会稳定、法治、个人自由及免于中国内地的政局动荡等状况，一般都被认为可归功于殖民管治。即使《中英联合声明》已明确决定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命运，香港仍充斥着一种渴求维持殖民管治的情绪，虽然这种情绪正在淡化。在1992年的调查中，多数受访者（38.9%）赞同保留香港为英国殖民地；持反对意见者则稍少一些（32.1%）。考虑到有15.8%的受访者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因此可以说：保留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回归前5年符合多数港人的意愿。[3]

当民众逐渐接受香港行将回归中国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而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又逐步回升后，[4]港人对殖民管治的缅怀也缓缓减退。尽管如此，在回归前夕的调查中，我们仍发现，有29.3%的受访者赞同保留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但不同意者占多数，有47.5%，模棱两可者则为10.8%。随着民众对保留香港殖民地身份的意向淡化，民族自豪感也逐渐上升，有多达46.5%的受访者对香港结束殖民管治及回归中国表示高兴，意见相反者则占较少的34.2%。

不过，与特区政府政治认受性有密切关系的是，民众依旧对殖民管治者给予高度评价。66.5%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对香港的管治做得好，认为做得不好的则仅有2.1%。虽然不少港人不满英国在处理香港回归时把英国的利益置于香港利益之上，但有相当比例受访者（32.8%）认为英国在撤出前，对港人有履行管治的道义责任；不以为然者则稍多，占39.2%。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纵使殖民管治的终结激发了港人的民族感情，但一般人依旧对英国人在香港的管治印象良好。民众对旧政权的缅怀，无疑对特区政府在营造政治认受性方面的努力构成阻力。至少在民众的心目中，1997年的政权转变并非一桩热切期待的事。

对政治体制的有限支持

与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相比，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特区政府为该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代表进步与倒退。香港特区成立时正式就任的临时立法会，比诸其所取代的殖民地立法局，是以一种民主程度较低的选举办法产生的。[5]相反，特区的行政长官虽然只是由一个规模小且带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选举团选出，但与纯粹由英国委派而无须获港人同意的最后总督彭定康相比，董建华理应有更大的民意授权。

由于港人普遍对中央政府缺乏信任，而中央政府又在选拔行政长官及成立临时立法会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大体上港人认为回归前的政治体制比回归后的好。比如在此次调查中，较多受访者（40.9%）认为回归前的政制比回归后的好，而认为回归后的政制较好者仅有12.8%。调查也发现，民众对香港政治体制的支持有下降趋势。在1995年的调查中，63%的受访者同意以下说法："虽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不同意者仅占20.1%。两年后，同意"虽然《基本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但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这已经是最好的了"这一观点的人有49.2%，反对者则为26.5%。

尽管民众对回归后政治体制的支持下降，但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始终比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更受支持。同意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受访者有28.7%，反对者则为34.9%；相比之下，仅17.3%同意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不满者则多达40.8%。

虽然特区的政治体制不为港人所喜，但董建华政府的保守性，其狭隘的精英支持基础，以及《基本法》均令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只能缓缓前进。随着特区的成立，港人拥有的示威、游行及结社权也因"国家安全"的理由在法律上有所收紧。所以，从借助推动民主发展及维护人权以强化认受性而言，特区政府难以与港英政府媲美，更遑论超越了。

除了民主基础不足外，特区政治体制以及董建华政府的认受性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港人普遍认为特区的政治体制是由中央政府设置的，目标是在香港建立一个拥护中央的政权。在过去10年，港人大多视内地与香港为互相矛盾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持此看法的人逐渐减少。在1995年，有60%的受访者认为内地与香港的利益有冲突，不以为然者则有25%。到了1997年，认为两地利益有冲突的受访者下降至44.8%，认为没有冲突者则猛升至前所未有的40.2%。这个发展趋势明显表示，回归前夕中央政府采取务实手段以争取民心的策略取得一定成效。

不过，在回归之际，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受访者中，不信任中央政府者（30.3%）比信任者（25.7%）多。同时，较多人（36.9%）相信特区政府会优先照顾中央政府的利益，而非港人的利益；而认为它会把港人利益置于中央政府利益之上的人则有32%。此外，大多

数人（72%）认为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有较大甚至很大的影响力。总的来说，由于港人普遍相信特区政府偏袒中央政府，因此特区政府要建立认受性便倍加困难。

新政权对政治认受性的追求

在各种困难与限制面前，特区政府以自身优势为基础，采取3个策略以求建立政治认受性。策略的最关键部分在于向港人宣示新政权获得中央政府的全面信任，因此它不仅能防止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也可取得中央政府的协助来解决香港本身的问题。旧殖民政权在其最后岁月里与中央政府发生严重冲突，香港也因此蒙受重大损失。新政权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由中央政府扶植，并深受器重，民众因此普遍预期特区的成立不单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带来和平，双方也会合作愉快。在政权交接前，中央政府的确与董建华政府积极配合，国家主要领导人也多次公开赞扬董建华的表现，其目标在于建立董建华在香港的声誉与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董建华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的确有助于他在香港争取认受性。调查发现，认为董建华及特区政府在政权交接前工作做得好的受访者（24%）比认为做得不好者（17.3%）多。这一发现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受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政权寻求政治认受性的另一个手段是竭力宣扬中国传统价值观。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董建华的亲密政治盟友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但他的确尊奉并大力宣扬传统美德。董建华所宣示的管治哲学明显带有传统色彩，不过他的政治思想缺乏系统性与严谨性。在董建华的讲话中，集体主义、家庭、和谐、和平、孝道、敬老、仁爱、社会责任、谦逊及正直等传统价值观随处可见。[6]董建华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是个实行仁政的家长型政府。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冲突（尤其是政治冲突）绝无仅有，人民尊重并顺从政治权威。从表面上看，在高度现代化及西化的香港，董建华的管治哲学是落伍的，而且与社会相抵牾。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往的屡次调查发现，传统思想在香港华人的思维中仍然强固。[7]在政权交接时，董建华的思想显然对民众仍有广泛吸引力。

大多数受访者（69.7%）同意“好的政府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只有17.3%反对家长型政府。同样地，大多数受访者（68.2%）同意政府应立法处罚不肯赡养父母的人，反对此建议者则仅占21.5%。港人也热切希望政府能作为人民的道德表率及训导者，同意“好的政府会教育人民如何好好做人”的受访者（75.6%）远比不同意者（12.4%）多。

当被要求在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中做选择时，港人比较推崇前者。当被问及中国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何者比较适

合香港需要时，较多受访者（32.1%）选择中国传统思想，31.1%认为两者同样重要，而认为西方思想较适合的则有27.4%。更具体而言，只有极少数受访者（14.1%）认为个人自由比社会秩序重要，持相反意见者多达59.1%，而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的则有23.7%。至此，香港华人重集体而轻个人的倾向显而易见。在比较人权与民众利益孰轻孰重时，44.7%的受访者认为民众利益应在人权之上，持相反意见者仅有23.7%，25.7%的人则认为两者有相同重要性。这些调查发现显示，在很多方面，董建华的传统心态与港人的主流思想相符。这种领导人与人民在思想心态上的共通性，为新政权在争取认受性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潜在资源。

尽管如此，港人的思想在某个重要方面远非传统守旧。大多数受访者不同意以下观点：“政府行政首长如同大家庭的家长，一切大小公共事务都应该听从他的决定。”少于1/3的受访者（27.9%）表示愿意听从政府的任何决定。因此，董建华不能轻易地假设人民会千依百顺，并以此作为建构其政府认受性的基础。要换取人民对他的支持，很明显，他只能切实执行所宣示的宽厚政府承诺。

毫无疑问，在中英政权交接时，港人对新政权能否实践其管治哲学并非信心十足。不过，由于董建华的个人形象蕴含着真诚、正直、谦厚、随和与勤恳等特质，因此民众对其政府在实行仁政方面事实上也有一定信心。

新政权在寻求政治认受性过程中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对港人承诺特区政府会在经济、社会及民生方面有所建树。回归前，香港长期受到一些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民生问题的困扰，[8]港英政府又没有好好予以正视。对董建华政府来说，那些问题正好提供机会，让它可以寻求民众支持。事实上，虽然英国人在回归前的10多年中试图通过高姿态的民主改革去强化管治权威，但港英政府的政治认受性基础始终源于它在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上所取得的成就与所显示的能力。[9]在特区成立之初，香港的立法机关（临时立法会）在民主本质上，与殖民时期的立法局相比显得力有不逮。因此，新政权更迫切需要依赖工作表现来建立政治认受性，以弥补其在推动民主改革上的能力有限。在正式就职前，董建华明确表示，房屋、教育及老人问题乃新政府的施政重点，他也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以强化香港经济竞争力及改善人民生活为己任。在香港经济旺盛，而特区政府又从港英政府手上接收大笔财政盈余的情况下，对一般港人来说，董建华的承诺可以信赖。因此，董建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符合港人的意愿。当被问及一个好的政府应首先关心哪个问题时，34.5%的受访者选择社会稳定、33.4%选择民生问题、20.5%选择经济发展、5.4%选择人权自由、1.7%选择民主发展。同样地，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个人自由及民主政府当中，52.6%的受访者认为社会稳定最重要，而认为经济繁荣、民主政府及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则分别占23.3%、10.4%及7.7%。考虑到港人的务实取

向，新政权尝试以政绩为基础建立政治认受性应该有较大的成功机会。

事实上，以传统价值观及以政绩来争取民众支持，这两方面的策略是互相关联的。在传统的思想中，仁政是指政府能在物质上及精神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有效的表现有助于产生道德权威。若要人民接受大量权力集中在国家机器手上的事实，那么统治者必须证明它是运用这些权力为人民的整体利益服务。政府及其所置身的政权在这方面的成败，将决定其能否取得人民的拥戴。”[10]

新旧政权的认受性基础

尽管中央政府意欲并承诺保持香港原来的体制结构及生活方式在殖民管治结束后50年不变，但由于新旧政权的管治理念有异，两者的政治认受性及支持基础自然也不一样。

在中英政权交接前夕，殖民管治下的港英政府得到52.8%的受访者信任，而表示信任特区政府者则有31.7%。考虑到港人依然缅怀殖民管治，而且对特区政府仍普遍存有疑虑，因此这项发现不足为奇。

重要又值得留意的反而是，民众对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的信任有正向关联。也就是说，人们若信任港英政府，也会信任特区政府。此外，就民众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如年龄、性别、学历等）而言，信任旧政权者的背景与信任新政权者的背景在很多方面相似。港人大体上以他们对港英政府过去的表现及对特区政府未来表现的估计作为准则，决定他们对两个政府的信任度。因此，受访者若认为港英政府在一系列事情上表现良好，他们会较倾向于信任旧政府。这些事情包括：改善市民生活、建立廉洁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法治、推动民主发展、保障人权与自由、提供社会福利、推行道德教化，以及与中国内地建立良好关系。同样地，估计特区政府未来会在这些事情上表现良好的人，也会较倾向于信任新政府。从表12-1可以看到，受访者认为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都有能力改善市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法治及提供社会福利。但他们相信旧政府的强项在于建立廉洁政府、推动民主发展及保障人权与自由，但在推行道德教化及与中国内地建立良好关系方面则表现较差。特区政府的强项及不足之处刚好是港英政府的弱项及长处。

表12-1　对港英政府过去表现及特区政府未来表现的估计（单位：%）

	好		普通		不好		不知道	
	港英政府	特区政府	港英政府	特区政府	港英政府	特区政府	港英政府	特区政府
改善市民生活	54.9	37.2	35.2	37.8	6.5	8.1	3.3	16.8
建立廉洁政府	71.5	24.4	19.3	33.7	2.9	21.3	6.3	20.7
推动经济发展	75.3	49.1	17.5	29.0	2.6	5.0	4.6	17.0
保持社会稳定	64.2	47.2	29.7	32.1	3.0	6.4	3.1	14.3
维护法治	63.6	34.1	29.0	36.5	2.4	12.0	4.9	17.3
推动民主发展	42.6	11.7	35.1	30.5	8.1	36.8	13.7	20.4
保障人权与自由	53.7	15.1	32.7	34.7	4.2	30.1	9.0	19.8
提供社会福利	41.3	29.8	42.2	43.1	12.4	10.3	4.0	16.7
推行道德教化	21.8	37.2	45.9	37.7	22.6	6.8	9.7	18.1
与中国内地建立良好关系	18.4	71.8	40.5	14.3	31.8	1.8	9.1	12.0

虽然分别信任新旧政权的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彼此间仍存在差异。信任特区政府的受访者一般对香港的前途较有信心、较相信“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落实、对中国的前途较具信心、较信任中央政府、较信任董建华，以及较认同“中国人”（而非“香港人”）为自己的主要身份。他们对香港也具有较高的归属感、较反对香港继续保留为英国殖民地、对香港回归感到较高兴、对作为中国人觉得较骄傲、较认为内地与香港不存在利益冲突、较相信特区政府能比英国人更好地管理香港，并且会照顾民众利益多于富人利益、较支持回归后的政治体制与政治领袖，以及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信任旧政权的受访者则是较信任英国政府且对殖民管治缅怀的人。由此可见，新旧政权支持者之间的主要分别在于政治态度方面。很明显，大多数港人持有促使人们支持旧政权的政治态度。因此，旧政权比新政权更受民众信任，便不足为奇。

尽管调查发现旧政权比新政权较得民众信任，但同时意外地发现董建华，一位政治新手，竟然比末代港督兼政坛老手彭定康得到更高的民众支持。在受访者中，表示信任董建华的有26.4%，信任彭定康的则只有21.5%。民众对董建华的较高信任也在另一调查发现中得到体现。表示支持董建华治港方针的人（24.7%）比支持彭定康的（22.8%）稍多。此外，与信任新旧政权的正向相关不同，信任彭定康与信任董建华两者的关系是负向相关的。换句话说，信任彭定康的人一般不信任董建华，反之亦然。很明显，董建华与彭定康的政治支持基础不一样。统计分析显示，信任特区政府的人与信任董建华的人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不过，信任董建华的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更为热衷，董建华的支持者倾向于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视为父子关系、认同好政府应教导人民如何好好做人、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比西方思想更适合香港的需要、置民众利益于人权之上，以及认为与民主发

展与人权自由相比，经济发展、民生问题及社会稳定更应受到好政府的关注。

相反，信任彭定康的受访者较有可能具有以下特点：对香港的前途缺乏信心、信任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确曾履行对港人的道义责任、希望香港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支持彭定康所推行的民主改革、不相信新政权在管理香港上会比旧政权做得好、认为回归前的政治制度比回归后的好、信任回归前的政治领袖、认为民主政府比任何一种政府优越、认为民主政府比经济繁荣及社会稳定重要、认为人权比民众利益重要，以及相信西方思想比中国传统思想更适合香港的需要。

显然，彭定康及董建华的支持者的政治价值观有很大分歧。西化程度较高、民主化取向较强的人倾向于支持彭定康；反之，董建华的支持者则多来自尊崇传统价值观人士，他们同时有较浓厚的民族意识。由于大部分港人都接受传统价值观，所以董建华很自然地比彭定康更受港人欢迎，纵使他与新政权有密切关系。

除较少人认同西方思想的因素外，彭定康个人声望受到影响，也因民众相信自身利益因他在任时与中央政府对抗而受损。29.4%的受访者认为彭定康政府所推行的政制改革对香港有利，但认为不利的人也有19.4%。从表12-2可以看出，民众对其切身利益的忧虑的确影响了他们对彭定康的信任。一般来说，对香港各种状况满意的人较信任董建华而不信任彭定康。毫无疑问，在现实情况下，有既得利益的人较倾向于抱怨彭定康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表12-2　社会满意现况与信任董建华及彭定康的关系（单位：%）

	董建华		彭定康	
	信任	不信任	信任	不信任
经济状况	34.2	22.5	28.9	31.7
治安	38.8	18.4	—	—
政治状况	44.7	14.0	32.2	33.1
交通	38.7	21.2	29.8	33.2

（续表）

	董建华		彭定康	
	信任	不信任	信任	不信任
房屋	44.4	19.2	32.9	29.2
医疗服务	37.6	18.1	29.2	34.8
教育	36.8	20.9	30.7	33.1
社会福利	42.5	16.1	34.2	30.7
就业	42.9	16.5	31.3	29.3
文娱康乐	34.6	20.6	27.7	32.0

注：表内只包括在卡方检定中显著度小于0.05的变项的数字，回答信任度为“普通”者亦没有列出，下同。

重要的是，在民众心目中，旧政权与彭定康并非完全等同，虽然事实上信任港英政府的人也倾向于信任彭定康。通过表12-3可以发现，认为港英政府在建立廉洁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及维护法治几个方面政绩良好的人，却较不信任彭定康。相反，正如表12-4所示，如果受访者估计特区政府在未来表现良好，现在便会信任董建华。

表12-3　正面评价港英政府过去表现与信任彭定康的关系（单位：%）

	信任	不信任
改善市民生活	31.6	27.1
建立廉洁政府	27.0	29.6
推动经济发展	27.1	30.0
保持社会稳定	27.9	30.5
维护法治	27.6	30.4
推动民主发展	30.3	28.6
保障人权与自由	31.5	27.0
提供社会福利	35.9	26.3
推行道德教化	38.0	29.6
与中国内地建立良好关系	44.7	22.0

表12-4　正面评价特区政府未来表现与信任董建华的关系（单位：%）

	信任	不信任
改善市民生活	45.2	12.7
建立廉洁政府	57.5	9.2
推动经济发展	38.0	17.0
保持社会稳定	40.5	16.3
维护法治	49.0	10.5
推动民主发展	62.2	9.5
保障人权与自由	61.7	9.6
提供社会福利	49.2	12.8
推行道德教化	43.7	18.3
与中国内地建立良好关系	32.3	24.2

上述调查发现显示，与对待港英政府的态度不同，港人对彭定康的态度是矛盾的。部分港人可能被彭定康的民主言论及亲民作风所吸引，但另有相当部分港人（包括赞同其政治立场的人）不满他处理与中国内地关系的手法。不少人对香港与中央政府对抗深以为忧，认为此举非香港利益所在。因此总体而言，彭定康个人所得民众的信任低于他所领导的殖民政府。

在个人社会经济背景方面，信任港英政府者与信任特区政府者分别不大。两个政府都得到年龄较长及学历较高者的信任。不过，信任彭定康的人及信任董建华的人有显著分别。总体来说，与彭定康的支持者相比，董建华的支持者年龄较长、学历较低且家庭收入较少，这些人较易受到董建华的传统思想所感染，同时，他们对董建华在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要上抱有较大期望。

结论

过去董建华不止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是“新加坡立国之父”李光耀的仰慕者。作为一位笃信以优良政绩为基础实践家长式仁政的人，董建华与李光耀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李光耀“通过向人民承诺卓越的经济表现来迫切争取人民对其统治的认同，因此他的政策需要特别针对一些严重社会问题以求取得实质结果……人民行动党政府意图将其管治的认受性置于以下基础之上：一，通过一个有效率且相对（如非完全）廉洁的政府来建构政治秩序。二，通过一个有爱心的（如非完全宽厚的）家长式政府向人民做出为民造福的承诺。”[11]事实上，作为典型的华人政治领袖，董建华与李光耀都是运用现代包装来实施中国传统治道的人物。[12]

就政治认受性而言，香港特区新政权的处境，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独立

时的处境相比，更为艰难。董建华政府不能依靠过往辉煌的政绩来树立威望，也没有一个团结又受人民拥戴的政党受其指挥。董建华是政坛新丁，又厌恶政治。最重要的是，董建华不是一位经由人民普选产生的行政首长，民众对其政府拥护中央及亲工商界的倾向存有疑虑。同样重要的是，民众对殖民管治残存的缅怀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新政权造成困扰。

在这些不利因素下，目前董建华所制定的管治方针恐怕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蓬勃的经济发展、高效率又尽忠职守的公务员队伍、庞大的财政储备等有利条件下，新政府应有能力在社会中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支持基础。我在特区成立前夕所做的民意调查发现，董建华以传统思想号召及对有能力政府的承诺，的确能为特区政府奠定良好根基。董建华积极塑造的个人政治形象，成功地增加了港人对其政府的期望。虽然民众仍较信任旧政权，但董建华能在个人威望上胜过彭定康，这本身便很不简单。

不过，新政权寻求认受性所使用的策略是否有效，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良好的经济增长及充裕的财政储备。新政府还要在解决香港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及民生问题上显示有效率与能力。另外不可缺少的是，香港继续享有高度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只有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后，新政权才可以继续获得工商界及普罗大众的政治支持，抗击来自进步精英分子的挑战。当香港的经济表现不好，新政府财政拮据，而其行政表现又被视为无能时，整个建立认受性的策略便会瓦解。

自1997年10月以来，香港饱受亚洲金融风暴及一连串不幸事件（禽流感肆虐、巴士意外丛生、医疗机构屡次出错）的蹂躏，特区政府以及董建华个人的民望也急剧下降。值得留意的是，董建华民望的下降速度比特区政府慢。这个事实显示，董建华对传统价值观的推崇，在支撑其民望方面仍然发挥作用。毕竟在艰苦时刻，港人热切渴望新政府是个不折不扣地实行家长式仁政的政府。如果董建华不能信守承诺，民众不单会因期望破灭而迁怒于政治认受性仍然脆弱的特区政府，而且最终会毁灭一位意图以传统思维作为其认受性基础的政治领袖。

章末注

1.Lau Siu-kai，“Democratization and Decline of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Democratization*，Vol.3，No.2（1996），pp.158-180.

2.所有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调查的总体是年满18岁的香港华裔居民，样本为概率样本。首先由港英政府统计处协助，在全港以分区等距方式抽取居住单位地址；其次是抽选住户，如果已选取的居住单位有超过一

家住户或为一群体住户（如宿舍），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抽选表，抽选其中一家住户或一位符合资格人士接受访问；最后是抽选受访者，如果已选取的住户有超过一位符合资格人士，访问员将利用基什方格（Kish Grid）抽选其中一位接受访问。回应率是扣除无效和没有使用的住址后计算：（1）1992年调查完成868个访问，回应率为55.4%。（2）1995年调查完成408个访问，回应率为61.5%。（3）1997年调查完成701个访问，回应率为49.7%。

3.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Colonial Legitimacy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1（1995），pp.79-102.

4.53.4%的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的前途有信心，表示没有信心的只有11.1%，另有32.1%表示其信心一般。

5.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除负责选举首任行政长官外，还负责选举临时立法会全体（共60名）议员。

6.可参见：董建华.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的香港[M].香港：政府印务局，1996：5、10.董建华.追求卓越、共享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行政长官董建华演辞[M].香港：政府印务局，1997.

7.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

8.Lau Siu-kai，“The Fraying of the Socio-economic Fabric of Hong Kong，”*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p.426-441.

9.Lau and Kuan，“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Colonial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10.Muthiah Alagappa，“Introduction，”in Muthiah Alagappa（ed.），*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The Quest for Moral Author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

11.Khong Cho-oon，“Singapore：Political Legitimacy through Managing Conformity，”in Muthiah Alagappa（ed.），*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pp.112-114.

12.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

1. 本文曾刊于刘兆佳.香港人对新旧政权的态度及特区政府的政治认受性问题[M]//刘兆佳，尹宝珊.华人社会的变貌：社会指标的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8：169-188.

第13章　中国传统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注]

中国文化不利于民主发展吗？这个问题不易解答。中国文化的含义丰富，到底是哪些内容产生了什么作用？民主发展的含义也不简单。当代民主化理论主张分清“建立”“巩固”与“扩展”等方面，因为不同的过程涉及不同的规律，不能混为一谈。大体上，现代化理论倾向于论述民主建立，而文化理论则较注重民主巩固。前者认为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经济成长等力量会带来社会结构和规范的巨变，尤其是社会多元化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最终促成民主制度的建立；后者主张任何政治制度需有相对应的文化才能顺利运作。因此，把民主制度移植到专制的文化土壤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文化不利于民主发展”这个命题的正误涉及文化（主观思想）、社会经济变迁（环境条件）、现行政治制度（权力的游戏规则）和政治领导（制度选择与运用）之间的复杂关系。理清这些关系着实超过本文能力。这里只能就较具体问题，即中国传统政治取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提供一些观察，希望有助于探讨文化与民主的关系。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中国传统政治取向对政治参与有消极影响。换言之，传统政治取向被视为因素，政治参与被视为结果，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较重要者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现代化等，我们都得在推论过程中控制好。

有关传统政治取向和政治参与的数据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的调查，样本根据成年人口随机抽样建立。[1]样本有效总数分别是3360人、1402人和892人。调查是在1993年（台湾与香港）和1994年（内地）进行，方式是面对面的访谈。

我们的推论基础是三地的比较。三地的文化传统基本上应当一致，但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程度和政治制度方面有显著差异。因此，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取向与政治行为间的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应可以分辨出传统、现代化和制度的个别效果。

然而，我们的推论结果并不足以证明“中国文化不利民主发展”这个命题正确与否。因为传统政治取向只是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环节，而政治文化也不能等同于文化。虽然我们认为提出这个命题的人多半是暗指传统的政治文化，或称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传统不利于民主发展。

此外，我们虽可以指定政治参与涵盖民主的两个主要角度，即参与和竞争，但政治参与不能等同于民主发展。例如，把政治参与的研究聚焦到竞

争性，甚至反对性参与的现象，便能一针见血地捕捉到民主精神。然而，民主发展不仅仅是参与制度与行为上的发展，还涉及法治精神和多种自由制度的发展。因为后者的落后，前者也不可能健全。[2]

基于上述限制，我们的分析结果如同盲人摸象，不一定能摸到全貌。但愿这些区区贡献能引发更多的研究与讨论。

传统政治取向的意义与测量

中国传统政治取向的基本内容是“道德国家”。这个源于乱世的大传统有着极强烈的秩序关怀，例如务求在五伦之中，各安其分以达致和谐。差序结构带来专制独裁的倾向，最后有赖伦理教化的制约。一切伦理教化从个人的修养做起，推演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者不求以力压人，乃求以德服人。君子似风、小人如草，为官者就像家里的长者，立道德榜样，爱民如子。这种国家观念是为道德国家，与以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国家、现代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都相去甚远。

以上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是否仍然存在于中国人心中？这是个很难测量的问题。问卷调查方法要求把复杂的观念化为一般人能理解的陈述，但具体陈述永远表达不了丰富的理论，甚至有以偏概全的风险。因此，一个思想观念应尽量用很多表达不同意义的陈述来代表。问题是，调查访问时间有限（尤其是在像香港这样生活繁忙的大都市），而且陈述问句的数目越多，调查的边际效益越累减。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选择了9个陈述句来代表中国的传统政治取向，在实地调查时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

这些陈述句都在表13-1中详细列出，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它们简称为：道德政府、道德领袖、道德自主、国家优于个人、我为国家、精英主义、家长主义、稳定优于多元、稳定优于民主。

第八句和第九句表达的是传统观念中的秩序情结。严格来说，这是秩序情结的现代版本，因为多元和民主的概念，在大传统思维中纵然存在也无关宏旨。第六句和第七句表达的主要是差序结构的非道德伦理部分。勉强地说，第六句也许可以和“君子之德如风”之类的想法扯上关系，而第七句也许可以反映中国传统上把国事家事化的倾向。第四句和第五句是对集体主义与集体认同的测量，由于传统思想中集体轴心定在家，而不在国，所以这两句把轴心定在国家概念上存在一些问题；不过，我们的演绎既然是政治取向，即政治文化，而非较广义的文化，那么这两句的提法是可以接受的。至于前3句正是道德国家的扼要陈述，当然，道德自主是道德国家的反义语。

表13-1　传统政治取向（单位：%）

		内地	台湾	香港
社会上道德风气败坏是政府的错	（道德政府）	82.2	52.7	23.9
只要有品行端正的领袖，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公共事务托付给他们，我们不必多给意见	（道德领袖）	71.3	48.0	27.2
一个人的品行好坏是他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政府不该过问	（道德自主）	37.4	56.1	48.8
先有个人，才有国家，个人是国家的根本	（国家优于个人）	81.7	30.5	24.9
不要问国家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要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我为国家）	86.7	60.7	57.5
教育程度高的人，应该对政治有更大发言权	（精英主义）	66.9	31.3	44.5
政府行政首长正如大家庭的家长，一切大小事情都该听他决定	（家长主义）	73.6	30.1	24.0
在一个地方有许多不同的团体出现，会影响地方的安定与和谐	（稳定优于多元）	42.6	54.3	41.6
如果进一步推行民主化会影响内地/台湾/香港的安定	（稳定优于民主）	31.6	21.7	26.1

注：表内数字是回答“同意”和“很同意”的受访者占比。第三句（道德自主）和第四句（国家优于个人）的数值经反向编码以代表传统取向。

政治参与的意义与测量

民众企图影响政府行为的任何活动都属于政治参与。[3]这是非常广泛的说法，在一些方面和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看法有重要区别。

首先，西方有关政治参与的主流研究重点在于选举以及与选举有关的行为，例如，竞选、助选活动。本文并不注重任何特定的参与模式。其次，西方的研究多数局限于合法的参与活动，而我们并不管行为是否违法，都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例如，示威抗议可能是非法行为。最后，西方学者大多只对企图影响决策的行为感兴趣，而我们的兴趣点则包括企图影响政策执行的行为。

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西方学者多数研究成熟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即民主参与，而我们则对非民主或正在民主化地方的政治参与更感兴趣。民主参与的研究视民主制度为当然，公民的参与，尤其是对决策的参与，要求足够的制度供应，例如，选举、创制、公决等制度，因此无需进行非法活

动，或在民主理论中较为次要、企图影响政策执行的活动。我们关心的是民主化中的华人地区，这是过渡政治的研究，民主参与的制度不能视为当然，甚至纵然已引进选举制度，但参与平等的原则尚未贯彻（如香港），或者由于制度的地域、事务或运作上的局限，有可能流于形式（如内地乡村）。换言之，在普遍情况下，民众有必要利用任何机会，突破官民间的差序结构，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类活动不能不当作政治参与，而且在民主化理论的研究中至为重要。

根据上述理论精神，我们选择了27种行为作为研究对象。[4]它们可以通过统计学上的因素分析被归类为投票、竞选、请愿、用关系、找对手出头和抗议六大参与模式。[5]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解释。然而，找对手出头模式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包括8种活动，其中除了“到领导家软磨硬泡”外，都涉及找可能与政府抗衡的人或制度出头，其中火药味较浓的有“找反对党帮忙”和“到法院告状”两种；至于“找政治组织”“找民意代表（议员）”或“找工会/农会”表达意见这3类活动也许不一定有对抗政府的味道；“写信到报社投诉”及“向投诉信访机关投诉（检举）”则处于以上两极之间。

两岸三地的政治参与比较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3个华人地区的政治参与频率。表13-2清楚显示了三地政治参与模式的异同。

表13-2　政治参与（单位：%）

	内地	台湾	香港
投票	59.1	91.0	29.6
竞选	24.2	36.3	9.2
请愿	42.7	11.2	13.7
用关系	14.4	7.6	6.3
找对手出头	8.7	6.1	12.9
抗议	4.8	1.4	14.2

注：表内数字是回答“有参与”的受访者占比。

首先，投票是6种参与模式中最重要的，这一点三地都一样。但是，三地的差异才最有趣。对台湾而言，政治参与的特色全都集中在投票及与竞选有关的活动上，其参与频率之高应有资格问鼎世界冠军。我们相信原因来自制度方面。这是台湾民主化阶段的第二届“立法院”选举，新鲜的激情推

动参与活动。相比之下，香港第一届立法局地区直选只有39.1%的投票率，可以说非常冷清。这只怪香港的民主化有“和稀泥”特征。要知道，立法会60个席位中，只有18席由地区普选产生，这样的安排对政府组成和公共政策都不会产生影响，理性选民当然不会投票。内地选民参与投票及与竞选有关的活动的频率都比香港高，除了因内地的有关尺度包含两层选举外，也跟制度安排存在动员成分有关，这方面在后面还会谈到。

就差异而言，内地民众的政治参与以请愿和用关系两种比较传统的模式为主，其中请愿最为突出，约43%的受访者都参与过这种活动。在民主参与制度不健全和传统政治取向充斥的条件下，这些模式的流行可以理解。不过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打算在此提供有关的实证分析。

最后，香港民众的政治参与特征是没有单一突出模式。请愿、找对手出头和抗议的出现频率都差不多。有意义的是，和其他两个地区比较后可以发现，港人喜欢对抗式的政治参与。在选举制度不健全但自由制度有基础的环境下，抗议应是政治参与的合理出路。

三地的传统政治取向

在研究设计之初我们估计，香港因受社会经济现代化及教育西化的影响甚深，因此政治取向应最不传统。而台湾由于国民党长期维持专制统治及宣扬儒家传统价值，政治取向应最传统。至于内地，因有革命在先，社会主义教育在后，估计传统的政治取向较难有生存空间。这些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从表13-1看出，其结果是：内地民众最传统，香港民众最现代，台湾民众居中。内地在道德国家观的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取向[6]达成共识的程度，[7]约为香港的3～4倍。这是本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显然，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并没有发挥破旧立新的功用，传统的道德国家文化只是换上了一件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外衣。

比较而言，港人的现代化大概也源于独特的政治经验。他们比较倾向于个人主义，受不了道德政府、道德领袖、家长主义的说法。这也难怪，港英政府、英国派来的高官终究都是外族统治，哪怕施政多么英明和有效率，最后还是不可能得到道德认可。

至于台湾，正是政治变迁使民众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民主化巨浪下，精英主义难有市场，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带来个人主义与集体认同的紧张，大约一半的人认同道德政府和道德领袖的信念，也许是因转变方向而产生迷惑的反应。

最后，不要忽略三地唯一相同的信念。仔细观察表13-1有关秩序情结与民主化关系的态度取向可以看出，三地的数值在所有取向数值中差异最小。

这说明民主的普遍性价值已深入中国人的内心，只有两到三成的受访者会为稳定而赞成牺牲民主发展。民主得不到发展，错不在人民！

政治取向的社会经济基础

两岸三地在中国传统价值取向上的显著差异正好说明了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种现行文化都可以找到传统的影子，也受到新经验的洗礼。在上一节，我们通过比较三地的传统政治取向，寻找有关制度经验的差异作用。在这一节，我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对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可见表13-3。我们把政治取向分成三大类：现代取向、过渡取向和传统取向。[8]然后对它们和代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变项（例如，学历、年龄、居住地、[9]职业[10]和性别[11]）进行相关分析。

表13-3提供的重要信息是，社会经济现代化会消灭传统价值取向。属于传统取向的往往是学历低、年龄大、住在农村、从事非白领工作的人。现代化力量在香港尤其重要。香港的学历与政治取向的相关系数（-0.566）约是内地的3倍、台湾的1.5倍。而职业方面，香港的相关系数（0.217）约是内地的两倍、台湾的2.5倍。

表13-3　政治取向的分布（单位：%）

	传统取向			过渡取向			现代取向			（人数）		
	内地	台湾	香港	内地	台湾	香港	内地	台湾	香港	内地	台湾	香港
学历												
没上学	52.0	13.9	17.3	41.1	50.2	38.7	7.0	35.9	43.9	(1 047)	(223)	(173)
小学	53.7	20.9	10.5	39.2	42.4	40.0	7.1	36.7	49.5	(899)	(335)	(190)
中学	43.2	11.7	4.3	41.8	32.1	17.9	15.0	56.1	77.7	(1 251)	(588)	(368)
专上	24.2	6.9	1.3	46.7	19.4	6.3	29.1	73.8	92.5	(86)	(248)	(159)
（Gamma：内地 = −0.178***，台湾 = −0.341***，香港 = −0.566***）												

（续表）

	传统取向			过渡取向			现代取向			（人数）		
	内地	台湾	香港	内地	台湾	香港	内地	台湾	香港	内地	台湾	香港
年龄												
18～30岁	42.1	8.2	2.6	42.9	27.0	14.0	15.0	64.8	83.3	(1 378)	(341)	(228)
31～40岁	52.8	9.6	5.6	39.0	31.3	24.3	8.2	59.2	70.1	(686)	(387)	(284)
41～50岁	52.2	14.7	8.8	40.2	40.0	25.3	7.7	45.3	65.9	(479)	(225)	(182)
51～60岁	56.9	19.6	14.6	36.7	40.2	33.7	6.4	40.2	51.7	(368)	(189)	(89)
60岁以上	49.9	20.1	15.9	42.8	44.0	39.3	7.3	35.9	44.9	(374)	(259)	(107)
(Gamma：内地＝0.153***，台湾＝0.284***，香港＝0.374***)												
居住地												
农村	51.0	14.0	—	39.7	42.5	—	9.3	43.5	—	(2 288)	(515)	—
乡镇	32.4	15.7	—	54.7	40.2	—	13.0	44.1	—	(136)	(127)	—
小城	42.6	12.1	—	44.8	32.6	—	12.6	55.3	—	(489)	(463)	—
大城	45.4	13.3	7.6	38.9	24.6	24.6	15.8	62.1	67.8	(372)	(293)	(890)
(Gamma：内地＝－0.142***，台湾＝－0.174***，香港＝不适用)												
职业												
白领	36.4	12.8	3.1	45.9	27.8	16.8	17.7	59.4	80.1	(2 909)	(468)	(351)
其他	49.9	13.6	10.6	40.4	38.9	29.7	9.8	47.5	59.7	(376)	(933)	(539)
(Eta：内地＝0.102***，台湾＝0.085***，香港＝0.217***)												
性别												
男性	48.5	13.2	7.0	39.6	32.9	22.3	11.9	53.9	70.7	(1 682)	(709)	(460)
女性	48.1	13.5	8.3	42.5	37.4	26.7	9.4	49.1	65.0	(1 602)	(692)	(430)
(Eta：内地＝0.015，台湾＝0.037，香港＝0.056)												

*p＜0.05　***p＜0.001

注：人口少于100万算小城，100万及以上算大城。

传统政治取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本章重点在于探讨中国传统政治取向是否对三地的政治参与有抑制作用，依变项是政治参与指数，由6种参与模式组成。这个假设的求证可以分两步进行。首先，我们只看这两个现象之间是否有关系。其次，我们会控制学历（代表现代化的作用）观察原来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分析结果列在表13-4中，其中括号内数字是净相关系数（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即控制了学历的影响后，剩下的传统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12]

表13-4　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

	内地		台湾		香港	
个人社会经济背景						
学历	0.18***	0.23***	0.20***			
年龄	−0.01	(−0.11***)	0.06*	(−0.13***)	−0.10**	(0.03)
职业	0.14***	(0.07***)	−0.26***	(0.18***)	0.11**	(−0.00)
性别	−0.13***	(−0.09***)	−0.17***	(−0.15***)	−0.07*	(0.00)
居住地	0.11***	(0.06**)	0.07**	(−0.01)	—	
收入	0.02	(0.00)	−0.09**	(−0.05)	0.02	(−0.02)
政治认知心理						
政治兴趣	0.30***	(0.25***)	0.37***	(0.35***)	0.32***	(0.33***)
政治效能感	0.13***	(0.11***)	0.24***	(0.17***)	0.24***	(0.20***)
传媒使用	0.20***	(0.15***)	0.25***	(0.14***)	0.23***	(0.18***)
政治知识	0.15***	(0.04**)	0.23***	(0.10**)	0.17***	(0.07)
组织						
社会参与	0.16***	(0.11***)	0.20***	(0.21***)	0.24***	(0.20***)
党员身份	0.23***	(0.21***)	0.20***	(0.16***)	0.00	(−0.02)
政府输出	0.09***	(0.06**)	0.18***	(0.01**)	0.20***	(0.17***)
政治恐惧	−0.02	(0.01)	0.07*	(0.07*)	−0.17***	(−0.13**)
传统政治取向	0.04*	(0.04*)	−0.06*	(0.02)	−0.17***	(−0.08)

*p＜0.05　**p＜0.01　***p＜0.001

注：表中数字是皮尔森相关系数；括号内数字是控制学历后的净相关系数。

首先，单独来看，传统政治取向对政治参与有影响，但不大。表13-4中，有关传统政治取向的皮尔森相关系数除香港外均非常微弱。可见，传统政治取向在现代化最高的香港更能发挥抑制政治参与作用。奇怪的是，传统政治取向在最传统的内地居然能促进政治参与。我们将在后面解释这个矛

盾。

其次，控制了学历的影响后，情况是否不一样？答案是肯定的。参考括号内净相关系数，在香港和台湾，传统政治取向本对政治参与有负面影响，控制了学历因素后，这个影响完全消失，这表示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学历为代表）在发挥作用。依然奇怪的是，在内地，不管人们的学历是高还是低，传统政治取向都有助于政治参与，这个难题以后再解。[13]

表13-4除列出所有与传统政治取向有关的数值外，还提供了其他可能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以便我们辨认两岸三地的异同。[14]相同的方面是学历与政治兴趣都促进了政治参与，而且政治兴趣最有效（包括控制了学历之后）。不同之处包括：一，党员身份只在内地有显著动员政治参与的作用，在其他两地并不显著。二，只有在台湾，职业（是否白领）可以解释政治参与频率的差异。[15]三，社会参与，即民众是否参加社会组织，对台湾和香港民众的政治参与有正面影响。更有意思的是，社会参与作用在台湾并不因学历的高低而减弱。[16]四，香港的特色在于混杂，影响民众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样的，除了和其他两地共通的学历和政治兴趣外，还包括政治效能感、[17]传媒使用[18]和社会参与。

传统政治取向与制度动员

上文提到了一个理论与实证的矛盾。理论上，传统政治取向应不利于政治参与。实证结果是，在内地，传统取向高的人，政治参与频率也高，而且这个关系丝毫不会因学历的差异而变化，也就是说传统政治取向对政治参与有独立的影响，不受现代化干扰。为什么？解答这个疑团，要从制度和政治参与模式入手。

我们在上文提过6种政治参与模式。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模式涉及不同的难易程度、不同的资源需要，甚至不同的政治风险。例如，投票是比较不花费时间和其他资源，而且政治风险较低的行为；相反，抗议需要付出更大的资源代价，并且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我们可以假设，由于政治参与模式不同，各种影响参与的因素的效能也不同。

再者，我们相信制度安排差异会影响政治参与。制度是一种诱因结构和规范结构，既可以剥夺某种参与途径，也可能提供某种参与机会，甚至有时候通过规范（公民责任）或赏罚（强制投票）来动员民众的政治参与。我们假设，具有传统政治取向的人较易被政治制度动员。

首先让我们看看，政治参与模式不同时，传统政治取向是否不一样。表13-5的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在控制了学历的影响后，投票、与竞选有关的活动和请愿等参与行为与传统政治取向有正向关系；用关系、找对手出

头和抗议等参与行为则与传统政治取向无关。也就是说，传统政治取向和整体政治参与指数的正向关系，主要由前3种参与模式（尤其是与竞选有关的活动）决定。

表13-5　内地的传统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模式

投票	0.04*	(0.04*)
竞选	0.08***	(0.09***)
请愿	0.03	(0.04*)
用关系	0.00	(0.02)
找对手出头	0.02	(0.03)
抗议	-0.04*	(-0.03)
政治参与指数	0.06***	(0.08***)

*p＜0.05　***p＜0.001

注：表中数字是皮尔森相关系数；括号内数字是控制学历后的净相关系数。自变项是传统政治取向，依变项是6种政治参与模式和政治参与指数。

可是，为什么传统政治取向会对现代参与模式，例如，投票和竞选等，有促进作用？[19]我们的假设是因为制度动员。可惜的是，我们在设计研究时，未能预计到这些制度对不同参与模式（尤其是有关竞选活动方面）的动员作用。因此，我们事后不能对其进行因应分析。幸运的是，我们针对投票参与的原因包含了“无法选择，上级要求我去投票”的选项。我们可以根据这一问题的回答，把内地的选民分成自发投票者和动员投票者，然后再论证传统政治取向是否对这两种选民有不同作用。分析结果（见表13-6）是，具有传统政治取向的选民倾向于被动员投票，而具有非传统政治取向的选民则多属于自发投票。

表13-6　内地的选民类型与动员选举（单位：%）

	自发投票	动员投票	(人数)
传统政治取向的投票者	89.9	10.1	(1 233)
非传统政治取向的投票者	95.7	4.3	(2 063)

注：卡方值（x^2）＝42.7，自由度＝1，显著度＜0.001。

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简单总结为5点。

第一，就政治取向而言，内地人最传统，港人最现代，台湾人居中。

第二，单独来说，中国传统政治取向对香港和台湾的整体政治参与有消极影响。

第三，控制了现代化（以学历为指标）的影响后，上述影响在两地完全消失。可见，现代化力量对政治参与（引申而言，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和台湾、香港两地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取向对内地人民的政治参与有积极作用，而且丝毫不受现代化力量的干扰。

第五，这个违反有关理论假设的内地现象可以通过制度动员来解释。内地当年还是一个动员政体（movement/mobilization regime），特定的制度安排可以动员群众从事特定行为，例如投票。而这种动员作用对持有传统政治取向的人比较有效。

中国文化是否不利于民主发展？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分析结果做出以下推测。中国传统政治取向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能也是内容上与民主最不相容的一系。政治参与是民主发展必须处理的一个环节，尤其是竞争式、反对性的参与。我们发现，传统政治取向虽不利于提升政治参与，但作用有限，并随着现代化而消失，正如香港和台湾所显示的那样。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中国文化不利于民主发展”的命题。何况文化同源的台湾，不正是建立起民主制度，刚刚经历和平的政府交替，并进入民主巩固期吗？

更重要的是，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因为随着政制改革、新经验累积，文化内涵会发生变化。德国的民主化经验最能发人深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建立了新的民主制度，它的崩溃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文化土壤结不出民主果子的例证。“二战”结束后，西德在盟军的强制下恢复了民主制度，即联邦德国，东德在苏联的扶植下建立了民主德国。西方学者一直担心联邦德国会步魏玛共和国的后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也发现，西德人欠缺公民文化有可能危及民主稳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的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发现，西德人的公民文化已和英美人并驾齐驱，首次证实民主制度的发展足以改变不民主的传统文化。更有趣的是，东西德统一后，两地政治文化研究发现，东西德人由于过去政治生活的差异，经历的制度不同，所以对民主的理解有显著不同。前者较看重以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后者则较看重以社会权利为主的民主。这项研究再次证明，东西德人虽然文化为同源，但制度差异可以影响文化的发展轨迹。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把原先的命题倒过来问：民主发展是否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持，而有助于新文化的开拓？

答案之一还在于制度的革新和政治领袖的胆识。我们曾提到中国传统的政治取向可以被制度利用，成为有利于某种动员式政治参与的工具。同样地，有胆识的政治领袖，也可以设置新制度来改变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上文也提到两岸三地人民都已接受民主观念，不认为应为稳定而不追求民主发展。显然，民主发展的责任不在于人民的政治文化不够成熟，而在于政治领袖对权力、利益的迷恋。有远见、有胆识的领袖，应改革教育制度让我们的后代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改革大众传播制度使信息得以自由流动，改革政党制度让人才从公平竞争中成长，改革选举制度让人民真正可以当家做主。

章末注

1.内地样本不包括西藏。

2.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民主化有往前和往后之分（forward vs.backward democratization）。早期英美等国家的民主化是先具备了法治与自由的基础，然后才发展参与制度，例如普选制度。后期所谓“第三波”的民主化，却是一步到位开展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但是竞争、反对性的选举参与得不到法治与自由的保障。因此，“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还需要往后补课，跟进法治与自由的调养。

3.这里的政治参与，并不包括企图推翻现行政权的活动，例如，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自成一个研究领域。

4.这27种行为中，“参加村委会选举”和“在单位按章工作”是内地特有。“找经办人的上司直接谈判”和“找反对党帮忙”是台湾特有。因此，香港的总体政治参与尺度只包括23种行为，台湾和内地包括25种行为。

5.“投票”在内地包括村委会和地方人大两个层次的选举，台湾指的是“立法院”，香港则为立法局。“竞选”尺度是5种有关活动的总和。“请愿”尺度包含5种（适用于内地与香港）或6种（适用于台湾）行为。“用关系”尺度是4种活动的累加。“找对手出头”尺度有6种（适用于香港）或7种（适用于大陆与台湾）行为。“抗议”尺度是两种（适用于台湾与香港）或3种（适用于内地）行为的总和。

6.这里指的是道德政府、道德领袖、家长主义等方面。

7.一个社会里的人如果有70%或以上共同持有某一种特定信念，我们就可以说该社会在这方面有共识。

8.这3种取向类型的尺度经4个步骤建立起来。首先，正如表13-1的注释所

述，有关道德自主和国家优于个人两项陈述句所取得的回答数值，需要反向编码以保证所有正价值都表示传统取向。其次，若所有陈述的回答是“很不同意”，重新定值为-1.5，“不同意”为-0.5，“同意”是0.5，“很同意”为1.5。然后所有9题陈述的回答值加起来。最后，凡是总值在0或以下的定为现代取向。1.51及以上的定义为传统取向，其余是过渡取向。

9.居住地可以测量城市化的影响。

10.职业反映经济由农业社会，经历工业化，再走向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此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白领）常被视为支持民主化的重要阶层。

11.性别并不能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虽然后者对两性平等有重要贡献。而两性平等化后对政治参与的性别差异有影响。表13-3显示了性别与政治取向毫无关联。

12.比较理想的办法是执行多变项的回归分析（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这样既可以清楚确定传统政治取向为因、政治参与为果，也可以检验其他可能的解释。但由于进行各种假设中的自变项（传统取向、组织因素等）与假设中的依变项（政治参与）间散点图（scatterplot）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关系呈现非线性（non-linear）特征，违反回归分析的基本条件。因此，决定改用净相关分析（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的方法。相关分析只能找出关系是否存在，并不能确定因果的方向。

13.根据表13-4第一列学历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系数，内地的数值也是最小。这是否意味着内地教育不是很强的现代化工具？

14.在比较三地的异同时，我们把净相关系数不达0.18者视为关系不显著。

15.广义地推论，香港的中产阶级不是民主化的有效推动力量，而内地的中产阶级恐怕还未成长为有效力量。

16.进而言之，社会参与连同职业（白领）的作用一块考虑可以得出如下假设：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社会运动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一种独立于现代化影响的力量。

17.政治效能感是由4个问题的回答值累加组成的。问题1是“我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参与政治”，问题2是“我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内地/台湾/香港）所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问题3是“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决策没任何发言权”，问题4是“我认为政府官员并不太在乎我这类人的想法”。回答的选择

是“很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很同意”“不知道”“拒答”。

18.传媒使用是指受访者在过去一周看报纸、看电视和听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的频率，以天数计算，3种传媒加总达成传媒使用尺度。

19.假如请愿可以被算作一种自古以来已有的政治参与模式，那么它和传统政治取向成正比应是理所当然的。

---

1. 本文与关信基合著，原以英文发表，刊于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1，No.31（2002），pp.297-318。中文版曾以“中国传统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为题，刊于《二十一世纪》，总第64期（2001），61-71页；现在的译本再经修订。